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在亚洲

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寻求真相


ISBN 978-7-5108-1498-3

9 787510 814983 >

定价：78.00元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在亚洲

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在亚洲 / 沈志华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7

（沈志华冷战史文集）

ISBN 978-7-5108-1498-3

Ⅰ. ①冷… Ⅱ. ①沈… Ⅲ.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亚洲—文集 Ⅳ. ①D83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6965号

冷战在亚洲

作　　者	沈志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33.25
字　　数	5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98-3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为此，我社把沈志华教授1994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根据“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五大主题编辑为五册，以飨读者。除了对冷战史这个广泛领域中许多不同事件或过程的描述，这些论文集也收入了沈教授对同一论题在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内容显得重复，但更多的是对历史过程表述的细微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恰恰显示出随着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而反映出来的冷战史研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了解这一历程可能更为重要。同时，在每一册中，作为附录，我们还挑选了沈教授整理、编辑的部分国外档案文献，相信对学者的研究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州出版社

目 录

三八线的由来及其历史作用 / 1

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 10

——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

一、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 / 11
二、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 / 15
三、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 / 18
四、苏朝联合发动进攻 / 23

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 27

一、形成决策的前提 / 29
二、改变决策的动机 / 34
三、保证决策的条件 / 42

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 50

——试论朝鲜战争起因与斯大林的决策动机

一、艾奇逊的演说触动了斯大林的神经？ / 51
二、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返回安理会？ / 52
三、斯大林真的要推动亚洲革命吗？ / 58
四、斯大林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 68

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 / 73

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 / 92

一、越过三八线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 92
二、战局变化推动的政治决策 / 99
三、影响美国决策的制约力量 / 103

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 112

一、中国无意介入朝鲜冲突 / 113
二、战争初期的军事防御战略 / 119
三、毛泽东四次下决心出兵 / 123
四、中国领导人的深层忧虑 / 130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 135
——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

一、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关于中苏对朝鲜冲突方针和策略的变化 / 136
二、毛泽东决心派兵入朝作战：关于 1950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的争论 / 144
三、中国入朝作战的困难和条件：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 / 150

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 / 159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 173

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 / 182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解密档案

一、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 183
二、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 186
三、金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 189
四、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 192
五、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 197
六、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 202

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 / 206

——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

一、1949年中苏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立场 / 207
二、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经过 / 209
三、苏联代表为何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 / 211
四、中国决策出兵朝鲜的复杂过程 / 218
五、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入朝作战的原因 / 225

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 231

一、印度政府的调停尝试与美国的反应 / 232
二、毛泽东决定打过三八线再谈停火问题 / 234
三、十三国停火建议与中国的最初回应 / 238
四、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与联合国停火议案的提出 / 242
五、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及其策略考虑 / 246
六、中国错失了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 / 250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 257

一、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 258
二、美国为实现对日媾和而拖延停战谈判 / 263
三、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 267

1953年朝鲜停战 / 273

——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一、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 274
二、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 280
三、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 288

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 296

——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

一、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 296
二、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 304
三、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 308

附录

俄国档案馆关于朝鲜战争的解密文件 / 313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最后阶段的俄国档案文献 / 475

人名译名对照表 / 514

三八线的由来及其历史作用

三八线与朝鲜战争密切相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三八线究竟是如何划定的？划分三八线本身到底说明了什么？三八线与朝鲜战争之间内在的和本质上的联系在哪里？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都有不同的说法，其结果对于分析战后远东局势的走向又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朝鲜这个曾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中国的王国便受到了日本的统治。1910 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使它成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盟国首脑在商议战后国际安排时也谈到了朝鲜的命运。在 1943 年 11 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对朝鲜问题是这样说的："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①] 在紧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又与斯大林讨论了朝鲜的前途问题。斯大林说他看到了《开罗宣言》，并说朝鲜应该获得独立。他还同意在朝鲜能获得完全独立以前，需要有那么一段准备时间，也许需要 40 年。[②]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再次谈到朝鲜问题。2 月 8 日罗斯福与斯大林举行会晤，在两人谈过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以后，罗斯福提出讨论领土托管问题，并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拒绝过美国在 1944 年 3 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

---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407 页。

②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 年（据 1956 年英文版译），第 374 页。《开罗宣言》是在征得斯大林认可后于 12 月 1 日发表的。

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①]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 1945 年 5 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没有改变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②]

然而，由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起了远东军事和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于是在四大国尚未就朝鲜的托管问题达成具体协议之前，首先要解决美国和苏联分别在朝鲜半岛对日本军队进行受降以及实行军事占领的问题。这时，便引出了三八线的划分问题。

北纬 38 度线原本是一条自然的和地理的划线，虽然在朝鲜境内的这条长约 300 公里的无形的划线将朝鲜半岛分为面积大体相同的两部分，但是其本身并没有任何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人为地从军事或政治上利用这条划线，最早是由日本和沙皇俄国提出来的。1896 年日俄密谋瓜分朝鲜，日本曾向沙俄秘密提出以三八线为分界线。1904 年日俄战争前夕，沙皇也曾做出决定，俄国只控制三八线以北，听凭日本在三八线以南任何地方登陆。但这两次划分均因双方利害冲突而未能实现。

真正使三八线成为从军事角度利用的分界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朝鲜驻军的兵力部署进行调整时实现的。1945 年 2 月，日本把部署在朝鲜半岛的日军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北部的军队归关东军指挥，南部的军队为大本营所属。后来，针对苏联可能参加对日作战的情况，日本大本营提出了把全部驻朝日军划归关东军指挥，并由朝鲜总督兼任关东军总司令官的方案。但 5 月 7 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带着这个方案去见裕仁天皇时，遭到天皇拒绝。[③] 这样，三八线在实际上就为后来苏联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对日本关东军作战，而美国则在南朝鲜和日本列岛与大本营直接指挥的日军作战提供了客观依据。

然而，三八线事实上被美苏两国加以利用，又有其突然性和偶然性。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前，美苏两国没有就各自的作战区域进行明确划分。在 1945 年 7 月

①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63–164 页，第 225 页。

②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375 页。

③ 金基兆：《三八线到底是如何划定的》，载韩国《新东亚》月刊，1993 年 12 月号。

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军事首脑曾同意，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苏两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其目的显然在于避免在战争中发生误会而混淆各自承担的责任。至于在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问题，则根本没有讨论。对于美国来讲，太平洋战争的核心是解决日本问题。因此，尽管当时的三军参谋长马歇尔要求杜鲁门授权麦克阿瑟在战争结束后的短时间内，派一个师在釜山登陆，此外还应占领汉城和清津，但那都是在结束对日作战之后的事。在波茨坦会议上，苏军总参谋长告诉马歇尔，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将进攻朝鲜，并问美军是否可以为配合这次进攻，在朝鲜海岸实施军事行动。马歇尔明确回答，在日本未被摧毁，日本在南朝鲜的军事力量未被消灭以前，美国不准备对朝鲜实施两栖作战。[①] 据杜鲁门回忆，那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杜鲁门确信，国际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过以三八线作为在朝鲜的分界线这个问题。[②]

苏联突然宣布对日作战和与此同时日本天皇决定无条件投降这两件事，[③] 使情况发生了急促变化。当苏联军队向满洲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时，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以外的冲绳岛。因而日本战争机构的突然崩溃，在朝鲜半岛造成了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由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具体分界线问题。

至于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的提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韩国外交协会会员金基兆提供的情况是：1945年8月10日凌晨6时左右，美国窃听到日本大本营发出的电报，电文内容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宣言。不久又截获驻朝日军司令官发给大本营的电报，电文说："苏联军队正大批进入朝鲜。如果美军进入这个地区，全体日本军队就可能向美军投降"。马歇尔获知这种情况后，立即召见作战局长赫尔及林肯准将，命令他们划出一条苏联攻入朝鲜时南下的界线，并指示美军也要即刻制订向南部朝鲜进军的计划。据说林肯准将接

---

① 詹姆斯·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二卷，王琪等译，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页。

②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375页。约瑟夫·格登提到，美国的军事顾问曾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向马歇尔提出沿三八线划分作战的界线，因为这条线大致上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参见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于滨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据1982年英文版译），第9页。但显然美国未曾向苏联提出过这个问题，其原因大概就是杜鲁门提到的情况。

③ 苏联出兵是在8月9日，日本公布天皇的投降诏书是在8月15日，但实际上在苏联出兵时，日本天皇已决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笔者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一文中对此已有论述。

受命令后回到办公室，偶然地从《纽约时报》上得到了划定三八线的启示。因为，《纽约时报》在报道苏军进攻情况时刊登的那幅地图，只画出了三八线以北的地区。于是，美国将军这个偶然的发现，便成为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的根据。①

施纳贝尔提供了另一种情况：日本突然投降促使美国迅速起草关于投降程序的“总命令第一号”，而这个命令的第一段便涉及到受降区域的划分问题，陆军部作战局为尽快搞出一份文件，一直工作到 8 月 10 日深夜。讨论的结果是盟国应在远东分几个区域受降，并且明确规定这些区域地理上的界线。政策组的负责人博尼斯蒂尔上校只有 30 分钟来起草命令第一段，国务院 – 陆军部 – 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正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最初，博尼斯蒂尔曾设想按朝鲜的行政区划来划分受降界线，但身边一时没有资料。后来他注意到北纬 38 度线差不多从朝鲜中部穿过，而且汉城及其附近的集中营都在三八线以南，于是他决定用三八线作为受降区域的分界线。②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和苏军已对日宣战并大举“涌进”朝鲜半岛的消息后，8 月 10 日深夜，美国国务院 – 陆军部 – 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在朝鲜的受降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助理国务卿邓恩、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和海军部高级官员巴德等五人。会上，邓恩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区去受降。但马歇尔的一位年轻参谋人员迪安·腊斯克上校指出，军方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美国军队在苏军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有困难。这时，麦克洛伊便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到第三休息室去，要求他们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于是，三八线就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匆忙地由两位美国上校提出来了。③

从资料来源看，第三种说法的真实性更可靠一些。不过，这些细节上的差别对于我们分析问题没有本质的影响。总之，这个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迅速得到美

① 金基兆：《三八线到底是如何划定的》。

② 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二卷，第 10–11 页。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6,* Washington D.C.: GPO, 1969, p.1039.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伍协力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据 1969 年英文版译），第 302 页；小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翟志海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年（据 1977 年英文版译），第 315 页；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9 页。

国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①]并于8月14日为杜鲁门批准。次日，杜鲁门便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杜鲁门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②]

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9月8日，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军队第7步兵师在仁川登陆。这是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这条约300公里长的分界线斜穿朝鲜半岛，它截断了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崇山峻岭，穿过181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公路和8条高级公路，以及6条南北铁路线。[③]显然，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来说，以及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三八线都是一条极不合理的分界线。但是，这并不表明匆忙划出的这条分界线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尽管美苏两国军队进驻朝鲜半岛时曾一致声明，三八线仅仅是两国军队在朝鲜驻扎时所划定的界线，并不具有政治意义。[④]但是事实上，特别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三八线对于所谓受降的军事意义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

---

① 三八线的草案送交参谋人员后，海军曾建议把受降线向北推到39度线。但战略与政策委员会的林肯准将认为由于39度线把大连和辽东半岛划在了美国占领区，肯定不会被苏联接受，国务院也赞同这一看法。于是，草案中仍然保留了三八线。见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二卷，第11页。

②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262–264页；南朝鲜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③ 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二卷，第13页。

④ 南朝鲜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第23页。

确认本身已经包含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很多研究者认为，三八线的划定只具有军事意义。如金基兆就认为，“以北纬38度线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决定性因素”，是“为阻止苏军南下”。他还引证说，驻南朝鲜美军司令官约翰·霍奇1947年10月27日和11月7日曾说过，以三八线分割朝鲜半岛，是由于驻朝日军的编制和部署所致；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局长沃尔特在1949年6月16日也说过：分界线是在日本军队的两部分之间划出来的。[①] 原苏联学者斯拉文斯基也断言，“接受日军投降是把朝鲜一分为二的唯一目的”，后来在冷战中，三八线才“成为南北朝鲜的边界”。[②] 俄国朝鲜问题专家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在刚刚出版的一部专著中仍然认为，三八线的划分“是一种非常性的临时措施，其目的是彻底击溃盘踞在那里的日本部队，并接受他们的投降”。[③] 如此来说明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划定只是从军事意义上考虑的，显然不能说服人。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界，首先考虑的是阻止苏军南下的军事意义，这一点无可置疑，但这不是最终的也不是决定性的考虑。如果不是孤立地或表面地看问题，那么就应该指出在军事意义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义。

第一，正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美苏等盟国对朝鲜问题的考虑，本身就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的。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想到日本会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才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仓促提出受降及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问题。

第二，美国方面在提出朝鲜分界线时就是有政治考虑的。早在1944年3月美国就开始考虑在朝鲜的军事占领问题。尽管朝鲜问题不是罗斯福战后远东政策的核心部分，但是他必须阻止苏联战后在朝鲜发挥统治作用的意图。罗斯福力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他曾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朝鲜可以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由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参加。他还曾向英国提出了这一建议。而美国国务院的计划甚至走得更远，它要求战后由美国对朝鲜实行统治，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美国参与在朝鲜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行动将大大加强它对朝鲜内部事务和对临时政府实行国际监督中发挥主要作用。该报告预计美国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而且可能会与将占领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面积的苏联共同实行军事占领。5月，

---

① 金基兆：《三八线到底是如何划定的》。

② *Славинский Б.*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53 гг.: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2, с.80.

③ *Торкунов А., Уфимцев Е.*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Москва, 1995, с.6.

国务院的另一份文件警告说，如果苏联独自占领朝鲜，美国认为这将会危及未来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这份文件及其他文件都提议，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而不是几个区域性政府分治。[①] 可见，美国在考虑军事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政治后果。

第三，美国在提出以三八线划界的方案时，绝不仅仅像金基兆所说，是"起因于一个美国军官的偶然发现"。尽管三八线的提出带有偶然性和突然性，而且也确实是首先针对受降问题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事实上，美国陆军上校们在划定分界线时，前提是要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方面的考虑"。[②] 三八线的划定，恰恰将朝鲜的旧都汉城和仁川、釜山两个重要港口都包括在美军受降的南部地区之内，这不是偶然的。提出三八线方案的腊斯克上校后来谈起过这件事，他在 1950 年 7 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如果这条线为苏联所拒绝，美军按实力并不可能到达这些地区。但我们认为把朝鲜的首都包括在美军管辖区内是很重要的，因此还是提出了这条线。"[③] 显然，对于首都汉城的考虑与国务院设想的"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方案是有直接联系的。很明显，如果这两个考虑都能实现，那么未来朝鲜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就将在美军管辖区内。这难道还不具有典型的政治意义吗？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怎样与美国勾心斗角的。

第四，苏联在接受三八线为界的方案时，也不是没有政治考虑的。的确，正如腊斯克估计的，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一点，不仅使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④]，而且也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⑤]。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以致斯大林可以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次战争不比从前了。现在是，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社会制度。"[⑥]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

---

① 参见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3-4 页。

②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9 页。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6,* p.1039.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6,* p.1039.

⑤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李庭植就曾撰文提出了这个问题。见 Lee Jeong-Sik, Why did Stalin agree for the 38th parallel,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85, Vol.4,* No.14。

⑥ 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谈话》，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据 1962 年英文版译），第 85 页。

上，作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在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时是有交换条件的。人们应该注意到，斯大林在 8 月 16 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 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2) 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第二点，他认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 斯大林最后还以强硬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① 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部分领土的占领。可惜，斯大林忘记了，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决不容苏联插手其间。在 8 月 18 日给斯大林的绝密电中，杜鲁门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点意见，即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受降地区，但对斯大林的第二点意见，则巧妙地加以拒绝。杜鲁门说，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盟国部队，"包括苏军在内"。② 斯大林一方面在 8 月 22 日复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即 8 月 20 日向苏联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北纬 38 度线以北。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拜访了麦克阿瑟，并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③ 这样，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终于受挫。但苏联在此前已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覆水难收。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把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所以说，苏联接受三八线也是有政治目的的，只是没有完全实现罢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三八线的划定，对于美苏双方来说，从一开始便有其深远的政治考虑，虽然表面上问题是从军事角度提出来的；三八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出现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成为美苏两国势力在朝鲜半

①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案》，第 267–268 页。

②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案》，第 268 页。

③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案》，第 269 页；南朝鲜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第 580–581 页。

岛对垒的既定疆界。

如果这些结论成立，那么就完全可以推断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美苏势力在远东的对抗，就表现为三八线的划定。历史证明，后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族的分裂也正是围绕这条纬线发展起来的。而涉及三八线的军事行动作为一条主线，也贯穿了朝鲜冲突和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南北朝鲜的军事冲突是沿着三八线展开的；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引起了美国全面卷入战争；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又迫使中国出兵朝鲜；中国军队因未接受停火协议而打过三八线，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麦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张越过三八线等战争叫嚣，被杜鲁门总统所罢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最后，战争的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作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这就是围绕三八线而进行的朝鲜战争的始末。

当然，从逻辑上讲，三八线的出现只是为未来南北朝鲜冲突以至爆发战争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美苏在远东的对抗，如果朝鲜民族的内部冲突没有激化，如果世界没有出现冷战局面，那么这种可能性就难以转化为现实性。可惜，历史是朝着与这些假设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

在对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课题。在90年代以前，国际学界存在着新旧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之分。① 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陆续公布以后，这些派别之间的界限模糊了，② 大多数学者认为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争，斯大林为北朝鲜开放了绿灯，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示同意和支持。③ 总体来说，这种分析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但是如果只是笼统地坚持这种说法，似乎证实了以往"共谋派"的理论。④ 所以，笔

---

① 对这四个学派的介绍可见：Kim Hakjoon，"North Korean Leader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

② 见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

③ 有关的国外研究论著有：*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 1993, №26; *Торкунов А., Уфимцев Е.*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Москва, 1995; E.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f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6-7, 1995/96; A. Mansourov, "Soviet-North 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1996.1; Park Mun Su,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Korea Observer*, *Vol.25*, No.3, 1994；V. Petro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3*, No.2, 1994; K.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Vol.2*, No.4, 1993;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Working Paper*, No.8, 1993; "Korean, 1949-50: 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④ 关于苏、朝、中共产主义集团共同策划了朝鲜战争的"共谋派"理论见Mineo Nakajima（中岛岭雄）："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 No.1. 韩国报纸在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时，其标题"三恶魔共谋发动战争"就说明，编者认为俄国档案的解密证实了"共谋派"的理论。笔者见到的是中译本。

者以为仍然有必要对某些细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北京在发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持的立场。[①]

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大量俄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②]对苏联、朝鲜和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过程中各自的作用、立场，以及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

1945年10月10日金日成率66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乘坐苏联"普加乔夫"号货轮在元山港上岸，不久后被苏联军政府选中，作为北朝鲜领导人。[③]苏联人所以要用金日成替换此前扶植的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与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有关。

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④]战后苏联在朝鲜的目标最初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⑤]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则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实行选举，并建立单独政府后，苏联又提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国撤军。莫斯科一方面满足于通过共产党对北朝鲜的控制，一方面相信金日成有能力对抗南方，因此可以实现其

---

① 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和9月号上，即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俄国外交部档案揭秘》，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攻台"补遗》。不过，作者当时利用的译文是根据韩国报纸发表的金泳三访俄时带回的200余件俄国档案翻译的，从后来俄国公布的档案情况看，这些文献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且只是摘要编译。所以，文章的作者对许多问题无法深入展开。

② 笔者近年收集到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5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原档复印件，现译汇编成册，见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以下简称《朝鲜战争俄档》），共17卷，未刊。

③ 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42–46页。

④ 参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第二章中"三八线的划定及其作用"一节。

⑤ 1945年9月外交部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外交部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4311, оп.1, п.52, д.8, л.40-43, 44-45。转引自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pp.9-11. 1945年12月10日马立克关于单一的朝鲜临时政府问题的报告，АВПРФ，ф.0102, оп.1, п.15, д.1, л.18-21。

在朝鲜半岛遏制美国而不发生直接冲突的设想。[①]

然而，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金日成始终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实现统一，而李承晚也主张加强军备，积极北进。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和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以后，朝鲜半岛的形势更趋恶化，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从 1949 年年初，苏联驻朝鲜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发来有关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告急电报。[②] 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依赖于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于是提出了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在遭到莫斯科的婉言拒绝之后，金日成便提出直接面见斯大林，以摸清苏联的意图和态度。[③] 但此时斯大林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一方面斯大林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意在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④]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了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⑤]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预的战争。在 3 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复表示满意。[⑥] 至于金日成所要求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只是同意帮助装备在三八线驻防的两个朝鲜警备旅，[⑦] 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清津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御。[⑧] 到 1949 年夏季，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美国撤军前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⑨] 据苏联

---

① 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二章中“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一节。

② 1949 年 1 月 27 日、2 月 3 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1 卷，第 120–122、135 页。1949 年 2 月 4 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1 卷，第 138-139 页。

③ 见 1949 年 1 月 19 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SD00206。

④ 详见拙文：《对 1948 年苏南冲突起源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⑤ 关于柏林危机的最新研究成果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3。

⑥ 1949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 д.346, л.13-23。应该指出的是，从档案文献看，斯大林与金日成并没有直接谈到发动战争的问题。

⑦ 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1949 年 2 月 3 日，《朝鲜战争俄档》第 1 卷，第 133–134 页；比留佐夫致什特科夫电，1949 年 2 月 4 日，《朝鲜战争俄档》第 1 卷，第 136–137 页。

⑧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第 68 号记录，1949 年 3 月 18 日，《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05–207 页。

⑨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4 月 20 日，АПРФ，ф.3, оп.65, д.839, л.13-14。

大使什特科夫和金日成的通报，“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将在7月发动进攻。[①] 但斯大林除了应金日成的不断要求，同意向平壤增加武器装备的援助，以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②] 莫斯科甚至批准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在美国撤军后，撤除苏联在清津港的海军基地及在平壤等地的军用机场的建议，以免这些设施被朝鲜人民军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③] 苏联此时的主张是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④]

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伟计划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转过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师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未结束，国家统一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⑤]。

尽管如此，金日成还不死心。面对来自南方威胁，金日成主张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为此，在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的同时，金日成于7月初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

① 1949年5月28日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和什捷缅科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45–246页。1949年6月18日、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58–261、280–282页。

② 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3, оп.65, д.839, л.13-14；1949年6月2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62–269页。此时苏联向北朝鲜提供的大量武器都是防御性的，武器清单见1949年6月4日缅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和戈洛温电，АПРФ，ф.6, оп.9, д.14, л.57。6月25日什特科夫的报告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南方的威胁”。见*Торкунов, Уфимцев*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с.20-21。

③ 1949年7月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75–276页。

④ 1949年6月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53–257页；1949年6月24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70页；1949年6月2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71–274页。

⑤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36–239页；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40–242页。

师配置在罗南”。[①] 做好准备之后，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②] 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应维辛斯基的要求对情况进行了核实后，[③] 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如果进攻顺利，“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但顿金本人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争必然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而北方军队还未强大到足以在速决战中取胜，同时，“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持久内战对北方都是不利的”。[④] 不过，什特科夫大使却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借口“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⑤] 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⑥] 莫斯科还是否决了金日成的计划。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

① 朝鲜人民军调动的详细情况见1949年6月22日、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62–269、280–282页。

② 1949年9月3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а, оп. 5а, п.4, д.11, л.136-138。

③ 1949年9月11日维辛斯基致顿金电，АВПРФ，ф. 059а, оп. 5а, п.3, д.11, л.45。

④ 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а, оп. 5а, п.3, д.11, л.46-53。

⑤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 3, оп.6, д.776, л.1-21。

⑥ 目前见到的莫斯科给平壤的指示至少有4稿，见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ф. 3, оп.6, д.776, л.33-38。

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①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② 但他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还是继续积极备战。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③

看来，金日成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等待莫斯科开放绿灯。

二、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

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年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就可以进入汉城”。④ 与苏联使馆人员采

① 1949年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1号记录，АПРФ，ф. 3, оп.6, д.776, л. 30-32。

②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352页。

③ 1949年10月26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10月31日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1月20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371、372-374、377页。

④ 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а, оп. 5а, п.3, д.11, л.87-91。

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一次斯大林却令人感到意外地改变了主意。经过一番考虑，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①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示同意在战争问题上帮助金日成。对此，金日成十分满意，并立即表示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②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看法？③

研究者注意到，此间发生了一件苏联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新条约的签订，而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之间谈判的结果是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2–3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④ 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除了已经既成事实的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是苏联外交部注意的目标了。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是必然结果了。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⑤

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便集中精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了。为了加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以及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同意金日成再组建3个步兵师，并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以便为新组建的部队购买

①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АВПРФ，ф. 059а, оп. 5а, п.3, д.11, л.92。

②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ВПРФ，ф. 059а, оп. 5а, п.3, д.11, л.93。

③ 显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9月24日政治局决议提出的条件根本没有达到。

④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⑤ 关于这一看法的详细论述见笔者提交"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的论文：《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

苏联装备。斯大林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替代了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① 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 月 9 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 1950 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 1.2–1.3 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 1.33 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② 莫斯科立即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 1951 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③ 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 月 20 日，金日成要求于 4 月初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④ 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于 3 月 30 日起程前往莫斯科。⑤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记录，研究者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据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报告，朝鲜北方和南方都正在为统一做准备，但形势对北方更有利。朴宪永则以热烈的言语描述了反李承晚政权的抵抗运动形势，他说：“人数达 20 万的南朝鲜共产党支部已经准备好在北方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着土地改革和其他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朝鲜领导人所不放心的只是不知道在统一问题上采取战争形式，朝鲜人民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对此，斯大林讲了拉伯雷《巨人传》中羊群的故事。他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跟着头羊，而不论头羊走到哪里。莫斯科担心的

---

① 1950 年 2 月 7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2 月 9 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АПРФ，ф. 45, оп.1, д.346, л.74-75，76。2 月 23 日什特科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а, оп. 5а, п.4, д.11, л.148。

② 1950 年 3 月 9 日、3 月 16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а, оп. 5а, п.4, д.11, л.149-150；АПРФ，ф. 45, оп.1, д.346, л.133-140。

③ 1950 年 3 月 12 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3 月 18 日斯大林致金日成电，АПРФ，ф. 45, оп.1, д.346, л.141，142。

④ 1950 年 3 月 21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94-95。档案原件所附清单为手写稿，没有签名和注明日期。根据内容判断为什特科夫电报的附件。

⑤ 沃尔科格诺夫曾提出，金日成在 1950 年 2 月还去过一次莫斯科（见 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Seoul，1991），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是否会出兵干涉。据金日成的译员文日回忆，金日成立即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其理由在于，这是一次果断的突然袭击，因为将会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进行起义，加上南方游击队对朝鲜人民军的支持，进攻将在三天之内取得胜利。这样，即使美国有心干预，也没有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和部署。① 此外，1966年苏联外交部曾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其中提到这次会谈时金日成向斯大林提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部署，即朝鲜政府准备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1) 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2) 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3) 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该报告确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②

总之，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是在1950年1月至4月间决定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发动一场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的。显然，与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防御和退守政策③的同时，苏联直接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

三、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

不过，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日程表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④ 斯大林不能出尔反尔。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开

---

① Kim Chull-baum,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pp.105-106;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p. 433.

② 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的报告，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 5, оп.58, д.266, л.122-131。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pp. 441-442. 中译文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附录。

③ 笔者关于美国此时对朝鲜政策的研究，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第三章。

④ 中文记录见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12页。苏方记录见*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3, с.78-79。

始大规模复员，至于军事战略目标，只剩一个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了。当时，中共在东南沿海集中了 16 个军的兵力，而在比邻朝鲜的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和一个集体转业、开荒种地的第 42 军。因此，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①

对此，斯大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早在 1949 年夏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得知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后，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问题。② 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③ 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④ 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在与金日成讨论并决定了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后，明知此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却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只能劝金日成去见毛泽东。⑤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一定要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了访华的要求。3 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估计到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道，"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当李周渊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到平壤时，金日成已经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鲜内阁副首相金策委托苏联使馆将这一消息转告金日

---

①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第 294–296 页。

② 1949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致刘少奇转斯大林电，АПРФ, ф. 45, оп.1, д.328, л.137-140；*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6, с.88；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 ф. 45, оп.1, д.329, л.9-17。

③ 引自 1996 年 7 月 31 日笔者在莫斯科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记录。据说，1949 年 10 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这两封电报保存在总统档案馆，尽管列多夫斯基未能向笔者展示档案原件，但他保证说曾亲眼看到过这两份文件。

④ 对这一说法的详细论证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 217–218 页。

⑤ Kim Chull-baum,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pp.105-106.

成。[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渊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会谈时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5月12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②] 金日成的说法不可信，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实际上，金日成对莫斯科谎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关于1949年5月金一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联共（布）驻北平代表柯瓦廖夫报告说，中共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实行反击，但劝告朝鲜不要主动进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报中却有意含糊其辞，说中共表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朝鲜。[③] 不管金日成有何考虑，毛泽东毕竟到此时还不知道平壤和莫斯科已经就发动战争这样的大事达成了默契。[④] 所以，尽管金日成认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但还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去见毛泽东，"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⑤]

5月13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达北京，并当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谈具体内容的档案文献，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⑥] 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⑦]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

---

① 1950年4月10日伊格纳季耶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а, оп.5а, п.4, д.11, л.98-99。

②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100-103。

③ 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 оп.1, д.331, л.59-61；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36–239页。

④ 俄国档案记载，1950年5月3日斯大林曾通过罗申转告毛泽东："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专门向您通报。"（АПРФ，ф.45, оп.1, д.331, л.54）但斯大林后来没有进行通报。

⑤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100-103。

⑥ 1950年5月13日罗申致莫斯科电（档案原件未注明收报人），《朝鲜战争俄档》第4卷，第572–573页。

⑦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泽东提起过金日成的要求和计划。

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① 看似平和的话语，却透着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应支持朝鲜的革命行动。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②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批准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师带装备回国，此事难道不是说明中苏领导人共同策划了战争的准备吗？③ 关于战前中国军队赴朝问题，过去因缺乏资料，不甚明白。④ 现在情况清楚了：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没有关系。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参加了中共的抗日军队。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满洲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1000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⑤ 1949年5月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⑥ 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8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实员10821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实员10320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⑦ 毛泽东所说的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6个月后提出的。1950年1月初，林彪

---

① 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 оп.1, д.331, л.55。

② 关于5月14–16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详细情况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第284–288页。

③ 笔者在讲课时多次遇到这种提问。研究者中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见 Mineo Nakajima，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④ 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见 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Y.1994，pp.109-110.

⑤ 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郑仁甲译自韩文）；Paik Nak-chung，"From the Korean War to a Unified Korea, An interview with Bruce Cumings", Nov. 19，1991，*Korea Journal*，1992.Win；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52页。

⑥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36–239页。

⑦ 详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第76–77页。参见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3, оп.65, д.776, л.30-32。

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这 16000 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因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 4—5 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与朝鲜联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1 月 11 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时致电林彪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4 月间更换夏装回国。1 月 28 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来武汉接收朝鲜部队。①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 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的同情和支持。1950 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②因此，艾伦·怀廷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很自然的现象。③不过，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 4 月 18 日到达元山时，④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因此，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的突然袭击能够成功，的确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① 1950 年 1 月 8 日莫斯科致什特科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3 卷，第 381 页；1950 年 1 月 11 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3 卷，第 382–383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249–250 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 年，第 744 页。

② 在 1949 年中国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居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 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而毛泽东早在 1949 年 12 月已经考虑军队从事生产问题，1950 年 4 月则提出了开始军队复员的工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114–115、120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82–183、310 页。

③ Allen S. Whiting，*China Cre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60.

④ 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

四、苏朝联合发动进攻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

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且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① 到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天之内完成。②

6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现在披露的6月26日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私人军事代表扎哈罗夫大将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前后的真实情况：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人

---

① 关于进攻南朝鲜军事计划的具体内容和制定过程的不同说法，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第167–171页。

② 1950年第408号和468号电报，见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的报告。

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地区；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江原道首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①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5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10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② 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③

---

① 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1950年6月26日，见CWIHP Bulletin Issue 6-7, 1997, p.39. 在军事上，Д为战争开始日的代号，Ч为发起军事行动的日期代号。至于所谓南朝鲜"侵犯三八线"的说法，显然是北朝鲜编造的假情报。6月20日葛罗米柯就向斯大林报告了北朝鲜提供的南朝鲜军队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但他指出，什特科夫认为"这件事有些可疑"。见1950年6月20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朝鲜战争俄档》第4卷，第615页。

② 见 *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с.29。

③ 见 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pp.105-106；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34页。什特科夫6月26日的电报证实了这一情况：由于苏联顾问的撤离，越过三八线的人民军在通讯联系和组织指挥方面出现了混乱局面。

然而，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却毫不知情。或许是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或许是估计到美国不会干涉从而不需要也不希望中国介入，总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①] 以至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来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②]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一方面要中国同意发动战争，一方面又对中国封锁消息。经过这样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结论一，金日成在 1949 年就提出通过军事手段推进革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此时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维持三八线现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莫斯科严厉禁止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也表示无法援助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结论二，1950 年初毛泽东访苏，迫使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其结果是苏联将要失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必须实现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国东北丧失的战略地位。于是，莫斯科决定积极支持北朝鲜发动一场突然袭击的战争，迅速统一朝鲜半岛。

结论三，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并且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毛泽东仍然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泽东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特别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

①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93，pp.153, 163.

②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第 85 页。

结论四，在毛泽东表示原则上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之后，朝鲜和苏联对战争的秘密准备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没有向北京透露其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任何细节。1950 年 6 月 25 日凌晨，在苏联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下，金日成发动了后来人们所说的朝鲜战争。

这就是近年来俄国解密档案给人们勾勒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画面。

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 年 2 月号

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引　言

90年代初，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大量发表，把国际学术界对于苏联史，特别是苏联对外政策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了苏联的远东政策。在整个1949年，莫斯科坚持应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以军事手段完成朝鲜统一大业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的唯一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①] 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各种推断和广泛争论。

叶·巴让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

---

①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 д.331, л.554。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凡本文直接引用的俄国档案均出自笔者保存的俄文档案复印件，有的文件在复印时漏掉了馆藏号，原文见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简称《朝鲜战争俄档》）。这里，感谢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及陈兼、凯瑟琳·威瑟斯比、奥德·韦斯塔、谢尔盖·冈察洛夫提供的帮助。

响。瓦·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了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李钟植和陈兼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谢·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 1 月 5 日的讲话和艾奇逊 1 月 12 日的演说，即表明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詹·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约·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 1950 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①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的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② 约·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③ 阿·托尔库诺夫等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④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与斯大林在 1950 年初改变苏联

---

① 以上观点是在 1995 年 7 月华盛顿关于朝鲜战争学术会议的讨论中出现的，威瑟斯比向我提供了由她本人撰写的“会议报告”。

②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93，pp.151-152.

③ John Garver, “Polemics, Paradigms, Respons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PRC Confrontation in the 1950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Vol.3*, No. 1, *1994*, pp. 27-28.

④ *Торкунов А., Уфимцев Е.*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Москва, 1995, с.32. 乌菲姆采夫是瓦列里·杰尼索夫的笔名。

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和中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二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更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本文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

一、形成决策的前提

从逻辑上说，斯大林同意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认可朝鲜半岛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不惜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 1949 年下半年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 1945 年形成的对远东的战略和策略。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个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和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在战后的几年当中，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例如在欧洲和远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同时，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例如近东的土耳其和伊朗，苏联有意推行一种有限扩张的对外政策。不过，对于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与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

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促使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 1947 年 6 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莫斯科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因此，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做出的最后反应就是全面调整其外交政策，从而使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出以冷战为特征的战争边缘态势。此后，斯大林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变得更具有进攻性和挑战性了。[①]

美国与苏联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 年 6 月至 1949 年 5 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②]

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在远东也进入了紧张的对抗状态。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自然是加强美国与苏联在远东敌对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一结果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但其本身毕竟不是莫斯科有意造成的局面。朝鲜半岛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在战后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到 1949 年，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朝鲜南北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朝鲜李承晚

① 对上述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 年第 6 期。

② 利用最新材料对柏林危机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3。

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①]

当时莫斯科估计美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的意图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②] 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1949 年 6 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 100 架、坦克 87 辆、装甲车 57 辆、自行火炮 102 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 44 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③]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进攻。[④] 甚至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也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使苏联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清津的海军基地，以及在平壤、江界等地设立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些基地的设施有可能被北朝鲜军队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⑤] 与此同时，苏联全力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朝鲜统一的运动，这就是于 1949 年 6 月开始的成立“统一祖国民主阵线”及其开展的大规模宣传活动。[⑥] 不仅如此，在北朝鲜边界受到挑衅时，莫斯科还制止朝鲜人民军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反击行动。

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可以利用军事反击

---

① 详细材料见 1949 年 4 月 20 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3, оп.65, д.839, л.13-14；1949 年 5 月 2 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30–233 页；1949 年 6 月 18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58–261 页；1949 年 7 月 13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80–282 页。有关 1949 年春夏沿三八线发生小规模冲突的详细情况，可见 Merrill. John, Korea: 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 Cranbury, N.J. :Associated Univ.Pr, 1989，pp.130-151。

② 1949 年 4 月 17 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11 页；1949 年 6 月 18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58–261 页。

③ 1949 年 5 月 1 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19–229 页；1949 年 6 月 4 日缅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电，АПРФ, ф.6, оп.9, д.14, л.57。关于苏联军事援助的情况还可见 Park Mun Su, “Stalin’s 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Korea Observer*, p.348. *Торкунов, Уфимцев*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с.20。

④ 什特科夫曾多次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缺乏武器，在战斗中“无力抵抗”，“在战备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状况。1949 年 2 月 3 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1 卷，第 133–134 页；1949 年 4 月 20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14–216 页。1949 年 6 月 25 日什特科夫的报告也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存在“南方的威胁”。*Торкунов, Уфимцев*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с.20-21。

⑤ 1949 年 7 月 2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75–276 页。档案文件上有苏联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斯基 7 月 4 日的批语：“同意”。

⑥ 1949 年 6 月 5 日、6 月 28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253–257、271–274 页。

行动实现朝鲜的统一。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①]9月15日什特科夫大使也报告了北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认为，朝鲜半岛内部的政治形势对北朝鲜是有利的，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②]

但是，斯大林坚决地拒绝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这说明在军事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这说明在政治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此外，进行局部的反击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③]这个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

① 1949年9月3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59а, оп.5а, п.4, д.11, л.136-138。

②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3, оп.65, д.776, л.1-21。

③ 1949年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71次会议决议，АПРФ, ф.3, оп.65, д.776, л.30-32。

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①]

北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②]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和“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③]这进一步证明，斯大林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本文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北朝鲜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④]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会因为美国不进行干涉就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而只能是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会作为实现动机的必要条件来考虑美国是否进行干涉的问题。否则，莫斯科就可以在任何美国不会进行干预的地区采取军事对抗行动了。因此，对于美国干涉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北朝鲜方面是否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因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决议所提到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

---

① 1949年9月23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指示稿（二），АПРФ, ф.3, оп.65, д.776, л.33-38。

②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352页。

③ 1949年10月26日、11月20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371、377页。

④ 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参见沈志华在《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中的介绍。

没有加强，反而更加削弱了。[①]

如果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完全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换句话说，斯大林可能认为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根本问题是当时莫斯科还没有形成改变对朝鲜政策的动机。如果说到斯大林的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在 1950 年初的举动。

二、改变决策的动机

1950 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 月 19 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在 1 月 17 日朝鲜外务省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金日成激动地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9 月 24 日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②]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 月 30 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③] 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 3 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 10 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 1951 年提供的贷款用于 1950 年，为计划组建的 3 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

---

① 例如，南朝鲜游击队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在 1949 年秋，那时游击队已发展到可以正面进攻大城市，并能与南韩军队师一级兵力作战的规模。而到 1950 年春天，南朝鲜的游击活动由于受到镇压，已经大体平息下去了。详见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上卷，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4 页。

② 1950 年 1 月 19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87-91。

③ 1950 年 1 月 30 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92。

成的要求。[①] 莫斯科还专门任命瓦西里耶夫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同时，苏联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②] 以后，金日成于4月8日至25日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会晤，斯大林终于同意了金日成通过军事反击行动统一朝鲜的计划。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③] 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④] 因此，完全可以断定，从1950年1月至4月，斯大林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

那么，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一时期在远东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形成了中苏联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损害，甚至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的远东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远东权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远东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

---

①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93；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4, д.11, л.145-146；1950年2月9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76。

② 详见1950年2月23日什特科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4, д.11, л.148；1950年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472–479页；1950年3月18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480页。

③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Vol.2*, No. 4, *1993,* p.433. 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 1991, pp.105-106.

④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p.441.

大部分政治权益。我认为，对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来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苏联的远东战略目标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彻底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防御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来实现。苏联的这一战略目标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和实现，而斯大林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回报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①] 斯大林竭力促使国共和谈并建立联合政府；一再推迟从中国东北撤军；被迫撤军后又积极支持中共军队占领东北；中国内战前期实行回避的政策；中国革命即将走向全面胜利时又积极主张国共和谈，——这一切做法，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保证苏联1945年已经取得的远东权益。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斯大林面临的仍然是如何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问题。在这方面，主要问题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像东欧国家那样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遇到了重新处理苏联对华政策的难题。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蒙古问题、新疆问题和东北问题上，而东北问题是其重点。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蒙古独立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坚持要收回外蒙古。这个问题在1950年2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商定由中苏两国以公告形式加以解决。[②] 中共领导人对新疆问题表示特别的关切，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对米高扬谈起新疆的重要地位，并有意地提到伊犁地区的独立运动受到苏联支持，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米高扬则明确告诉毛泽东，苏联不主张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毛泽东不放心，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之前又同柯瓦廖夫谈到新疆问题。[③]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表现令中国领导人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有些意外。斯大林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不仅建议人民解放军加速解放中国西部地区，并答应为此提供物质援助。新

---

① 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②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3, с.87；*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107. 尽管师哲否认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提出过蒙古问题，但他承认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时还是借中国民主人士之口提出了这一问题。李海文：《柯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第92–93页。

③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106；*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3, с.87.

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此不无关系。[1] 不过，很难说斯大林的大度和慷慨不是为了在与未来新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关系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的主权的目的，自然要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中苏双方都首先采取了非常谨慎和试探性的方针。据米高扬本人后来就这一问题给苏联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在西柏坡访问时，苏联就承认苏中旅顺条约是不平等的，并提出与日本和约签订后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从旅顺撤出苏联军队。但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也愿意这样做。而中共领导人则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等到中国强大起来再说。关于中长铁路问题，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表示可以协商解决。对此，毛泽东同意让下属去研究而后再汇报。这是中苏双方初次平静地接触这一问题，不过，米高扬感觉到毛泽东“有自己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说出来。[2]

1949 年 6—8 月刘少奇访苏，双方再次谈到中苏条约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提出三个方案：（一）由新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显然对中共代表团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感到不快，他在申明了当时签订旧条约以及苏联在旅顺驻兵的理由后再次表示，如果中共需要，苏联可以立即从旅顺撤兵。但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可以等到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3] 当然，斯大林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正如《不确定的伙伴》一书所言，苏联“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4] 问题只好再次搁置起来。

---

① 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5 期，第 143–150 页。关于苏联在新疆解放中所起作用，详见邓力群：《“力群电台”收发的电报选编》，《中共党史资料》1990 年第 36 期，第 1–38 页；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70.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106-107, 1995, №3, с.101.

③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551 页。

④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68.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在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但实际目的主要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这一点，在周恩来给莫斯科的电报以及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汇报中都讲得十分明确。[①] 然而，斯大林在见到毛泽东后，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表示。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谈记录，在这两位领导人 12 月 16 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当毛泽东提出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可以讨论解决，紧接着便强调旧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因此最好在形式上保留，“暂时不改动任何条款”，但实际上苏联可以从旅顺撤兵。[②] 根据毛泽东在会谈后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答复说，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倒台，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则说，修改条约要在两年以后。[③]

毛泽东对第一次谈判的结果很不满意，他在 12 月 22 日邀请柯瓦廖夫谈话，要他向斯大林转告中国方面对下一步谈判的两种考虑，一是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并召周恩来前来完成签字手续；一是继续进行磋商，暂不履行有关协议的签字手续，周恩来以后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④] 然而，在 12 月 24 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失望。[⑤] 此后，毛泽东便滞留在莫斯科的豪华别墅里消磨时光。这种僵持局面直到 1950 年 1 月 2 日才开始打破。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 年 1 月 2 日晚 8 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 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 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 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⑥]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在 1 月 6 日与维辛斯基谈话时（出席的有柯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他“越来越相信必须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

①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19, д.288, л.81-85，转引自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76；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83.

② 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9-17。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7–18 页。

④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3, с.88-89.

⑤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9 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40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212 页。

新条约的必要性来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苏之间所形成的完全新型的关系”；一方面又解释说，“大家都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现在的中苏条约表示不满。因此，中苏之间签订新友好同盟条约将会对两国有利。”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修改条约某些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① 在1月9日与柯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以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②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中明确表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③ 尽管中苏新条约的具体谈判也经历了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且中方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但毕竟按中国的意愿废除了旧约，而新条约规定不久苏联就将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④

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损失，斯大林坚持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⑤ 尽管毛泽东同意签订这个《补充协定》，但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外交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

①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8, д.302, л.4-6，转引自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77。

②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p. 247-248.

③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29-38。

④ 关于谈判过程，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1–25页；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p.126-127.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1–12、17–18页。

⑤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5页。

待这一天，已经等了 40 年”。[①] 对于这样一个企盼了几十年的目标，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因此，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必然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对远东的政策，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目标。

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使东北亚地区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甚至是战争状态。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远东地区的要求。一旦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自然可以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 1949 年 3 月，苏联已经与朝鲜商定建设一条连接朝鲜的阿吾地和苏联远东地区的克拉斯基诺之间的铁路线，[②]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中长铁路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斯大林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远东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海军留驻旅顺、大连，而中长铁路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正是苏联本身利益的要求，使得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战略。

斯大林非常了解朝鲜半岛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性。早在 1945 年 6 月 29 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的背景情况报告，就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深远意义：“俄国反对日本经过朝鲜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的斗争从历史上讲是正义的行动”；“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③] 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且仍然把已经战败的日本视为主要威胁，但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特别是要防止把朝

---

① 《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中文版，第 438–439 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 1905 年沙皇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屈辱的只是沙皇政府和欧洲资产阶级。见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中文第 2 版，第 134–142 页。

② 参见 1949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3-23。

③ 1945 年 6 月 29 日茹可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简要报告，АВПРФ, ф.0430, оп.2, д.18, д.5, л.18-30。

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将其与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俄国档案中一份 1945 年 9 月的题为《关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坚持将济州岛置于中国人控制的区域内是合乎需要的，这可以促使中国人对加强旅顺港的苏中海军基地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如果两年后占领制度结束，朝鲜必将成为四国的托管地，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州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坚持这些战略地区分配给苏联，我们就能利用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上的战略地区的愿望，对美国的地位造成压力。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①]1945 年 9 月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82 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州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②]

然而，由于 1945 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且美国与苏联在朝鲜半岛有三八线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但同时却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柏林危机后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但是到 1950 年初与毛泽东谈判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南部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了。

这里还应该指出，俄国在历史上就有这种调整势力范围的传统。沙皇俄国在 1905 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了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③] 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

---

① 1945 年 9 月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АВПРФ, ф.0430, оп.1, п.52, д.8, л.40-43。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on, 1993, Vol.8*, pp.9-10.

② 1945 年 9 月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АВПРФ, ф.0430, оп.1, п.52, д.8, л.44-45。转引自《苏联在朝鲜的目标》，第 10–11 页。

③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 5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中文第 2 版，第 777 页。

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将其军队推进到朝鲜半岛，而当时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军队还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冲绳岛。为了限制苏联在远东势力的扩大，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分美苏在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受降区域。8月15日杜鲁门向斯大林通报了以这一决定为基础的盟军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的"总命令第一号"。第二天，斯大林便复信表示同意。此时已经越过三八线向汉城推进的苏联军队，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后，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军官腊斯克估计的，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使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深感惊奇。[①] 其实，斯大林这样做是有其深层的政治考虑的。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 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2) 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第二点，他指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斯大林最后还以强硬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②] 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必须考虑那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三、保证决策的条件

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进行周密的考虑，以妥善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6,* Washington D.C.: GPO, 1969, p.1039.

②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第267–268页。

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个方针：

第一是尽量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尽管莫斯科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是支持了金日成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主张，斯大林也只能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但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在紧张的军事对峙的情况下，1950 年 6 月 20 日什特科夫发来一封特急电：说北朝鲜“需要军舰”，还“请求派遣 10 名苏联顾问供船上使用”。什特科夫认为应该满足这一请求。6 月 22 日葛罗米柯回电答复：“不能接受您的建议。这样做会为干涉提供借口。”① 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行动就更加谨慎小心了。② 顺便说，斯大林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是出于对日本威胁的考虑。除非莫斯科认为日本将替代美国控制南朝鲜进而威胁北朝鲜，或者苏联决心把控制朝鲜半岛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否则做出这样的决策对于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当时并不存在。

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接受了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在 1949 年夏秋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做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对此做出估计。当时朝鲜领导人的估计是，美国不会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上的指挥。③ 如果斯大林当时对这一估计尚存疑虑，那么美国政府在 1950 年初的公开言论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科回忆说，艾奇逊 1 月 12 日讲话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仔细研究了这个讲话，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④ 不久，在 1950 年 4 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坚决。据随同金日成访问的译员文日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2）将有 20 万

① *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с.29.

② 详见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5 期。

③ 1949 年 9 月 11 日维辛斯基致顿金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315 页；1949 年 9 月 14 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2 卷，第 316–323 页。

④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101.

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3) 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4) 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①] 斯大林显然相信了艾奇逊的宣言和金日成的判断。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在朝鲜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计划。

第三，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当让中国对朝鲜问题承担起责任。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朝鲜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据贾丕才回忆，斯大林在 1950 年 4 月与金日成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这位苏联领导人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②]5 月 14 日，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北朝鲜实现统一的建议，但"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③] 于是，中国领导人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这样一来，一旦美国进行干涉，中国就将承担起援助朝鲜的责任。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面对远东的国际局势，莫斯科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苏联与美国的远东对抗中成为盟友和先锋。同时，斯大林在 1950 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就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言，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而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远东地位的新中国将可能构成对苏联的潜在威胁。就美国可能进行的干预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 1949 年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④]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

①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an War", p.433.

②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145. 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 1991, p.106.

③ 1950 年 5 月 14 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54。

④ 关于 1949 年 10 月金门战役的情况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 9 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肖锋等：《回顾金门登陆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林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的确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然而，如何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斯大林进行周密的考虑和安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了解毛泽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而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四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关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国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柯瓦廖夫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毛泽东不仅表示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而且答应给以军事援助。但在毛泽东的通报中，中国领导人则劝朝鲜同志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中国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可能援助朝鲜的革命斗争，而且“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才会采取。[①] 对这两个通报准确性的判断，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在谈到如果发动国内战争，“舆论和人民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时，“金日成拿不定主意”。这时金日成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②] 显然，金日成此时的说法与毛泽东通报的情况是吻合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并不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第二，中国以解放军中朝鲜籍师援助金日成是否就证明支持北朝鲜以武力解决

①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36–239页；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菲利波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9-61。

② 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46-53。

国家的统一问题。[1]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一些朝鲜籍战士回国。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在东北的高岗就接到了毛泽东关于让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回国的指示，这些朝鲜人于 1949 年 7—8 月回国。另一个朝鲜师是 4 月 18 日到达元山的。[2] 这一事实不能证明中国领导人当时支持北朝鲜通过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既然前文已经说明，毛泽东在与金一会谈时并不赞成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可以推断，他答应朝鲜师回国只是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此外，当时中国经济情况十分严重，“币值下跌”，“物价上涨”，“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而“钞票发行过多”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巨大的军费开支。在 1949 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占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 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3] 因此，中国内战结束后大量军队的复员肯定是中国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这样，朝鲜籍战士回国实际上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三，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是否讨论过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首先，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已经就这一问题与斯大林交换过意见。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 1949 年 10 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南朝鲜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4] 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谈到过朝鲜的局势，但没有讨论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并决定邀请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这些情况斯大林对中国客人却只字未

---

①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军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详见 Mineo Nakajima, “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1, 1979, pp.19-47.

② 详见 1950 年 1 月 8 日莫斯科致什特科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3 卷，第 381 页；1950 年 1 月 11 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朝鲜战争俄档》第 3 卷，第 382–383 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 年，第 744 页；Chen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on-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1994, pp.109-110；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 1994 年博士论文）等。

③ 陈云：《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 年 8 月 8 日；陈云：《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1949 年 12 月 2 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1 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117、114–115、120 页。

④ 引自 1996 年 7 月 31 日笔者在莫斯科访问安·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记录。

提。

第四，在1950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时中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俄国档案材料记载：金日成从莫斯科回国后告诉斯大林，他决定5月13日动身去北京，并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金日成还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满足”。① 金日成一行于当地时间13日5时20分飞赴北京，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内容的材料。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② 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否则没有必要立即要求证实。这时，斯大林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强调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③ 这样，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但是，金日成走后，中国便加快了解放台湾战役的准备工作。6月上旬，粟裕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并请求中央军委直接组织台湾战役。到6月23日中国军队已经三度修改作战计划，参战兵力达16个军以上。④ 显然，毛泽东在加紧做自己的事情。

综上所述，由于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⑤ 他在解决朝鲜问题与中国的关系时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因为在中国人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斯大林感到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⑥ 其二，在苏联和朝鲜已经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由金日成去向毛泽东转达意见并求得中国的同意。因为在中苏联盟的分工中，毛泽东承担着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国除了

①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100-103。

② 1950年5月13日罗申致斯大林电，《朝鲜战争俄档》第4卷，第572–573页。

③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54。

④ 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69页。

⑤ 苏联外交官贾丕才的回忆证明：《苏联知道中共政治局反对金的主张》。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147.

⑥ 斯大林只是在5月3日告诉毛泽东，金日成访问了莫斯科，但没有讲任何具体内容。见1950年5月3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4。

同意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之外别无选择。其三，对于莫斯科与平壤商议的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斯大林丝毫没有向中国透露，[1]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再没有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过联系。

斯大林的做法表明他对毛泽东缺乏信任，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而斯大林采取了这样三个步骤，则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结　论

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只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才在 1950 年初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远东地区，通过军事行动扩大苏联的势力和影响，莫斯科希望并相信这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斯大林被迫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即将丧失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 1945 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港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使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权益。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来阻止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至少其结果是如此。

斯大林做出这一远东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苏联本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就国家关系而言，则是出于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

---

① 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p.153, 163。

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因为斯大林最初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

最后应当指出，这里对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的动机的判断，主要是在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得出的，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像苏联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领导人做出重大决策的动机，往往无法找到充分的文献证据。即使有了确凿的文献，也很难说那白纸黑字就体现了决策者的真实意图。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

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试论朝鲜战争起因与斯大林的决策动机

在一般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关于决策动机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涉及到社会主义阵营一方的决策动机，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于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决策动机，比较容易研究，因为他们的决策过程比较清晰，都有文献记载，而且往往伴随着大量决策参与者的回忆录和日记。只要档案解密、史料开放，研究者便很容易进入角色。而东方阵营的决策程序就完全不同了，那里一般都是所谓的“领袖外交”，参与决策的只是极少数人，甚至一两个人。特别是在决策过程中，高层的秘密会议和会谈往往没有文字记录，即使有一些会议和会谈记录，也都未能依据现行档案法的规定按期解密。所以，对于决策动机，甚至有些决策过程，研究者只能进行推断。这就是学术研究中对于苏联、中国等原东方阵营成员国的外交决策动机众说纷纭且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关于斯大林决定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动机，就属于这种情况。

1950 年 1 月以前，斯大林为了避免在远东陷入与美国的冲突，一直反对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①] 但是 1 月 30 日他突然给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发出一封电报说，金日成“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大的行动，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此举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②] 得知金日成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满意和激动，斯大林又向什特科夫发出了

①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修订版。

②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1 月 30 日，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д.3，п.11，л.92。

一个补充指示："请向金日成同志解释，在目前情况下，他想和我讨论的这个问题应该始终是机密的。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任何北朝鲜领导人和中国同志，更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①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在 1 月底突然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为什么还要瞒着当时就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或者说，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一、艾奇逊的演说触动了斯大林的神经？

过去在西方最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是因为在 1950 年 1 月 12 日的讲演中，艾奇逊把日本、琉球和菲律宾连接起来，说成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线。这样，朝鲜半岛和台湾就都不在美国的保护范围内。此后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于是很多人指责说，是艾奇逊给金日成开放了"绿灯"。②这个看法很难成立。

首先，让艾奇逊来承担责任多少有些滑稽，关于远东防御线的提法既非艾奇逊始创，也不是他首先公布出来的。早在 1949 年 3 月麦克阿瑟就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宣称："我们的防线贯穿了亚州海岸边缘的一连串海岛。这条防线从菲律宾开始，延伸到包括其主要堡垒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然后折向日本，经阿留申群岛直到阿拉斯加。"③即便艾奇逊的演说引人注目，斯大林也未必就相信这样一个公开宣言。1956 年 9 月米高扬曾告诉毛泽东："朝鲜战争开始前，我们情报机关破译的敌人的电报说，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报告，他主张朝鲜南北双边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

①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 月 31 日，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д.3，п.11，л.92-93；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2 月 2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转引自 *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с.56。

② 如 80 年代美国学者的看法，见 William W. 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161；Charles M. Dobbs，*The Unwanted Symbol*：*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old War*，*and Korea*，*1945-1950*. Kent，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1，pp. 180-81。冷战结束后，这种看法在美国仍然有人坚持，如见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7，p.72。

③ 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Inc.，1969，p.357. 此外，1949 年 12 月 30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 48/2）也提到，美国要加强关于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立场，强化与他们的双边条约。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9*，*Vol.7*，*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Washington，D.C.：GPO，1976，p.1216。

不要进行干涉。”[①] 可以认为，使斯大林相信美国不会干涉或来不及干涉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艾奇逊的讲演，不如说是被破译的美国电报和金日成关于发动“闪电战”的保证。[②]

其次，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把斯大林的动机归结为对美国立场的反应，实际上是把目标本身和实现目标的条件混为一谈了。不错，斯大林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的确与美国的态度有关。以前他担心对南方的进攻会引起美国的干预，所以再三阻止北方采取武力方式实现统一，而现在认为美国不会或来不及干涉，这种担心似乎已不存在，至少是风险大大降低，所以就可以批准金日成的行动了。不过必须看到，美国是否会干预在朝鲜发生的战争，只是斯大林决定改变其政策的条件，而不是他的目标。试问，艾奇逊的演说同样表明台湾也不在美国的防御线之内，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加大对中共的援助力度，反而减缓了援助速度？[③] 与帮助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相比，帮助中共解放台湾，对于斯大林来讲风险无疑要小得多，台湾海峡发生的战事不仅远离苏联，而且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美国更没有出面干预的理由。再者，毛泽东解放台湾和金日成进攻南朝鲜，都需要得到苏联的同意和援助，而中共解放台湾的战役不仅准备在先，也是首先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的。那么，为什么反而让金日成抢占了先机？这里唯一的解释就是，在斯大林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背后，不是出于对朝鲜的同情，而一定有他认为必须这样做的自己的理由，有他需要实现的自己的目标。

二、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返回安理会？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新的看法，与上述观点恰恰相反。这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动机就是为了把美国吸引进来，让它在亚洲陷入一场战争，特别是一场与中国的战争。问题是由一个长期悬挂在朝鲜战争研究者头脑中的历史之谜引起的，即苏联代表在战争爆发之际为何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

众所周知，6 月 25 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顺利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

---

①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 年 9 月 23 日。

② 已有西方学者论证，艾奇逊的讲话对北朝鲜的进攻计划几乎没有什么影响。James I. Matray, “Dean Acheson’s National Press Club Speech Reexamined”,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 22, No.1, Spring 2002, pp.28-55.

③ 参见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34–53 页。

该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边界自己的一方，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日，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①] 因为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才使联合国上述决议得以顺利通过。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各种猜测：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取得成功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即坚持在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之前与其保持一致；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②]

2005年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即斯大林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在与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怀疑这一举动的正确性，认为“民主阵营没有必要离开安理会”。在1950年8月27日给哥特瓦尔德的电报中，斯大林详细解释了苏联这一做法的理由和考虑：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

---

① 详见《人民日报》1950年6月28日、7月7日第1版；Peter Calvocoressi，*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9-195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479-480。

② 伊豆见元：《围绕朝鲜战争的中苏对立：关于苏联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背景》（日文），《军事研究》1975年第3期，第100页；David Horowitz，*From Yalta to Vietna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1969，p.120；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61；*Лебедев С.Н.*（*гла. ред.*）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еншней разведки，Т. 5，1945-1965 годы，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3，с.388。

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雄厚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①

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② 萨莫欣

① 斯大林致哥特瓦尔德电，1950年8月27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62，л.71-72，转引自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No.5，c.96-97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c.97-98.

也认为，斯大林决心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入到远东的军事冲突，并让中国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从而在亚洲消耗美国。[①] 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这也正是斯大林希望人们理解的，即莫斯科采取这种做法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俄国学者的这种理解，把决策者神话了。按照这种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拒绝返回安理会的做法，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无论是"高瞻远瞩"，还是"险恶用心"，一切都在斯大林的运筹帷幄之中。然而，这里的逻辑前提及其与已知史实的衔接存在一系列值得怀疑的地方。

其一，事实上，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意图与中国建立一种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甚至尚未考虑会发生的战争的考虑。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②] 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在同意签订新条约后，1月6日维辛斯基又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对这个措施百分之百地赞成"，并认为这个声明的副本可以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③] 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

① *Самохин А.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ланы И.В. Сталина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Власть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2010，No.3，c. 103-105.

② 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页；《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57–68页。

③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0年1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1-5，*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257-259。

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①] 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②] 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提出派遣自己的驻安理会代表，以"迫使他们把这个问题纳入具体的议程"。鉴于毛泽东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到安理会的支持，维辛斯基指出，中国继续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③] 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当然，斯大林这样做可能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希望毛泽东能够感恩戴德，在中苏条约的下一步谈判中做出让步。但无论如何，此时关于朝鲜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其二，事实上，斯大林同意并鼓励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前提是预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关于这个问题，前文已有详述。而根据上述史实，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斯大林在批准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

其三，还要看到一个基本史实，即美国出兵参与朝鲜战争以后不久，毛泽东就主张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甚至金日成也有此意愿，几番试探莫斯科的态度，但是在1950年10月以前，斯大林对此一直默不做声。直到美军兵临城下，北朝鲜危在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19-22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② 参见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第六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55–456页；《人民日报》，1950年1月16日第1版。马立克发言全文见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0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3，с.288-289。

③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0年1月13日，АПРФ，ф.3，оп.65，д.364，л.94-9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T. V，K. 2，c.261-263.

旦夕之际，斯大林才要求中国出兵。[①] 所以，说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算定并有意安排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完全背离了史实，近乎天方夜谭。

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复杂，苏联不过是想在事情明朗化之前置身事外而已。战争爆发的当天，6 月 25 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②] 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便致电苏联外交部，通报了安理会 6 月 25 日决议。[③] 6 月 26 日晚（美国时间 27 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听后大惊失色，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④] 6 月 27 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 5 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⑤] 6 月 29 日赖伊向苏联通报了安理会 27 日的决议。[⑥] 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于当天会见美国大使，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⑦] 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莫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 27 日的决议。[⑧]

---

①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以中俄解密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31 期（2009 年 5 月），第 165–198 页。

② *FRUS*，*1950*，*Vol. 7*，p.148.

③ 赖伊致苏联外交部电，1950 年 6 月 26 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 4 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2004 年，未刊，第 617–618 页。

④ Joseph C. Goulden，*Korea*，*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New York: McGraw-Hill，1982，p.87.

⑤ *FRUS*，*1950*，*Vol. 7*，p.204.

⑥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c.189.

⑦ АВПРФ，ф.07，оп.2，п.51，д.362，л.28；ф.07，оп.23，п.24，д.318，л.12-13，*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9-1952，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6，c.216-218. 在 6 月 30 日的《消息报》上刊登了声明全文。

⑧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c.190.

斯大林当然知道苏联代表不在安理会的后果，米高扬回忆说，他曾建议斯大林让马立克回到安理会，斯大林回答说："依我看，苏联代表不必参加安理会的会议。"① 对于斯大林如此不露声色的平静反应，可以看作是胸有成竹，但也可以看作是不知所措。问题在于，莫斯科此时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或弃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回避的态度。② 两个月后苏联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无论怎样理解，苏联代表没有回到安理会这件事都不能证明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就希望美国参战并预见中国参战，尽管几个月后他确实是这样设计的。③ 实际上，在 8 月 27 日的电报中，斯大林表述的不是他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想法，而是对美国已经出兵干涉这一既成事实的反应和思考。把事后的结果解释为事前的动机，在逻辑上也许可以成立，但却违背了基本史实。这个案例告诉人们，对档案文献也不可全信。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他们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三、斯大林真的要推动亚洲革命吗？

关于斯大林的决策动机，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有不少学者认为，斯大林所说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就是指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一边了。其表现有：苏联试制原子弹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苏同盟建立，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其

① 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p.161.

② 斯大林是极其谨慎小心的。苏联援助的军舰于战争爆发前 5 天到达朝鲜时，金日成要求再提供 10 名苏联驾驶员，斯大林当即予以拒绝。见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1993，№ 26，c.29。进攻开始时，斯大林下令召回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参见 Kim Chullbaum（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Testimony 40 Years Later*，Seoul：Eulyoo Publishing Co.，Lrd.，1991，pp.25-26；Strobe Talbott（tran. and ed.），*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Andre Doutsch Ltd，1971，p.370。

③ 关于斯大林这种行为的其他解释，参见 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pp.161-162。

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了胜利，这不仅激励了金日成，也刺激了斯大林。于是，苏共开始认可和支持中国革命，甚至宣传和推广中国革命的经验。其表现有：赞同刘少奇在世界工联亚澳工会会议的演说，甚至在《真理报》予以发表；批判日本共产党“和平夺权”的路线，鼓动他们与美国占领当局开展公开斗争；发表文章突出中共的夺权经验，鼓励印度等国共产党走中国的道路。有些研究者由此断定，斯大林改变了冷战爆发以来谨慎、保守和防御的政策，开始鼓励和推动亚洲各国革命，并向帝国主义阵营发动进攻。朝鲜战争就是一个开端。①

这种说法看起来顺理成章，既符合逻辑，又有史实证据。但是仔细推敲，感觉漏洞还是比较多。最重要的问题是，苏联的冷战战略是不是真的要发动世界革命，与帝国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到1950年初，斯大林是不是真心赞同中国的革命道路，是不是实意宣传和推广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

这关系到对苏联冷战战略和策略的整体看法。笔者认为，斯大林最初执行的方针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会议，驳回召开多瑙河流域和北欧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以及因铁托在援助希腊革命问题上的过激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②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斯大林也不想过分刺激西方，从而使苏联陷于孤立境地。例如，1947年9月12日，联共（布）中央派驻世界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切乔特金娜提交了一份她对东南亚国家进行访问的详细报告。报告说，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热火朝天，共产党和青年联盟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们已经不满足苏联在道义和宣传上的支持，而需要“更为重要的一些东西”。于是，切乔特金娜建议，成立一个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联合组织，并向印尼等国派驻常设贸易代表处，以便向这些国家提

---

① 详见 *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No.5，c.156；*Орлов А.С.*，*Гаврилов В.А.* Тайны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Москва：Вече，2003，c.48-49；*Дроговоз И.Г.* Необъявленные войны СССР，Минск：Харвест，2004，c.17-23；*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c.82-94；*Самохин А.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ланы И.В.Сталина，c. 103-105；杨奎松：《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读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二十一世纪》2004年2月号，第81期，第136–141页。

② 详见沈志华：《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页；《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供帮助。结果，该报告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受到严厉批评，切乔特金娜也被撤销了在青年联盟的职务。在12月10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对外政策部指出，这些建议“没有经过思考”，“几乎都是不适宜的”。[①] 1948年2月，东南亚青年代表大会在加尔各答召开。在对外政策部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确定了东南亚青年反帝斗争的任务——完全在合法斗争的范围内：争取政治权利，要求工作保证，提供社会保障，推行土地改革，减少地主剥削，免费获得教育，给予结社自由等等。[②] 1948年4月，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伊拉克共产党倡议召开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而联共（布）中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这一措施会引起反对派对共产党人展开新的镇压，会成为各种歪曲在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歪曲苏联的借口”。[③] 还有学者论证，1948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并未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而此前与马共保持通讯联系的是中共。[④] 在亚洲坚持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的武装斗争应属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越南革命，在那里人们也根本看不到莫斯科的影子。早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即1938年胡志明离开莫斯科以后，越南革命者就与苏联共产党渐行渐远，而越来越接近中国共产党。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斯大林接到了驻法国大使的报告，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有研究表明，关于越南情况的最初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⑤]

大量经过考证的史实表明，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以后，苏联对亚洲的政策仅限于在原则上号召落后国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其中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而并非鼓励和支持他们搞武装斗争。在情报局和苏联外事部门的宣传材料中，斗争性的提法的确明显增多，但是苏共既没有加强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更没有发出任何号召武装暴动的指示。1948年以后亚洲各国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无

---

① RSASPH，f.17，o.128，d.249，l.23-52，Larisa Efimova，“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Calcutta Youth Conference of February 1948”，*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 40，No.3，October 2009，pp.455-463.

② RSASPH，f.17，op.128，d.432，l.21–24，Larisa Efimova，“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pp.463-465.

③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1947-1956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1994，с.80-81.

④ Leon Comber，“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ord in Southeast Asia：The Ca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1948-1960），A Special Branch Perspective”，*ISEAS Working Paper*：*Politics & Security Series*，No. 1，2009，pp.2-10.

⑤ *Огнетов И.А.*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1，No.8，с.137.

疑大多是受到了日丹诺夫报告的激励和鼓舞，但所有这些暴力行动与莫斯科并没有直接关系。[①]

还有一个情况并非不重要。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向斯大林谈起建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②] 在 1949 年 5 月 26 日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斯大林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从南进的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③] 显然，斯大林并没有因中国革命的胜利就看到了亚洲革命的乐观前景。

那么，是不是过了几个月，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因为中国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呢？很多情况，从表面上看是一回事，但深入观察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例如，1949 年 8 月 29 日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确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也引起了白宫一阵惊慌和纷争。[④] 但实际上，真正担心和紧张的是斯大林。同美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原子弹试爆时，也没有后备储存。斯大林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核武器试制成功刺激了美国，而苏联这时却没有可以使用的原子弹。所以，直到 9 月 23 日美国在报纸上披露了苏联的核试验后，《真理报》才被迫发表声明承认

---

① 参见 Larisa Efimov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pp.468-469；Karl Hack and Geoff Wade,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east Asia Cold Word",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40, No.3, 2009, pp.441-448。

② 详细背景见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主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第 27–37 页。

③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1949 年 5 月 26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3-75。

④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 *Батюк В.* План Баруха и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1995，с.85-98；赵学功：《美国对苏联首次核试验成功的反应》，《历史教学》2010 年第 10 期，第 50–52 页。

这一事实，同时谎称苏联手里还有原子弹。① 事实上，1953 年底苏联才将第一枚原子弹交付部队，而首次带有原子弹爆炸的军事演习是在 1954 年 9 月进行的。② 再如中苏同盟的建立，偌大一个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无疑使苏联集团的力量倍增，共产党的势力得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但是也必须看到，同盟条约的签订在为中苏两国罩上了一圈安全和发展的光环时，也引发了它们之间民族利益的冲撞，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心底留下了猜疑、忧虑和怨恨。③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研究者就会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而无法解释后来在中苏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中共经验的态度也是这样。

先看亚澳工会会议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10 月 7 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牌，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不仅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将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新中国是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的“忠实友人和可靠堡垒”。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劳动人民最后胜利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来临”。④ 这些溢美之词并没有说明实质问题——中国革命走的是什么道路。而两天之前《真理报》发表的另一篇祝贺性文章，则明确地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引导，强调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却没有突出毛泽东以及中共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⑤ 但是一个多月后，报纸上的调子突然就变了。

11 月 16 日，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会议在北京开幕。作为东道主和第一次会议主席，刘少奇在开幕词中大力宣扬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总结说，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⑥ 刘少奇的讲话引起了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很多国家代表团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工会的会议，不是政治会议，

---

① V.M. Zubok，“Stalin and the Nuclear Age”，in J.L. Gaddis，P.H. Gordon and E.R May (eds.)，*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58-61；《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6 日第 1 版。

② Thomas B. Cochran，William M. Arkin，Robert S. Norris，and Jeffrey I. Sands，*Nuclear Weapons Databook*，Volume IV：Soviet Nuclear Weapons，New York：Harper & Row，Ballinger Division，1989，pp.7-10.

③ 详见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1–30 页。

④ 《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9 日第 3 版。

⑤ 见 Правда，5 октября 1949г.。

⑥ 《人民日报》，1949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11 月 22 日第 1 版。

况且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不应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样的政治口号。经过商议，许多国家代表不同意公开发表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对此坚决反对，但还是表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11 月 18 日中国代表刘宁一在大会的发言，没有再提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斯大林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即给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发出一封电报。斯大林指出：反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电报命令索洛维约夫马上通知中国代表团，苏联同意中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并把莫斯科的这个立场通报给其他国家代表团。斯大林还特意写道："你们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同志了解我这封电报的全文。"几天后，11 月 2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大会作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再次谈到争取广大人民的拥护、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并在第 1 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六天前的开幕词。然而，在会议结束时，分歧再次出现。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该决议有意回避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在执委会的建议下，刘少奇起草了另一份决议，其中指出工会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和支持对反动政府的武装斗争。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和执委会认为刘少奇起草的决议根本行不通，一旦这个决议公布，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工联组织将无法开展活动，执委会也要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最后，中国代表还是勉强对执委会的决议修改稿投了赞成票，尽管他们并不满意决议的内容。12 月 1 日会议闭幕。在关于各国工会报告的决议、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中，没有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但间接地提到学习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民族统一战线、工农联盟、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人民武装等。中国代表还同意了在会议开始时曾表示反对的执委会的另一个建议——成立（世界工联）亚洲国家联络局，刘少奇后来解释说，同意这个建议，仅仅是因为执委会承认"联络局的领导角色属于最了解亚洲国家状况的中国同志"。12 月下旬，苏联要求刘少奇提供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和所起草的决议的审定译文。1950 年 1 月 4 日，《真理报》刊登了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开幕词。[①]

---

① 希巴耶夫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12 月 25 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10，л.18-30；关于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在北京行为的材料，1950 年 1 月，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7 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2005 年，未刊，第 1615–1620 页；《人民日报》，1949 年 11 月 19 日第 3 版、11 月 22 日第 1–2 版、12 月 2 日第 1–2 版；Правда，4 января 1950 г.，3-й стр.。参见刘宁一：《历史回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年，第 140–144、374–376 页。

看起来，这个故事好像表明斯大林已经认可中共经验的普遍意义，已经同意把武装斗争作为世界工联的工作路线。实际上，这并不代表斯大林的真实想法，他同意发表刘少奇的讲话是迫不得已，另有所图。正如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所说，面对世界工联会议的冲突，斯大林非常为难。本来，在离开莫斯科之前，苏联工会代表团关于这次会议的一切原则路线都是经斯大林批准的。没想到，中共在会议上突然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问题。对此，斯大林必须做出选择。毛泽东就要到苏联来访问，斯大林不想也不能令他难堪，所以只能批评自己人。至于《真理报》在 20 天后突然刊登刘少奇的讲话，也是对毛泽东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因为苏联在远东需要一个可靠的盟友。[①] 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斯大林只是同意中国报纸刊登刘少奇的开幕词，而对会议决议的争执却不予表态，这就说明斯大林不是真的赞同中共的说法——发表刘少奇的讲话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做出的决议则对整个亚洲国家工人运动有指导作用。至于《真理报》1 月 4 日刊登刘少奇讲话的目的，列多夫斯基所说固然不错，但斯大林这样做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了让毛泽东心满意足，以争取苏联提出的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得以通过。

再看对日共和平路线的批判。

1950 年 1 月《真理报》和情报局机关报载文批评日共的“和平转变论”，主要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在日本的较量，与中国革命或中共的经验并无直接关系。在美国提出三八线的问题时，斯大林曾企盼苏军能够获取在日本本土登陆的机会，此事遭到美国拒绝，斯大林必定耿耿于怀。冷战爆发后，美苏在日本的冲突愈加激烈，这主要反映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尽管美国决策层在缔结对日和约的时间和方式上一直有不同意见，但是对苏立场日趋强硬却越来越明显。[②] 战后初期，苏联始终坚持在 1945 年达成的协议框架内谈论对日和约的问题。从保证苏联远东安全和落实雅尔塔协定出发，斯大林三番五次提出建议，希望尽快缔结对日和约，而美国对这些建议却根本不予理睬。苏联原本设想拉拢中国共同参与讨论日本问题，所以不断向国民政府表示友好。[③] 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破败，这个帮手已实难指望，中共在日本问题上一时又说不上话，莫斯科只能依靠日本内部的力量——日本共产党来对抗美国。但此时日共执行的却是一条和平路线，主张与美国占领军合作，这能不令斯大

①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с.82-83.

② 详见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第 172–188 页。

③ 见 *Тишков.В.А.* Вынужденные мигранты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осква：ИЭИА РАН，1998，с.6。

林焦急万分？这种情绪在情报局的文章中一目了然。

文章首先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将就将注意力转向了日本。美国以种种借口拖延签订对日和约，就是要“使美军对日长期占领合法化”。镇压民主运动，打击共产党和工会，对日本经济的控制，重新武装日本军阀，以及空军和海军基地的广泛建立，都是表明美国企图把日本“作为反对苏联和反对亚洲各国民主运动的军事冒险的主要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就是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接着，文章就开始从各个方面批判日本共产党的现行路线。文章指出，野坂参三等日共领袖试图证明，“战后的日本具备着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甚至认为美军的占领有利于日本实现民主化。文章在严厉地批评了日共的这种“和平革命”路线后断言，这种理论是在粉饰和吹嘘美帝国主义，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①]

通观全文，没有一处提到中国革命的榜样，也没有一处提到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实在看不出有何理由把这篇文章看作是苏联赞同和推广中共革命路线的范例。说到底，斯大林的不满就在于日共没有执行苏共在 1947 年情报局会议上提出的新纲领，没有开展与美国占领军的斗争，而是继续采取和平的、合作的方针。至于如何开展斗争，在情报局会议上和这篇文章中，都没有明确指示，至少是没有谈到像中共那样开展武装斗争。斯大林之所以请中共发表文章，大概主要是考虑野坂参三长期居留延安，与中国关系密切，希望中共帮助进行说服。而中共的出面自然有助于野坂参三、德田秋一等人低头认错，但也带来了误解——似乎革命斗争就是中国式的武装暴动。正是因为情报局的文章没有明确指出斗争方式，才导致事情复杂化，引起日本共产党内部一片混乱。一开始，德田和野坂都不同意情报局的批评，而宫本显治、志贺义雄等人则认为应该接受批评。中共的文章发表后，德田等人立刻转向，认为应学习中共开展暴力斗争，夺取政权。但宫本一派则对此不满，进而另立中央。日共由此分裂为两大派，反而削弱了反美斗争的力量。[②] 这大概是斯大林没有想到的结果。

说情报局发表文章鼓励印度也走中国式革命道路，同样是一种误解。

1 月 27 日，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社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

---

① 《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1 日第 1 版。

② 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5–76 页；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段元培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45–148 页。

展》，大力赞扬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并列举了越南、南朝鲜、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尼等国正在开展的游击活动和武装斗争。看起来是在宣传中国道路，但是仔细阅读文章的用词就会发现，社论把中国人民取得的胜利归结为列宁、斯大林“战略与策略的学说获得胜利的显著证明”。就是说，功劳首先是苏联的。更重要的是，社论在谈到印度共产党的任务时含混地说，“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应该加强工农联盟、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统一战线等等，而恰恰没有提到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真谛的武装斗争。[①] 这篇社论确实导致印共走上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但这并非接受情报局指示的结果，而是印共党内斗争使然。

印度共产党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派别斗争。1947 年 9 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以后，以兰纳迪夫为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1948 年 2 月，印共召开代表大会，兰纳迪夫顶替主张合法斗争的约希担任了总书记，并提出印度已进入“革命冲突”阶段。但是，兰纳迪夫接受的是南斯拉夫的革命理论，而当年 6 月苏南分裂，铁托被批判，再加上印共组织暴动引起政府镇压，兰纳迪夫开始感到压力。这时，安得拉地区党组织提出应该接受中共的革命理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当作“印度的指针”。兰纳迪夫指责安得拉派搞分裂，并攻击中共的理论和经验。1949 年 6 月，苏共支持中共的消息传达到印共，不久苏联报纸上又刊登出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的讲话，兰纳迪夫发觉形势不妙。于是，在情报局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社论发表后，兰纳迪夫立即做出检讨，并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接受情报局的结论。为了表明自己已彻底转变，兰纳迪夫在声明中不仅赞扬毛泽东和中共，甚至讲出了情报局社论根本没有涉及的内容——“在必要的国内条件许可时，组成人民解放军”。尽管如此，兰纳迪夫还是在 1950 年 5 月安得拉派发动的一次“宫廷革命”中被解除了职务，安得拉书记处的重要成员腊欧成为新的总书记。腊欧掌权后，在给党内的“密函”中宣称，印共新的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中共的理论和方针，并谎称莫斯科“把印度列为使用暴力已经成熟的国家”，随即开始组织武装暴动。几个月后，印度的农民起义便扩展到全国。腊欧的举动在党内和工会遭到众多反对和抗议，约希、丹吉、高士等人都出面抵制腊欧，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印共陷入分裂危机的时候，很可能是接到了情报局的指示，已经沉默三年的英国共产党不得不又重新担起责任。10 月英共政治局致函印共中央，批评印共的行动路线脱离实际，要求彻底

①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3 日第 1 版。

消除“托洛茨基－铁托主义的毒瘤”。来信指出，问题的主要根源就是印共曲解了1月情报局文章，误认为武装斗争是印共当前的主要任务。革命不应该排除武装斗争，但当前主要是开展合法斗争，准备参加大选。1951年1月，印共召开中央全会，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腊欧暂留总书记位置，等候党代表大会选举。此后英共中央再次来信，要求印共与尼赫鲁政府合作，促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并大谈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性。①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1951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见了印共代表。在会谈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革命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然而却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共产党“不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以依靠的友好邻邦”。② 显然，在斯大林看来，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武装斗争经验并没有普遍意义，即使在中国搞暴力革命，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对上述事件稍作详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武装夺取政权模式的吹捧只是一时之需，而非内心的认同。何况在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苏共指导和援助的结果。所以，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推广中共的经验。实际上，情报局机关报和《真理报》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在两种情况下引发了亚洲国家的革命风暴：一种是被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所利用，成为打击对手的工具；一种是过于看重文章的表面含义，对苏共此时言论信以为真。总之，没有一个行动是莫斯科授意或经过莫斯科批准的。

由此看来，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的确属于一种例外。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在亚洲只对两个国家的武装斗争提供过实际援助，就是中国和朝鲜。对于中国革命，除了有一些限于东北地区的暗中援助，莫斯科基本上是冷眼旁观，直到中共取胜的大局已定，斯大林才全面关注和帮助中国革命。朝鲜的情况则根本不同，整个军事行动就是斯大林与金日成共同策划的，北朝鲜的军队是苏联顾问手把手训练的，武器装备也完全是苏联提供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斯大林是一个意外，而朝鲜半岛的战争则是斯大林的预谋。就战争的爆发而言，这场战争与其说是金日成的战争，不如说是斯大林的战争。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同意发动这样

① Gene D. Overstreet and Marshall Windmiller, *Communism in Ind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p.245-305；《人民日报》1950年3月13日第1版。

② 斯大林与印共领导人谈话记录，1951年2月9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10，л.85，78–79。

一场战争？

四、斯大林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到此为止的历史叙事可以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两个前提：第一，斯大林根本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时间就在 1950 年 1 月；第二，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采取行动有苏联自己的需要。于是，问题就变成：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斯大林究竟失去了什么东西使他感到必须要通过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来进行补偿？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特别值得注意：1 月 26 日，中方提出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路的协定草案，要求在两年内收回中国在东北的全部主权；1 月 28 日，苏联退回经修改的中方文本，基本上接受了中国的要求；1 月 30 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电报，表示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并愿意提供帮助。由此，笔者有一个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将使苏联失去通向太平洋的唯一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无疑是一个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失，其结果将导致苏联在亚洲失去战略依托。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对南朝鲜发动进攻，就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重建或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这一传统战略的支撑点。

旅顺、大连和中长路，即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对于苏联的重要性，前文已有详细论述，这里要说的是，夺取和控制朝鲜半岛就能弥补这一损失吗？斯大林怎么会突然想到用朝鲜半岛来顶替辽东半岛呢？其实，朝鲜半岛对于俄国在亚洲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仅从地图上看就一目了然。早在 19 世纪末，俄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897 年 11 月 11 日（俄历），积极在亚洲寻找通往太平洋出海口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写道："我一直以为，我们日后的自由港应选在辽东半岛或朝鲜湾东北一隅。"沙皇在信上御批："完全正确"。[①] 这就是说，朝鲜半岛本来就是沙皇俄国的选择对象之一，后来把目标确定在辽东半岛，大概是出于对路途远近的考虑。

中国外交官也看到了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意义。雅尔塔密约关于苏联租借旅顺港的消息传出后，中国人很着急。1945 年 4 月 11 日，在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追问下，曾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海军上将李海透露，苏联人有意在最后阶段参加对日作战，其目的可能是想用租借的办法重新占有旅顺和大连。顾维钧显

① 穆拉维约夫致尼古拉二世函，1897 年 11 月 11 日（俄历），抄录自大连开埠建市档案展览展件，2011 年 9 月。

得非常焦急，立即指出苏联这样做的结果将重蹈19世纪末列强在辽东半岛争夺的覆辙。为此，顾维钧特别向美国建议，"如果苏联真的想要一个不冻的海军港口，它可以在沿着朝鲜半岛东北海岸分布的三个日本人建造的海港中找到一个，而它们都与进入中国东北的铁路便利地连接着。苏联可以沿着朝鲜半岛的东北海岸创建一个更为合适的海上走廊，因为这将与它的沿海省份及海参崴相连接"。①

对日宣战前，苏联外交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万一中国拒绝租借旅顺口如何补救。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指出，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阐述的理由，几乎是重复了顾维钧的观点。②是年9月，美苏已经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控制范围，但仍倾向于通过托管实现朝鲜的独立和统一。于是，苏联外交部继续向斯大林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则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③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

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所以，斯大林一再阻止金日成在三八线惹是生非，而且像毛泽东保证，和平可以维持10-15年。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至于雅尔塔协定，斯大林

---

①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eahy, April 11, 1945, box 77, No. 5, V.K. Wellington Koo Papers, Butler Library,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② 茹科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报告，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430，оп.2，п.18，д.5，л.1-7。

③ АВПРФ，ф.0431I，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 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Working Paper*，1993，No.8，pp.9-11。

在同意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时就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在1月22日会谈时，毛泽东提到改变中苏条约将牵涉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斯大林说了一句话："那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①] 很可能在这个时候，解决出海口问题的方案已经浮现在斯大林的脑海中。

至于用朝鲜半岛顶替辽东半岛，在此应该指出，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了远东政策，为此曾策划外蒙古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②] 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交易即为众所周知的一例。[③] 就是在朝鲜半岛，斯大林也曾进行过同样的尝试。1945年8月当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划分美苏在朝鲜的军事管制范围的建议时，斯大林欣然同意，其目的就是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麦克阿瑟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④]

斯大林一向思维缜密、做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军事进攻有两种结果——顺利或者不顺利。如果按照斯大林对艾奇逊演说理解的那样，金日成在朝鲜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没有出兵干预。那么，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至于交通运输的问题，一方面如顾维钧所说，北朝鲜的铁路可以与中长路连接；另一方面，为了把苏朝铁路连接起来，双方在1949年3月已经确定修建克拉斯基诺至阿吾地之间仅58公里的铁路线。[⑤] 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而根据中苏双方的协定，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急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路。于是，通向太

---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

② 列宁语，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5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7页。

③ 详见《史料》杂志编委会：《丘吉尔与斯大林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俄国档案中的百分比协定》，吕雪峰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2006年秋季号），第261-278页。

④ 详见沈志华：《三八线的由来及其政治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57–60页。

⑤ 参见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49年3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3-23。

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可以继续为苏联服务。所以，斯大林显然已经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不得不开放中长铁路，并请求苏军继续留驻旅顺基地。1950 年 7 月 11 日，根据苏联政府的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对苏联的军事运输全面开放中长铁路和东北的空中航线。① 旅顺口归还日期临近时，1952 年 9 月，中国主动请求苏联海军推迟撤离，斯大林要求重新签订协议。② 经过商谈，中苏双方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③ 与此同时，按照 1950 年的协定，苏联归还中长路在即。但就在签署归还中长路的联合公报时，莫洛托夫特意提醒中国代表，关于允许苏联军队使用中长路的秘密备忘录仍然有效。周恩来确认了这一点。④ 就这样，苏联如愿地保住了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最后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急于开始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战争的准备十分仓促：南朝鲜的游击队活动在 1950 年上半年正处于低潮，而且没有迅速复兴的迹象；苏联的武器装备刚刚运达，朝鲜部队尚未学会使用；由于缺少飞行员，朝鲜的空军部队无法参战；人民军部队的作战训练仅仅几个月，也还没有圆满完成。这些问题，金日成看不出来，苏联军事顾问也瞎了眼吗？金日成不顾一切要抢先发动进攻可以理解，斯大林一生处事谨慎、思虑周全，为何也要打这无把握之仗？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斯大林看重的是战争的发动，而不是战争的结果——无论胜负如何，苏联都可以控制一个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是有缜密和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31–32 页。

②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 年 8 月 20 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 年 9 月 3 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75-87。

③ 周恩来给维辛斯基的照会，1952 年 9 月 15 日；维辛斯基给周恩来的复照，1952 年 9 月 15 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2184、2185 页。

④ 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2 年 9 月 8 日，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59-64，*Мясников В.С.* (*под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т.2，Друг с союзником нового Китая，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10，с.184-187。

政治同盟使中国加人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报复：本来斯大林是同意先帮助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考虑朝鲜问题。后来突然秘密召见金日成，讨论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显然已经把中共进攻台湾的战役置之脑后了。由此展开，美国学者柯庆生从另一个角度对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行为的解释，也是比较合理的："正是因为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成为铁托主义者或者亚洲的列宁，才使得金日成撬动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成为可能。"①

当朝鲜战场的局势出现逆转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确实面临着严峻考验。究竟是亚洲的铁托，还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全部问题就聚焦于一点，中国在危急时刻是否能够出兵援助朝鲜。

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4 期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Worse Than a Monolith：Disorganization and Rivalry with in Asian Communist Alliances and U.S. Containment Challenges，1949-69"，*Asian Security*，Vol.1，No.1，Jan 2005，pp.80-88. 中译文见柯庆生：《东亚社会主义同盟与美国的遏制战略》，《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4 辑（2007 年春季号），第 33–34 页。文中指出，较早使用"亚洲的列宁"这一说法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在 1949 年 6 月 6 日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道："在可能导致中苏分裂甚或走向战争的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不甘人下的毛泽东要成为亚洲的列宁。"

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

朝鲜战争的爆发，引起美国对朝政策乃至远东政策骤然发生转变。1950 年初美国政府曾公开宣布朝鲜半岛处于美国远东战线的防御圈之外，美国对朝鲜问题的一切计划都是以从朝鲜脱身为基点的。这一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杜鲁门 1 月 5 日的声明、艾奇逊 1 月 12 日的演说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案则是 2 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东京制定的“非橄榄球”作战计划。[①] 然而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仅仅五天之内，连续做出一系列决策，而且步步升级，终于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华盛顿来讲的确是出乎意料的。然而，美国的反应却异常迅速而且激烈。从最初获得战争消息感到震惊和慌乱，到做出全面介入战争的最后决定，前后不过几天时间。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通过美国政府决策的不断升级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朝鲜战争泥淖的端倪。[②]

---

① 详见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伍协力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第 227–229、233 页；*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 washington D.C.: GPO, 1977, pp.237、292；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年（据 1983 年英文版译），第 679 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99 页。

② 时间表以美国东部时间为准（引文仍是汉城时间），华盛顿与汉城的时差约 14 个小时。对这一过程描述的主要根据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 pp.125-269；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三联书店，1974 年（据 1956 年英文版译），第 393–413 页；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 261–278 页；Glenn D. Paige, *The Korean Decision: June 24-30*, 1950，New York，1968，pp.90-241；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34–114 页；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孟庆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据 1991 年英文版译），第 21–56 页。由于对上述材料做了综合处理，经核查后有所取舍和调整，故除专门引文外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6 月 24 日，星期六。

晚上 9 时稍过，在华盛顿的美联社总社收到驻南朝鲜记者报道朝鲜发生战事的第一封急电，称北朝鲜军队发动了进攻，“开城已告失守”。国务院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报向驻汉城的美国大使馆询问。大约在同一时间，即 21 时 26 分，国务院收到穆乔（又译穆西奥）的电报：

根据朝鲜军队的报告（此项报告已部分地为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战地顾问的报告所证实），北朝鲜的部队今天清晨已向大韩民国领域的好几个据点进犯。开始行动的时候大约在上午 4 时。瓮津遭受北朝鲜炮火的轰击。6 时左右，北朝鲜的步兵开始在瓮津、开城和春川等地区越过三八线。据称水陆两栖部队已在东海岸江陵的南部登陆。开城据说已在上午 9 时陷落，北朝鲜大约有 10 辆坦克参加了这次战斗。北朝鲜部队以坦克为前锋，据称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鲜部队已将公路切断。我们今天上午正在同朝鲜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和朝鲜的官员们进行会商，研究当前的局势。

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这次进攻的方式看来，这似乎是对大韩民国的一场全面攻击。[①]

当时正值周末，美国很多政府官员都在度假或外出。杜鲁门总统和家人团聚在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国务卿艾奇逊、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则分别住在马里兰州和佛蒙特州他们各自的家中。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杜勒斯尚在东京没有回国。被电话召到国务院来的只有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无所任大使菲利普·杰塞普、联合国政治与安全事务处副处长温豪斯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官员培根等人。至于军方领导人，据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回忆，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当时正在从东京返回华盛顿的途中。[②] 除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外，一时无法与其他部长和参谋长取得联系。

22 时左右，艾奇逊接到电话通知，希克森报告了有关朝鲜冲突的情况后，建

---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 年，第 395 页；*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pp.125-126.

② 有的著作说这两位军界主要领导人这时已回到美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参与当天晚上的商讨和决策。

议第二天上午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号召停火。艾奇逊表示同意，并授权驻联合国副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去找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艾奇逊还要求国务院迅速通过佩斯与五角大楼取得联系，以便共同研究应付方案。

23 时 20 分，艾奇逊与杜鲁门通上电话。艾奇逊将穆乔的电报内容和召开安理会的建议报告了总统。杜鲁门表示同意，并要立即赶回华盛顿。由于夜间飞行风险较大，而且关于朝鲜的局势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艾奇逊劝杜鲁门第二天再动身。

23 时 30 分，希克森给赖伊挂通了电话。赖伊同意在次日下午 2 时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值日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中校也是由于新闻界的询问才获悉朝鲜发生战事的消息。然而，除了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以外，军方似乎是无所作为。由于截至到第二天清晨，除了第一封电报，穆乔以及驻汉城的使馆再没有发回更多的消息，午夜过后由陆军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主持的临时"指挥所"，只是确保把来自国务院的各种指示和情报转给太平洋彼岸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整个五角大楼所做的仅是准备以克利夫顿中校的名义向新闻界发布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已获悉朝鲜爆发了战争以及美国军队没有卷入战争。

6 月 25 日，星期日。

午夜刚过 2 时 30 分，希克森终于找到了格罗斯，向他口述了由温豪斯和培根起草的提交安理会的议案，内容确定后，用电报将召开紧急会议的请求和美国的议案通知了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并随后派温豪斯乘飞机将议案带往纽约。

国务院在早晨收到了来自南朝鲜的进一步消息：以一个坦克纵队为核心的大规模进攻正指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南朝鲜的武器装备显然远远不能抗衡。刚刚从马里兰州驱车赶回华盛顿的艾奇逊认定在朝鲜已经发生了全面战争，情势危急，便再次与杜鲁门通了电话。杜鲁门决定立即赶回华盛顿，并于当日晚在布莱尔大厦召开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人员会议。杜鲁门还要艾奇逊会同陆海空三军部长和参谋长立即进行研究，以便在他回来后能提出一个方案。

10 时 35 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情报处收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的一份情况综述，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报告对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显然做了十分错误的估计。报告说，北朝鲜的进攻部队只有 3 个师，而南朝鲜的防御部队有 4 个师，另有第 5 师正在开赴前线。所以报告认为所丢失的一些土地都在应急的防御计划的意料之中，算不得一回事。麦克阿瑟认为，尽管"从北朝鲜投入的力量和战略意图来看"，他们的进攻是"猛烈的"，战术上也造成了突然性，但无论如何其最终

目标尚不明确。麦克阿瑟已下令向南朝鲜运送弹药，并建议集结在菲律宾的第七舰队主力开赴朝鲜，以防万一。军方本来就认为朝鲜对美国没有战略意义，况且在几个月前也曾拟定了对付入侵的应急计划：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尽快撤出所有的军事人员、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时动用空军掩护。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危机的态度似乎是希望执行这一应急计划。

11时30分，艾奇逊根据杜鲁门的要求，召集了有军方人员参加的会议。国务院方面出席会议的都是首脑人物，即艾奇逊、韦伯和腊斯克，而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代表只是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和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显然军方对这次会议并不重视。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建议：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应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周围建立防御圈，以确保美国平民的安全撤离；授权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向南朝鲜提供武器装备，而不受以前的军援计划的限制；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不应撤离；麦克阿瑟的职权应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包括第七舰队在内的一切力量去"稳定局势，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尽管这些建议都通过电话征求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意见，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后来的文件仍称这一行动计划是国务院方面提出的。

下午2时，杜鲁门的座机独立号从堪萨斯机场起飞，由于时间仓促，总统的两名随员竟未及赶上飞机。杜鲁门在飞机上用电报通知艾奇逊，晚7时30分召集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官员在布莱尔大厦共进晚餐，并召开紧急会议。就在杜鲁门的专机起飞时，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正式开始。赖伊引用联合国驻朝鲜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北朝鲜已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而安理会应采取措施，重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接着格罗斯宣读了美国的决议案，要求安理会命令北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将其军队撤回三八线。据艾奇逊的回忆，美国起草的决议原来说的是"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构成'无端的侵略行为"。但其他几个安理会成员国认为，对目前掌握的情况能否作出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说这是"构成对和平的破坏"较为合适。美国照此意见修改了决议案。所以，下午6时以前，经短暂的休会进行考虑后，安理会代表同意接受美国的决议案，只有南斯拉夫弃权。

下午5时过后，杜鲁门抵达华盛顿，即直接赶往布莱尔大厦。被召集来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官员有艾奇逊、韦伯、腊斯克、希克森、杰塞普，国防部官员有约翰逊、陆军部长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军

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海军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以及布雷德利共 13 人。会议正式开始前，约翰逊请布雷德利宣读了一份他从麦克阿瑟那里拿来的关于台湾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似乎现在要讨论的不是朝鲜局势，而是台湾的命运问题。艾奇逊感到这是国防部与国务院意见分歧的表现，军界一直对朝鲜问题不感兴趣，而对于国务院的弃蒋政策耿耿于怀。由于杜鲁门把话岔开，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讨论。

晚上 7 时 45 分，会议在晚餐后正式召开。杜鲁门请艾奇逊首先发言。艾奇逊依据国务院情报司提供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分析报告，讲述了南朝鲜的局势。该报告估计，北朝鲜军队将在 7 天之内攻陷汉城，并在 72 小时后向南朝鲜提出“和平解决建议”，即要李承晚投降。如果美国不出面，南朝鲜即将崩溃。随后，艾奇逊宣读了准备好的建议。据艾奇逊说，当天下午他曾独自在办公室思考行动方案。所以，宣读的建议与上午商讨的内容稍有修改，并归纳为三点：（1）麦克阿瑟应将包括军人眷属在内的美国公民撤离朝鲜，为此，应当出动美国空军击退对金浦、仁川等机场和港口的进攻。但美国的空军部队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2）应当命令麦克阿瑟以空投和其他办法向韩国军队提供军火和给养。（3）应当命令第七舰队立即从菲律宾的海军基地出发北上，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战争扩大到该地区。同时发表一项声明：第七舰队将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也阻止台湾进攻大陆。杜鲁门插话，可以立即命令第七舰队北上，但是在该舰队到达指定地区以前，暂不发表声明。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每个人都谈了不同的具体细节支持这几项建议，同意采取以上行动。谢尔曼和范登堡宣称，动用海、空军即可应付局面，通过美国的空中打击和海上重炮猛轰，战争就可能结束。柯林斯对此表示怀疑，但大部分人都反对使用美国的地面部队。杜鲁门又详细询问了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最后决定采纳艾奇逊的三项建议。杜鲁门指示三军参谋长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一旦联合国号召向北朝鲜采取行动时，立即发出命令，使用美国的部队。同时，接受柯林斯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向南朝鲜派出一个调查组，对于援助的方式和怎样使用远东的美军力量做出第一手估计。杜鲁门还决定将第七舰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其基地设在日本的佐世保。会议于 23 时左右结束。

从 25 日的情况看，美国军方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反而是国务院比较主动。由于国务院的建议中已经提出了台湾问题，因此，关于朝鲜问题的这些建议没有遭到军方反对。尽管决定使用空军部队介入战争，但其目的似乎还是为了

达到撤离朝鲜的原定方案。至于是否使用美国军队来阻止北朝鲜的进攻，拯救南朝鲜政权，显然还是个犹豫不决或至少没有明确的问题。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对战局发展的情况没有更清楚的了解。

6 月 26 日，星期一。

从朝鲜传来的消息令白宫感到沮丧：南朝鲜部队节节败退，北朝鲜部队则步步进逼。美国军事顾问团怀疑李承晚的部队能否坚守住汉江这条三八线与汉城之间唯一的天然屏障。穆乔大使不顾麦克阿瑟的反对——这位将军认为不必惊慌失措和操之过急，于凌晨 2 时做出使馆撤离汉城的决定，尽管他本人还留在汉城。李承晚的政府则已决定迁至汉城以南 240 公里的大邱。晚些时候发来的麦克阿瑟的电报令杜鲁门感到吃惊：

南朝鲜第 3 师和第 5 师零零星星地投入汉城附近战斗的结果，并未能阻止敌人的入侵，这种入侵被认为是过去两天中敌人行动的主要努力，其目的在于夺取首都汉城。敌人的坦克正进入汉城近郊。……在当前这种迅速恶化的局势下，远东司令部派出的前往朝鲜的军事调查组已下令召回。

南朝鲜的部队抵挡不了北朝鲜的猛攻。敌人的有利因素完全在于拥有坦克和战斗机。作为战斗情况的指标来看，南朝鲜的伤亡人数表明缺乏足够的抵抗力，也缺乏战斗意志，据我们估计，很快就会全部崩溃。[①]

下午 3 时 15 分，南朝鲜大使张勉向杜鲁门转递了李承晚请求提供援助的信。杜鲁门回忆说，张勉“显得很忧郁，几乎要掉出眼泪来”。显然，局势已经异常严重。

晚上 9 时，杜鲁门再次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与昨天的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的气氛显得凝重。首先由布雷德利汇报了朝鲜战况，声称南朝鲜的军队正在全线后撤，几乎丧失了“有效的抵抗能力和斗志”，汉城“异常危急”，北朝鲜的坦克已“兵临城下”，李承晚的部队即将“彻底瓦解”。范登堡报告说，美国空军已击落一架苏式雅克型飞机。在答复杜鲁门要求提供建议时，艾奇逊提议：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399–400 页。

——空军和海军应向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支援。在目前可将活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

——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进攻，告诉国民党人也不要进攻大陆，告诉第七舰队，如有必要，可阻止他们这样做。

——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并加速援助菲律宾军队。

——增加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并告诉法国人我们要派一个强大的军事使团去。

——如总统同意以上各点，请总统发表按他指示所准备的声明，其中包括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在明天上午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上，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案，号召联合国会员国给朝鲜援助，以回击武装进攻和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①

这些建议得到一致赞同，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但是，对于美国出动海军和空军援助南朝鲜军队作战是否能够奏效，仍有意见分歧。海、空军官的看法比较乐观，但陆军参谋长对此深表怀疑。杜鲁门于是询问了美国地面部队的情况，经柯林斯和布雷德利反复估算，认为美国兵力明显不足。如果出动地面部队，就需要下令动员国民警卫队和请求国会拨款。杜鲁门命令立刻对此进行研究。

会议只进行了一个小时，杜鲁门即下达了出动海军和空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以及派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的命令。杜鲁门还要约翰逊用电话通知麦克阿瑟，动用在远东的海、空军力量支援南朝鲜，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会后，佩斯立即向麦克阿瑟下达作战命令：对三八线以南的“所有军事目标都可以出动空军”，“海军在所有海岸水域及港口均可自由采取行动”。

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就迈出了卷入战争的第一步，同时，也为中美之间的抗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已经有意使用地面部队介入战争，只是由于能力不及和对海、军力量的出动寄予希望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已。还有必要指出，在美国总统和陆军部长的命令下达时，联合国安理会尚未开会通过所谓支援南朝鲜的决议案，美国国会也还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甚至没有任何表面的合法化。当然，白宫对此并不是不介意的。麦克阿瑟受命后，要求授权将“援助措施”立即向南朝鲜宣布，以“激励士气”。但国务院不同意，韦伯回答说，在总统与国会取得联系之前，

①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269–270页。

不能公开宣布此项消息，“以免影响国会对政府的支持”。但麦克阿瑟认为，如果不给南朝鲜军队注入一针兴奋剂，不用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这样，在麦克阿瑟的一再坚持下，韦伯和佩斯同意了他的要求，条件是在杜鲁门的公告发表以前，不得使用英语广播这些决定。

6 月 27 日，星期二。

上午，杜鲁门率国务院和国防部主要成员与国会领袖会谈。在艾奇逊概要地介绍了情况后，杜鲁门宣读了国务院为他草拟的准备在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征求国会领袖对此声明的意见。国会领袖们对杜鲁门政府的行动采取了一致支持的态度。参议员维利询问美国军队目前卷入的程度，约翰逊确切地回答，麦克阿瑟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派出了空军和海军部队。参议员说，只要知道美国已有军事力量在朝鲜，并且总统认为这些力量够用，便行了。泰丁斯参议员报告说，他所领导的兵役委员会已于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决定延长征兵法的期限，并建议授权总统召集国民警卫队的力量。问题转向政治范围后，杜鲁门解释说，目前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支持联合国为恢复朝鲜地区和平所作的努力。至于台湾，他的命令是辅助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爆发任何新的战斗。会谈时，还讨论了美国向联合国提交的议案，除提出一些措词的问题外，该议案也得到这些国会议员的一致同意。当天，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杜威也在电话里向艾奇逊宣读了他的声明，保证支持政府在朝鲜的行动。

会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了声明，宣布美国已派海军和空军部队为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并且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进攻以及台湾对大陆的进攻。杜鲁门为第二道命令寻找的行动依据是台湾的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和约问题的解决或经联合国的审议。

下午 3 时左右，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为制止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援助”的议案。会议辩论达数小时之久，随后又休会几小时，以便印度和埃及代表等候各自政府的指示。直到深夜 11 时 50 分，在苏联代表仍然没有返回联合国的情况下，安理会才以 7 票赞成，1 票（南斯拉夫）反对，2 票（印度和埃及）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紧急制裁案”。

6 月 28 日，星期三。

三军参谋长们通过对朝鲜局势通宵达旦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仅仅依靠海、空军

是无法挽救南朝鲜的危险局势的。战斗机的轰炸在白天可以摧毁北朝鲜的坦克纵队，但却无法阻挡10余万人的步兵对仅有其兵力1/4的南朝鲜部队的进攻。在上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其下属的联合战略委员会研究一下，如果当前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收效甚微，那么从军事角度出发，应采取什么对策，并限48小时拿出方案。该委员应该考虑空军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以及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在内的其他行动。

下午5时，杜鲁门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朝鲜局势。空军部长芬特勒要求取消对空军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的限制，以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持”。杜鲁门拿不定主意，他请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研究这个问题。美国空军“可能不得不”轰炸北朝鲜的空军基地和储油罐，但他目前还无意作出决定。范登堡感到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北朝鲜的空军基地位于三八线以北约60公里，美国飞机不可能借口“误越边界”对其实行轰炸。艾奇逊和约翰逊也不倾向于这样做。杜鲁门最后说：“我们不会那么干。”尽管杜鲁门在不到24小时之后便改变了态度，但在此之前，麦克阿瑟早已口授了一份给远东空军副司令帕特里奇的电报，命令他“立刻摧毁北朝鲜的机场”，并不准他声张。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他自朝鲜开战以来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超越了总统授予他的权限。

6月29日，星期四。

麦克阿瑟派往朝鲜的以约翰·丘奇准将率领的先遣调查团发来消息，如果美国军队不投入战斗，已不可能恢复战前的分界线状态。北朝鲜军队已经攻克汉城，并肃清了那里的李承晚军队，现正继续挥师南下，直指南朝鲜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水原。在约翰逊的紧急动议下，杜鲁门于下午5时再度召开了有副总统巴克利、国务卿、国防部长、三军部长和参谋长、财政部长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等人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约翰逊首先提出了一项发给麦克阿瑟指示的建议。约翰逊认为，仅仅为了建立一个保证空军行动安全的基地，就应该动用地面部队。因为从日本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在目标空域行动的时间极为有限，并且无法与它们支援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约翰逊还抱怨把海军和空军的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做法，使北朝鲜的补给品和增援部队可以顺利地向南运送。如果建立一个得到保护的空军基地，还可以保护那里的美国人员安全撤离。总之，约翰逊认为，美国军队至少应在南朝鲜有一个立足点。杜鲁门表示，所采取的行动不要含有美国计划同苏联作战的意思，而只是表明要“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同时，这一行动还要

保证美国“不至于过深地陷在朝鲜，以至我们照顾不了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佩斯认为，对于授权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应特别慎重，并对这种行动明确地加以限制。艾奇逊概要地向会议汇报了国务院对苏联行动所作的估计，国务院的分析认为，“中国人可能干涉，俄国人则不至于”。

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于当日下午6时59分向麦克阿瑟发出第84681号命令，其要点是：（1）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但目标是保障远离战区的釜山的港口、飞机场和交通设施。（2）准许动员海军和空军在远东的全部力量打击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军事目标，但要“特别注意，在北朝鲜的行动应清楚地止于满洲和苏联边境”。（3）“如果苏联部队积极攻击我们在朝鲜的作战行动，你部可自卫但不能采取使形势恶化的行动，并应向华盛顿报告情况”。①

这一天，美国的行动又进了一步。海军和空军出动的目的已经不仅是保护美国平民的撤离，而且要打击北朝鲜的军事目标，特别是把三八线以北的军事目标也包括了进去。另外，美国还决定将地面部队投入朝鲜，尽管只是保护性的，但这距离真正加入战斗，只有一步之遥。

会议后不久，艾奇逊带着蒋介石的提议回到白宫。蒋介石表示愿意在南朝鲜投入33000人的军队，由美国运送和提供给养。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艾奇逊则提出反对，理由是“这些军队对保卫福摩萨比保卫朝鲜更有用”。杜鲁门指示在次日的会议上再提出这一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6月30日，星期五。

麦克阿瑟亲自乘飞机对南朝鲜进行视察后，于子夜1时给五角大楼发出一份洋洋2000字的电报。电报说南朝鲜部队已“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目前能够坚守汉城以南战线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麦克阿瑟建议立刻派遣一支约2000人的部队，随后再从日本抽调两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柯林斯被五角大楼的值日官从床上唤醒后，匆匆赶到办公室。他立即与麦克阿瑟直接进行了电传打字会商。麦克阿瑟要求立即对他的建议给予答复，并再次强调前线急需美国军队的援助。柯林斯只得又唤醒陆军部长佩斯。佩斯答应向总统请示，便于凌晨5时向杜鲁门请示。佩斯口述了麦克阿瑟的电文后，杜鲁门仅问了几句，就命令佩斯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同意先派一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

---

① 《关于朝鲜的决策》，第240–241页。

上午8时30分，杜鲁门再次召集布莱尔大厦小组讨论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和蒋介石向朝鲜派出军队的建议。杜鲁门仍倾向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因为时间十分紧迫，而蒋介石的部队在5天之内即可上船出发。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都反对让蒋介石卷入朝鲜战争，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这种行动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朝鲜进行干涉或进攻台湾。杜鲁门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婉言拒绝蒋介石的建议。此后，麦克阿瑟关于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投入战斗的要求，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便顺利地通过了。杜鲁门批准了将要发布的命令。

上午11时，白宫举行与国会领袖会晤的会议。杜鲁门向国会领导人作了简要介绍，宣布他刚刚命令美国地面部队介入朝鲜的战争。在漫长而紧张的沉默之后，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对总统未经与国会商议便决定使用地面部队的做法表示异议。杜鲁门以时间紧迫为由回答了这一指责。国会两院以压倒的多数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支持。

下午1时22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84718号命令："兹取消84681号命令中关于限制使用陆军的规定"，授权麦克阿瑟可以使用他所指挥的陆军投入朝鲜的战斗，只是以"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为限"。此外，"国务卿奉命通知，目前对蒋介石委员长提供部队的建议应予谢绝"。[①]

至此，杜鲁门政府终于非常轻易地迈出了使美国全面卷入战争的最后一步。随着7月5日第24师第1团史密斯特遣队在乌山投入作战，美国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一般说来，地面部队投入战斗就意味进入战争状态，而杜鲁门未经事先宣战——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事例，也未经国会同意——这在以往的情况下会遭受国会的强烈抵制，便决定了美国所面对的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然而，美国国会和舆论却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美国也就这样一步步地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

朝鲜半岛本来是处于美国在远东的环形防御线之外的，美国军方几次制定的关于朝鲜一旦发生战事的应急方案也是迅速撤离朝鲜半岛，退守日本。就是说，从朝鲜脱身是美国的既定国策。但为什么在战争爆发仅仅几天，美国政府就完全改变了它长期精心制定的政策，不顾一切地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呢？

美国做出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的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几个前提必须搞清楚。

（1）朝鲜战事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弄清北朝鲜发起进攻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次进攻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这一点外，政府各机构研究部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263.

门和情报部门看法各异。这次进攻的目标到底只是想占领南朝鲜，还是想以南朝鲜为跳板进攻日本？到底是局限在远东范围，比如台湾、越南、菲律宾，还是声东击西，利用美国在远东集中兵力的时机使苏联得以向西欧进攻？到底是北朝鲜的单独行动，还是苏联甚至加上中国蓄谋已久的总战略的前哨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到仁川登陆时都没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这种对战争意图的迷惘，必然造成决策的盲目。

（2）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对战争的爆发感到突然。尽管如前所述，许多情报机构都有关于发生军事冲突的迹象的报告送达各主管部门，但鉴于冷战状态下紧张局势的普遍存在，加之朝鲜南北军事冲突延续已有一年多，所以无论政界和军界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甚至战火已经燃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仍然掉以轻心，认为这不是一次决定性的战斗。[①] 对于战争缺乏心理准备，或者说只做了一旦发生战争便撤退到日本的准备，就使得美国在突如其来的环境中表现出惊慌失措，那么也就很难避免决策的失误。

（3）即使考虑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军方的立足点也建立在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抵挡住任何进攻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战争前夕，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朝鲜问题的争论仅仅集中在是否再给南朝鲜援助，究竟给多少援助这样一个问题上，从来没想过美国要亲自出兵参战。军方普遍认为只要再给点军火，南朝鲜军队便可以稳住战线。进攻开始一天以后，麦克阿瑟还对杜勒斯及其助手打包票说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应付。[②] 就是说，美国在军事上也并没有准备。因此，轻率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轻而易举地引导出第二个决定。从整个战争过程看，美国的政治决策多少都有些被军事形势牵着鼻子走。

（4）从军事理论上讲，由于掌握了原子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战后大量裁军的现状，美国的军事战略理论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击力量的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海、空军力量。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只是准备去对付一场苏联对美国或西欧突然发动的全面进攻，而这种进攻将遇到战略空军力量的强有力反击。正如李奇微所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有限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③] 其结果是苏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140.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140.

③ 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 年（据 1967 年英文版译），第 3、20 页。

联按兵不动，美国却由于判断失误而为太平洋彼岸的弹丸之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认识盲目、判断失误以及心理和军事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仓促做出了进入战争状态的重大决定。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在各种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存在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基础。

首先，战后的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美国既然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而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美国眼里，苏联正在利用其战后建立起来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由于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胁性，实现其一贯宣传的目标：解放全人类。况且，雅尔塔体系已经大体上划分了美苏两国或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又确定了美苏冷战游戏的规则。所以，美国认为向南朝鲜的进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公然挑战。在 1950 年初美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75% 的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①]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早已为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抵制苏联发动的任何进攻或制造的紧张局势。从希腊到柏林，从伊朗到中国，从西亚到远东，战后几年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尽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被划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但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上讲，南朝鲜毕竟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毕竟是受美国保护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威信，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即使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都不很重要的朝鲜半岛，也成为美国决心保卫西方世界免遭“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1949 年“丢失”中国之后，就使得南朝鲜在远东的这一象征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杜鲁门在回顾朝鲜战争时，正是这样说的：

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

① 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 19 页。

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末，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①

艾奇逊对这一点说得更加明确：

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南朝鲜是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区。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②

当然，杜鲁门和艾奇逊作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主要决策人，在事隔多年后采取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为美国错误地卷入这场战争的决定进行辩护的用意。这是因为，战争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美国意料，而美国的舆论和民意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已经开始转向，从初期对战争的热情变为抱怨和厌恶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不过，当时美国的决策确实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当国会顺利通过杜鲁门关于介入战争的决定后，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莫尔斯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总统的历史性声明向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决不能容忍共产党侵略自由世界。"③

其次，美国确定的冷战原则是遏制政策，从这一政策出发，美国必须阻止苏联侵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每一步扩张行动。而朝鲜发生的进攻行为，就被美国认为是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或试探性进攻。因此，美国必须加以遏制。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的情报分析人员就做出结论说：北朝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被看作是苏联的行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03页。

②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266页。

③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49页。

动，是过去18个月中支配苏联对外政策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组成部分。但是，唯有这一次，苏联显然是在冒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①] 艾奇逊也认为："几乎可以确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②]

正因为美国认定对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战略进攻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设想得十分严重。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之后，艾奇逊递交杜鲁门一份杜勒斯从东京发来的电报。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视朝鲜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躏，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③] 第二天，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关于南朝鲜军队崩溃在即的电报后，对他的顾问们说："如果共产党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红军和飞机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福摩萨就会腹背受敌。""目前朝鲜局势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共产党人总是找我们军事上的弱点进攻；我们必须对付他们的攻击，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战。"[④]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不仅立即决定使用海、空军参加朝鲜的战斗，而且还向台湾海峡派遣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军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而这些部署，都发生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争之前。

美国当局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朝鲜战争本身，不如说是这场战争的后果。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政府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在于，这种干预对于防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决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综合症的影响，所以要努力避免重复30年代失败的绥靖政策。这种分析对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布雷德利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当单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操纵的。那天晚上我们猜测，斯大林为了让其卫星国对远东实现全面进攻，已暂时放弃了他在欧洲和中东的计划。朝鲜可能仅是这一进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台湾，再下一步则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宾也可能是目标之一。"[⑤]

希特勒是怎样在西方绥靖政策的鼓舞下，一步步蚕食欧洲的情景还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远东多米诺骨牌的结局。对于出现这种可怕后果的担心，无疑是美国决定在朝鲜出兵的原因之一。否则，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

①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55页。
②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265页。
③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398页。
④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00页。
⑤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693页。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勉强对这样一个本来准备放弃的半岛投入兵力。杜鲁门在做出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后，心情就是这样。他走到办公室里一个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①

再次，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内迅速改变了对朝鲜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美国的两党制和议会制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与对台政策相比，国务院在朝鲜问题上态度稍为强硬，但总的来讲，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是从远东脱身，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更未曾设想在朝鲜半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不仅如此，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军方的指责和攻击。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舆论倾向，而且尤其注意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人大多主张对一切共产党国家都采取强硬立场。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也迫使杜鲁门为平息舆论而采取让步。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如果说民主党政府在 1950 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勒斯刚刚访问南朝鲜后留在东京。当他听到战争到消息后，尚未搞清情况，便立即与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给艾奇逊的电报，其中特别提到："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哪怕这

① John W. Spani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65, pp.31-32.

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应行动的风险。"[1] 这使杜勒斯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人。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意见十分重视，他认真阅读过以后，便把电报单独呈送杜鲁门。这封电报的意见无疑反映了共和党强硬派的立场，也无疑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在第二天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上决定出动海军和空军投入战斗起到了重要影响。

杜鲁门关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和社会舆论中引起的反响，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受到共和党和国会压力的影响。除了塔夫脱认为杜鲁门未经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决定有侵犯国会拥有的宣战权之嫌外，杜鲁门的决定在国会受到一片赞扬。曾经最严厉地抨击政府远东政策的共和党参议员惠里说："总统目前这样的道路是唯一可采取的光荣道路。""总统最后终于采纳了我们一些人的建议，他划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问题上，他放弃了举棋不定的做法，这使全国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2] 杜鲁门的决定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文章说，"从来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甚至连股票行市也上涨了。[3]

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确使杜鲁门政府度过了 1949 年底以来形成的政治难关。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鲁门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最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还与苏联对战争的态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美国看来，战事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讲，美国的决策是针对苏联的，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美国传递信息。而美国的每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

斯大林本身并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兵戎相见，这也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北朝鲜能够迅速取得进攻的胜利，而且又如金日成所说，在美国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实现朝鲜的统一，那又何乐不为呢？毕竟，在斯大林看来，朝鲜半岛离苏联的军事基地旅顺港有 150 哩，距苏联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 25 哩，而与美国还隔着一个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积极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苏联绝不愿意公开出面干预朝鲜问题，更不允许给美国和世界

①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 268 页。
②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 649 页。
③ 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 39 页。

舆论留下受人指责的口实和证据。因此，苏联处处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便给驻苏大使馆发去一份电报，要艾伦·柯克大使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式向他通报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并要求苏联施加影响让北朝鲜撤回入侵部队。然而，下午 6 时 48 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据报，重要人物都不在城里。① 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采取回避态度。6 月 29 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柯特报告：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打算支援北朝鲜，远东苏军也没有什么动静。② 6 月 30 日美国收到苏联的复照，复照说苏联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并宣称它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明显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显然使正在决策的美国政府如释重负。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是，这个照会表明苏联将不会干预战争。③ 于是，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

苏联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朝鲜战争研究中的疑团之一，也是美国分析苏联对战争态度的依据。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苏联代表在 1950 年 1 月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错误，以致使苏联无法在联合国发挥作用，阻挠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在战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经常使用否决权，甚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苏联仍在安理会中，就很容易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此外，如果许多东欧国家不随着苏联退出联合国组织，在战争初期美国也绝不可能在联合国如此随意行动。当然，如果说苏联在半年前就预见到朝鲜战争爆发，从而采取表面上的回避态度，那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于重返联合国的冷淡态度就颇值得研究者注意了。当然，在重大问题上苏联如此反应迟缓，在当时也特别受到美国决策者的注意。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 1950 年 8 月 1 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一共做出三项决议，即 6 月 25 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通过的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北朝鲜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6 月 27 日通过的责成联合国成员国应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7 月 7 日通过的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

①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55 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1*, p.329.

③ John W. Spanier, *The Turman—MacArthur Contra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p.33.

第一个决议是程序性的，对于美国出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况且因时间仓促，苏联也来不及返回联合国。即使苏联回到安理会，也难以对这种呼吁和平的一般性决议使用否决权。[①]

第二个决议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是美国为实行其出动海、空军向南朝鲜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的。但正是在这个重要决议通过前几个小时，苏联代表放弃了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有利时机。6 月 27 日中午，赖伊、马立克和格罗斯共进午餐。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他马上要同其他外交官前往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举行会议，并问道："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当时格罗斯连连后退，脸色煞白。因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正是美国将采取的行动的合法外衣，而如果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会否决议案，那么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了。但这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②]马立克显然是得到了国内的指示。据葛罗米柯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应于 6 月底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便在那里使用否决权反对联合国做出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③]

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使得美国可以随意利用联合国这一工具为其决策服务，而苏联的举措则在客观上使美国可以得心应手实施其出兵朝鲜的计划。

至于第三个决议通过的后果就更为严重，由于苏联缺席而按美国策划而顺利通过的这个决议，不仅使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介入战争，而且为美国越过三八线北进提供了借口：正是因为有联合国军这面大旗，美国才能够以联合国提出的南北朝鲜统一为理由越过三八线。而这一举动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并迫使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战争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发表于《世界历史》1995 年第 3 期

---

① 据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格罗斯回忆，6 月 25 日晨他曾与联合国秘书长及助手商议，如果苏联代表下午返回安理会并使用否决权，他们一致认为可在 48 小时内召开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解决这一问题。见 Frances H. Heller ed., *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Lawrence，1977，p.22.

②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86 页。

③ R. Foot, "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t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 *Diplomatic History, Vol.15*, No.4, *1991,* p.416.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3, p.161. 不清楚斯大林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或许他认为无需如此，北朝鲜也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或许他想避免苏联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以致引起舆论的猜疑和指责。但无论如何不是葛罗米柯认为的那样，斯大林的决定是"一时感情激动而做出的"。

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

朝鲜战争中敌对双方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围绕三八线展开的：沿三八线开始的军事冲突引发了朝鲜内战；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迫使中国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过三八线而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麦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张越过三八线等战争叫嚣被杜鲁门总统所罢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战争的最后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作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这就是围绕三八线而进行的朝鲜战争的始末。本文旨在分析美国军队在联合国军在名义下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从而说明美国军队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决策，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关于朝鲜战争战略意图重大改变的标志，是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所犯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也是导致战争升级和美国军队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无法自拔的根本原因。

一、越过三八线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关于美国的战争行为是否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问题，最早在6月29日，即战争爆发的第四天就已经提出来了，显然这与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整个战略意图有关。当时，陆军部长佩斯的意见是，目前美国的军事行动应限于三八线以南，“对于授权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应当特别慎重，而且我们应当对这种行动明确地加以限制”。但是艾奇逊认为，空军在执行任务时不应受到这种限制，不应把三八线作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来严格遵守。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计划处副处长林塞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转达了麦克阿瑟的意见，他要求美军的行动不受三八线的限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詹姆斯·莱则认为，如果中共正规军进攻朝鲜，美

军就可以在三八线以北行动。凯南同意这一看法，并在他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3号文件中提出，如果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就意味着战争扩大，“应视情况发展考虑行动”。杜鲁门从战略意图的角度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所希望的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迫使北朝鲜人退回三八线以北去。但是我希望我们能保证不致于过深地陷在朝鲜，以至我们照顾不了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杜鲁门同意佩斯的意见，并指出，“凡是在三八线以北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应当仅限于破坏军需上的供应，因为我希望大家都明确地了解，我们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①]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6月29日美国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时的考虑是：(1)可以使用空军轰炸三八线以北的运输线，破坏军需供应。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越过三八线的概念。(2)如果中国出兵朝鲜，美国部队便可越过三八线与之作战。这里，是以中国首先出兵参战作为前提条件的，而后来这种因果关系正好颠倒。(3)最重要的是，美国这时明确的战略目标是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恢复原来的分界线。

然而，随着军事态势的变化，美国完全改变了最初的战略意图。

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在朝鲜战局大体稳定下来的时候再次提出。7月中旬，杜鲁门派柯林斯和范登堡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以便直接对战局形势做出判断。参加会见的还有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和刚从朝鲜赶来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柯林斯说，他必须把麦克阿瑟的要求同政府的总的军事计划结合起来，因此需要了解麦克阿瑟什么时候能够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回答说，反攻日期目前还无法确定，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北朝鲜赶回三八线以北，而且是要消灭他们，并进而统一朝鲜。麦克阿瑟强调说，他可能不得不攻占整个北朝鲜，为此还需要8个步兵师。范登堡问，如果中国人参战怎么办？麦克阿瑟答道：把他们消灭在北朝鲜。麦克阿瑟最后说：“我们要么在这个地方赢，要么在所有地方输。如果我们在这儿赢了，我们就增加了在所有地方赢的机会。”[②]这次谈话的时间是7月12日上午9时，也是第一次提出主动越过三八线的问题。第二天李承晚就公开宣称，南韩军队将不停止在三八线上。[③]

---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405页；*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ashington D.C., GPO: 1977, pp.327-335.

②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4页；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83页。

③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伍协力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05页。

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提出越过三八线问题。7月14日杜勒斯交给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一份备忘录，声称三八线决非政治分界线，美国的目标是统一朝鲜，“如果有机会去掉分界线，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干”，而且，让北朝鲜部队从容退回三八线，也是件“蠢事”。备忘录还写道：“如果我们有力量加以摧毁的话，必须摧毁北朝鲜部队，即使这样做需要越过三八线也在所不顾。这是消除威胁的唯一途径。”[①]

杜鲁门这时的意见是，在战争局势比7月中旬大为明朗以前，应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因此针对李承晚的公开宣言，美国军方发言人在电台广播中说，美军的任务只是把北朝鲜部队赶回三八线。美军将停在那里，并将强制南韩军队也这样做。艾奇逊也急忙打电报告诉穆乔大使，尽最大努力制止公开讨论这个问题。[②]

然而，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国务院内部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以及受到他们观点影响的政策设计司司长保罗·尼采极力主张要进行最大限度的克制，他们认为应该命令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倘使北朝鲜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北，他的军队将不跨过三八线追击。[③] 尼采还在接到杜勒斯的备忘录后，召集政策设计司进行紧张讨论，并于7月22日草拟了一份“关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美国政策问题”报告。报告首先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联合国部队把北朝鲜部队赶回三八线附近时，美国和支持安理会决议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所采取的决定和行动以及克里姆林宫的决定和行动，将决定这场冲突是限于朝鲜境内，还是冲突扩大，导致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报告分析了与此有关的几种情况：如果中苏不介入，北朝鲜可能自动撤回，可能被迫然而有秩序地撤回，也可能溃不成军地逃回，也很可能在三八线顽抗。但是报告倾向于认为，“美国应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在美军尚未到达三八线时，中苏部队已进入三八线以北，进而支持在三八线以南作战的北朝鲜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共和苏联军队冲突的危险性将大大增加”，因为“克里姆林宫决不会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统治和控制的政权”。报告认为，发生这类冲突所冒的风险“似乎远远大于政治上可能得到的好处”，因而强调在军事上取得一定进展后应该立即转入政治解决，即“尽快在可以接受的条件基础上，停止冲突”，在美军占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Korea*, Washington D.C., GPO: 1976, pp.386-387.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373；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

③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4页。

领朝鲜南部的条件下，施加政治压力，提出朝鲜统一问题。报告还提醒必须考虑盟国的态度，当北朝鲜被迫撤回三八线后，大多数盟国，尤其是亚洲和中东国家恐怕不会支持联合国军用武力统一朝鲜的做法。报告同时又警告说，南韩当然要求美军一鼓作气拿下北方，美国舆论也希望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但这样一种情绪倘若蔓延开来，美国政策的执行也许将面临严重问题。[①]

布雷德利后来回忆说，三十多年后重温这份文件，可以发现这里充满了远见卓识，可惜当时未得到广泛的赏识。[②] 然而，可惜的还不止这一点，问题在于这个似乎论证有力、考虑全面的报告，最后还是留了一个尾巴：“倘若军方有把握在三八线以北取得胜利，就应该设法使美军北进并取得联合国相应决议的支持。”[③] 这就是说，如果能确保军事上的胜利，再有联合国的招牌，美军还是应当越过三八线，占领北朝鲜。正是这最后一笔，把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留给军人去解决了。以后我们就会看到麦克阿瑟是怎样以军事必胜的许诺牵着白宫政客们的鼻子走的。

政策设计司的报告在政府内部遭到猛烈的攻击。首先是主管朝鲜事务的东北亚处处长艾利森表示强烈反对，7 月 23 日艾利森即给尼采写了备忘录，明确表示对尼采的报告“从观点到结论”都不同意，“整个报告的基调无非是暗示北朝鲜政权是合法的，三八线以北地区事实上是个独立国家。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道义。北朝鲜政权是苏联一手炮制的，它违背朝鲜人民意志，并蓄意与联大三次决议为敌。……按这个报告办事，我们将回到冲突前的状态”。艾利森说，南韩不承认三八线，并且认为现在是统一的绝好机会，“对此，美国在朝鲜的外交官都表示赞同，如不这样做，朝鲜人民将对美国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谈到与中苏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时，艾利森认为确实存在，但不应像报告那样企图通过绥靖政策避免“刺激苏联”。因为不管美国怎么小心谨慎，与中苏冲突的危险并不会因此消失。艾利森坚决主张越过三八线，“也许这意味着一次全球战争”，但“应该让美国人民知道这一点，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既然一切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正当性都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④]

艾奇逊没有艾利森这么冲动，但他的基本观点同艾利森是一致的。艾奇逊认为，“不应强行下达不许越过三八线的武断的禁令。作为一条分界线，它不具备任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449-454.
②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 724 页。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453-454.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458-461.

何政治合法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应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以防止其再度进攻南韩。“我们希望能将北朝鲜军队消灭在南朝鲜，但我们认为不应将麦克阿瑟限制在三八线。我们强烈要求占领整个朝鲜，从而保证自由选举的进行”。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为了将苏联或中共进行干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认为应由韩国部队在三八线以北实施地面作战，而美国则继续提供空军和海军支援。”[①]

7月31日，国防部也拿出了他们的意见，即“对朝行动方针备忘录”。备忘录确立了三个假设的前提：(1）美国将动员足够的力量来达到占领整个朝鲜这个目的，并增强在所有战略重要地区的军事地位。(2）苏联将不在朝鲜或其他地区进行干涉。(3）将由总统宣告，国会同意，并由联合国采取行动，以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朝鲜为美国的作战目标。实际上，这里面只有一个苏联干涉的问题，因为第一点从军事上，第三点从政治上，美国本身都可以做到。这就是说，只要苏联不出兵干涉，联合国军队就可以跨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国防部还从军事的角度提出另一种具体方案：即只占领北纬40度和38度线之间的交通要道和包括平壤在内的中心城市，然后再划出“非军事区”进行“政治解决”。[②]

看起来，多数人的意见是应该越过三八线，只是要对苏联是否出兵干涉做出判断。作为少数派意见的主要制定人凯南这时只得打起退堂鼓。凯南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被召到国务院做顾问的，看到自己的意见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心灰意冷，终于决定离开国务院去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但行前（8月21日）他还是给艾奇逊留下一封信，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再次提出美国尽早从朝鲜脱身的问题。凯南的基本论据是美国的力量“做不到把朝鲜永远排除在苏联影响之外”，从长远来看，解决的办法是恢复历史上日本在朝鲜所起到的抗衡苏联的作用。凯南认为：“在俄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压力下，朝鲜不可能真正取得独立。从我们的利益考虑，日本统治朝鲜比俄国统治朝鲜有利。但目前日本太弱，无法与俄国竞争。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日本。日本的实力和声望恢复以后，就要重新在朝鲜发挥影响。”而眼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与俄国建立真正的外交接触”，美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同时从南韩撤退，由“联合国对朝鲜实行至少一至两年的有效控制，为此，联合国可以使用其他亚洲

①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4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508-509；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306页。

国家的部队来执行这一任务”。[①] 无论凯南的出发点和目的如何，这个建议作为外交策略而言，的确是使美国摆脱朝鲜问题困扰的富有远见的见解。但在当时，这封信显然不合时宜，因此被艾奇逊束之高阁，存档了事。

在这种状态下，美国开始在联合国做出了试探性的姿态。8 月 10 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在安理会发言，宣称华盛顿关心的首先是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独立的朝鲜这样一个目标。这实际上是暗示人们，美国正在考虑越过三八线的问题。[②]

与美国政府内部的讨论遥相呼应，南韩开始大力呼吁越过三八线。8 月 2 日南韩的外交部长发表声明，表示联合国应继续向前推进，直达满洲边境。8 月 20 日，张勉大使也在马塞诸萨州发表公开演说，攻击有人建议在朝鲜至少是北朝鲜实行临时性的联合国托管制，并同时进行选举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张勉宣布，韩国政府“不承认三八线作为一个军事、政治和经济分界线的合法性”，而坚持要求北朝鲜军队“无条件投降”。他还声明，韩国政府希望联合国军能尽早地向它移交所有的行政管理权。[③]

与政府内部讨论和联合国讲坛上演说的出发点不同，麦克阿瑟主张越过三八线，则是完全建立在对北朝鲜的反攻计划的基础之上的。这时，麦克阿瑟正在竭力说服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他的在仁川实施登陆的“烙铁行动”计划。尽管军界首脑人物一致对仁川登陆的计划表示反对或怀疑，但麦克阿瑟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且在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保密的情况下，于 8 月 12 日制订了详细的登陆作战方案。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8 月 17 日麦克阿瑟会见返美途中来东京拜访的顾维钧时，信心十足地说，他毫不怀疑，在南韩的北朝鲜军队最后一定会全部被歼灭，除非他们现在立刻撤回北朝鲜。麦克阿瑟甚至相信，只要把北朝鲜消灭了，苏联就不得不同意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再度实现朝鲜的统一。[④]

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就仁川登陆计划紧锣密鼓地讨论和准备的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最后议决关于越过三八线的问题。显然，人们已经预计到实施反攻和越过三八线这两次行动之间的必然联系。8 月 25 日，杰塞普、腊斯克、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625-627.

② 彼德·卡尔沃科雷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据 1953 年英文版译），第 658 页。

③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9）》，第 658 页；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据 1971 年英文版译），第 112–113 页。

④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94–95 页。

希克森和马修斯等国务院高级官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认真讨论了“越过三八线问题”。会议讨论的基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7 月上旬制订的两个文件。其中 7 月 1 日的第 73 号文件规定，若中国不公开介入，美军仍然可以在“打击北朝鲜军队的名义”下继续作战，“只要目前在朝鲜承担义务或准备承担义务的联合国部队能作有效抵抗，这一作战行动就应继续”，而且还可以“扩大到包括下令采取适当的空中或海上行动，在朝鲜之外对付共产党中国”。7 月 10 日的第 76 号文件规定，若苏军大举出动，美军就不应越过三八线，“美国应把承担的义务和作战计划的执行减少到最低限度，而越过三八线，则是我们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的义务”。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会议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美国军队应该越过三八线，但要与中国和苏联边境保持一段明显的距离。“若有情报说明，发生了中国或苏联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联合国军总司令在向华盛顿报告之前，不得下令继续前进”。[①]

9 月 9 日，即在杜鲁门批准“烙铁行动”（仁川登陆）计划的第二天，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报告及上述会议的建议，起草了“对朝鲜行动方针报告”。该报告经杜鲁门 9 月 11 日批准，确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81 号文件，其要点如下：

（1）美国军队具有越过三八线的“合法基础”，只要中国和苏联不卷入朝鲜战争，就应授权麦克阿瑟占领北朝鲜，但事先必须取得总统批准，并经过与盟国协商。

（2）如果中国和苏联同时介入，麦克阿瑟不应在北朝鲜进行地面战斗，而应防守三八线，对北方继续实施轰炸。

（3）如果中国介入，除不应与中国军队展开全面战争外，可以考虑授权麦克阿瑟在积极抵抗中国军队的同时，在朝鲜之外进行海空战斗。与此同时，应向安理会提出“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案。

（4）如果中苏均不介入，北朝鲜军队溃败，应在与盟国协商后，向北朝鲜军队提出“投降条款”，若遭拒绝，则摧毁之。但在沿中国和苏联边境地区只能使用韩国军队，不得使用美国军队。

（5）经过改组和改革后，承认“韩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

（6）在朝鲜实现“稳定”、“统一”和“真正成为独立国家”之前，联合国军应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646-650.

继续留在朝鲜。①

这份用心良苦、考虑周密的文件实际上为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确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中国或苏联军队没有卷入朝鲜战争，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介入，美国军队应防守在三八线一带。第二，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应与盟国协商，并以实现朝鲜的统一和独立为政治基础。这就是说，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还应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和批准。然而，战局的变化促使美国沿着错误决策的方向滑得更远了。

二、战局变化推动的政治决策

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第 81 号文件内容制定的命令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当天，即 9 月 15 日，“烙铁行动”计划开始实施。仁川登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举获得成功，的确是麦克阿瑟创造的一次军事奇迹，从而给麦克阿瑟带来无上的荣耀。麦克阿瑟因此而得到的声誉和威望又反过来加重了他在政府决策时发言的分量。正如李奇微回忆的：“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地步。就连他的上级也好像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② 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正是把这种情绪带到了政治决策中，才使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感到美军越过三八线是势在必行和理所应当的。

辉煌的军事胜利使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忘乎所以，甚至总统和国会也沉浸在欢乐和轻松的气氛中。这时，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81 号文件限定的两个越过三八线的条件，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围攻汉城的时候，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官员就多次向柯林斯建议，要求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马歇尔正式下达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但马歇尔一定要先知道国务院的意见，并呈报杜鲁门总统批准。③ 而这时杜鲁门的心情比麦克阿瑟还要着急。显然，如果在国会选举前能够结束朝鲜战争，对于民主党在国会的席位增加是大有益处的。据顾维钧当时得到的“密讯”，“美国当局鉴于国会选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712-721.

② 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57 页。

③ 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六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78 页。

举即将到来，朝鲜战局已有好转，他们希望战争能够很快结束，藉以影响舆论，赢得选票”。[①] 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有意制造要由联合国决定联合国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的舆论，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麦克阿瑟准备的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9 月 27 日给麦克阿瑟的第 92801 号命令发出：

你的军事目标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授权你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两栖和空降或地面作战，只要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没有主要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军队不得跨进满洲或苏联与朝鲜交界地域，并且为了政策的缘故，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各道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再者，对于你们在三八线南北作战的支持将不包括对满洲或对苏联领土的空军或海军行动。

如果在三八线以南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苏联军队时，你应采取守势，不采取任何扩大局势的行动，并向华盛顿汇报。如果你的军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而他们使用了大量的苏联军队，你应该采取同样行动。你不应仅仅因为在目标地区发现有在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军队而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的空军和海军的行动。但是，假使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的意图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军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把这事提交给华盛顿。[②]

这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似乎成了朝鲜半岛前途命运的主宰，他对于命令中要求他把在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呈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指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企图以此来保持军事行动的最后批准权。但麦克阿瑟还是于 9 月 28 日呈报了一份作战计划。麦克阿瑟的电报说：如果北朝鲜武装部队不按照我将在 1950 年 10 月 1 日发表的声明无条件投降，我将进入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完成将其消灭的军事目标。麦克阿瑟的计划是派遣第八集团军在西岸经开城和沙里院一线前进，夺取平壤，派遣第十军在东岸元山实施两栖登陆。电报还说，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或中共的主力部队已进入朝鲜。[③]

---

①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 155 页。

②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 307–308 页。

③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 734 页；麦克阿瑟：《麦帅回忆录》，台湾王家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 年中译本，第 341 页。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9日批准了这项计划。同一天，似乎是为了平息麦克阿瑟被迫呈送行动计划的怒火，国防部长马歇尔针对南韩部队越过三八线的问题给麦克阿瑟发去一封密电："据报告，第八集团军曾宣布韩国部队将在三八线停止前进以便重新集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你认识到，你在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不受限制。上面所提到的声明有可能会使联合国处境尴尬，因为在联合国里，人们显然不愿意出现必须对越过三八线问题进行投票的局面。相反，人们希望看到你在军事上已证明有必要这样做。"[①]这无异于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声张，一切行动可以先斩后奏。其目的无非是要给联合国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迫使联合国接受美国关于允许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计划。但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把政府部门掌握的权力交给了一位战地指挥官。后来凯南也批评说，"华盛顿由于国内政治原因，而把国家和（朝鲜）地区的和平命运寄托在一个代理人身上"。[②]

第二天，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授权麦克阿瑟便宜行事而不必声张。麦克阿瑟在9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军事上，三八线不是影响我们使用部队的因素，我的部队的后勤补给是妨碍我们迅速推进的主要问题。为利用敌军的失败，我们的部队随时可以越过三八线，进行试探性进攻或占领当地的战术目标。你们了解我在北朝鲜总的战略计划。在敌人投降以前，我认为我们在整个朝鲜都可以进行军事行动。"电报最后要求发表一个声明公布他的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电报后，对于"我认为我们在整个朝鲜都可以进行军事行动"这句颇有含义的话——这意味着美军也可以到达鸭绿江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③]反而对发表声明一事极为敏感。马歇尔当即回电告诉麦克阿瑟，"发表一项这样的声明是不明智的"。相反，电报指示他务必"继续进行作战行动，不要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声明，让行动去说话吧"。回电再次强调说，"我国政府希望在击败朝鲜部队的任务完成之前，避免在三八线问题上闹出一场风波"。跟随麦克阿瑟多年的惠特尼将军后来回忆说，这一电文的含义让麦克阿瑟"大吃一惊"，但他"很欣赏总统本来的意图是给联合国中其他各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826；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4页。

② Mineo Nakajima, "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1, 1979, p.25.

③ 事实上后来麦克阿瑟正是这样做的，而且以事先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没有被拒绝来为自己辩护。

国政府来个既成事实”。[①]

于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虽然几个月来白宫和五角大楼各部门就这个问题经历了反复研究和激烈争吵，进行了详尽的论证，甚至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使上述一切努力显得毫无意义，与军事家们取得的胜利相比，政治家们的议论要逊色得多。其结果不知是军事指挥了政治，还是政治利用了军事。但不管怎样说，当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从而使战争再次升级的行为受到公众指责时，让一个战地指挥官来承担全部责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麦克阿瑟或许不知道，就在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电报频繁往来的时候，联合国大会正在开始讨论有关越过三八线问题的议案。美国当然知道无法在联合国大会直接提出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因为苏联代表这时已经回到成功湖，而一张否决票就会使在三八线以北地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所以，美国政府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不声不响去做他想做的事，一面说服以英国为首的八国提出了一项提案。提案要求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局势的稳定，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选举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朝鲜政府。[②]美国政府似乎为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找到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这一提案中包含着的一目了然的用意，是允许联合国军使用武力占领北朝鲜，从而实现朝鲜的统一。[③]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八国提案的当天，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队大举向三八线以北挺进。同一天，鉴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可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五角大楼向杜鲁门提出建议，要求修改9月27日给麦克阿瑟的命令。该建议经杜鲁门批准后于10月9日作为命令发给麦克阿瑟：

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

---

①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5页；John W. Spani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65, pp.100-101.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5页；John W. Spani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65, pp.100-101.

② 南韩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第30–33页。

③ 后来艾奇逊本人也承认：“这个决议案代表了8月中正在国务院远东司和联合国司形成的意见，并因仁川的成功发展了一大步。……这个决议案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它鼓励麦克阿瑟将军进一步采取冒险主义所引起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经过透彻的考虑，而且这个决议案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把已在前文谈到过的凯南备忘录所提醒的困难与危险掩盖起来了。”见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310页。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①

这道命令最后敞开了麦克阿瑟在北朝鲜采取任何行动的大门，除了对中国境内目标的攻击要得到华盛顿首肯外，在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权力已经由白宫和五角大楼转移到联合国军司令部。这是辉煌军事胜利引发的结果，却反过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美军越过三八线本身已经铸成大错——引起中国出兵介入战争，而允许麦克阿瑟自行其是更使得这一错误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盲目地发动“感恩节攻势”，实际上成为与中国军队的大决战。杜鲁门的特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对此十分坦诚地说：“现在回顾起来，1950年9月在仁川登陆成功之后越过三八线，这也许是个错误。但是北朝鲜军队溃败得如此彻底，致使我们不能罢手，只有消灭他们退却中的部队而后已。很清楚，我们没有就在平壤以北附近的狭窄地带这条线上停下来，这是个悲剧性错误。英国人和别的人曾建议我们这样做。”②

这场“悲剧性的错误”的本质就在于美国的军事行动把朝鲜战争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美国政府彻底改变了以前确定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从反击北方进攻、重新恢复三八线分界改变为进击北方、抹掉三八线分界。战后几年美国通过外交手段没有达到的目标，或者说美国原已准备完全放弃的目标，现在眼看就可以实现了！然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人忘记了他们最初讨论这个问题时想到的限制条件和制约力量——中国或苏联军队介入朝鲜战争。

三、影响美国决策的制约力量

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越过三八线问题讨论的历次文件看，影响美国这一决策的制约力量始终是苏联或中国军队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固然，盟国的态度也是美国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看作为西方集团内部事务。苏联和中国这两种制约力量对美国越过三八线的军事举措的反应完全不一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32页。杜鲁门回忆录说该建议是他本人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但布雷德利说这一说法不准确。还有文件说明这一建议是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起草的。见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1页；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

② 威·艾·哈里曼：《哈里曼回忆录》，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据1971年英文版译），第58页。

样，但美国政府的判断却只有一个——这两种制约力量都不会发生作用。

华盛顿在卷入战争之初就十分注意观察苏联的动向。如前所述，对苏联意图的判断是美国决策的重要因素和首要因素。同样，当战局发展转为对美国有利，华盛顿在考虑三八线问题时，也非常关注莫斯科的一举一动。

尽管事实上斯大林同意并援助了金日成对南方实施武装进攻的计划，① 但是斯大林决心只在幕后导演这次行动。战斗一旦打响，苏联便采取置身局外的超然态度，特别是在表面上，尽量避免给人造成任何苏联在背后支持北朝鲜的印象。战争爆发的前五天，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金日成要求提供进攻和登陆用的舰只，并需要十名苏联顾问驾驶这些船只。6 月 22 日，斯大林回电拒绝了这些要求，认为这样做为美国干涉战争提供了借口。②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北朝鲜军队中的顾问人员。在北朝鲜军队前线指挥所中负责了解进攻计划执行情况的两位苏军中校，也在部队即将越过三八线时返回复命去了。斯大林对此解释说："我们的顾问继续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③ 当朝鲜人民军的迅速进攻开始受阻时，7 月 8 日金日成用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请求苏联派 25—35 名苏联军事顾问到人民军前线参谋部和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还不能胜任指挥现代化军队作战的任务"。在此之前，什特科夫在与金日成的交谈中曾允诺，劝说莫斯科同意这一请求。斯大林在回电中严厉指责什特科夫："你应该明白，你是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朝鲜政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已直接出面请求，斯大林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但他指出，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派去的，以免在他们万一被俘时，造成苏联在军事上卷入这场冲突的印象。④

固然，这些内幕情况当时美国的情报机构不可能获知，但苏联表面上作出的姿态却是白宫分析莫斯科的意图和动向的基础。如苏联 6 月 29 日照会宣称"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战争开始后迟迟没有返回成功湖，莫斯科

① 近几年俄国公布的原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秘密档案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②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 №26 (июня 1993.), с.29.

③ 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 1991, PP.25-26.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据 1971 年英文版译），第 534 页。

④ Kathryn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2, No.4 (Winter 1993), p.448.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с.29.

对一架苏军轰炸机在朝鲜附近海域被美国空军击落保持沉默态度等等。这无异于告诉美国，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兵干预朝鲜问题，这个制约力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美国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7 月 28 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报告说：从苏联报纸或官方声明中，看不出苏联会在形势不利于北方时作出反应。苏联小心地不把自己的威信押在朝鲜这场战争上。柯克认为，当北方到了紧要关头时，苏联也不会自己出兵来打或让它能支配的军队出来打。柯克的看法的确很准确，尽管如此，他仍劝说白宫不要越过三八线。[①] 9 月 26 日杜鲁门还接到报告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认为苏联主要是在宣传上下功夫，也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寻衅以分散西方的注意力，但不会为找回面子和消除威胁而打一场总体战。[②]

美国分析，苏联不愿介入朝鲜战争而冒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在核打击力量对比方面的劣势。中央情报局在 8 月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苏联正在“加速实施其备战计划，尤为明显是在石油加工、工厂转产计划的完成、飞机生产、机场建设，以及大量储备物资等方面”。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在 1950 年余下的时间里，苏联领导人会认为有理由冒爆发全面战争的巨大风险，或是以处理朝鲜事件为由，或是在局部采取新的行动”。但是对苏联人的一个主要威胁因素是苏联没有能力“在 1950 年实施大规模的核条件下作战”。[③] 国防部长约翰逊显然是受到这一分析的鼓舞，才私下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苏联在欧亚两洲都不会发动战争，因为俄国很可能知道我们现有的原子弹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④]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白宫决定越过三八线的过程时表明的那样，美国决策的基础就是因为确信苏联不会出兵干预朝鲜战争，甚至也不愿作出任何有这种表示的姿态，虽然仅仅这种表示就会形成一种制约力量。

如果说美国对莫斯科的态度十分关注，判断也非常正确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反应却十分轻视，判断也是非常错误的。战争之初，白宫一方面认为中苏结盟后，北京是听从莫斯科调遣的，因此苏联的态度就可以表明中国的动向；另一方面认为新

---

①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 年 7 月 28 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 205 页。

②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 年 9 月 26 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 210 页。

③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于滨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年，第 323 页。

④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66, New York, 1967, P.116.

中国的军队经过多年征战，人困马乏，不堪再战，况且对手又是拥有最现代化装备和海空绝对优势的美国，因此，中国必不愿出兵。然而，这是一次绝大的判断失误。布雷德利回忆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的反应做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军事顾问们的职责是判断敌人的能力，而不是它的意图。在这件事上，我们这些参谋长们让自己过多地受到了对中共意图各种判断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们现在指出的，做出这样判断的那些人对如此众多的明显的警告信号视而不见，因而就难免会做出大错特错的判断。"[①]

布雷德利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一般说来，军事上应对对手的能力做出判断，而政治上则应对对手的意图做出判断。但是，政治判断往往影响军事判断。因此，政治上对意图判断的错误也就导致了军事上对能力判断的错误。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的问题，美国的判断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仁川登陆前，美国对这一问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其分析大多集中在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上，即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判断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仁川登陆以后，尽管中国从各个方面发出越来越明显的警告信号，但美国基于前一阶段的政治判断，对于中国的警告却置若罔闻，甚至不重视去做军事能力的分析。

美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意图判断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由于战争前夕中国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在白宫看来，这表明中国已经倒入苏联怀抱，中国正式加入了苏联集团。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美国认为既然苏联不愿因战争扩大而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或世界大战，那么推论的结果必然是不允许中国大规模卷入朝鲜的军事冲突。布雷德利回忆说，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认为，使用中共部队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政治上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对中国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同对苏联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是一样的：这可能预示着俄国人正向世界大战迈进"。[②] 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提供过许多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报告，不过10月12日的一份报告得到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情报部门的一致赞许。这次报告再次肯定了早些时候的分析，即中国大概不会参战。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预，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1950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③] 从

①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8页。
②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
③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25页。

这个角度讲，日本学者中岛岭雄说得很对："是美国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奠定了朝鲜战争的基础。它的主要出发点之一是中苏团结坚如磐石的荒谬说法。"①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对于中国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关注点与其说在朝鲜，不如说在台湾。美国认为，即使中国出兵，其矛头也是指向台湾，而不是指向朝鲜的。国务院就有这样的看法：中共极有可能不论朝鲜战况如何而在8月进攻台湾。② 军方的看法也是如此，如布雷德利所说："我们认为北朝鲜发动的战争是莫斯科挑唆的，因而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这样，我们认为苏联比中国人干涉北朝鲜的可能性更大。假如中共打算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的话，以台湾为目标的可能性较大，我们认为中共是不会轻易插手，帮助俄国解决北朝鲜的问题。"③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当麦克阿瑟在8月初与蒋介石在台湾会晤后，杜鲁门十分惊慌，急忙于8月6日派哈里曼作为特使去东京见麦克阿瑟。据哈里曼回忆，行前杜鲁门交代了两件事：第一，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和大陆中国作战。第二，只要可能，就满足麦克阿瑟的一切需要。④ 这也说明美国当时对中国军队动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台湾方面。

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参与朝鲜战争，一方面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引起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例如，在中国对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并进行轰炸提出抗议后，美国政府同意联合国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把这一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同时，美国还通过潘尼迦向中国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满足。⑤ 此外，对于中国政府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也很关注。于是，大概是出于安抚北京的目的，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撤离台湾。记者问道，当联合国军恢复了朝鲜的和平与安全时，美国第七舰队是否将从台湾海峡撤退？杜鲁门回答说："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七舰队当然没有留在台湾海峡的必要。它在那里是我国保护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的侧翼的行动。"⑥ 杜鲁门在麦克阿瑟发出有关"烙铁行动"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显然是要

---

① "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 p.27.

②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8月17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207页。

③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

④ Frances H. Heller ed., *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Lawrence*, 1977, p.26.

⑤ 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姜中才等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据1986年英文版译），第204–205页。

⑥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42页。

给中国政府传递信息，预防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线问题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当时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布雷德利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一旦中国干涉，我们将从朝鲜撤军，准备实施非橄榄球作战计划”。布雷德利还向英国参谋长简要述说了这一政策。[①]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的确很担心中国出兵干涉朝鲜问题，但经过分析，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出兵。仁川登陆的成功以及联合国军随后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极大军事优势，使得美国人认为他们越过三八线并最终胜利地结束朝鲜战争，已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这时，白宫，特别是五角大楼，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也不那么重视了，甚至对于中国的多次警告也充耳不闻，满不在乎。

美国推断中国不太可能出兵朝鲜的根据之一是中国军事行动的方向在台湾，但是在仁川登陆前后，各方面的情报和分析，已经使美国政府确信，中共军队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向台湾发动进攻。早在8月8日，凯南就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如果我们没能作出像6月27日声明那样的反应的话，共产党军队很可能已经占领了台湾岛”。但“在未来的六周内，他们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如果这种企图在此期间不能实现的话，从目前情况的发展来看要再予实施便根本不可能了”。[②] 随后不久，哈里曼访问东京回国后向杜鲁门汇报了麦克阿瑟的看法。麦克阿瑟确信，中共军队目前不会入侵台湾，他得到的情报和照片都说明中共军事力量没有高度集中。[③] 大约两个月后，中央情报局也非常傲慢地推断，中共军队在1950年以内不会入侵台湾，否则就要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而在这一战争中，中共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④] 按常理分析，既然中国军队不可能进攻台湾，那么，如果中国在军事上要有所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只能在朝鲜半岛了。况且也确实有这种消息不断传来。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的美国人没有重视这一点。

9月21日，即仁川登陆后第六天，华盛顿便收到美国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国军队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⑤]

---

①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26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pp.363-364.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6, Far East and Pacific*, Washington D.C., GPO: 1976, p.429.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20页。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pp.530-531.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p.742.

9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来自香港的快讯说，中国人正在议论朝鲜战争，讨论万一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的对策。记者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在鸭绿江边界进行部署”的情况。对于中国官方公开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些朝鲜籍士兵已经回国参加战斗一事，报纸评论认为，这是“有意警告：如果联合国军推进到中国东北边境，中国军队也将开进朝鲜”。① 对于这些报道，美国官方没有作出任何值得注意的反应。

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潘尼迦共进晚餐时告诉他，中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人一直打到中朝边境。两天之后，这一消息通过英国外交官传到美国国务院，但国务院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中国恫吓威胁的宣传而已”。②

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③

南韩军队越过三八线以后，关于中国军队将入朝参战的情报、消息、分析源源不断地传到白宫和五角大楼。10月3日国务院收到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等许多地方来的电报，都报告了同一件事：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于当日凌晨召见潘尼迦，并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只是共产党的传声筒，而周恩来的恫吓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艾奇逊虽认为这是一次重要警告，但又说“这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④ 同一天，荷兰外交大臣斯蒂格对美国大使说，根据可靠的消息，中国正在准备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第二天荷兰又通报美国，荷兰驻北京的代办认为中国不想打仗，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则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⑤ 与此

---

① 斯通：《朝鲜战争内幕》，第118页。

②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31页；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228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④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31–432页；《麦帅回忆录》，第307页。周恩来与潘迪迦谈话的详细情况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5–27页。

⑤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10月3日、10月4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211页。

同时，中央情报局根据潜入中国东北的国民党特务提供的情报报告说，比较准确地获得了沿满洲和北朝鲜边界的中共军队的数量和部署。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情报与其他情报一起，向联合国军发出了明确警告：共产党的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①

然而，面对这一系列的警告和信息，美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这的确令人感到奇怪。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漠然的态度。这里既有对东方式的交际手段和信息传递手段的不理解，也有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估计不足；既有对中苏关系状况的错误判断，也有对中国高层领导意图的盲目认识。总的说来，到1950年10月中旬，即北京正在紧张地讨论如何出兵抗美援朝，入朝部队已经整装待发的时候，华盛顿还陶醉在那种胜券在握的狂妄和喜悦当中。在政治上，美国依然认为苏联不敢，也不愿让中国冒险参与战争。中央情报局专家们的意见就是这样："苏联领导人不会认为为了夺回朝鲜失去的东西，而值得进行直接军事干涉，进而承担战争的严重风险。我们认为，俄国人和中共干涉朝鲜，要冒世界大战的风险，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因此，苏联和中共不会对朝鲜进行干涉。"②在军事上，美国依然认为中国军队根本无法与美国军队作战，所以不会出兵。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谈时对杜鲁门说的一席话反映了这一点：中国人"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南下，"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即使有俄国的飞机来支援中国的地面部队，也不足为患，因为"俄国空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根本就配合不来"。麦克阿瑟还骄横地断言："假如中国人要向平壤进军，那里将会有一场血腥的屠杀。"③

这时美国的状态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管有什么消息和劝告，就是没有人相信与中国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人们甚至可以怀疑，是否有人有意要造成这种局面。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完全有这种可能。麦克阿瑟受命挥师北进的前提就是中国没有出兵，也没有将要出兵的声明。因此，麦克阿瑟宁可相信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眼看到手的全面胜利以及由此得到的荣耀，绝不能因为一些消息和传言而成为泡影。对于杜鲁门来说，到这个时候，似乎也愿意接受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如前所说，赢得全面胜利而结束朝鲜战争对于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的地位关

①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26页。

②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0页。

③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37页；*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p.104.

系甚大，而政府又绝不能承受一旦中国出兵而招致的判断失误的指责。这或许是杜鲁门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后兴师动众跑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晤的真实目的。尽管杜鲁门本人回忆说此行的目的是向麦克阿瑟了解关于战争的“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但参加会晤的惠特尼根据记录认为：“凡是向麦克阿瑟提出的任何问题，华盛顿都已掌握了将军的全部观点。像这类事情本来只要通过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通讯联系，就可以获得满意的解决。”① 在麦克阿瑟做了中国不会出兵的十分肯定的保证之后，杜鲁门感到心满意足。中国是否真要出兵朝鲜，已经不是白宫最担心的问题了。

如果美国政府在三八线一带能够冷静下来，认真清理一下被胜利冲昏了的头脑，对问题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其后果也不会像实际发展的那么糟糕。国务院的一位远东问题专家阿列克西斯·约翰逊就比较清醒，他对周恩来 10 月 3 日凌晨的警告很重视，并向国务院建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声明完全看成是虚张声势，进一步探讨保持美国的战术海空支援‘保护伞’，而完全使用韩国部队征服北朝鲜的可能性，是十分必要的。”布雷德利不无遗憾地感叹道：“不幸的是，约翰逊有见解的意见未引起应有的重视。”②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美国军队不越过三八线，而仅仅以空军支援南韩部队的进攻，那么中国军队很可能就不会跨过鸭绿江。或者，如果美国军队像英人国建议的那样，只停留在平壤－元山一线而不再前进，那么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中国军队出而不战，两军在平壤－元山一线形成对峙。换个角度，我们可以同样假设，如果作为制约因素的苏联或中国公开发表声明，明确表态，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将引发苏联或中国出兵援助北朝鲜，那么，联合国军就很可能止步于三八线。不管怎样，其结果都会与后来的实际状况大不一样。然而，狂妄骄横的麦克阿瑟却不顾一切地大举向北推进，甚至违背了 9 月 28 日作战计划中关于美军不进入中朝边界的原则，联合国军部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直奔鸭绿江边。当韩国第三军第六师饮马鸭绿江时，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发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同时，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恰恰是中国军队的大规模介入，使美国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美国政府不得不饮下他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

发表于《世界历史》1996 年第 6 期

①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p.105.

②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 740 页。

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使中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名义下参与了朝鲜战争。从客观后果看，由于中国的参战，朝鲜战争实质上成为中美之间的一场大战，朝鲜半岛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和冲突的战场，而且最终确定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及远东国际局势的格局和走向。因此，对于中国出兵朝鲜决策及原因的研究，是战后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中最令各国学者感兴趣的题目之一。

国外研究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甚至中国出兵朝鲜也是事先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协议的。[①] 前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公布后，韩国更出现了“东亚共产主义三角同盟理论”，认为朝鲜战争及中国出兵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预谋的。[②] 然而，对于有关苏联档案材料进行分析之后，笔者得出的结论与此并不相同。尽管人们期待着中国方面的有关档案公布于世，但根据中国近几年出版的大量文献和回忆录，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中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举措属被动行为，毛泽东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是被迫的，派兵入朝作战更是出于迫不得已。

---

① 中岛岭雄把这类观点归纳为“北京－莫斯科－平壤共谋理论”，并综述了各种看法。参见 Mineo Nakajima, “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 No.1.

② 1994 年 7 月韩国政府在报纸上公布了金泳三总统从俄国带回来的一些前苏联档案，《中央日报》的编辑手法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另参见韩国高丽大学朴明林 1994 年的博士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第一章。

一、中国无意介入朝鲜冲突

朝鲜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便成为美苏两国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场所之一，其结果是以三八线将朝鲜一分为二。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后，朝鲜冲突便表现为南北两个独立政府之间的朝鲜民族的内部斗争，而美苏两国则退居幕后进行操纵。朝鲜南北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重新统一问题。[①]而在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金日成作为苏联占领军扶植和培养出来的北朝鲜领袖，自然会求助于苏联，当然也会求助于在抗日斗争中与朝鲜结成紧密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说到战争策划，中国与苏联、朝鲜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

很多著作提到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把大量的朝鲜籍士兵送回国，从而说明中国参与或至少是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大体是：早在1949年1月，李立三、周保中与崔庸健等人就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在哈尔滨举行过一次会议，讨论中共军队中的朝鲜籍士兵回国的问题。会议决定到1949年底以前把中共第四野战军中的28000名朝鲜籍士兵送回国。1949年5月金日成派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北平，金一此行的基本目的是要求把中共军队中由朝鲜籍士兵组成的几个师转交给北朝鲜。毛泽东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到1949年7—8月，四野中以朝鲜籍战士为主的164、166师回到北朝鲜。这些战士回国后组成了朝鲜人民军第7师。[②]1950年1月，金日成又派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来，要求把中国军队中的14000名朝鲜籍士兵接回国。经过谈判商定，中国方面同意将这些朝鲜籍战士全部移交朝鲜人民军。接着，金光侠又要求让这批部队携带武器返回。经聂荣臻请示中央，1月22日批复同意。这些朝鲜籍战士集结在河南省的郑州后便乘火车回国，并于4月18日到达元山。[③]从客观上讲，这批朝鲜籍战士加入人民军，增强了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的实力，金日成提出此项要求也完全

---

① 笔者在最近出版的《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三章中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②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pp.109-110；*Торкунов А., Уфимцев Е.*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Москва, 1995, с.15-16. 也有文章说这些战士组成了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见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第一章。

③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744页；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第一章。如此计算，回到朝鲜的士兵共有40000多人。据陈兼访问中国军事史研究者了解的情况，经查阅档案，至1950年春回国的朝鲜籍战士总数为23000人。（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ean War*, pp.109-110.）

有可能是出于这一目的。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却与此没有关系，因为在 1949 年底和 1950 年初他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

1949 年 3 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便提出了以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但斯大林说“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在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才可以越过三八线。[①]遭到斯大林拒绝之后，金日成曾一度寄希望于得到中国的支持。同年 5 月，金一秘密访问北平时，向中共领导人解释了关于南北朝鲜不能并存的观点，强调以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的迫切性。会见中毛泽东说，“金日成任何时候都应做好进行游击战或持久战的一切必要准备”。毛泽东还估计到日本有可能帮助南朝鲜作战，并表示“必要时，中国可以派军队帮助朝鲜”。但是，毛泽东并不支持金日成立即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他说：“金日成没有必要在近期内进攻南朝鲜，因为从全局考虑，国际形势对我们不利，而且中国共产党正在与蒋介石的军队作战，无法帮助平壤。”毛泽东甚至说，在南朝鲜侵略时一定要反击，但不要进攻南方，以免引起美日干涉。[②]显然，毛泽东没有把金日成的计划放在心上。他在这里所说的派兵援朝有两个条件，一是北朝鲜受到攻击而不是主动出击，二是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这就说明中国同意让朝鲜籍战士回国与金日成的出发点根本不同。

有些研究著作认为，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曾与斯大林商议了朝鲜战争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当时的会谈已达成协议，由苏联出武器而中国出军队，帮助金日成发动进攻。还有人认为，关于发动战争的问题，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莫斯科共同商定的。近几年，有关档案和回忆录披露了一些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是否在 1950 年初参与朝鲜战争策划的问题做出判断。

根据现有材料看，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确曾与斯大林谈到过朝鲜问题。据冈察洛夫等人的著作说，1989 年苏共中央曾命令在外交部档案中查找有关战争的档案，并发现一份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同米高扬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回忆起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谈到过朝鲜问题。[③]但根据苏联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并没有与斯大林讨论过金日成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也不重视金日成的进攻计划，他担心的是出现相反的情况。会谈中，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朝鲜的问题，现在不是北边进攻南

---

① Kathryn Weathersby, “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on*, p.2；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3, pp.135, 328.

② 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第一章。笔者 1995 年 10 月采访师哲得知，毛泽东与金一谈话很简单，说了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

③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326.

边的问题，而是南边进攻北边的问题。南边的力量要比北边大得多嘛，还有美国军队在那里嘛。现在的问题是北边要保持主动，时刻有所准备。[①]俄国学者彼得洛夫说，档案中没有关于谈到金日成计划的记录。他认为，即使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提到解放朝鲜问题，也很可能是最一般地说说。因为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本身还没有决定给金日成开绿灯，而当时毛泽东的兴趣集中在解放新疆、西藏，首先是台湾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朝鲜无疑是斯大林的责任。[②]

另外，斯大林是1月30日回电同意金日成访苏的，而毛泽东是2月17日离开苏联的。这时，金日成可能还未到达莫斯科。即使他刚刚抵达，也没有证据说明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曾举行过三方会晤。关于这一点，冈察洛夫等人1992年访问了陈兼，据陈兼说，他曾看过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录的手稿。手稿中说，斯大林对毛泽东说："金日成告诉我，他想对南方采取行动。金年轻而勇敢，然而，他过高估计了有利因素。"斯大林问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我们仍然应该帮助小金。"但接着又说："朝鲜现在面临着复杂的局面。"[③]如果师哲的这个回忆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即使毛泽东在莫斯科时已经知道金日成带着"对南方采取行动"的要求来见斯大林，从毛泽东的口气看，他仍然对采取这种行动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

还有一个情况。1950年1月19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金日成再次提出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问题，并坚持要与斯大林面谈。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在引证了这封电报后说，斯大林"一个多星期拿不定主意"，随后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措词谨慎的密电，"如果有取得胜利的充分把握，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文章还提到，再次与北京商议后，斯大林2月9日同意在朝鲜半岛准备搞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④]这似乎也表明中国在1950年初便参与了战争的谋划，但这种说法有些令人不解之处。第一，斯大林通过什特科夫的电报已经知道毛泽东对此持反对意见，照理他不可能未经商议便贸然发电通知毛泽东同意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第二，当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毛泽东1月14日出访列宁格勒，17

---

①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第86页。

② V. Petro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3, No.2, 1994, p.21.

③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p.130, 325. 笔者1995年10月采访师哲时，证实了上述情况。师哲说，毛泽东在莫斯科未见过金日成，对朝鲜问题也不感兴趣。

④ *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c.28-29.

日已回到莫斯科），斯大林怎么会通过电报与毛泽东联系呢？第三，2 月 9 日金日成很可能尚在来访途中，斯大林未经商议怎么就会同意在朝鲜半岛“搞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呢？看来，沃尔科格诺夫引用的这个材料显然有误。

最近，很多文章引证苏联公布的档案材料，说明 1950 年 5 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并且取得毛泽东对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完全支持。但这一事实同样不能证明中国参与了朝鲜战争的谋划。

在与金日成会谈之后，斯大林虽然对武力解决朝鲜统一的计划表示认可和支持，但他决不愿对此承担责任。斯大林在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后接着说，朝鲜朋友应更多地和毛泽东商量，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①] 什特科夫也曾两次提醒金日成，关于武力统一朝鲜问题，他需要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于是，金日成通过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告诉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就统一朝鲜问题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但对细节问题只字未提。毛泽东告诉朝鲜大使：他欢迎金日成来访，如果金日成对朝鲜统一已经有了具体计划，这种访问可以是秘密的；如果还没有具体计划，最好进行一次正式访问。毛泽东还提醒说，朝鲜目前应当首先做好一切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加强自身的力量，以应付可能的战争。[②] 这时毛泽东可能了解到金日成的大体意图，但显然还不知道金日成的具体计划，也不知道金日成与斯大林会谈取得的进展。于是，就有了金日成 1950 年 5 月对北京的秘密访问。

关于金日成秘密访华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金日成在访苏后没有再访问北京，[③] 也有人说访问的时间是在 4 月金日成访苏回国途中，或者说是在 4 月 7 日至 26 日之间。[④] 根据师哲的回忆以及最近披露的苏联档案材料，我们知道，金日成在访苏后确实来北京进行过秘密访问，具体的时间是在 1950 年 5 月 13 日至 16 日。[⑤]

---

① 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 1991, p.106.

② 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第一章；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第 87–88 页。

③ 前苏联外交官员卡皮察和前人民军作战部副部长俞成哲都认为当时金日成与中国关系不好，不可能访问北京。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330.

④ Zhai Zhihai, Hao Yufan,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China Quarterly*, 1990, Vol.121, No3, p.100;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330.

⑤ 参见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秘密外交》，载《法制文萃报》1995 年 1 月 5 日第 6 版；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No.4, p.442；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330；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第 88–89 页。也有材料说金日成是 5 月 12 日到达北京。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第 68 页。

在金日成和朴宪永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便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朝鲜领导人首先通报了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说明斯大林已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统一朝鲜是可能的，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中国的同意。毛泽东很客气地提出意见说，你们的李相朝已经同我谈过几次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金日成一再解释说，苏联已经帮助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需要请苏联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实一下。毛泽东随后终止了会谈，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要求立即给斯大林发电证实金日成的说法。①

5 月 14 日晚，苏联大使拿着斯大林的电报来见毛泽东。在电报中，斯大林明确肯定了金日成所说的内容是确实的。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发表了这个电报："在同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表示了这样的观点，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同志实现祖国统一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已经确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做最后的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问题的解决必须推迟到进行重新讨论之后。朝鲜同志会向您转达会谈的详细内容。"② 这封电报的口气软中带硬，看似征求中国意见，实际上是把责任推到了中国方面，逼迫毛泽东表态。如果中国不同意，就将推迟朝鲜的统一，如果中国同意，则"最后的决定"就是中国与朝鲜做出的。看来毛泽东是不能不同意了。毛泽东对苏联大使说，他已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即由于美国势力逐渐退出南朝鲜，朝鲜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他认为，仍然有必要像中苏条约那样，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迅速签订一个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③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需要中国直接对北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准备是必要的。然而，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毛泽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而并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

5 月 15 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毛泽东明确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不过，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日本军队参与

---

①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第 88 页；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第 68 页。冈察洛夫引证一位了解档案材料的前苏联高级外交官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即当金日成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已经重新估价了北朝鲜对南方发动一次成功袭击的可能性时，毛泽东最初还是表现出极大的怀疑态度。（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146.）此处李相朝似应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

②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③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第 88 页。

的可能性问题，他甚至还提到美国军队可能的干预问题。毛泽东说，一旦有二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中国将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金日成对于毛泽东所说的危险毫不在意。他相信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日本军队参战的情况，即使美国人派个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金日成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根本不必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5 月 16 日，即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发来电报，同意中朝缔结一个友好同盟条约，但不是战争发动之前，而是在朝鲜已经成功地统一之后。[①]

这就是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秘密访华以及毛泽东了解和同意金日成进攻计划的大体过程。笔者可以做出的结论是：

第一，金日成访问北京只是奉斯大林之命来要求中国同意他以武力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计划，他并不需要中国的援助，[②]因此没有向中国透露他的进攻计划。在此之后，中国也不了解金日成和苏联军事顾问制定的具体计划。据师哲回忆，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来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③]

第二，对于金日成的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没有真正把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事情放在心上。虽然中国与北朝鲜政府在 1949 年 10 月 6 日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直到战争爆发时，中国在平壤还没有正式设大使馆，任命不久的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因病还在武汉休养。在平壤仅有的中国机构是东北行政委

---

①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第 81 页；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第 68 页。

② 冈察洛夫引证的师哲和雷英夫的回忆也指出，当毛泽东问金日成，如果美国介入，朝鲜是否愿意让中国派部队到中朝边界时，金日成回答说，他将在一个月内取得胜利，美国人在此之前无法部署军队。他拒绝中国派军队到边界，他确信，目前已有的和正在供应的苏联援助已经足够了。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146.

③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 85 页。

员会派出的商业代表处，而且其主要负责人温士祯也在沈阳休假。[①]毛泽东提出援助北朝鲜，是以其领土受到侵犯为条件的，而这一点当时又根本不在金日成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三，从中国当时的国内状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看，毛泽东是不情愿看到在这个时候（中国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②]、在这个地区（中国在东北几乎没有正规部队）[③]爆发一场可能威胁到中国安全和稳定的战争的。中国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和被动的。所以说，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参与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和策划。

其中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1949 年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的决战时刻，毛泽东显然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就全国范围内的工作来说，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了。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宣布"战争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④]中国对朝鲜爆发的战争没有政治准备、军事准备和心理准备的事实说明，在战争爆发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

二、战争初期的军事防御战略

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因此而转移。土地改革是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国中心工作之一，6 月 30 日，

① 直到 7 月初，中国外交部才开始调配驻朝大使馆人员。7 月 8 日，派驻平壤的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等一行才启程赴朝。参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第 24、36–40 页。

② 1950 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将苏联提供的三亿美元的一半拨给海军购买装备。4 月，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舰艇、飞机和岸炮，并要求苏联在 1950 年夏，至迟 1951 年春以前予以提供。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两天，中央军委根据三野的报告，决定再次修改战役计划，增加攻台兵力达十六个军以上。见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67–70 页。

③ 当时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已经确定集体转业的第 42 军在黑龙江开荒生产，另外还有五个独立师、一个公安师担负地方警备任务，全部兵力不足 20 万人，只占当时中国正规军总兵力的 1/27。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年，第 16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391、416 页。

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解放台湾的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立即放弃。据肖劲光回忆，6 月 30 日周恩来向他转达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① 显然，推迟进攻台湾只是因为在军事上遇到困难，而不是有意要参与朝鲜战争。全军规模的复员工作也没有因战争而停止。6 月初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复员。拟将 540 万军队分两期复员，力争把全军的定额压缩到 280 万到 300 万人。② 有的著作提出：在杜鲁门宣布全力支持李承晚后，中共领导人就认识到形势很严重，并于 6 月 30 日撤销了复员 100 万部队的命令。③ 然而，据当时协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搞军队复员整编工作的雷英夫回忆，6 月 29 日晚他把印好的有关复员工作的文件呈请周恩来最后审阅时，曾大胆地提出，鉴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要改变计划，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6 月 30 日，按照预定计划，中央复员委员会下达了由军委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 1950 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④ 这些情况说明，战争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

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韩国的决议以后，中国开始重视朝鲜战局问题。这时，毛泽东一方面指示中央军委讨论调整战略部署，加强东北边防，一方面开始考虑中国如何对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不过，直到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前，中国军事部署的基本方针属于战略防御，即使有在万不得已时出兵朝鲜作战的想法，也是出于战术角度的考虑。

7 月 7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会议做出决议：限 7 月底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调往安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组成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华为副政委的指挥机构；进行后勤、兵员补充准备及政治动员

① 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第 72 页。
②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 年第 6 期，第 76 页。
③ 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 61 页。
④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 76 页。

工作。毛泽东当天夜里批准，立即执行。[①] 后因粟裕有病不能到职，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所辖第38、39、40、42军在东北布防。东北边防军总兵力约26万人。[②] 从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决议的内容看，这时中国考虑的重点只是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美韩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③]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④]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们对朝鲜战局进行反复研究后认为，美国“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雷英夫把这一结论向周恩来汇报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汇报和询问情况后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并立即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2）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应该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如部队主动后撤或在仁川加强布防等，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供他们参考。（3）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⑤]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28页。

②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86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7–78页。后因情况变化，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未成立，所辖部队直接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54、469页。

⑤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80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页。另有材料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美国有可能从海上迂回到朝鲜人民军背后实施登陆的担心，并要李相朝速告金日成，部署防止美军登陆的措施。见孙宝升：《毛泽东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军事史林》1990年第5期，第13页。

对于战局严峻的估计，使中国进一步调整了军事部署，也开始明确提出了入朝作战问题。8 月 26 日，周恩来召集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与前次会议比较，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员增加了直接参与作战指挥的干部。周恩来通报了朝鲜战局的复杂情况和可能面临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困难局面，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在 9 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周恩来特别强调了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①

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 8 月底到 9 月初，中国大规模调整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四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八个军。② 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华东地区准备进攻台湾的第 9 兵团和西北地区正在开始复员的第 19 兵团，分别调至津浦和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命令中南地区的第 50 军开赴东北地区，使东北边防军兵力从四个军增至五个军。同时，中央军委还作出加速特殊兵种建设的决定，立即增编四个飞行团、三个战车旅、十八个高射炮团及十个军的队属炮兵。为了保障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安全，中央军委还制订了防空计划，将三个航空兵师、十五个高射炮团和一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于东北及沿海大城市，担任对空防御，并决定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向北迁移。③9 月 7 日深夜，被外交部紧急召回国的柴成文向周恩来汇报了朝鲜的战况。周恩来曾问道：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④ 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说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确已经在考虑出兵朝鲜的问题了。

尽管如此，此时与美国军队对阵，特别是入朝作战，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还是以防万一的考虑，是整体战略防御中考虑的一部分，而不是已经确定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在 8 月 26 日国防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我们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各军兵种要先有个三年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等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⑤ 毛泽东在 8 月 27 日给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等人的电报中，虽然也谈到“应付时局”问题，但目的还只是让这些地方负责人考虑与时局和三年规划有关的问题，准备提交 11 月或 12 月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

①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 24–25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485 页。

③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 20 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6 页。

④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 86 页。

⑤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 25 页。

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①] 可见，从当时国家决策的角度看，出兵朝鲜的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派兵入朝作战，并不是中国政府一厢情愿的事情。中国出兵朝鲜，当然首先要得到朝鲜政府的邀请。但当时中朝关系并不是十分协调的。据前苏联外交官员回忆，"在战争前夕，中国驻平壤代表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官方机构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有时甚至要苏联大使馆充当协调人。[②] 金日成在战前就未向中国透露任何具体计划，战争爆发后仍然对中国领导人封锁消息。邓华在 8 月曾提出由中国派观察员到朝鲜了解战况的要求，但遭到了金日成的拒绝。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的苏制武器都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的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情报人员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③] 柴成文作为使馆人员于 7 月初到达朝鲜时，曾带了周恩来给金日成的亲笔信，信中特意说明"此人是可靠的"。朝鲜方面虽然给予柴成文很高规格的待遇，在他和金日成之间架设了直线电话，但是对于朝鲜方面的实际情况却很少向中国人介绍。总政治部副部长徐辉和人民军第二集团军司令武亭都是从中国回去的，但他们与中国人的谈话也受到很大限制。以至柴成文 9 月初回国时，聂荣臻认为他所做的关于朝鲜战局的汇报过于简单，很少谈到"友军"的情况。[④] 显然，金日成在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向中国求援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谈不上中国出兵的问题了。

三、毛泽东四次下决心出兵

9 月 15 日美国果然在仁川登陆，并一举成功，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出兵朝鲜问题也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9 月 17 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作战场准备。这一建议本是东北边防军在此前提出的，但周恩来一直压下未批，这时才以增派武官的方式派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赶赴平壤。路过沈阳时，高岗给柴成文看了一封毛泽东的来信，信上说，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484 页。

②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154.

③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p.153, 163.

④ 引自笔者 1995 年 5 月采访柴成文记录。战后，武亭被金日成镇压，而徐辉则躲在中国政治避难。

“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①]

由于战场局势恶化，金日成不得不向苏联求救，并且通过苏联请求中国派兵赴朝作战。9 月 27 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军事代表马特维耶夫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汇报了朝鲜的严重局势：“人民军损失惨重”，“装备弹药严重供应不足，燃料缺乏，运输差不多已完全瘫痪。兵员与弹药补充的组织工作很差。部队指挥系统从上到下一团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和朴宪永于 9 月 29 日联名给斯大林写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援助”，即“直接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金日成还要求斯大林：“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②]10 月 1 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回电，要他们立即去见金日成，转告他的意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与敌人做长期斗争；迅速组建预备队，并在南方开展游击战；苏联将提供必要的物质援助。至于金日成要求派军队援助的问题，斯大林推到了中国身上：“给予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援助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部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③]在此之前，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有所考虑。师哲在回忆录中提到，仁川登陆以后，斯大林曾来电询问中国在沈阳到丹东一线部署的兵力有多少，能否出兵援助朝鲜。[④]在接到金日成的求援电报后，斯大林于 10 月 1 日又给毛泽东发来电报，电报说：“如果您认为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派部队支援朝鲜人，那么您应该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我们的朝鲜同志有机会在你们的部队的掩护下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中国军队可以考虑作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人指挥。”[⑤]金日成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国寻求帮助的同时，也直接派人来北京求援。10 月 1 日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请中国出兵赴朝参战。[⑥]

几天之内形势巨变，情况危急，苏联的鼓动和北朝鲜的请求，加上中国对战局发展前景的担忧，迫使毛泽东当机立断，做出决定。10 月 2 日凌晨 2 时，毛泽东

---

① 柴成文等：《板门店谈判》，第 79 页。

②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pp.448-449, 453-454. 马特维耶夫的真名是扎哈罗夫。

③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pp.455-456.

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92–493 页。

⑤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34，л.98.

⑥ 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 14–15 页。

以中央军委名义给高岗和邓华发电，要高岗立即来京开会，让邓华下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说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还通报说中国预先调至东北的十二个师将于 10 月 15 日开始出动，在北朝鲜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进行防御战，待苏联武器到达后，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①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将派兵入朝作战。

但 10 月 2 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商讨此事时，出现了意见分歧。于是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行讨论。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并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②10 月 4 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理由主要是：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情绪等等。③ 关于政治局会议争论的情况，有不同说法。有的文章说，会议延续了几天，讨论是否出兵时，高岗、林彪强烈反对派兵与美国作战。也有文章说，据高岗向苏联人所言，他在会上力主出兵朝鲜，并与反对出兵的周恩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④ 实际情况如何，只有将来中国有关档案公布才能搞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会议的争论肯定十分激烈。在毛泽东已经决心出兵的情况下，仍然发表出众多反对意见，说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或至少是暂时不出兵的倾向是主要的。聂荣臻就回忆说，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倾向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⑤

由于气候原因，彭德怀于 10 月 4 日下午才飞抵北京。赶到会场后，彭德怀“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当天下午，彭德怀没有发言。第二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38、539–540 页。最近，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在美国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俄国档案中没有中国公布的这份电报，而有的是另一份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笔者为此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保存的档案中确有毛泽东亲笔起草的这份电报，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本人当时是决心出兵的。至于这两份电报的差异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

②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第 400 页。

③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01–402 页；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321 页。

④ 郝雨凡等：《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历史再考察》，第 105 页；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第 89 页。

⑤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 735 页。

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去中南海谈话。显然，毛泽东有意通过彭德怀扭转会议的僵持局面。因此，谈话时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当彭德怀表示支持毛泽东出兵的主张，并愿意带兵出征后，毛泽东颇为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以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下午政治局会议继续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进行讨论时，仍有两种意见。这时，彭德怀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彭德怀的发言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出兵援朝。所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才十分肯定地对彭德怀说："给你十天准备时间，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①

10月6日周恩来在居仁堂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并研究部署志愿军出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林彪在会上提出，为了拯救朝鲜而把中国打烂不值得，因装备太差与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美国可能用原子弹或大规模空军袭击中国大陆。因此，他主张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待机行事。周恩来批评了这种看法，强调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现在只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②在此期间，斯大林又打来电报敦促中国出兵："中国将被卷入战争，同时，由于与中国有互助同盟条约，苏联也将卷入战争。我们对此应该惧怕吗？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我们联起手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而不要等数年之后，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就将恢复起来并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国。"③这里显然又是对毛泽东的一个刺激。尽管他在10月7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还是对出兵问题留有余地的，④但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10月8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四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三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

①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1–403页。

②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24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

③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7. 还有材料说，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讲明局势严重后，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国派兵援助。斯大林还说，如果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苏联愿意直接介入。参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p.174, 339；Zhai Zhihai, Hao Yufan,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p.1。

④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7.

由高岗调度。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金日成。[①]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做出派兵入朝的决定。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确是有很大困难的，其中军事方面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而且没有进行现代化作战必需的空军。[②] 毛泽东在 10 月 2 日的电报中就要求斯大林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坦克、重炮和其他轻重武器，及几千辆卡车。同时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时提供空军援助。[③] 为了取得出战必胜的把握，也鉴于斯大林电报中说过“联手作战”，中国决定派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洽谈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和提供武器装备的问题。然而，就是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斯大林瞻前顾后，出尔反尔，以至中国在下决心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再次出现波折。

周恩来 10 月 8 日离开北京，因飞机中途停留，于 10 日到达莫斯科，11 日在布尔加宁陪同下乘专机飞到黑海之滨斯大林的休养地。当天下午举行双边会谈，据师哲的回忆，会谈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1) 斯大林解释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斯大林认为苏联虽设想过帮助朝鲜，但早已声明苏军从朝鲜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现在战场，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2) 斯大林劝中国出兵，如果中国出兵，苏联将供应武器和装备。(3) 周恩来阐明中国出兵的困难：中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许多国计民生问题尚未解决，目前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和建设等等。(4) 斯大林建议，如果中国不出兵，就通知金日成早些撤过鸭绿江，保存有生力量，可将主力部队撤到中国休整，以利再战。[④] 会谈结束后，当晚 7 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电报内容目前尚未披露，但根据师哲的回忆，可能包括有上述会谈内容以及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的安排。另外，据毛泽东 13 日给周恩来的回电看，肯定还有一个内容，即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43–545 页。

② 10 月 9 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特别提出了空军支援问题，彭、高即急电向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04 页。）毛泽东 11 日回电：“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48 页。）

③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ean War*, p.177.

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495–498 页；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秘密外交》。

军在朝鲜作战”。[①] 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周恩来因未能达到请苏联空军出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作战的目的，所以与斯大林共同做出暂不出兵的安排。毕竟，中国领导人在是否出兵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而是否有苏联空军掩护则是能否保证出战必胜的关键问题。

因莫斯科与北京时差5个小时，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联名电报到北京时是12日子夜，再由苏联使馆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大约已是12日下午。[②] 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京商谈。[③]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担心电报转辗延误时间，又于当晚7时许匆忙赶到军委作战部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安东察看渡口的彭德怀，告诉他情况有变化，回北京当面谈。[④]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彭德怀听说苏联不给予空军支援后十分生气，并表示要辞去志愿军司令。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⑤]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日。[⑥]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下决心出兵朝鲜。

10月15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彭德怀告诉他，中国已做出最后决定，预定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同日，毛泽东致电高岗和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出动日期提前。电报说“我军先头军最

---

① 参见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88页；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第3页。

② 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2–553页。

④ 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第8–9页。

⑤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ean War*, pp.201-202；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5–40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6、558–560页。

好能于 17 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 18 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10 天内渡江完毕”。[①] 彭、高接电后即于 16 日上午赶到安东，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并提出渡江后的战术要求。[②]

然而，就在中国军队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之时，莫斯科方面的情况又有变化。斯大林得知了中国的决定之后，于 10 月 14 日给什特科夫发出急电说，“经过一段犹豫不决，中国人已最后做出向朝鲜派出他们的军队的决定。我很满意这个有利于北朝鲜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您不必考虑以前我们的高级官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做出的建议。”[③] 这个“建议”显然是指在此之前苏联与中国达成的一旦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苏联就将提供空中支援的协议。斯大林既已达到目的，自然要把苏联所承担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然而，中国方面对此还寄予着很大希望。

毛泽东虽然再次决定出兵，但是对于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是否能采用租借办法和两个半月内苏联空军是否能够出动心里没底，但这两件事又至关重要。如果要用现钱购买苏联的武器，则因中国一时难以支付而延误交货日期；如果苏联空军两个半月内不能出动，则会影响志愿军的整个战略部署。因此，毛泽东在 13 日电文中还指示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就此与苏联领导人商议。毛泽东表示，只要能用租借办法，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周恩来当夜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要他立即向斯大林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④]10 月 14 日，苏联政府承诺对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将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以及将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周恩来又致电在疗养地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除战斗机外，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除提供武器装备外，可否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贷款订货的条件等等。[⑤] 这时，斯大林却改变了主意，他给在莫

---

①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0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64 页。

②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06–407 页。

③ Park Mun Su,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pp.369-370.

④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 88 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第 86 页。参见罗申 1950 年 10 月 14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

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502 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 86–87 页。

斯科的莫洛托夫打电话说，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①]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得于16日离开莫斯科回国。

苏联决定不派空军入朝作战，也就意味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根本无法得到有力的空中支援。这不能不使中国重新考虑出兵问题。于是，毛泽东在17日下午5时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改变计划。原定先头部队17日出动，现改为"准备于19日出动"，并且说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电报还要彭、高二人再乘飞机回京商谈。[②]毛泽东于18日又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刚回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会谈的情况，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出国前的准备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③]会后，毛泽东于晚9时给邓华等志愿军领导去电，命令部队按预定计划，自10月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④]这是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定决心。

四、中国领导人的深层忧虑

对以上中国介入朝鲜冲突并最终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过程进行分析和归纳，可以看出，中国出兵朝鲜确实是出于迫不得已，[⑤]而毛泽东的忧虑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政治方面考虑，避免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

---

① 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8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7页。另有著作引证的电文为："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7页。

③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7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8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8页。一般都认为，中国出兵的时间是10月19日。但据最早赴朝参战的第42军军长吴瑞林回忆，他的部队是在10月17日和19日分两批从辑安渡口入朝鲜的。见董玉荣：《志愿军42军赴朝前后》，《军事史林》1994年第5期，第10页。

⑤ 胡乔木在回忆录中说，他参加了历次中央会议，可以证明中国没有"鼓动朝鲜发动战争"，"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7页。据志愿军政委杜平回忆，作战部队在战前只有一半人对出兵抱积极态度。就在出兵前两天，13兵团几个负责人还联名致电彭德怀，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志愿军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等无可等的情况下"出动的。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3、41页。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夕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和政治方针，即表明了在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中，新中国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又赴苏谈判，几经磨难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尽管条约本身仍然包含着不利于中国的不平等因素，但毕竟在寻求国际援助方面取得了苏联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不仅如此，在中苏两党的会谈中，苏联还一再表示要让中国在亚洲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使新中国承担起在亚洲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在北朝鲜共产党政权处于危难之机，斯大林和金日成共同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情况下，毛泽东便不得不考虑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声誉。当时的形势是，苏联、朝鲜和诸多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翘首等待中国政府做出决定。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在给中国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是朝鲜的唯一希望。[①] 据当时在苏联大使馆的中国外交人员回忆，朝鲜局势逆转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社会舆论都认为中国应该出兵援助朝鲜。而当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后，这些国家的报纸一片欢呼，甚至组织群众上街游行。[②] 中国共产党承受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也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信任。斯大林过去一直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怀疑新中国将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援助朝鲜，无疑将证明斯大林的看法和怀疑是正确的，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颇有感触的。他在 1956 年 9 月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直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以后，才摘掉了这个帽子”。1958 年 7 月毛泽东又对尤金说，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国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③]

新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诞生而又贫穷落后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需要得到国际援助，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已经与中共处于对立状态，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更使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方针公开化和明朗化。这样，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是毛泽东的第一层忧虑。

---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87 页。

② 引自笔者 1995 年 7 月采访荣植的记录。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252、326 页。

其二，从军事方面考虑，避免在中国东北境内打一场无法避免的中美之战。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目标绝不仅仅是要消灭北朝鲜政权，而是要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向中国领土渗透，因此中美之战在所难免。对于美国觊觎中国的野心，毛泽东始终是有警惕的。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讲，还是从美国“安全战略”角度讲，毛泽东认为美国绝不会甘心失去其在中国的影响，它都在寻找机会控制这块远东大陆。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担心美国要参与中国内战，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军事部署。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东北地区。麦克阿瑟的战争叫嚣，无疑加重了中国对东北遭到入侵的担忧。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美国加强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都使毛泽东确认了美国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敌对状态的看法，也认定美国将执行一种以台湾为据点向外扩张的军事侵略政策。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一旦美国占领了北朝鲜，难道不会执行一种以北朝鲜为据点的军事扩张政策？毕竟台湾与大陆隔着一道海峡，而朝鲜与中国仅仅一江之隔，况且美国的远东军事力量几乎全部集中在朝鲜半岛。毛泽东非常担心美国继占领朝鲜半岛后进而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使东北三省成为战场。周恩来在 8 月 26 日国防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很多迹象表明，美帝马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的企图是不断地以一个一个局部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我们就要将其发动的局部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①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战争总是要一个接一个爆发的，与其等到美国跨过鸭绿江再打，不如现在就打出去，争取在朝鲜境内就将战争制止住。

从后来美国公布的档案看，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非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也没有与中国作战的计划和企图。② 显然，中国领导人对局势发展和美国进攻北朝鲜意图的判断是有失误的。当然，美国政府内部的讨论和分歧情况，北京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此与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和蒋介石集团的蠢蠢欲动相比，艾奇逊等人的声明和保证就显得毫无价值，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之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 9 月 30 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③ 不管是麦克阿瑟狂妄言行的误导，还是毛泽东对情报判断的失误，总之中国领导人认定美国继攻占北朝鲜之后，必将把中国东北作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这才下决心与美国一战。

①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 25 页。

② 参见笔者在《朝鲜战争揭秘》第五、六章中的论述。

③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 86 页。

这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层忧虑。

其三，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东北。

使毛泽东担心的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苏联。毛泽东很有理由做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继侵占北朝鲜后会进一步跨过鸭绿江，那么，战火一旦在中国东北境内燃起，苏联很可能会以中苏同盟条约为依据而出兵东北。其结果，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这就是说，无论未来东北战场鹿死谁手，中国都将失去在东北的主权。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使中国丧失了对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的主权。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主要的分歧和争论就是东北问题，这是中苏双方都十分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心里明白，中苏条约确定的苏联归还中东铁路以及旅顺、大连的日期，是中国“虎口夺食”，硬逼出来的，难道斯大林就不会利用中美之战的机会，以中苏同盟为借口，重新返回东北吗？况且，苏联的很多做法也的确增加了中国领导人的疑虑。当朝鲜局势出现危机时，在平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扎哈罗夫曾建议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援助，并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满洲整编。[①] 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也提出：要朝鲜同志做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②] 斯大林还曾直接给北京发电报，通知中共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③] 苏联再三提出让北朝鲜政府和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基地实行反攻的建议，这无异于把朝鲜的战火引向中国。中国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出兵朝鲜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或者让北朝鲜残余部队撤进中国境内，重新整编和装备后再返回朝鲜。显然，选择后者将使美国以追赶北朝鲜败军为名入侵中国东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出兵，中美之战仍不可避免，只是这样一来，战场则是在中国境内。使问题复杂化的主要之点在于，一旦美国跨入中国境内，苏联便极有可能派几十万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这样，即使中苏联手打败美国军队，中国也将再次面临一个如何请苏联撤军的麻烦，而且还很可能延迟苏联归还中东铁路

---

① Kim Chull-baum 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p.107.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97 页。

③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 22 页；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 250 页。

及旅顺和大连港的日期。甚至美国情报机构也估计到一旦美国对中国境内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根据中苏条约将给予适当的军事支援”。[1]而担心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这恰恰就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三层忧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是不得不出兵朝鲜了。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忽视或抹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援助朝鲜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直接结果是拯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从而使得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友好的邻国。更重要的是，新中国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建国初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敢于面对世界头号强国，英勇奋战，致使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也不得不来到谈判桌前。这的确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特别是给许多弱小的国家做出了不畏强权的榜样。但这些都是中国出兵的结果，而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只是说明出兵朝鲜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被迫做出的决策。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①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331页。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国出兵朝鲜与中苏结成同盟有什么直接和内在的联系？面对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急局势，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所采取的对策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研究者十分感兴趣的。然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以及作为盟国的苏联在中国出兵的问题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90年代以前，由于中苏双方都很少公布有关的档案和原始材料，历史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大多是从结果推论原因，从中国和苏联当时公开宣布和执行的政策来追寻他们制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或者根据官方的出版物来判断历史发展的进程。进入90年代之际，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其他一些文献，其中公布了大量有关中国出兵朝鲜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随着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发表，国内外陆续出现了一批利用中国新材料研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

90年代初，俄国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俞成哲、姜相浩、李相朝、林隐、郑相晋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前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如什特科夫、贾丕才、洛博夫、波尔特尼科夫、索济诺夫等人）。与此同时，俄国档案开始大量解密，特别是在朝

鲜战争结束5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与金日成、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与他们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战争的前苏联档案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等人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此后不久，俄国有关部门又通过不同渠道分别将这些材料卖给了西方研究机构，于是出现了俄国档案的英文本。俄国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和访谈录，特别是俄国档案文件的解密和传播，引起了俄国、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不过，综合利用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著还不多见，且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的公布尚不全面，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回忆时有偏颇和疏漏，以至研究者对中国出兵的决策问题常有迷惑、舛误和分歧。例如，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的？中国领导层内部对出兵朝鲜有哪些分歧？是斯大林逼迫中国出兵还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同意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中国是否在战争的危急关头对派军队入朝作战犹豫不决？周恩来赴莫斯科谈判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出兵还是说服斯大林同意中国出兵？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诺言？斯大林在中国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根本方针是什么？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结果是加强了中苏联盟还是削弱了中苏关系？

本文拟在对比研究中俄两方面档案材料和有关回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搞清楚中国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中苏领导人考虑这个问题时的不同出发点，以及当时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对中国决策的微妙作用和影响。

一、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关于中苏对朝鲜冲突方针和策略的变化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

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避免参与朝鲜冲突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决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在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但在苏联本身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则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朝鲜战争爆发时，莫斯科的态度非常积极。当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下制定的。[①] 苏联政府还在战争初期为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俄国档案透露，1950年7月1日和6日斯大林两次要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苏联将“完全满足朝鲜关于运送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要求”，并“将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②] 据统计，1950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达8亿7千万卢布。[③] 斯大林本人对朝鲜战局的进展十分关心，他希望苏联支持的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当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后进行休整时，斯大林担心朝鲜同志因害怕“美国飞机对北朝鲜领土的攻击”而停止前进，即指示金日成“绝对必须继续进攻，尽快解放南朝鲜而不给（美国）入侵造成机会”，同时建议朝鲜政府“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美国的攻击和军事入侵”。[④]

然而，尽管斯大林一心要北朝鲜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他绝不愿意公开表示苏联对北朝鲜的军事支持。当北朝鲜军队向三八线以南进军时，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中的苏联顾问。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为此，斯大林还特别指示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考虑到瓦西里耶夫首席军事顾

① 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第三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②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 д.346, л.104, 140；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107, 116.

③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3, p.147.

④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04；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107.

问的地位，我们认为他留在平壤是十分有益的。”[①] 当朝鲜人民军的进攻由于美国空军的干预而受阻，一些军官开始对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产生怀疑时，金日成于7月8日亲笔给斯大林写信，请求莫斯科“允许将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派往人民军前线参谋部和第二军团参谋部”。[②] 在此之前，什特科夫曾答应金日成劝说莫斯科接受这一请求。为此，斯大林在回电中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未经请求“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是“错误的”，“你应该明白，你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特别强调：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③]

当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斯大林除了继续对朝鲜战局进行军事指导和提供军事装备外，开始加强了精神鼓励。斯大林在8月28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一方面建议北朝鲜把空军集中于前线的进攻上，并答应“为朝鲜空军再增加攻击机和战斗机”，另一方面则安慰金日成不要为“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甚至出现某些局部的挫折而感到烦恼”。斯大林以苏联在内战和对德战争中的经验鼓励金日成，并称赞朝鲜“已经成为亚洲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运动的旗帜”。[④] 总之，直到美国仁川登陆以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是非常积极的方针，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同样十分明确的是，斯大林支持北朝鲜取得战争胜利的限度是莫斯科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冲突。

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因此而转移。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一天，中央复员委员会按照预定计划，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⑤] 甚至解放台湾的

---

① 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 1991, pp.25-26.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34页；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40；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116。

②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05-107, 143-144；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4, д.11, л.151.

③ *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с.29.

④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5-6；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4, д.11, л.155-156.

⑤ 有人曾建议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而“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见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6页。

军事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立即放弃。[①]显然，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重视朝鲜战局问题，并进行了军事方面的部署。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万5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②]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美韩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③]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④]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8月26日周恩来在第二次国防会议上又提出要把对朝鲜的援助"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要考虑到出国作战的问题，"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⑤]

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在7月初就已经提出来了。巴加诺夫引证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罗申的

---

① 据肖劲光回忆，6月30日周恩来向他转达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直到8月11日中央军委才明确表示同意陈毅的意见，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见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第7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28页；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247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54、469、485页。

⑤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247–248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5页。

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答应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还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①]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非常关注朝鲜的战局，并有了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准备。但如果由此得出中国在战争初期就决定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对比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很可能是斯大林对中国没有对朝鲜战争作出积极反应表示出了不满，因而要罗申探询中国的态度。[②] 而周恩来关于中国已经在东北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显然是在应付斯大林，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关于这方面的部署还未付诸实施。此外，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国出兵的先决条件——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而7月初的状况是北朝鲜军队正在大举进攻，根本就谈不上美国人越过三八线的问题。随着朝鲜局势的发展，中国领导人的确越来越关注战争形势的变化，并且表现出日益积极的态度。但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战略部署还是属于防御性质的，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问题的考虑，总体说来，是从军事防御角度作最坏的打算，而不是已经确定的战略方针。

9月15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后，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中国和苏联的对策和态度也都更加明朗化。斯大林对于朝鲜局势出现逆转的情况首先表现出急躁和焦虑。9月18日，斯大林向平壤发出密电，指示瓦西里耶夫和什特科夫，要金日成从洛东江前线调回朝鲜人民军的4个师到汉城郊区。同一天，斯大林还命令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紧急制定一项苏联空军为平壤提供空防的计划，包括从他们在苏联远东的滨海边疆区及港口城市海参崴派遣几个苏联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及雷达和防空部队到平壤周围的机场。随后，斯大林紧急向朝鲜派遣了以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马特维·扎哈罗夫（化名马特维耶夫）的特别代表团，并携带着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从洛东江前线撤出所有部队，把他们调回来守卫汉城的东面和东北面。斯大林还再次敦促华西列夫斯基尽最大努力向朝鲜人民

① Evgueni 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6-7, winter 1995/96, p.88.

②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如下事实：7月8日斯大林态度生硬地指示罗申："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迅速派出一名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更快地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82；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117.

军提供空中掩护及在平壤周围地区建立防空系统。[①]斯大林采取的紧急措施，看起来是要把苏联空军投入战斗，也就是说斯大林这时似乎采取了一种背离了他以往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一贯方针的做法。其实不然，斯大林的这一举动如果不是情急之下的一时冲动，就是要作出一种姿态，借以遏制美国进一步向北朝鲜进攻。因为事实上当战局进一步恶化，美国真的越过三八线，朝鲜急需莫斯科给以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既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也没有派空军保护平壤。[②]

形势的危急还使得斯大林对朝鲜领导人以及苏联在朝鲜的代表和军事顾问的不满和埋怨情绪溢于言表。斯大林在 9 月 27 日的电报中先是指责朝鲜军队的“前线司令部、军团司令部和各部队在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在战术方面犯有严重错误”，接着又严厉批评苏联“军事顾问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大的责任”，指责他们在坦克战术运用上的“愚蠢”，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无知”。斯大林特别强调造成局势恶化的原因是什特科夫和苏联军事顾问忽视了“敌人在仁川登陆的战略意义，他们否认这次登陆的意义，什特科夫甚至建议追查在《真理报》发表评论美国登陆情况的作者。这种忽视和缺乏战略眼光的状况致使他们怀疑从南方向汉城地区抽调部队的必要性，调动部队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搁了”。斯大林认为如果能够“保证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从主要战线撤回 4 个师到汉城地区的命令得到准确和及时的执行”，“本来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汉城附近的局势的”。[③]斯大林大概忘记了中国领导人早在 7 月初就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同志美国军队在仁川或朝鲜人民军后方实行登陆的危险性，当时金日成固然因求胜心切而无视中国的警告，[④]而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在事前从战略上重视这个问题。在 10 月 1 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又埋怨什特科夫没有积极向朝鲜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从而助长了朝鲜领导人摇摆不定的情绪”；埋怨马特维耶夫“一直未曾将他对朝鲜战局的评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说他也未曾

---

①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7, л.79-82；Alexandre 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6-7, winter 1995/96, pp.95-96.

② 华西列夫斯基在 9 月 23 日给斯大林写的报告中指出，为阻止美军对平壤的空袭，苏联空军准备在前线部署战斗机部队，并可于 10 月 1 日和 2 日两天内把飞行部队投入到平壤，10 月 3 日开始行动。但华西列夫斯基接着提出警告，因空战指挥时使用俄语进行无线通话，在第一次空战后美军就会知道苏联飞行员在平壤上空活动（见白宙铉根据俄国档案材料编译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看来，华西列夫斯基的提醒不是没起作用。

③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7, л.90-93.

④ 据林隐和李相朝回忆，毛泽东也曾直接提醒金日成防止美国军队从仁川登陆。但据林隐说，“金日成忽视毛的警告，认为不值得考虑，并命令对此保密”。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1994，pp.273，275.

提出目前这种形势所需要的任何设想和建议”，从而妨碍了莫斯科的决策，也导致“朝鲜领导人还没有在三八线及其以北保卫共和国的任何计划，也没有从南朝鲜撤出部队的计划”。①

斯大林大概也忘记了正是由于他本人的命令，苏联军事顾问在朝鲜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苏联顾问奉命无论如何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他们自己对战局的了解及施加影响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不亚于苏联。出兵朝鲜问题已经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9 月 17 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② 9 月 22 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一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的决心，一方面也是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北朝鲜的企图提出警告。9 月 25 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③ 9 月 30 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④ 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

形势越来越危急。9 月 28 日金日成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承认局势是严峻的。会议决定：第一，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采取非常措施把最高统帅部和民族保卫省的职能合并于金日成一人手中，并建立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部，以保证军队指挥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第二，根据金日成的计划，采取紧急措施立即组建 15 个新的战斗师，除当时正在朝鲜北方进行组建的 6 个师外，再从东南战线撤回的残余部队中重新组建 9 个师；第三，也是关键的，政治局经过激烈

---

① Vladimir Petrow, “Soviet Role in the Korean War Confirmed: Secret Documents Declassified”,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3, No.3, 1994, pp.60-61.

② 引自 1995 年 5 月笔者采访柴成文的记录。

③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第一卷，第 28 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331 页。

④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 249 页。笔者在与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进行座谈时，有人告之，演说原稿上所增改的这句话是毛泽东的亲笔。

争论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而一旦敌人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将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毫不迟缓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政治局还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①]9月29日晚，金日成会见了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金日成在说明"如果敌人真的越过边界，人民军将无法组成新的军队，因此也无法对敌人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之后，就如何向斯大林提交要求苏联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信件这一问题征求什特科夫的意见。但害怕再次承担责任的什特科夫回避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紧急，金日成不得不硬着头皮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要求。[②]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考虑到斯大林可能不会接受这一请求，他们又特别提出要斯大林对中国施加压力："请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③]该信9月30日夜晚23时30分以"特急电报"送达苏联武器部队总参谋部八局，10月1日0时35分解密，1时45分打印，送到斯大林在南方的别墅是2时50分。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当天给平壤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以及给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封信中。

在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但他首先强调北朝鲜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反复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北朝鲜有极大可动员的潜力和资源"，"我们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进行战斗"。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

①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46-49；另参见 ф.3, оп.65, д.827, л.103-106。

②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98.

③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41-45.

量”。[①]

同时，斯大林非常客气但十分坚决地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出兵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在信中说：“如果您认为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派部队支援朝鲜人，那么您应该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我们的朝鲜同志有机会在你们的部队的掩护下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中国军队可以考虑作为志愿军，当然是由中国人指挥。”一方面为了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引起毛泽东的猜疑，斯大林隐瞒了最初是由金日成提出这一要求的事实。他说：“关于这个想法，我尚未也不准备告诉我们的朝鲜朋友，但在我看来，他们知道这一情况后，毫无疑问会感到高兴。”[②] 实际上，金日成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国寻求帮助的同时，已经直接派人到北京求援。10月1日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请求毛泽东、周恩来派中国军队赴朝参战。朝鲜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二、毛泽东决心派兵入朝作战：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的争论

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时向毛泽东提出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要求后，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又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国际学术界发生了一次争论，其缘起在于发现了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从而引起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几年来，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广泛引用这个文件，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至少毛泽东本人已经决心派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几家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1996

① V. Petrov, “Soviet Role in the Korean War Confirmed”, pp.60-61.

②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97-98.

年 1 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又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同时，还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这两封时间相同而内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文件绝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伪造品”，而中国公布的文件则“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未发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错误”，甚至不能排除“中国当局为了表现他们认为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正确的历史看法，改动或歪曲了文件内容”的可能性。还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俄国档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现在官方批准的中国文献及后来学者著作中的毛泽东 1950 年 10 月 2 日至 14 日电报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以此提醒人们“应该对中国关于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文献格外小心地对待”。[①]

从表面上看，这两封电报的确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又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②]然而，这两封电报又都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确实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则确有电报的手稿原件为证，虽然公开发表时略有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稿一字不差。所以，中国的文件也是真实的。看来，为了搞清楚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进入最紧张的时刻到底是怎样考虑中国出兵的问题并如何作出决定的，很有必要对这两个文件进行认真的推敲和分析。

中国公布的电报是由毛泽东签署的，[③]而俄国公布的电报不是中国发出的。所谓“毛泽东 10 月 2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其实是罗申 10 月 3 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转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 10 月 1 日电报的答复：

“……我们原计划当敌人前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承担

---

①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p.95, 107-108; E. 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p.89.

② 笔者曾向中国有关部门查询，了解到在中国档案中找不到俄国公布的那封电报。笔者在香港会议期间又从俄国学者那里得知，在俄国档案中也根本不存在中国公布的那封电报。

③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39–540 页。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再引证，但读者不妨将此文件与下面刊出的文件对照起来阅读。

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解决朝鲜问题非常困难（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不派军队援助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遭到彻底毁灭，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可以把斗争的形式改为游击战。

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与您谈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表示，“毛泽东的答复表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与以前毛泽东同尤金、克多夫、康诺夫，以及刘少奇同我的多次会谈中表示的态度是矛盾的。”罗申还向斯大林报告说，实际上“中国政府无疑可以向朝鲜派出不只五六个，而是更多的做好准备的战斗师”。[①]

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这封电报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此电本不是毛泽东直接发出的，可以断定是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谈话中对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作出了答复，而由罗申整理并经毛泽东认可后发出的。所以中国档案中不可能保存这个文件。那么，俄国档案中为什么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呢？现在判断，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据查，中国档案中的电报原件上既没有标明发报时间，也没有发报人的签发记录，而在 10 月 2 日当天毛泽东发给高岗、邓华的电报则标有发报时间（凌晨二时）和杨尚昆签发的记录。当然这还不能作为主要根据，因为据当事人说，那时毛泽东发出的电报经常是没有签发记录的。判断这封电报没有发出

①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105-106.

去，当另有原因。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 10 月 1 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正式讨论。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据了解，10 月 1 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会上没有就是否出兵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也做准备，随时待命出动。[①] 根据目前国内有关的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在 10 月 2 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要彭德怀挂帅，还决定 4 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②] 根据这种情况分析，10 月 2 日中国领导人仍未对出兵朝鲜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不必再召开更大范围的会议继续讨论。况且，虽然会上决定由彭德怀挂帅，但毛泽东当时尚不知彭德怀的态度，[③] 作出最后的决定自然要征求主帅的意见。反过来说，如果还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说明 10 月 2 日的会议还未作出一致的决定，至少是不会在 4 日会议之前就把这一决定通知苏联方面。[④] 关于 10 月 4 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所述材料都是大体一致的，即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会议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⑤]

---

① 参见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ean War*, p.173. 陈兼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对中国方面的当事人和知情人进行了大量采访，上述情况即是对军方人士的采访所得。笔者所进行的不同采访也证实了陈兼所述。此外，徐焰对笔者说，他的采访同样证实了这一情况，即 10 月 1 日夜晚的书记处会议存在不同意见。

②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00 页。

③ 毛泽东 10 月 5 日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可参见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02–403 页。

④ 陈兼在书中说，10 月 2 日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 10 月 15 日派兵入朝，而且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提议以他个人名义给斯大林发电报，将这一决定通知苏联（参见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ean War, p.175）。后来陈兼告诉笔者，这种说法就是以毛泽东 10 月 2 日电报已经发出作为前提来推断的。

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494 页；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01–402 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 735 页。另可参见彭德怀 10 月 14 日在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320–321 页）。

估计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便下定决心要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于是亲自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是在中央领导人一起讨论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此事只得暂缓，[①]因此毛泽东便向罗申作出了暂不出兵的答复。当然，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待于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开放。

那么，中国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是不是就像当时罗申和斯大林及后来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中国对出兵援助朝鲜“犹豫不决”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呢？这需要对比这两封电报的内容，并把此电前后的毛泽东的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看到，毛泽东当时决心出兵也是为形势所迫的，他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而这一点与提出反对出兵或暂不出兵意见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仔细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两封电报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所陈述的中国暂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国军队装备太差、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遭到破坏会引起国内的不满情绪等，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都隐约有所表露，只是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从毛泽东第一封电报中对未来战局发展的估计到初战方略的安排，都反映出毛泽东的担忧。此外，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还暗示“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但是，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出兵朝鲜的决心，也不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国领导人犹豫不决）。对这两封电报进行认真分析的结果说明，毛泽东没有改变自己的目标，而只是改变了实现目标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复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方式。所以他在第二封电报中特别提醒斯大林注意：“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还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并要求派周恩来去苏联商议此事。

其次，毛泽东在电报中表示暂不出兵与以前中国领导人答应出兵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国学者大概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历次讲到中国出兵时都要说明采取这一行动的前提条件，即敌人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是强调这一前提条件的。周恩来在10月3日凌晨与潘尼迦谈话时还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②]但这个前提条

① 实际上，在俄国公布的电报中毛泽东所说“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已经暗示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的分歧。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27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32页。

件显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国领导人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这样。[①]而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也只是说要帮助北朝鲜建立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防线，并没有讲明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这时表示暂不出兵的意见也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暂不出兵而是积极做好准备，"这样做在把握对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第三，毛泽东当时不急于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答复，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虽然毛泽东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决心，但现实中毕竟存在着很大困难，很多人对出兵表示异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数领导人都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情况下，[②]他很难向苏联方面做出明确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反复召开高层会议进行商讨，直到 10 月 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才统一了意见。

而一旦做出决定，中国立即采取了行动。10 月 5 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邀周恩来、高岗、彭德怀共进晚餐，进一步讨论派兵入朝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军队需尽快进入朝鲜，他担心任何耽搁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要高、彭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师以上指挥员传达中央的意见，准备 10 月 15 日进入朝鲜。10 月 6 日周恩来便主持军委会议，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③]

即使到了这时，毛泽东还是没有给斯大林一个明确的答复。斯大林没有毛泽东那样沉得住气，他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 10 月 2 日的答复后很快就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理由更加充分。斯大林首先表明他"完全知道中国领导同志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他们愿意派几支部队援助朝鲜同志"，并以间接的方式指出，中国"派军队到朝鲜"可以"避免出现使朝鲜成为美国的跳板和未来日本军国主义反对中国的桥头堡这样的危险"。接着，斯大林提出了他认为有利于中国出兵的国际局势："美国目前没有准备进行一场大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恢复起来"；苏联作为同盟国支持中国将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美国将被迫放弃台湾，并无法使日本成为远东的跳板。斯大林还明确告诉毛泽东，如果中国"采取消极的等着看的政策"，那么"中国不仅不能得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都无法收回台湾"。针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中美之间发生公开的战争会把苏联也拖

---

① 详情见下文。

② 据陈兼采访师哲得知，事实上当时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ean War*, p.281.）。即使彭德怀在开始时也对此持有异议。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第一次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见王亚志：《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6 年第 1 期，第 87 页。

③ 详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 24 页；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ean War*, p.185；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01–403 页。

进来，并使局势“变得十分严重”的看法，斯大林激动地说：“我们对此应该惧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然而，斯大林的慷慨陈词并没有打动毛泽东，尽管当时中国已经决心出兵朝鲜，但毛泽东在 10 月 7 日的复电中仍然表示“现在不能派出部队，而要过一些时候”。[①]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毛泽东的两封电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②] 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才迟迟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进行直接会谈的根本目的。

三、中国入朝作战的困难和条件：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

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③] 因此，面对各方面材料说法不一，甚至大相径庭的状况，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回忆认定历史事实，而只能根据旁证材料和逻辑推理对周恩来

---

①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65-67.

② 据陈兼采访师哲和中国学者得知，中国公布的毛泽东 10 月 2 日电报中未发表的部分内容是，毛泽东要求斯大林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坦克、重炮和其他轻重武器，及几千辆卡车。同时，当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时，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见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ean War*, p.177.

③ 目前中国方面发表的已有周恩来的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的回忆，最近俄国学者曼绍洛夫也对斯大林的翻译尼古拉·费德林进行了采访，据说费德林在会谈后整理了一份会谈备忘录，不久即将公布出来。（编注：笔者 1996 年 10 月在纽约拜会曼绍洛夫时，他答应很快就会让笔者看到这份备忘录。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关材料问世。）

赴苏谈判的目的和会谈的结果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至于许多细节则无从考证。[①]

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②] 另一种意见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③] 俄国学者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④]

第一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摆出了中国不出兵的种种理由。在这一点上，师哲和费德林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访苏的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中国出兵，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协议。第三种意见的根据则主要是认定周恩来的本意就是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出兵。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本人后来几次谈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⑤] 实际情况是，在周恩来出国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 月 6 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就是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因此他不会不知道已经做出的决定。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黑海会谈的最初结果就是中国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来访苏确实是带着出兵或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是否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赴朝作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已决定出兵，而周恩来却先摆不出兵的理由了。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

至于俄国学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内部反对中国参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

---

① 例如，对这次会谈的时间就有不同的说法。师哲的回忆说会谈是在 10 日和 11 日举行的，而费德林的备忘录则认为会谈是在 9 日和 10 日举行的。

② 参见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 85–88 页。

③ 见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第 3 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第 83 页。

④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103.

⑤ 1960 年 7 月 31 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 252 页；1970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见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 103 页。

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1]是缺乏根据的。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周恩来本人这时也表示赞成出兵的决定。在10月6日周恩来主持的部署出兵准备工作的军委会议上，他发言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2]不过，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更讲现实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比较强调中国出兵的决心和英雄气概，那么周恩来则更注重中国出兵的实际困难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才首先强调中国出兵存在的种种困难，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时，周恩来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3]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建议“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由苏联“供应武器装备”，苏联还可在作战时“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4]还有一种说法是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是毛泽东13日给周恩来的回电中有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一句。[5]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最后还是没有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因此，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与周恩来一起给毛泽东发过联名电报。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6]

---

①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p.102, 103.

②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24页；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250页。

③ 康一民的回忆见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2–63页。另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第30页；杨凤安、王天成：《驾驭朝鲜战争的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9页。

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7–498、500页。

⑤ 参见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88页；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第3页。

⑥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103.

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各种不同渠道和来源的材料交织在一起，难以进行细节的择选。不过，根据现有的文献，仍然能够看出事情发展的基本脉络。首先是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否做出了一致的决定，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说周恩来是奉毛泽东之命前来的，当时北朝鲜军队已经全面溃败，周恩来前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出兵，阻止美国和南朝鲜部队继续前进。起初，斯大林和周恩来都认为，中国进行干涉并无益处。但在周恩来归国前，他们决定中国应当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援助，中国军队当时已集中在边境上。①这就是说，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初步意见是一致认为中国不出兵。从毛泽东 10 月 13 日给周恩来复电的措词和语气看，他得到的信息也是会谈做出了中国不出兵的安排，而且电文中还提到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联名电”，这就说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斯大林和周恩来的共同意见，而并非是周恩来一个人的主张。

当然，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斯大林本人对会谈结果所做出的反应。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斯大林在 10 月 13 日下午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②同一天，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做出“迁就”。③显然这种举动也是受了中苏领导人会谈结果的影响。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中苏领导人一致认同的。斯大林在 14 日确知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后，立即指示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无效了”。④有人认为斯大林电报中所说的“建议”是指苏联空军援助中国一事，⑤但把斯大林连续发出的两封电报联系起来看，斯大林宣布“无效”的这个“建议”当是指他与周恩来会谈后共同做出的劝告金日成撤退的决定。如此看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确

① 赫鲁晓夫的这段回忆见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0, №6, с.106。

② 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参见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104；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31。

③ 斯通：《朝鲜战争内幕》，第 130 页。

④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74-75, 77.

⑤ Park Mun Su, “Stalin’s 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pp.369-370.

实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斯大林和周恩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共同决定？从斯大林 10 月 1 日到 7 日之间两次致电毛泽东强烈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看，斯大林是主张中国出兵的，① 至少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他表示出这种强烈的要求。毛泽东在朝鲜局势出现危急情况后也是决心要派兵入朝作战的，②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显然，斯大林不会主动提出中国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来提出中国出兵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暂不出兵的。而周恩来是代表毛泽东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他在未与毛泽东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国不能出兵，肯定是因为他和毛泽东事前共同商定的出兵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的空军援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出在苏联没有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没有答应派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要求。③ 苏联是否答应过派空军援助中国，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这一许诺，这是关于黑海会谈结果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也是反映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所以很值得进行仔细分析。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从军事角度讲，最不利的条件就是缺少空军。根据俄国的文献，中国早在 7 月初就提出空军的问题了，而且中苏之间已经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在 7 月 2 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④ 斯大林在 7 月 13 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对此做了回答："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 9 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 124 架飞机的喷气式战斗

---

① 见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97-98；ф.45, оп.1, д.347, л.65-67。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沃尔科格诺夫认为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泽东要求直接支援朝鲜的建议的（沃尔科格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中文版，第 541 页），这种看法已经被新材料证明是错误的。

② 1966 年苏联外交部文件说中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才派兵支援朝鲜的，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该文件的英文本，见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Vol.2, No.4, 1993, p.443.

③ 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也说过："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周恩来还说过："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参见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 85 页；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 252 页。

④ E. 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p.88.

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①7月25日维辛斯基给罗申的电报还谈到，“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你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②

看来中苏领导人都很重视空军的问题。不过，从上述电文看，中苏双方在苏联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和训练的问题上谈的比较仔细，并做出了具体安排和计划，而在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军队作战的问题上却没有一个明确和准确的意见。但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恰恰是后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③这里，中苏双方未谈清楚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问题，是与中国军队同时行动还是让中国地面部队先行一步？一是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作战还是只负责中国领土的防空或掩护中国部队的后方供应线？④从苏联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方针来分析，斯大林显然宁愿下功夫武装中国的空军，将来让他们承担起直接入朝作战的任务，而避免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过早地做出明确和具体的承诺。但是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国方面来讲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求苏联空军能够协同中国地面部队，与中国军队同时入朝作战。这一点越到临战时就越显得迫切。在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就特别提出了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

---

①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85；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118.

②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90, 94.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③ 实际情况是，刚刚组建的中国空军第4师直到1950年10月底才进驻辽阳基地，12月21日进驻安东浪头基地，随苏联空军进行训练。直到1951年1月21日中国空军才有几架飞机第一次参加空战。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45–249页。

④ 曼绍洛夫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会谈中“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的要求，并且“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105），实际上是混淆了这两方面的问题。

“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①

关于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如前所说，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中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②但是，会谈中没有说明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是什么。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他在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表示在苏联暂缓派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仍要出动外，还特别指出：“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毛泽东同时还明确地要罗申转告斯大林：“我们所需要的主要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③这里所说“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

毛泽东之所以决心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派军队入朝作战，是因为他的初战安排只是进行防御，只与南朝鲜军队作战，而不与美国军队正面接触。毛泽东制定这样的战略，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掌握的有关朝鲜战局的情报有误。当时的情况是平壤防线已被突破，金日成已经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安排。而10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电报却说，中国得到的情报是美韩军队“集结汉城以北三八线上开城、金川地区作进攻平壤之准备”，从而认为“美是否进攻平壤及何时进攻平壤，似乎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还认为“金日成指挥的朝鲜各个尚能战斗的部队”正在“三八线坚决对敌”。14日的另一封电报又说，“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因此，毛泽东考虑的战略一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二是继续加强工事，“修筑布防”，进行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④毛泽东显然从军事角度考虑到，即使暂时没有空军掩护，只靠中国地面部队也能完成上述作战任务。

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

①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41页。

② 这方面的证据还有：毛泽东在1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上有一句：“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8页）；毛泽东在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有一句：“我们希望看到空军尽可能快地到达，而不要超过两个月。”（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2）

③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88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86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2。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9–561页。

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根据师哲和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转告了毛泽东13日电报中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决定入朝作战的情况后，苏联政府当时答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但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除战斗机外，苏联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等要求时，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①]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日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②] 因此，上文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苏联不出动空军，应该指的就是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一情况。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的实际情况表明，斯大林肯定下达过这方面的命令。许多当年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空军人员都承认，“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空战经验，他们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但苏联拒绝了”。“由于缺少合作”，有一次苏联的“高射炮团打下了一架中国飞机”。[③] 中国空军的回忆史料也证明，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也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④]

如此看来，如果说斯大林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似乎是有些勉强，因为斯大林除了曾一度要推迟时间外，的确一直答应为中国提供空军援助，只是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诺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但是，中国提出的出兵条件主要就是要求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掩护，而苏联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出不满和抱怨是可

---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85–87页。并参见 Jon Halliday, “Air Operation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Story”, Williams, William J.(ed), *A Revolutionary War: 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d*,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3, p.151.

②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7页。

③ Halliday, “Air Operation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Story”, p.154. 冈察洛夫的采访也证明了这一点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p.199-200.)。

④ 《空军回忆史料》，第251–260、309页。

以理解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著在这方面对斯大林的政策提出指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于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从上述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联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苏联在进入冷战状态后已经确定了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战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作为保证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同时也作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的，相反，当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发生公开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时，他恰恰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远东消耗和拖住美国。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联盟的基础。特别是在美国军队逼近中国东北边境的紧急情况下，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国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与头号世界强国美国对阵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同盟国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保证。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协同志愿军与美国作战的要求。这样，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结果，中国出兵朝鲜一方面加强了中苏之间的联盟关系，一方面也为中苏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

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

近年来，由于俄国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和公布，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已经逐步为各国研究者所了解。中国的参战，即抗美援朝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中美之间的战争。同时不能忘记，这也是自冷战爆发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较量。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进程中，特别是在历次战局转折的关键时刻，苏联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拟对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行。①

在笔者收藏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② 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谈判的原则和方针到争辩的技巧和方法，何时该打，何时该停，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听从莫斯科的意见。当中朝之间或前线指挥官与后方决策者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和矛盾时，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总之，虽说毛泽东的主张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但最终决定还是由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做出的。

---

① 关于在中国出兵决策中的苏联因素，笔者已有论述，请参见拙文《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和《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

② 在笔者掌握的500余件俄国有关档案中，这种电报约占90%。

（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在1950年12月8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①]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须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②]

然而，莫斯科从政治上考虑，表示了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而要“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2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中国大使王稼祥，当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时，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③]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发表的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表示苏联不希望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电报要求罗申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据维辛斯基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国政府的意见。电报强调：“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

①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3-454页。

②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740页。

③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日记摘录，1950年12月5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 оп.65, д.515, л.35-37。

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①

尽管中国在停战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但与苏联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须的。12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伍修权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②

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③ 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在苏联代表团的方案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④

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日，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他们对谈判“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电报内容与斯大林的说法完全相同。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⑥ 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50年12月5日，АПРФ，ф.3, оп.65, д.828, л.20-21。

② 罗申致莫斯科电，1950年12月7日，АПРФ，ф.3, оп.65, д.336, л.17-19。

③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12月7日，АПРФ，ф.3, оп.65, д.336, л. 20-21。

④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50年12月7日，АПРФ，ф.3, оп.65, д.828, л. 23-24。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722页。

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①]

（二）

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已定，但战役如何展开还是个问题。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将领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部队因连续作战而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则采取稳进方针。[②] 12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讲述了前线部队面临的极大困难，同时指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③]

毛泽东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看来，强迫前线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越过三八线作战并非他的本意，所以，他在考虑政治因素之余，在军事上对彭德怀提出的关于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立即表示支持。在12月21日和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打法，即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④]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741–742页。

②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99页。

③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56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5–246、249–250页。

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对此安排却颇为不满，他质问道：中朝联军此战役后休整两个月，南朝鲜人民和游击队遭到镇压如何解决？北京已经宣布三八线不存在，打过三八线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释？是继续作战有利，还是待两个月后雪化路滑时再作战有利？如此等等。[①] 然而，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②] 就实际战斗力而言，中国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为强弩之末。因此，彭德怀于 1951 年 1 月 8 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1 月 9 日上午，当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在朝鲜的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主张继续南进。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 1 月 11 日急电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并担任仁川和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在 10 日和 11 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结果，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则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 1950 年 6 月到 9 月所犯过的错误”。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③]

---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63 页。

② 参见《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383 页。

③ 王亚志：《聂荣臻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两次谈话》，《党史研究资料》1992 年第 11 期，第 1–2 页；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第 11 页；《彭德怀年谱》，第 465–466 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 年 1 月 15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1-3；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44 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称。

正是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关于中朝军队在第三次战役后实行休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①]

（三）

不过，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停战讲和，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对中朝军队来说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该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的新议案使美国政府进退维谷：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②] 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朝方面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③] 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提案，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

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方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联合国军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

①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26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7, л.37-40。

②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381页。

③ 陈兼：《中国结束朝鲜战争的战略》（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提交“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

时，中朝高级指挥员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 - 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将他的答复向斯大林作了报告，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①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终于使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②然而，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只是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③

---

①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46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28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30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7, л.41-44。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51–153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3月1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3月3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7, л.78-82, 89。

③ 详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81–505页。

（四）

在战争进入僵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和谈的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于5月初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了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日，已经退隐普林斯顿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了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的任务。5月31日，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6月5日，马立克在第二次会谈时答复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①]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也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概括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和结果：“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②] 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件事需要征得朝鲜和苏联的认可。于是，金日成6月3日抵达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商议。接着，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③] 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7，pp.462，507-511.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23–125页。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409–411页。

②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741–742页。

③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6月5日、6月9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9, л.23, 28-29。

事”。[①] 然而，中国不久前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如今已陷入被动局面，因而很难主动提出停战的要求，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斯大林。在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回电中，毛泽东一方面表明了中方的让步条件，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

一、等待敌方提出。

二、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三、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的事业，我们将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②]

高岗和金日成立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斯大林，[③]

斯大林决定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尽管马立克此前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

① 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9, л.31-32。

② 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9, л.57-59。

③ 高岗和金日成致斯大林信，1951年6月14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9, л.60。

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①] 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②] 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毛泽东在6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③] 虽然斯大林没有“亲自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

（五）

当1952年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中朝之间再次出现分歧：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又是斯大林出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金日成继续边谈边打的方针。

还在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④] 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月15日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

① 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电，1951年6月24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9, л.78。

② 详见葛罗米柯会见柯克日记摘录，1951年6月27日，АПРФ，ф.3, оп.65, д.828, л.202-203；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22–128页。

③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6月30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9, л.90-91。

④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2月8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42, л.81-83。

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在7月16日的回电中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①

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②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应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③斯大林对中国意见的支持，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勇气和英雄气概的欣赏，他很可能还有更加深远的谋略：把美国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长期吸引和消耗在东亚，对于苏联在欧洲与美国的抗衡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无论如何，在中苏领导人的莫斯科会谈之后，1952年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了。

（六）

出于对战局发展的估计和政治心理因素的考虑，中国领导人决心把与美国人的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2月16日，彭德怀在空军党委会上指出：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④此后，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会更加频繁”。毛泽东还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为此，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中国已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还要派海军部队赴朝参战。总之，中国“准备竭

---

①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7月18日；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1952年7月17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43, л.72-75, 65–68。

② 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2年7月16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43, л.69。

③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29, л.54-72。日本学者和田春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1952年周恩来访苏时，朝鲜要求停战，苏联也想停战，但中国不愿停战，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Wada Haruki,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 提交“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但这种说法的论据显然不足。

④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38页。

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毛泽东的想法再次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①] 于是，1953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满怀信心地宣布：“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②] 然而，一个月后，斯大林去世了。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政策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决定。

斯大林的葬礼刚刚结束，他的继任者们便开始商讨以缓和国际关系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新方针，这一方针的起点就是解决朝鲜战争问题。3 月 13 日，马立克指示拉祖瓦耶夫呈交联合国部队总司令克拉克在三个星期前就朝鲜交战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件。[③] 3 月 19 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此做出决议，批准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在给中朝领导人的信中，苏联政府指出：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应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为此，莫斯科做出了具体安排：

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 2 月 22 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

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

① 毛泽东致谢苗诺夫电，1952 年 12 月 17 日，1953 年 1 月 7 日；谢苗诺夫致毛泽东电，1952 年 12 月 27 日，1953 年 1 月 27 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43, л.105-114, 125-128, 115-116, 139。谢苗诺夫是斯大林的代称。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45 页。

③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的信，1953 年 3 月 14 日，АПРФ，ф.3, оп.65, д.830, л.58-59。

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苏联部长会议还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6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下文字：‘6、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①

3月21日晚，苏联新领导人一起同赶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会谈，提出了莫斯科的新方针。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②

朝鲜对于苏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前往平壤转达莫斯科指示的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再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都不利，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遣返战俘的数字没有意义。苏联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必须尽快实现”。③ 至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立场的反应如何，目前尚无历史文献可以说明。但从实际行动看，北京还是按照莫斯科的安排发表了致克拉克的复信和周恩来的声明。4月26日，板门店谈判重新开始。

说中国方面在此时不想将战争停止下来，是有根据的。1953年夏季，中国志愿军在战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前线阵地更加巩固，反登陆作战也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给志愿军总部的指示是：停是谈判会场的事，军队“只管打，不管停”，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于是，中朝联军在最后谈判阶段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共攻击敌军目标104处，攻占土地240平方公里。④ 以至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宣称：“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⑤ 事后，毛泽东还

①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3年3月19日，АПРФ，ф.3, оп.65, д.830, л.60-7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90–291页。

③ 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年3月29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59а, оп. 5а.п.11, д.5, л.120-122。

④ 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89、325–326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261–26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2页。

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从纯粹军事的观点来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是可行的。[①]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打算背离莫斯科制定的总方针。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斯大林已经不在了，朝鲜战争也结束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衰落。

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① 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 年 7 月 29 日，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11, д.5, л.156-158。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苏联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的问题上，有过一番讨论和争执，这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①]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拟推迟出动并表示不能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这一困难就尤为突出——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件事感动，也震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改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②]

斯大林对毛泽东表示信任，同时也是对赢得朝鲜战争恢复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他本人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援助志愿军作战而设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10—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期间，莫斯科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表示了两条意见：斯大林先是提出，苏联尚未做好准备，"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③]对此，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到："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要迟于两个月。"[④]当毛泽东决定中国先行出兵，等待苏联空军到达再投入作战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

---

① 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请参见拙文《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

② *Юдин П. Ф.*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17.

③ 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转引自李海文：《中共中央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第88页。

④ 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 д.335, л.1-2。

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军队作战。[①] 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打响第一战役后，情况有了变化：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 44 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 657 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而朝鲜人民军空军当时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 20 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②] 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③] 当中国几十万大军和大量军需物资涌入狭长的朝鲜山地时，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轮番轰炸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如何的重创和灾难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朝鲜战争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战爆发了。苏联空军部队共有 13 个师在 1950 年 8 月至 12 月先后进驻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其中别洛夫航空师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于 8 月到达东北担负防空任务的。[④] 这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的第一支部队。1950 年 11 月 1 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 6 架雅克 –9 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 B–29 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 –9 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 – 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 –15 飞机击落了两架 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 4 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 –15 是从沈阳和鞍山两

①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的总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53–54 页。

② *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4，с.130. 根据中方的统计，到 1950 年 10 月底，美国在朝鲜战场投入的空军兵力共 14 个大队，1100 余架作战飞机。见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的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27 页。

③ 1950 年 6 月 19 日中国空军第 4 混成旅正式成立（后改为师），主要任务是飞行训练。直到 1950 年 12 月 21 日才有一个大队进驻安东（今丹东）浪头基地，随苏联空军进行实战训练飞行。一个月以后，中国空军第一次出动了几架飞机参加空战。《当代中国的空军》，第 79、130–131 页。

④ 参见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第 3 页；《当代中国的空军》，第 78–79 页；菲利波夫（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13 日；罗申转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0 年 7 月 22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85, 88-89。不过，中方材料说，别洛夫师的飞机有 138 架，而不是斯大林电报中所说的 124 架。

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 8 个架次。”[①] 在斯大林眼中，出动空军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问题，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 10 月 25 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 7 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鸭绿江上空，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毛泽东出兵决策的支持。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 151 和第 324 这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以后是洛博夫继任）的第 64 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 75 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此时，第 64 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②] 仅在 11 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 23 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 120 架米格 –15 新式战斗机。[③] 除了米格 –15 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 F–86 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甚至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也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 B–29 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第 64 航空军的飞行员与 B–29 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 10 至 12 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正如美国人承认的那样，喷气式护航歼击机保障不了轰炸机的安全。”到 1950 年 11 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无法在鸭绿江地区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 月 6 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 6 座战略桥梁和 10 个北朝鲜的边境城市，但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 300 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战略轰炸机只能在 6000–7000 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从而大大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 –15 飞机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其轰炸任

① 扎哈罗夫致冯西（斯大林）电，1950 年 11 月 2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71-72。

②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c.130. 第 151 师即别洛夫师、第 324 师进驻东北的具体日期不详。

③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0 年 11 月 15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16。

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①]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其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而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②]

然而，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开始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③]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B–29和B–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4000米。[④]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⑤]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

---

①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с.132-134.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94页。

③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с.138-139.

④ 关于1951年5月联合空军的战斗报告，1951年7月18日。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ф.35，оп.173543сс，д.69，л.45-46。

⑤ 彭德怀、金日成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27日。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9页。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31日。《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72页。

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①]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6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无空军掩护。"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机场。主要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入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②]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回电答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

---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8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64页。参见俄国档案文献：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3月1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78-82。

③ 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3月5日、3月15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3月18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89, 118, 126。

进驻朝鲜。[①] 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 64 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 2–3 个航空团增加到 4–5 个航空团。[②] 总的说来，到 1951 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 –15 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③]

1951 年 8 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 8 月 18 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 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 174 架次，到下半月达到 248 架次。[④] 此时，第 64 航空军有 3 个航空师（151、303、324–R），2 个高射炮师（82 和 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1 个航空供应师，2 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体数量很少，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 190 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 1500 架。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 9 月 1 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 9 月 19 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 3 架“佩刀式”飞机和 3 架歼击轰炸机。在 10 月 23 日的战斗中，8 架 B–29 飞机虽有 34 架 F–86、55 架 F–84 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 3 架。10 月 24 日当 34 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 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一架 F–84 飞机和一架 B–29 飞机。10 月 30 日，56 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 –15 中的 44 架迎战由 21 架 B–29 飞机和 200 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了 12 架 B–29 飞机和 4 架 F–84 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 64 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

① 以后，志愿军空军也改为从中国境内的机场起飞到朝鲜上空作战。1951 年 12 月中央军委决定放弃进驻朝鲜境内机场的打算。《当代中国的空军》，第 141、205 页。

② ЦАМОРФ，ф.16иак，оп.178612，д.88，л.21；ф.35，оп.173543，д.73，л.52.

③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с.131.

④ 关于 1951 年 8 月联合空军的战斗报告，1951 年 10 月 18 日。ЦАМОРФ，ф.35，оп.173543сс，д.69，л.253-254。

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①]据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②]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③]

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受到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④]所有这些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始终掌握着一条他最初制定的原则，即不允许苏联空军在前线协同中国军队作战。

---

① 洛博夫：《在朝鲜上空的米格走廊》（Аллея Мигов в Корейском парке），《航空兵与宇航学》1990年第11期，第31页；*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c.130-131，139-140。

② 什捷缅科给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报告，1951年12月9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829, л.69-70。

③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c.142-143.

④ Halliday, "Air Operation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Story", p.154;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c.133, 146.

斯大林在一份电报中指责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说，“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 8 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①] 据第 64 航空军报告，在 1951 年 4—5 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②]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强调，“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③] 中国的材料也证实，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以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中国空军第 8 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④]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⑤] 到 1951 年 12 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⑥]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

---

① 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1 年 6 月 13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47。

② 第 64 歼击航空军关于 1951 年 4–5 月战役的作战述评，1951 年（日期不详）。ЦАМОРФ, ф.35, оп.173543сс, д.99, л.245-251。

③ Halliday, “Air operation in korea”, pp.154, 161. 冈察洛夫所进行的采访也证明了这一点，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3, pp.199-200.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空军回忆史料》，第 309 页。

⑤ 关于 1951 年 7 月联合空军的战斗报告，1951 年（日期不详），ЦАМОРФ, ф.20571, оп.174045сс, д.188, л.73-74。到 1952 年底，在志愿军空军 700 多名飞行员中，只有 28 人掌握了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技能。《当代中国的空军》，第 190 页。

⑥ 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的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05–206 页。

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建议保密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①] 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沉寂了 40 年。

但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 12 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 72000 人，1952 年最多时达到 25000-26000 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 1097 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 212 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 335 架飞机和 120 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 299 人。[②]

总之，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虽然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后来对此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①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cc.133，146；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pp.159-160.

②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c.145；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pp.149-150.

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解密档案

最近几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苏美两国空军曾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拼死相搏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①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这是美苏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战争行为，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一事实隐瞒了四十多年。②那么，一向处事谨慎的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决定把苏联空军投入战争的？苏联空军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参战的？这些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试图解开的历史之谜。

虽然在十几年前人们已经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那时档案文献的缺乏给人造成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笔者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当时能够看到的主要是各方面的回忆录和访谈录，而相关的档案文献只是零星出现的。所以，就历史过程的链条来看，断裂的地方颇多，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推断。例如，关于周恩来赴苏的日期，中苏领导人会谈前中国是否告知已经做

---

① 相关的研究，如果说最早出现的依据主要是口述史料（见 Jon. Hallidy，"Air Operation in Korea：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William J. Williams（ed.），*A Revolutionary War: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Imprint Publlcations，1993，pp.149-170），那么稍后俄国学者便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见 *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c.121-146）。笔者也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69–74 页）。后来，美国还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朝鲜空战的专著：Zhang Xiaoming，*Red Wings over the Yalu: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Texas A &M University Press，2002.

② 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 1950 年 11 月 27 日就推断，"如果联合国空军攻击满洲的目标"，苏联极有可能秘密参战（Fiche 22，Item 100，NIE 2/2，The National Archives，U.S.)。1952 年 7 月 30 日，中情局更根据"大量迹象"断定，苏联"如此广泛地参加了敌人的空战"（Folder: PSF Intelligence File，NIE 55/1，Truman Library)。

出的决定，黑海会谈的具体时间和最终结果，斯大林对中国到底做出了什么承诺，等等。[①]至于苏联在华空军的部队建制、作战部署及参战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更是语焉不详、含糊不清。最近几年，中俄两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进一步披露出来，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的大量出现，使得研究者可以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可以对这段历史过程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了。[②]

苏联空军参战的过程是同中国出兵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个过程与其说反映了苏联对美国的政策和立场，不如说体现了中苏同盟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在了解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具体过程的同时，人们对于中苏之间、中朝之间乃至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同盟关系也会有一个更加细致、更为深刻的观察。

一、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苏联空军就已经进驻中国。1949 年底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凭借其空军优势，不断派遣飞机对大陆进行轰炸和袭扰，最严重的是 1950 年 2 月 6 日对上海的轰炸。据苏联领事馆给莫斯科的报告：由 17 架重型轰炸机进行的这次袭击，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供水中断，所有企业停产；上海当局和居民情绪十分低落，人人提心吊胆，甚至做出了将工业企业迁往内地的决定。蒋介石则为此欢欣鼓舞，并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要求扩大轰炸，批准将袭击目标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决定帮助国民党尽快修复舟山群岛上的台山机场。[③]此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同盟条约，接到报告后，便请求斯大林给予空军援助。[④]于是，苏联派遣巴季茨基中

① 详见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 83–87 页；Alexandre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94-107；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 1950 年 10 月中苏会谈问题的争论》，《党史研究资料》1996 年第 4 期，第 7–12 页。

② 由于缺乏档案文献而导致的历史链条的断裂，笔者以前对一些历史细节的判断有误差，如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时机、金日成拒绝中国出兵援助的原因以及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的限度等，正因为如此，深感有必要在新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把那些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③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43，д.722，п.313，л.201-203；АВПРФ，ф.0100，оп.43，д.138，п.314，л.43-47，*Кулик Б.Т.* 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против КНР，1949-1952，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с.32-33.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472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49 页。

将率一个防空集团军开赴徐州和上海，其中包括第 106 歼击航空师、第 52 高射炮兵师、近卫高射探照灯团，还有一个独立无线电技术营，共 127 架飞机，计有喷气式歼击机 40 架、活塞式歼击机 41 架、强击机 26 架、轰炸机 10 架、运输机 10 架。不到一个月，即 3 月 7 日，第一支苏联空军部队（第 351 歼击航空团）便进驻了徐州机场，并担负起警戒和巡逻任务。在随后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从 3 月 8 日到 8 月 1 日共出动 230 架次，进行了 7 次空战，击落 6 架敌机，而自己没有任何损失。第 106 歼击航空师出色完成了保卫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战斗任务，击落了所有试图侵入这些地区上空的敌机，而没有让一枚炸弹落在其防御区，以至地面高炮部队完全"失业"了。①

朝鲜战争爆发后，令斯大林和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立即采取了干涉政策，并首先投入了空军和海军部队。② 美国参战后立即给朝鲜人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首当其冲的就是空军和海军。据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开战仅仅几天，到 7 月 3 日，朝鲜已有 36 架飞机和 5 艘舰艇被击毁。③ 这时斯大林便意识到，战事的发展很可能是不会顺利的，他需要考虑如何对朝鲜增加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只是这种援助不能来自莫斯科。

战前苏联的援助主要在于训练朝鲜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制定作战计划，而斯大林绝对禁止苏联军人越过三八线、直接介入战争。例如，战争爆发前 5 天，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因进攻和登陆需要，金日成要求为已经抵达朝鲜的两艘舰艇提供 10 名苏联驾驶员和顾问。莫斯科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④ 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⑤ 正是由于缺乏苏联顾问的指导，继续南

---

① 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ф.50 ИАД，оп.152677，д.4，л.3-4，91，133-134，*Набока В.П.*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 Китае в 1950 году.//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39-141.

② 关于苏朝领导人战前对美国立场的估计，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47–158 页。至于美国参战的决策过程，参见牛军：《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演变（1950.6–1951.6）》，《美国研究》1991 年第 1 期；沈志华：《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 年第 3 期。

③ 关于朝鲜人民军损失情况的报告，1950 年 7 月 3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37。

④ *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с.29；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编：《朝鲜战争大事年表》，未刊，第 33–34 页。

⑤ 参见 Kim Chullbaum (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Testimony 40 Years Later*，Seoul：Eulyoo Publishing Co.，1991，pp.25-26；赫鲁晓夫著：《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第 534 页。

进的朝鲜军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以至什特科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批准给人民军每个军团派两名苏联顾问，并希望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① 对于派遣苏联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根本不予理睬，只答复说瓦西里耶夫“住在平壤更为适宜”。② 尽管后来在金日成的直接请求下，斯大林答应可以派一些苏联顾问进入朝鲜境内，但他一方面愤怒地指责苏联大使擅自答应朝鲜人的做法，要他个人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苏联顾问成为俘虏；一方面明确指出，这些顾问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而且他们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③ 斯大林脑子里想的是在必要时由中国军队提供援助。④ 当然，何时以及如何提供这种援助，还要看战局的发展。

美国参战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7 月 2 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要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形势的判断，并指出，为了防止美军登陆，朝鲜人民军应当加速南进，攻占南方的港口，并在仁川等地建立起强大的守卫部队。周恩来强调，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将以志愿军的方式并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与美军作战。为此，中国将在沈阳地区集中 3 个军，兵力 12 万人。最后，周恩来询问，苏联空军能否确保对这些部队的空中掩护。⑤ 实际上，中国的东北边防军是在几天后才正式决定组建的，并限令 8 月 5 日前完成集结。⑥ 周恩来在做出正式决定之前这样说，显然是有意让斯大林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愿意帮助朝鲜的⑦，但同时也要让斯大林明白，苏联出动空军是中国出兵的条件之一。

斯大林对此立即做出了反应。7 月 5 日斯大林回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 9 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

---

①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7 月 1 日、7 月 4 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46，л.105-107，136–139。

②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7 月 6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0。

③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7 月 8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3-144；*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с.29。

④ 斯大林早在策划战争时就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他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 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5. 参见 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106.

⑤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编：《朝鲜战争大事年表》，第 35–37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428 页。

⑦ 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中国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罗申与邹大鹏谈话备忘录，1950 年 7 月 4 日，转引自 O.A.Westad，“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rs，Policies，and Perceptions，1950-1961”，*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Kong，January 1996。

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①] 由于没有接到中国的进一步消息，7 月 13 日斯大林再次请罗申转告周恩来或毛泽东：“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 9 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 124 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 [②] 这两个文件表明，为了催促中国下决心并尽快做好出兵朝鲜的准备，斯大林当时明确承诺，苏联除愿意帮助中国培训空军、向中国提供空军装备外，也将向“进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也就是说，苏联空军将与中国陆军并肩作战。[③] 不过，斯大林在这里预设了一个条件，即中国出兵（当然也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机是“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

二、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美国空军的轰炸使得平壤陷入一片紧张状态。7 月 7 日金日成约见什特科夫，再次请求苏联军事顾问尽快进驻汉城，并参与各军团的军事指挥，否则人民军将面临“失败”和“崩溃”。金日成还说，他接到大量电话，讲的都是美军空袭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包括铁路枢纽和多座桥梁被摧毁。据什特科夫观察，金日成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显得“心绪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④] 斯大林再次把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他在 7 月 8 日的电报中指示罗申：“请告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 [⑤]

实际上，中国此时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在部队大规模向东北集结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加紧作战的筹划。7 月 12（或 13）日，周恩来委托中国驻朝鲜代办告诉金日成，中国不会容忍美国对朝鲜的干涉，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为了能及时满足朝鲜方面的需要，请金日成在提

---

①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5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79。

②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13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5。

③ 俄国学者大多同意这个判断，见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0-101；Mansourov，Stalin，Mao，Kim……，*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105。

④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7 月 8 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193-194。

⑤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8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2。

出帮助的要求时不要客气。同时，希望向中国“提供比例尺分别为 1 比 10 万、1 比 20 万、1 比 50 万的朝鲜地图各 500 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还要求“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金日成及时地向苏联大使报告了这个情况，在会谈中，金日成心情沉重地谈到，美军的参战，尤其是美国空军的袭击，“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金日成还提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①

7 月 19 日金日成又报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美国将长期参战，并会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还“答应给朝鲜 30000 支步枪，2000 挺手提机枪，200 挺重机枪，300 门 81 毫米迫击炮和 1000 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 7 月 25 日起运”。金日成还通报，为了解朝鲜战局情况，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前往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很困难，只好请金日成派军事代表去中国。此外，毛泽东还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 4 个军，共 32 万人”，并希望金日成于 8 月 10 日以前通报自己的意见。当金日成询问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什特科夫答复：对此一无所知。金日成又说，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同斯大林协商过此事，没有想到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最后，苏联大使在电报中要求莫斯科尽快提出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看法，以便日后答复金日成。② 斯大林对此一直没有回答。看来，斯大林比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沉得住气。不到危急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而经过几次试探后，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这种考虑。

7 月 18 日莫斯科收到苏联使馆关于朝鲜局势的长篇综合报告，其中心意思是朝鲜领导人和居民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恐慌情绪，并恢复了胜利的信心。报告说，在刚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时，朝鲜人担心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武装援助，就无法战胜美国武装干涉者。不过，随着人民军向南推进，特别是 7 月 5 日和 11 日与美国部队交战并给对方以重创、俘虏大批美国士兵后，“人民的战斗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积极要求上前线的人数急剧增长，几天内就组建了 74.5 万人的志愿兵部队。被解

①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7 月 15 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03-305。

②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7 月 20 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52-355。

放的城市，尤其是汉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活，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动员了地方资源来帮助前线。人民军队的胜利还促使南方游击队运动再次活跃起来。报告的结论是，朝鲜人恢复了迅速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①]8月，驻朝使馆再次向莫斯科提交了同样结论的报告，只是附带提到，朝鲜的干部和群众对于苏联未能及时派遣空军阻止美国飞机的轰炸流露出不满情绪。[②]对于战局发展的乐观估计，大概就是斯大林不急于解决对朝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出兵朝鲜的急切心情，很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出兵的一种后果就是扩大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苏联是不利的。[③]

毛泽东确实在认真考虑出兵的问题，特别是在得到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许诺之后。7月22日，毛泽东答复斯大林7月13日电说："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同时，毛泽东还谈到了对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安排，计划到1951年3–4月间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及改装训练的工作。对此，苏联表示完全同意。[④]其实，在此前一天，即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已经做出相关决议。根据这个决议，7月22日，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指示在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巴季茨基，将驻防上海地区的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8月1日，在上海的防空集团军建制取消，装备全部转交集中在上海－徐州地区等待改装训练的中国混成航空兵旅。8月10日，苏联第151歼击航空师便已最后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的集结任务。[⑤]

或许是因为中国出兵的建议迟迟没有得到朝鲜的答复，毛泽东决定通过另一条渠道向莫斯科提出这一设想。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在北京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哲学家尤金院士谈到朝鲜战事。毛泽东讲到了事情发展的两

---

①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7月18日，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7，л.29-40。

②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8月（日期不详），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8，л.109-169。

③ 在上述两封电报及其他政治报告中，大使馆都重点汇报了苏联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可见莫斯科对此问题的关注。

④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维辛斯基致罗申电，1950年7月2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90。

⑤ 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Набока*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41。

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人在朝鲜只使用目前的兵力，那么他们不久就可能被赶出半岛而再也不会回来。但是，如果美国决心要在朝鲜取得胜利，那么他们需要增兵30—40个师。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北朝鲜人就无法对付了，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如果进行这种援助，就可以消灭美国的这30—40个师。而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将会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有利。[①] 毛泽东这番话当然是说给莫斯科听的。[②] 然而，斯大林却不为所动，尽管金日成继续表达了这方面的请求。

三、金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8月中旬以后，人民军的进攻在洛东江一线受阻，金日成再次表现出焦急和失望情绪。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苏籍朝鲜人文日受其委托去见什特科夫。文日说，卧病在床的金日成对于前线部队因遭受美国飞机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而被迫放弃进攻一事“忧心如焚”，情绪极为沮丧。“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只能继续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建议朝鲜人民军“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快向前推进”。什特科夫还报告，“近期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对人民军“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③] 由于朝鲜空军损失严重，无法对敌作战[④]，金日成只能期待来自苏联的空军援助。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电话向苏联大使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考虑到不便再次当面向苏联人提出他们一直回避的问题，当晚，金日成再次借文日之口对什特科夫说，他“仍然想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对此的意见，并几次想到要给斯大林写信。金日成还想把这一问题提交劳动党政治局讨论。看到什特科夫无意谈论这

---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编：《朝鲜战争大事年表》，第45、47页。

② 关于中国的出兵意图，这里讲述的只是毛泽东向苏联和朝鲜表示的意见，至于中国在国内动员和部署参战的情况，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69–176页。

③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19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621-623。

④ 截至到8月24日，朝鲜人民军空军损失歼击机和强击机109架，仅存战斗机36架。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朝鲜人民军空军情况的报告，1950年8月26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26。

个话题，文日连忙改口说，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的，金日成并没有请他谈这些问题。什特科夫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多次试图征得苏联使馆的同意，以便请求中国军队来帮助朝鲜。但这次通过文日刺探口风后，金日成再未提起过这一问题。① 金日成在这里所说的美国打算在仁川登陆的情报，显然是中国人提供的。毛泽东在 10 月 2 日起草的致斯大林电中曾写道："还在今年 4 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7 月中旬、7 月下旬和 9 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② 毛泽东这样做无非是根据经验提醒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此时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而金日成也是以此为由向莫斯科提出请中国出兵的问题的。

斯大林无法再置之不理了，但他否决了金日成要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在 8 月 28 日的电报中，斯大林首先告诉金日成，"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接着，斯大林又安慰说，"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是没有连续胜利的。""俄国人在 1919 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斯大林最后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 ③ 直接听到斯大林的意见后，金日成"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并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应该向政治局委员传达。显然是为了解脱自己，金日成解释说，"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④8 月 31 日，金日成向斯大林呈上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敬爱的导师，我们感谢您的谆谆教导。在朝鲜人民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您的巨大支援。" ⑤ 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

①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 8 月 28 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7，л.666-669。

② 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39 页。

③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8 月 28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5-6，10-11。

④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8 月 30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13。

⑤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8 月 31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4-15。

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了。①

然而，斯大林此时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仅没有及时向朝鲜提供空军援助，就连原来已经确定的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的任务也停止执行了。8 月 28 日，华西列夫斯基报告，鉴于 8 月 27 日美国飞机对中国东北的居民点和火车站实施了空袭和扫射，军事部请求允许让已经集结在那里的第 151 歼击航空师承担起为东北边防军（第 13 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的战斗任务。报告要求批准给师长别洛夫下达的命令草案。命令说："一、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再培训任务的同时，自今年 9 月 1 日起第 151 歼击航空师在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将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 13 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二、在执行掩护任务过程中，第 151 歼击航空师的飞机不得飞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境线。三、与第 13 兵团司令部（位于安东）一起制定同人民解放军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协作计划。该师空中掩护行动计划必须通过（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以最便捷的外交邮件渠道呈交苏军总参谋部（审阅）。四、涉及空战方面的活动报告必须在每天 20 时以前立即通过热线电话用密码暗语向苏军总参谋长汇报。"第二天，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在该文件上批示："退还 A.M. 华西列夫斯基"，便没有下文了。②8 月 31 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提交报告，询问"是否有必要命令第 151 歼击航空师在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同时，还能够为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空中掩护"，并说明这项任务是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提出的。这一次，布尔加宁干脆在报告上直接用笔勾掉了所询问的几句话。③ 布尔加宁这样做，显然是经过斯大林允许，甚至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授意的。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决定抽调部署在沈阳地区的空军兵力而加强旅顺海军基地的力量。根据 9 月 13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军事部命令，第 151 歼击航空师于 1951 年 2 月 1 日结束在沈阳地区对中国飞行员的再培训工作后，将其两个团及指挥机关调至旅顺基地，与 10 月 6 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来的第 303 航空

① 关于金日成在仁川登陆前拒绝中国援助的情况，详见 Shen Zhihua，"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CWIHP Bulletin*，Winter 2003-Spring 2004，Issues 14/15，pp.9-24。

② 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 年 8 月 28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

③ 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 年 8 月 31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4-5。

师第 177 团和一个航空机械营，共同组建一个新的米格 15 歼击航空师。[①] 在华苏联空军的这次调动命令，显然与 9 月 4 日美国飞机围攻并击落旅顺基地正在空中训练的轰炸机事件有关。[②] 这充分表明斯大林对旅顺港地位的重视[③]，而对于将要出国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掩护，这时已经不在苏联空军的任务日程表中了。不过，急剧变化的朝鲜战局打乱了斯大林的这一部署。

四、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从 9 月 14 日到 18 日，斯大林不断接到战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的报告，9 月 13 日美军便开始在仁川地区实行小规模侦察性登陆作战，但前线战局尚未发生重大变化。9 月 15 日，美军集中了约 150 艘舰船，在舰载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在仁川地区实施登陆，主力是美国第 10 军。人民军只有一个海军陆战团和两个边防营进行防守，由于道路和通讯中断，零星调往仁川和汉城地区的部队情况不明。美军登陆成功后，一路向汉城进击，人民军的防线已被突破。与此同时，南部战线的美韩联军开始猛烈反击，并取得成功。9 月 17 日，美军登陆部队已强渡汉江，汉城郊区正在激战。由于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从中国边境至前线的所有铁路和桥梁均受到攻击，交通已经陷入瘫痪。[④]

对于朝鲜局势的突然变化，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 月 18 日，周恩来召见了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周恩来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 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以建立起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周恩来

---

①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9 月 13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0-171。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0 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3，с.214-216；F. 斯通：《朝鲜战争内幕》，第 131 页。

③ 旅顺基地与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关系，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143–146 页。

④ 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9 月 14、15、16、17 日；洛莫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9 月 18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

还以毛泽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周恩来请求把这些意见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给予答复。[①]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没有及时提供军事情报是不对的，但原因在于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至于中国对朝鲜作战的建议，苏联同意立即将人民军主力北撤，建立起汉城防线。但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没有任何回应。[②]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③]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同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向他讲述了前一天与罗申谈话的同样内容，并进一步问，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李周渊当天便电告了金日成的原话：“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战斗”。此外就没有任何来自朝鲜的消息。[④]20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接着金日成问什特科夫，应如何答复中国人。在苏联大使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后，金日成立即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作战经验，但在大量美国飞机不间断地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也很难说。在场的朝鲜人都随声附和说，“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相当艰难”。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⑤]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周恩来的提议。朴宪

---

①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23-12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с. 106-108。

②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9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542–545页。

③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3-135，*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109-111。

④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1，*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109。

⑤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永、金料奉（最高人民议会议长）和朴一禹（内务相）都认为，朝鲜明显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但金日成发言说："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作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他相信，"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最后，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还说，如果朝鲜加速组建一支新部队，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① 金日成现在完全是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而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国出兵的问题。② 只是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9 月 26 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军事代表请示，运到朝鲜的 3400 辆汽车没有足够的司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可否建议金日成请求中国朋友向朝鲜派遣 1500 名以上的司机"？ 4 天以后斯大林才答复："你们可以这样向金日成建议，只是不要说：这是莫斯科的意思。" ③ 事情真的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在仁川登陆后不久，斯大林本来产生过出动苏联空军保护平壤的念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华西列夫斯基于 9 月 21 日报告说，可以派遣第 147 航空师第 84 团的 40 架雅克 9 型飞机前往保护平壤，航空团两天便可抵达，但全面做好战斗准备需要 8—10 天。④ 两天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报告，决定改派第 32 歼击航空师第 304 团前往，"10 月 3 日该团可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最后报告说："第一次空战后，我国飞行员保卫平壤的战斗就会被美国人发现，因为空战的一切指挥将用俄语通过无线电话进行。"⑤ 或许是军事部长的这番话提醒了斯大林，或许是急剧变化的朝鲜局势迫使斯大林重新考虑了对策，总之，到了危急关头，苏联战斗机并没有出现在平壤上空。

---

①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 1950 年 9 月 22 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② 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回忆说，在仁川登陆的那几天，他就在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的反应很平静，并说苏联对此已制定了必要的计划——要中国志愿军部队投入战斗。*Ракоши М.*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3-63，译文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04 页。

③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9 月 26 日；布尔加宁致马特维耶夫电，1950 年 9 月 30 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103-106，101。

④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9 月 21 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79-80。

⑤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9 月 23 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汉城可能已经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断，并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同时也起草了给毛泽东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们现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①] 同日夜晚，金日成来了求援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②]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在通报了朝鲜的危险局势，即朝鲜已经没有任何抵抗部队、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没有任何设防后，斯大林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或许是考虑到此前莫斯科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种种反应，斯大林最后故作亲近地说："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③]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凌晨便起草了同意出兵的回电。但是，这一主张在中共领导人的会议上受到质疑，毛泽东不得不答复莫斯科：中国暂不出兵，有关问题将再行讨论。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极力主张下，10月5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战的决议。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成立，部队进入了战前的最后准备阶段。[④] 尽管出兵的决定已经做出，但中国领导人的犹豫和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关于出兵的时机，如果说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助防守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难怪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此时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否则，"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不过，麦克阿瑟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投入地面部队，苏联出动空军，"进行联合作战"。[⑤] 这恰恰就是当时毛泽东

①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6-49。

②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1-45。

③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10月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④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79–190页。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Korea*，Washington D.C.: GPO，1976，pp.954-955；Papers of DA，1950.10.15，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Box 67，Truman Library.

和中国领导人所期待的。

从作战角度讲，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武器装备落后和没有空军支援，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告知了斯大林。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电报中不仅开列了包括坦克、重炮和几千辆汽车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清单，而且提到“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故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出动时给予空军支援。[①]如果说因这封电报没有发出而斯大林不知其内容的话，那么从其他渠道传递的信息应是十分明确的。10月7日，斯大林派驻朝鲜的私人代表马特维耶夫报告：朴一禹已于10月5日从北京返回，他在北京期间受到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两次接见，谈话持续时间长达10个小时。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帮助朝鲜，但就是不能派出军队。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出兵势必把苏联也拖入战争，而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中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军和海军。[②]毛泽东对苏联人的谈话就更直接了。10月6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时说，他对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国共同打击美国的说法感到十分欣慰，并强调，如果要打，就应该立即动手，他在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是这么说的。说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非常落后，“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是空军问题”，他指出，中国出兵“必须要有空军部队”，其任务在于：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参加前线的作战行动；掩护中国重要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毛泽东最后说，为了汇报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全部想法，他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③]由此可以断定，周恩来赴苏谈判之前，斯大林对其目的和要求是一清二楚的。

10月8日，毛泽东分别正式通知金日成和斯大林，中国已决定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部队大约在10月15日开始入朝。随之，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又互通了消息。中国终于决定出兵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金日成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0页。笔者在1996年1月与负责主编该书的金冲及先生谈话时了解到，除引号内的字句外，电报的其他内容在发表时被删节了。

②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7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05-706。

③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7日，РГАСПИ（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ф.558，оп.11，д.334，л.126-128，*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с.106-107；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588–590页。

对中国军队在朝鲜集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做了安排。[1] 但这一切来的似乎已经晚了，此时的斯大林有一种不祥之感，他在不安地等待已经进入苏联国境的周恩来和林彪。

五、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经莫斯科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并于当天下午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尚未披露，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谈话。所幸不久前俄国公布了作为会谈结果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再加上会后的中、苏、朝之间几件往来电报，目前关于黑海会谈的情况已经大体清楚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反复讨论以后，双方认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准备，只好放弃朝鲜，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会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指出：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因执行掩护任务的空军至少2个月后才能到位，装备和培训中国部队至少需要6个月，而那时援助朝鲜已无意义，故决定中国不再出兵。电报最后说，等待毛泽东做出决定。[2]

周恩来之所以接受中国不出兵的意见，显然是因为苏联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而这一点应该是毛泽东已经答应彭德怀并事先与周恩来商定的。彭德怀

---

① 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0年10月8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3–4页；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8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2，*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с.107-108；什特科夫致电斯大林，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1；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2-713。斯大林在给北京的回电中说志愿军当然应由中国人指挥，但似乎没有向金日成提起过这个问题。这造成了日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指挥权问题上的分歧。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1991年，第495–498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Mansourov，“Stalin，Mao，Kim……”，*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09，并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92–197页。

10月9日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说明当前形势及中央意图。虽“各项准备不很充分，但为争取时间”，仍决定先派两个军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集结在熙川、德川一线。但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讲到空军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在会后发出的电报中还提到：“陆空联络尚未规定，据说须经军委规定，请即速办理，否则（会）发生误会遭受损失”。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因此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①]这足以表明，中国军队出动前是得到过有空军掩护的许诺的，只是具体方式和时间尚不清楚。现在周恩来没有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自然便同意放弃朝鲜的意见了。而斯大林此时做出的推迟出动空军的决定，则有着更加缜密的思考。

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明显是一种托辞，因为如上所述，不仅集结在沈阳地区的别洛夫航空师早已整装待命，而且就在十几天前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报告，准备从滨海边疆区调往平壤的第32歼击航空师第304团和两个高炮营及其他辅助部队，只要5—6天便可以到位，并于10月3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②]斯大林在10月11日明确表示苏联空军不能与中国陆军同时出动的真正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斯大林一向严禁苏联军队在前线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可以在后方提供空中掩护。10月2日晨斯大林得到报告：南朝鲜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③]这就是说，朝鲜北部即将成为战区。斯大林由此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愿显示出任何苏联将与美国直接和公开对抗的迹象。莫斯科对美机空袭苏联边境机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做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莫斯科竟采取了默不

① 彭德怀、高岗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4页；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41页。

②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③ 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2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85-186。

作声的态度。① 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军队尚未越过三八线时，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又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便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② 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回旋余地。

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在三八线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候，9 月 27 日正在纽约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电告，一位亲苏的美国企业家兰开斯特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与美国国务卿的助手或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召集会议并做出决议，同意与美方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③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又采取一个行动。10 月 4 日，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工作人员瓦西里·卡萨涅夫邀请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共进午餐，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线止步，苏联将劝说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并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④ 显然，如果这些秘密外交取得成果，即使中国出兵不利或不出兵，危机也会过去，而苏联就没有必要再冒险与美国开战了。

接到黑海来电后，毛泽东陷入了极度思考之中。10 月 12 日下午 3 时 30 分刚看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同意你们的决定"。晚 10 时 22 分，毛泽东再电告知，中国军队尚未出发，已下令"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斯大林接着便致电平壤，将黑海会谈的结果通知金日成，并要他立即组织撤退。⑤

① 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1950 年 10 月 8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02-103。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 年第 1 期，第 62–65 页。

② 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 年 10 月 10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3–14 页。

③ 维辛斯基致葛罗米柯电，1950 年 9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 年 9 月 27 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6-87，84-85。

④ *FRUS*, 1950, Vol.7, pp.877-878.

⑤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12 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10 月 12 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0，141，142-143，*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с.109-110。

其实，毛泽东的态度并不像他电报中说得那样坚决，他给彭德怀等人的指示实际是：“10 月 9 日命令暂不实行”，部队“暂不出动”，还要彭、高二人来京一谈。[①]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把真实想法全部告诉斯大林，也许是对在如此条件下继续坚持出兵的主张能否再次被中国领导人接受没有把握。但是，经过 13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毛泽东可以向斯大林表示中国的决心了。

会议刚刚结束，10 月 13 日 21 时毛泽东即刻召见罗申，并宣布：中共中央经过再次讨论决定，“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②] 此前金日成已经接到斯大林关于撤退的通知，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只得表示遵照执行。[③] 莫斯科得到报告说，平壤的政府机关和外交使团从 8 日已经开始撤离，但组织混乱，情绪低落，并对苏联未能及时给予帮助颇有怨言。[④] 于是，斯大林紧急电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⑤]14 日凌晨收到罗申关于中国出兵的补充报告后，斯大林再次告诉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⑥] 不过，罗申的补充报告特别指出了空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还提到，希望能以贷款的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周恩来必须与斯大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⑦]

毛泽东在 13 日 22 时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把中国再次决定出兵的安排和要求讲得更清楚：第一，中国军队入朝后，“可以专打伪军”，建立根据地，以振奋士气，待苏联志愿空军和武器装备到达后，再打击美军；第二，争取用租借办法解决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问题；第三，务必要求苏联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京、津、沈、沪、宁、青等地。[⑧]14 日 3 时，毛泽东再次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等人电，1950 年 10 月 12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5–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52–553 页。

②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5，*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с.110-111。

③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14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3。

④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136-140。

⑤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5。

⑥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10 月 14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7。

⑦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

⑧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6–7 页。

发电叮嘱周恩来：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武器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解决。[①]14 日 21 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已决定 10 月 19 日出动 12 个步兵师、3 个炮兵师共 26 万人入朝，并要他立即通知斯大林。[②]鉴于平壤告急，10 月 15 日凌晨毛泽东又决定志愿军提前出动，即 17 日和 18 日分别出动一个军，10 天左右全军渡江完毕。[③]毛泽东最后的决心已下定，并一再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苏联空军的出动。中国人的立场和要求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态了。

此时周恩来已返回莫斯科，并向苏联方面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莫洛托夫大概是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实际意图，便笼统地答应苏联可以先出动 16 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掩护中国军队。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苏联空军与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等问题时，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④]这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 17 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 18 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 19 日出兵朝鲜。[⑤]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⑥]

---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 年 10 月 4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7–8 页。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 年 10 月 14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8 页。

③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0 年 10 月 15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0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64 页。

④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502 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 年 10 月 10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4 页；周恩来给斯大林的信，1950 年 10 月 14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9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86–87 页。

⑤ 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1950 年 10 月 17 日，毛泽东致邓华等电，1950 年 10 月 18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1 页。

⑥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7 页；彭德怀关于高岗问题的一次谈话，1955 年 2 月 8 日，彭办主任王焰抄记，未刊。20 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中国出兵朝鲜，“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还是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可以再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 年 10 月 10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3 页。笔者对于毛泽东出兵动机的分析，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278–287 页。

六、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①]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151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活动。[②]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③]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④]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⑤]于是，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2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⑥]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⑦]

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

---

① 巴季茨基的报告，1950年10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54。

②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9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5-18。

③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4。

④ Viktor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12，№4（December 1999），pp.13-14.

⑤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有亲身体会的。见АВПРФ，ф.0100，оп.50а，п.423，д.1，л.19，*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95；《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

⑥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71-72。

⑦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1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25-26。

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 9 兵团）3 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情况，11 月 6 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①] 这更增加了斯大林的信心，他于 11 月 15 日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 120 架米格 15 歼击机，并由此成立军一级的指挥机构（第 64 歼击航空军）。11 月 20 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空军部队。[②] 按照计划安排，除已在中国的第 151 歼击师和在鞍山新组建的第 19 歼击师外，从 11 月到次年初，将有 12 个歼击机师、2 个强击机师、2 个轰炸机师陆续进入中国，分别部署在东北及北京、上海、青岛、广州等中心城市周围。[③]

11 月 30 日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军指挥机构人员已经全部抵达沈阳，各航空师已陆续到达或在调运途中。此外，计划供应中国的火炮、弹药、汽车及其他装备也陆续开始启运，有些已经运抵目的地。[④] 据空军总参谋部报告，至 12 月 4 日前，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已有 11 个歼击机师（第 17、20、28、50、65、144、151、297、309、324、328 师），2 个轰炸机师（第 162、186 师），以及第 64 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第 6 飞行技术学校的部分人员，共计将军 5 人，军官 5058 人，部队官兵总数达 17950 人。与此同时，为组建中国空军，已移交给中国各种飞机 1653 架，其中歼击机 900 架（350 架米格 15、372 架米格 9、40 架拉 11、130 架拉 9），强击机 117 架（伊尔 10），轰炸机 132 架（图 2），教练机 412 架，运输机 44 架，通讯机 56 架。此外，还有各种车辆 1871 部。[⑤]

1951 年 1 月 9 日第 64 歼击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 8 月 11 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 151 师，11 月 1 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 28 师，11 月 20 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 50 师，共 6 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 30 架米格 15 飞机。11 月 27 日，这三个师合并为第 64 歼击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 月 3 日和 25 日，第 50 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

①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 年 11 月 2、6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4-5，12-13。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97 页；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1 月 16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16；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189；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0 年 11 月 20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67-169。

③ 索科洛夫的报告，1950 年 11 月 30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231。

④ 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11 月 30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81-183。

⑤ 卡特尼金和索尼里尼克的报告，1950 年 12 月 4 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30-132。

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50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①

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②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③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64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④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⑤

---

① 第64歼击航空军关于1950年11–12月作战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9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95，л.138-147；克拉索夫斯基给第64歼击航空军的指示，1951年1月16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67，л.1-6。

② 参见周恩来致斯大林电，1951年2月2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2-65；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1-63；洛博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7月25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100，л.168-172；别洛夫关于第64歼击航空军战斗情况的报告，1951年10月（？），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73，л.22-69。

③ 关于美苏空战的情况，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68–277页。

④ 别洛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9月，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4045，д.49，л.38-41。

⑤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7。按照约定，平壤－元山线以南及东西海岸线以外为中朝联军作战区域。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①]

至此，可以对斯大林在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做一个总结了。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这是为了履行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盟国责任；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到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独自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至于中、苏、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略有改动

① 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空军作战情况的总结，1953年11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80-283。

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

——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成果最踊跃、最成熟的课题之一。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如同剥笋一般，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逐步大白于天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关这段历史的各国档案文献，特别是俄国的档案文献，披露得比较完整，比较全面。

在这场战争结束 50 年之际，笔者编辑、出版了三卷中文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该文件集刊载了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 700 余件，就其数量而言，大大超过了当时散见于各国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韩文文本。正是在利用这些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写作并出版了《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修订版即将出版）。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挖掘、梳理和解读原始档案文献，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近几年，又有大量新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披露出来。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和解读，笔者拟对过去研究中的某些重点问题，做一些补充和说明，再议苏联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关系及作用。[1]

---

① 这里利用的，主要是俄国学者公布的档案：*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с.79-113；*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9-1952，Россия，XX век，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6，以及笔者收集到的一些俄国档案原件和中国近期公布的相关档案文献。

一、1949 年中苏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立场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 1949 年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各国学者已经基本取得共识，但仍有一些细节不清楚，以至无法把历史的链条完整地连接起来。

是年春天传出消息，美军即将从朝鲜南部撤出，李承晚政权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对北方的进攻。[①] 为此，金日成一方面向斯大林寻求大量的武器装备援助（6 月初苏联满足了朝鲜的请求[②]），一方面向毛泽东要求提供兵力支持。5 月初，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到达北平，转达了金日成的要求。毛泽东同意让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携带全副武装开赴朝鲜，以防备南方可能发动的进攻，但同时“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北方采取的进攻会引起美国的干预，而中共的军队主力已经南下，“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③]

6 月底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三八线附近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南朝鲜的进攻似乎已迫在眉睫。[④] 此时，在得到武器（来自苏联）和兵力（来自中国）的有力保证后，金日成便考虑“先下手为强”。9 月 3 日，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计划，即抢先“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占瓮津半岛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希望莫斯科批准采取这一行动。对此，苏联驻朝鲜大使和军事总顾问什特科夫表示支持。[⑤] 9 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请求，并给予答复，拒绝批准金日成的计划。莫斯科的复电说，对于南方发动的进攻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爆发战争，对此，“北朝鲜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同时还“必须指出，如果军事行动由北方主动发起并变为持久战争，那么这可能给美国人提供以各种方式对朝鲜事务进行干涉的借口”。苏联方面

---

① 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1949 年 4 月 17 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4 月 20 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70、172–173 页。

②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49 年 5 月 1 日；缅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和戈洛温电，1949 年 6 月 4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76–182、193–199 页。

③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 年 5 月 15 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 年 5 月 18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87–190 页。

④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 年 7 月 13 日；苏联驻朝大使馆关于朝鲜政治情绪的调查报告，1949 年 7 月 24 日；顿金与朴宪永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8 月 27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215–225、228–229 页。

⑤ 顿金致维辛斯基电，1949 年 9 月 3 日、9 月 14 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49 年 9 月 14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230、238–254 页。

建议朝鲜“集中最大力量”，“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武装起义”，同时加强军事力量，以便在南方发动进攻时进行反击。[①] 这就是说，斯大林同毛泽东一样，赞同金日成实现祖国统一的主张，但反对直接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

对于此后一个多月事情发展的进程，缺乏文献证据。在以往发现的俄国解密档案中，只有 11 月 5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其中谈到：“鉴于您的 10 月 21 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②] 但是，毛泽东来电究竟谈了什么意见，莫斯科将向朝鲜提出什么劝告，都没有说明。

直到 2005 年俄国学者又公布了一些解密档案，才把这一历史链条连接起来。这个文件就是莫洛托夫于 10 月 26 日为斯大林起草的一封以副外长葛罗米柯名义给毛泽东的回电，全文如下：

北京

致科瓦廖夫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菲利波夫同志对其 10 月 21 日电报的答复内容：

“致毛泽东同志。

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充分地准备好。

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开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③]

---

① 莫洛托夫呈报的拟答复金日成的指示稿，1949 年 9 月 23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答复什特科夫请示的决议，1949 年 9 月 24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255–260 页。

②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第 276 页。

③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32，л.47-48//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2-93. 据列多夫斯基解释，括号中的“还”字为斯大林所加。这说明，斯大林知道毛泽东原则上不反对采取军事行动，只是对进攻时机有所考虑。

由此可以做出判断，9月下旬遭到莫斯科的拒绝后，北朝鲜又试图说服中国同意并支持其通过武力手段解决民族统一的问题，但显然同样遭到了拒绝。很可能是在与平壤接触期间或其后，10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达了中国的意见，并征询莫斯科的意见，以便取得一致立场。[①] 大概是出于谨慎的考虑，11月5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时，斯大林没有采用莫洛托夫的草稿，而是使用了前引那件用语非常简单的电报稿。尽管如此，莫洛托夫的电报稿还是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统一问题的一致立场——不同意金日成立即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这就是说，至少在11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没有为金日成开放绿灯。[②]

二、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经过

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过去已经知道的是：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到北平，要求中共允许让林彪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7月上旬，金日成决定将这两个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回国时，164师实员10821人，166师实员10320人。会谈时毛泽东还答应，另外还有一支朝鲜族的部队正在南方作战，必要时也可以送他们回国。[③] 关于这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以前也有一些史料，但不够连贯，以至研究者对历史过程的描述有较大出入。[④] 现在，把最新解密的俄国以及中国档案文献与以前发现的史料连接起来，情况就比较清楚了。

1949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林彪、邓子恢、谭震联名致电

---

① 这里又有一处小小的“历史断裂”，即10月2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还没有予以公布。

② 根据已经看到的档案文件，直到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再次提出使用武力解决朝鲜统一的要求时，苏联方面的态度仍然是十分谨慎的。见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1月19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305–306页。

③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7月13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87–188、215页。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114页。

④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例如，关于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时候以及由谁首先提出的，学者们就没有说清楚。

中央军委："据最新统计资料，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服役的朝鲜人有16000左右。除了分散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朝鲜人外，还有由他们的人组成的4个营、27个连、9个排。服现役的指挥员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连级598人、排级400人、班级1900人。他们都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经受了锻炼和教育，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中许多人从我军吸取了作战、创建武装力量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可以当干部。我军部队南下后，在这些人中曾一度出现波动，有人要求送他们回国。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服从命令，并坚定地向南方进发。现在战争即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想把这些经过训练的干部送回朝鲜（想留下的我们就留下）。请中央讨论并答复能否送他们回国，以及朝鲜（劳动）党方面是否希望他们在此时回国。如果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将把他们集中起来并组成一个正规师或四五个正规团，经过短期训练后让他们回国。"29日，总参谋长聂荣臻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转发了这封电报，并请求给予指示。①

毛泽东把这个情况告知了苏联方面。1950年1月8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朝大使，转述了林彪反映的情况，并要求他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林彪此件的态度"。② 1月9日，什特科夫与金日成会晤。金日成报告，他接到了中国贸易代表交来中国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战争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朝鲜族部队正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给它。"金日成请教如何答复中方。什特科夫通报了斯大林的指示后，金日成说，"他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人民军队中上述数量的朝鲜族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③

接到朝鲜方面的要求后，1月11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彪等人："四野所有朝鲜部队和朝鲜干部同意派回朝鲜工作。中共中央已与鲜共中央接洽好，他们即派参谋政治人员三人来中国把部队改编好，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回朝鲜，

---

① 聂荣臻致毛泽东电，1949年12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9//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89-90。

②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8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280页。

③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50年1月11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281页。

并选一千多人先回朝鲜学习机械化兵种。”同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人民政府驻平壤办事处副主任文士桢转告金日成，“同意你们即派三个人来中国准备接收朝鲜部队，这三个人请到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长聂荣臻接洽。同意朝鲜部队在中国改编并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并回朝鲜。”①

1月14日，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等到达北京，与聂荣臻洽谈此事。②

1月2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在四野之朝鲜籍战士和干部共14000余人。金日成已派其作战局长等三人来接收。他们要求将该部战士编为一个师，及其直属部队，要求随带全部武器，数目如下：步枪12000支，轻机440，重机180，手枪120，迫击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105榴弹炮36门及若干弹药，除告林准备酌拨外，可否，请主席复示。”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办。”28日刘少奇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③

据韩国学者考察，这支部队是4月18日到达朝鲜元山的。④ 俄国学者的研究指出，在这批回国的朝鲜族干部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朝鲜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和指挥员，如崔庸健出任民族保卫相（即国防部长），武亭担任朝鲜人民军炮兵副司令员，崔仁担任副总参谋长，金翰燮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崔光担任第一步兵师师长，李光武担任第四步兵师师长，金灿德担任第五步兵师师长，方虎山担任第六步兵师师长，万永担任航空兵师师长。⑤

这批军队和军事干部返回朝鲜，无疑大大增强了平壤的军事实力和战斗能力。不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说明，无论是北京还是莫斯科，其目的并非为了发动一次进攻，而只是出于一种革命的道义。因为如前所说，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反对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

三、苏联代表为何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

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6月25日下午（美国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319–320页。

②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744页。

③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320页，俄文档案见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2//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0。

④ 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韩文），1994年8月。

⑤ *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с.144.

东部时间）安理会顺利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该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边界自己的一方，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 月 27 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 月 7 日，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①] 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呢？在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研究者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取得成功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即坚持在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之前与其保持一致；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②] 不过，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证据，人们大多是简单地发表一下议论，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

不久前，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苏联政府拒绝在安理会参加美国政府起草的朝鲜问题决议案的讨论，令许多国家感到不解。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在与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怀疑这一举动的正确性。哥特瓦尔德说，在他看来，“民主阵营没有必要离开安理会”。在给哥特瓦尔德的电报中，斯大林详细解释了苏联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这一做法的理由和考虑：

绝密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

---

① 详见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王希荣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第 624–625 页。

② 伊豆见元：《围绕朝鲜战争的中苏对立：关于苏联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背景》，《军事研究》（日本），1975 年第 3 期，第 100 页；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00 页；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61；*Лебедев С.Н.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разведки：В 6 тт. Т.5，1945-1965 годы，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3，c.388。

“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和它退出后所发生的事，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

1950 年 8 月 27 日[1]

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因此，毛泽东必然要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2] 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这也正是斯大林希望人们理解的，即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安理会阻止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决议案，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斯大林的这个解释，或者说俄国学者的这种理解，迎合了以往某些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观点，即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关键时刻拒绝返回安理会，“是要利用美国重新卷入远东事务这一机会使华盛顿与北京发生纠纷”，因为斯大林已经考虑到，美国出兵朝鲜必然招致中国军队的介入，那样就会“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3]

按照这种看法，从 1950 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采取的策略，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然而，这里的逻辑前提及其与已知史实的衔接存在一系列疑问。

其一，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的战争的考虑。

在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

---

① 斯大林致哥特瓦尔德电，1950 年 8 月 27 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62，л.71-72//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6-97。

②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7-98.

③ 伊豆见元：《围绕朝鲜战争的中苏对立：关于苏联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背景》，第 106–107 页；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297 页。

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① 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 月 5 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② 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1 月 6 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对这个措施百分之百地赞成”，并认为这个声明的副本可以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③ 1 月 8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④ 1 月 10 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 1 月 13 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⑤ 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提出派遣自己的驻安理会代表，以“迫使他们把这个问题纳入具体的议程”。鉴于毛泽东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到安理会的支持，维辛斯基指出，中国继续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

---

① 详见沈志华：《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载《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

② 详见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 451、561–562 页；沈志华：《50 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③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0 年 1 月 6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43，п.302，д.8，л.1-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257-259。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219–220 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0 页。

⑤ 参见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第六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455–456 页。1 月 13 日马立克在安理会的发言全文见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0 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3，с.288-289。另见 1950 年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①]

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当然，斯大林这样做可能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希望毛泽东能够感恩戴德，在中苏条约的下一步谈判中做出让步。但无论如何，如何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此时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其二，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实现朝鲜统一的计划的前提是预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斯大林与中国协商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面对此事，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后6天，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中再次提出只有使用武力手段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对此，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反复修改的几个文本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显然是被迫做出的。1月31日斯大林答复平壤，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待中苏同盟条约签订、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金日成于4月10日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商谈。会谈中，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军事计划。斯大林最后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金日成走后，5月3日，斯大林通报毛泽东，金日成来过莫斯科，具体商谈的问题日后告知。随后，在莫斯科的催促下，金日成于13日秘密抵达北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最初感到意外，便紧急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14日电报答复，说朝鲜的计划已经得到莫斯科同意，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和朝鲜。毛泽东只得表

①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0年1月13日，АПРФ，ф.3，оп.65，д.364，л.94-9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с.261-263。

示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行动。[①]

根据上述史实，笔者曾做出推断，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②]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其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平静，并面临两难选择。

战争爆发的当天，6 月 25 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③] 6 月 26 日晚（美国时间 27 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④] 6 月 27 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 5 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⑤] 6 月 29 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 27 日的决议。[⑥] 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

① 详见沈志华：《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

②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176–180 页。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Vol. VII，Washingdon D.C.: GPO，1976，p.148.

④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86 页。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I*，p.204.

⑥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0 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3，с.189.

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①] 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莫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 27 日的决议。[②]

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文过饰非。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四、中国决策出兵朝鲜的复杂过程

以往的研究已经大体讲清了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的复杂过程，即从 10 月 1 日接到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电报，到 19 日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渡过鸭绿江，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开会讨论，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与斯大林进行商谈，其间经历了三次反复。但是，尚有一些细节不甚明了。例如，9 月 15 日美国在仁川登陆后，中国究竟有何打算，是否准备出动已经集结在中朝边界的军队；10 月 5

---

① АВПРФ，ф.07，оп.2，п.51，д.362，л.28；ф.07，оп.23，п.24，д.318，л.12-13，*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9-1952，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6，с.216-218. 在 6 月 30 日的《消息报》上刊登了声明全文。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с.190.

日下午中国决定派兵入朝作战后，是否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莫斯科——这涉及到如何判断周恩来去苏联谈判的目的。这些都没有任何文献证据。还有，中苏领导人在黑海会谈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因缺乏档案，而当事人的回忆又不尽相同，引起研究者对这次会谈情况及结果的猜测和争论。[①]

俄国公布的新档案弥补了这些空缺，使研究者可以把以前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出兵朝鲜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和毛泽东下定决心的背景。

新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美国仁川登陆后，中国驻朝鲜大使即向朝鲜通报了中方所掌握的关于美第十军和李承晚部队1个旅在西海岸登陆的情报。同时，周恩来召见朝鲜大使李周渊，询问朝鲜政府对中国有何要求。按照朝鲜领导人的理解，这表明了“承诺派遣中国的部队援助朝鲜人民的意图”。在9月20日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金日成和金科奉（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认为，中国军队虽然英勇善战，但是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优势，没有空军掩护的中国军队即使参战，也将于事无补。而了解苏联大使意图的外相朴宪永则提出，“尽管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统一，但如果中国军队能够前来支援的话，情况将会大不一样”。对此，什特科夫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说这是朝鲜的内部事务。[②]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是否邀请中国出兵的问题。在两个半小时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相反对意见。朴宪永、金科奉、朴一禹（内务相）认为，“情况危急，靠自身的力量已很难与美军对抗，应当向中国政府提出部队援助的请求”。金日成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参战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况且中国出兵也解决不了问题，应寄希望于重新创建的人民军部队。他还强调，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和武器援助的情况下，请中国人帮助，会使莫斯科产生“侮辱感”，因此，应暂缓向中国政府求援，而是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③]

此时，毛泽东确有立即出兵援助朝鲜的意图。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④]但是，平壤的态度使得中国很难主动地、明确地提出参战的要求。事情耽搁了几天以后，形势更加危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说，“近日来形

①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四章。

②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③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2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④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79页。

势日益复杂。敌人已完全切断第 1 方面军的 6 个师和 2 个旅，并攻进原州，切断了第 2 方面军的 7 个师。汉城已经陷落。能开赴三八线有效抵抗敌军的部队已经没有了”。“政治形势也在复杂化。敌人向北朝鲜境内投下伞兵以侦察苏联援助何种物资，并组织破坏活动。反动势力在北朝鲜已开始抬头。”报告还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尽管如此，金日成还是不愿明确提出请中国出兵。9 月 28 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会议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但只是暗示要求援助。①

直到 10 月 1 日斯大林明确答复苏联不会给以任何直接到军事援助时，金日成才转向请求中国的帮助。同一天，毛泽东接到斯大林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国使馆也收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请求中国派兵入朝作战。10 月 2 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答复电，表示同意立即出兵，但要求苏联给以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但是，在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多数领导人主张对出兵的问题应慎重考虑。会议决定 10 月 4 日、5 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只得在当晚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告知中国目前出兵有困难，还要再开会商量。10 月 5 日下午，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积极推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兵入朝作战。②

10 月 6 日晚毛泽东召见罗申说，他同意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也认为应该由中苏联手打击美国，但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实在落后，特别是没有空军，因此想派周恩来和林彪当面向斯大林讲明情况。③ 在这里，毛泽东没有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的问题。或许是担心斯大林误解其意，在 10 月 8 日下达了组建志愿军的命令后，当晚 10 点半，苏联驻华使馆又收到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另一封电报，其中明确告知：“我党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您的意见。我已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高岗同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们已于今天早晨（10 月 8 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奉天。部队大约能在 10 月 15 日前开始入朝。我已将派中国志愿军入朝的决定通知了金日成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已于今晨 8 点乘飞机前往您的所在地。他们的使命请予保密。”罗申立即将电报发出，同时说明，

①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 年 9 月 21，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220–232 页。
③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7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588–590 页。

“根据我从民航获得的消息，周恩来一行已于 17 时 43 分顺利抵达伊尔库茨克。”①

根据这个文件可以对此前当事人的不同说法做出判断了。师哲和费德林都说周恩来是带着中国不出兵的意见去见斯大林的，显然，这个记忆是错误的，而周的机要秘书康一民的说法更符合事实——周此行的目的就是向苏联告知中国的出兵决定，并商讨武器装备的援助问题。不过，关于这次会谈的结果，康一民的回忆就错了——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而师哲的回忆则比较符合事实——双方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的措施。笔者曾根据对各种史料进行逻辑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苏领导人黑海会谈的初步结果应该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② 现在可以肯定这种判断了，根据就是俄国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档案，即 10 月 11 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联名电报，其全文如下：

绝密

第 4784 号密码电报

优先拍发

驻北京的苏联使馆立即转告毛泽东同志

贵国代表已于今日到达，我们联共（布）的领导同志与贵国代表一起讨论了贵国已知的那些问题。

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以下情况：

1、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装备差，缺少大炮，没有坦克，执行掩护任务的航空兵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用于装备和培训上述军队的时间至少需要六个月。

2、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

3、因此，为朝鲜人提供的像样的援军只能在半年后，即在朝鲜被美国人占领，朝鲜已不再需要援军的时候才能到位。

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到周恩来同志报告的因中国参战而给国内带来的不利因素，我们一致决定：

1、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

---

①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2//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7-108.
②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237–244 页。

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

2、如果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也只能在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的山区而不应深入；

3、一部分朝鲜军队应在平壤和元山以北的山区组织防御，另一部分军队要转入敌后打游击；

4、把战时应征入伍的朝鲜人中的优秀分子及指挥员分批悄悄地调入满洲，在那里把他们整编成朝鲜师团；

5、要尽快对平壤和北朝鲜山区以南的其他重要据点进行疏散。

至于中国同志所需的用于重新装备中国军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苏联将充分予以满足。

等待您的决定。

签名：菲利波夫

周恩来

1950年10月11日

报告执行情况

打印1份送斯大林同志[①]

这份档案解答了以前不知道或不确定的问题：第一，周恩来一行在莫斯科时间11日抵达黑海斯大林的疗养地，并立即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第二，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但苏联空军至少要待两个月后才能出动——这是周恩来拒绝中国先出动陆军的主要理由；第三，文件只打印一份，说明斯大林不想让其他苏联领导人知道事情的原委；第四，斯大林和周恩来已经商定中国军队不再开赴朝鲜作战，但最后的决定要由毛泽东做出。过去，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13日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中国继续出兵，而不知道毛泽东此前也曾接受了不出兵的意见。俄国的新档案披露了这一情况。

北京时间10月12日15时30分，罗申拜会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联名电报。毛泽东当即请罗申转告斯大林："同意你们的决定。"22时12分罗申又收到毛泽东要求转发给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

"致菲利波夫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①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09.

我同意10月11日电报的意见。

我方军队还没有出发，我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

关于朝鲜同志应根据形势重新部署兵力并执行新的计划一事，我已委托高岗向朝鲜同志进行解释。”①

实际上，未等高岗做出解释，斯大林在接到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后就立即向金日成通报了会谈的结果，并开始安排撤退和疏散，而做出如此令朝鲜人沮丧的决定的责任，自然推到了中国身上：

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同志：

请向金日成宣读下列内容：

“昨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林彪就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问题召开了会议。

从周恩来的报告中得知，原计划赴朝支援的中国军队尚未做好出兵准备，没有坦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门大炮，对陆军的空中掩护大概至少要两个月之后才能提供，还需配备坦克和大炮，培训坦克兵和炮手也至少需要六个月时间。

鉴于周恩来通报的情况，会议一致认为，中国只有在六个月后才可能出兵援助。

因为这样的援助已为时太晚，那时美国军队可能已占领北朝鲜，所以会议得出结论：中国军队在装备差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目前不可能在朝鲜取得胜利，相反，会陷入危险境地。

鉴于这些情况，由中苏双方的中央代表召开的这次会议建议：

立即开始对平壤等重要据点进行疏散，不要惊慌；

朝鲜人民军边作战边向北方撤离，牵制敌军，防止它迅速向北方深入；

一部分军队在元山和平壤以北的山区集结，在那里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另一部分军队要组成小分队进入敌后打游击；为组建新的后备师而应征入伍的朝鲜人要分批经中国边境进入满洲，在那里组建师团（中国同志对此表示同意）；

利用已到货的、朝鲜军队尚未使用的苏联武器来装备在满洲组建的朝鲜师团；

6、派所有在苏联学习过飞行的朝鲜人去执行飞行任务并在满洲把他们整编成

①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0，141//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9.

航空兵部队，所用飞机由苏联提供；

7、对于所有苏联顾问，要么派他们回苏联，要么利用他们在满洲组建新的朝鲜师团——一切都由金日成酌定。

还要向您通报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意并赞成这次会议形成的意见。”

冯西

1950 年 10 月 12 日[①]

就在平壤接到莫斯科关于组织撤退的指示后，北京的情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3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讨论出兵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中国再次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讨论情况，目前尚无文献证据——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会议记录，但俄国公布的档案，即 10 月 13 日罗申致斯大林的第 2406 号电报，披露了一个重要事实：

菲利波夫：

10 月 13 日 21 时毛泽东把我叫去宣布了下列事项：

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菲利波夫同志的最近一封电报和我的决定。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

鉴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同志马上把周恩来拦在了莫斯科，给他下达了同您讨论朝鲜问题的新指示。

现将谈话的详细内容随本电报一起发出。[②]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称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我的决定”，然后认为“应当帮助朝鲜人”。这说明，本来力主出兵的主要就是毛泽东本人，而在苏联已经表明不能及时出动空军，中苏领导人也已经一致决定放弃北朝鲜的情况下，又是毛泽东个人做出了不惜与美国人孤军作战的“决定”。

---

①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2-144//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10. 此前笔者认为，斯大林发出要金日成实施撤退的指示，是因为 13 日收到海军的情报，称咸兴海面发现美国特混舰队和两栖作战部队（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243–244 页）。现在看来这个推断是错误的，其实斯大林在 12 日就已经通知北朝鲜实施撤退方案了。

② РГАСПИ（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ф.558，оп.11，д.334，л.145//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10-111. 电报中提到的“谈话的详细内容”，见《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597–598 页。

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中苏领导人黑海会谈后做出中国暂不出兵的决定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空军还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及时出动，而原来斯大林答应由中国出动陆军，苏联出动空军掩护，并且，苏联的别洛夫航空师早在 8 月份已经到达中国东北担任了防空任务。[①]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在周恩来访苏之际突然改变了主意？

五、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入朝作战的原因

斯大林确实曾答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早在 7 月 2 日，周恩来就向苏联大使提出，鉴于美国已经介入战争，“毛泽东认为，为了掩护汉城，应当同时在仁川地区建立强大的屏护队，因为美军陆战队可能在那里登陆。”周恩来还强调指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那末中国军队将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采取反对美军的志愿军行动。为此，中国领导人已经在沈阳地区集中了三个军，兵力为 12 万人。”随后，周恩来问道，“苏联空军能否从空中确保对这些兵力的掩护。”[②] 7 月 5 日斯大林对此做了答复，他要罗申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尽力”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③] 斯大林在 7 月 13 日经罗申转给中国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 9 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配备 124 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击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④] 7 月 22 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 1951 年 3—4 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

---

①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330 页。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说明，苏联空军并非没有做好准备。

②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с.36.

③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8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439 页。

④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13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450 页。

作”。[①]

显然，有苏联提供空军掩护的保证，是毛泽东说服彭德怀挂帅出征的主要理由；他派周恩来与斯大林面谈的主要目的，也是要让斯大林明确保证提供空军支援。然而，毛泽东却没有得到这个保证。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在紧要关头出尔反尔，突然改变了主意？过去一些研究者推断：10月8日，即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派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看作是美国提出的警告，从而变得更加谨慎了。[②]俄国新档案所披露的苏联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及其所作所为证明，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自介入朝鲜战争后，美国的军用飞机在远东地区屡次侵入苏联领空。苏联国家安全部边防部队管理总局局长斯塔哈诺夫中将10月4日的调查报告，讲述了这个详细过程：

经再次核查已经查明：在苏联外交部照书草案中指出的美国飞机破坏苏联边界（除了今年8月27日的破坏之外）的事实确实存在，此前国家安全部向苏联外交部通报的关于破坏边界的事实完全属实。

今年7月8日18点20分，自白令海峡方向，在阿拉卡姆切琴群岛上方大约1000米高度，出现两架美国歼击机，它们飞过恰普林角上空，消失在美国圣劳伦斯群岛的方向上。

18点50分，自圣劳伦斯群岛的方向出现两架歼击机，它们在300米的高空飞过普罗维杰尼耶海湾、世纪角并消失在楚克奇半岛上空的西北方向。

18点53分，两架歼击机自圣劳伦斯群岛方向越过苏联的国界线，消失在苏联阿纳德尔湾水域上空。

19点20分，自阿纳德尔海湾方向，在大约1000米高度上出现两架歼击机，它们飞过阿琴角和世纪角，消失在圣劳伦斯群岛的方向。

边防勤务、哨所、上等兵卡莫利科夫和上等兵鲁斯久洛夫对飞机的飞行情况进行了观察。

---

①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483–484页。

② Jon Hallidy，“Air Operation in Korea：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Williams，William J.（ed.），*A Revolutionary War: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1993，pp.149-170；Park Mun Su，“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History Revisited”，*Korea Observer*，Vol.25，No.3，1994，pp.341-381.

今年7月17日14点28分，在西北方向1000米高度飞行的两架美国飞机，侵入位于乌艾连镇的苏联边界线。14点30分，在杰日尼奥夫角以北12海里的地方，飞机做了一个掉头，消失在阿拉斯加方向。

边防勤务在上等兵阿纳尼因的指挥下对飞机的飞行情况进行了观察。

今年7月20日15点29分，自北海道群岛方向，在500米高空飞行的两架美国飞机，侵入苏联边界线之后，出现在千岛群岛组成中的苏联塔菲利耶夫群岛上方。飞过波隆斯基和希科塘群岛上空后，飞机掉头向西，15点46分，飞过南库页岛村庄的上空，然后沿着库纳希里群岛东南岸，消失在北海道方向。

前哨部队军官古拉克，中尉戈卢布，驻守在千岛群岛的整个边防勤务部队，边防舰队军人和空中观察哨，对飞机的飞行情况进行了观察。

今年7月23日11点45分，两架美国飞机在恰普林角地区侵入苏联边界，11点50分在100米高度上飞过楚科奇角和普罗维杰尼耶海湾，此后消失在阿纳德尔湾水域的上空。

12点的时候，这些飞机掉头，飞过普罗维杰尼耶海湾和楚科奇角上空，消失在阿拉斯加方向。

哨所的军官科尔什上尉、萨维切夫中尉和拉夫连季耶夫中尉，上等兵留明和科斯久申，上士希霍夫采夫，边防勤务哨所和空中观察哨，都对飞机的飞行进行了观察。

今年8月1日17点14分，两架美国歼击机侵入苏联国界线，在50米的高空出现在苏联的阿纳德尔湾水域的上方。在世纪角和楚科奇角上空飞过，飞机于17点25分出现在恰普林角上空500米的地方，此后飞向圣劳伦斯群岛方向。

对飞机的飞行情况进行观察的有军官博罗达夫卡中校和切尔诺夫中校，哨所军官斯科科夫，中尉拉夫连季耶夫，上士波格兰斯基，下士别里卡列夫和库捷尔瓦斯，上等兵库里洛夫、贝科夫、库里岑、普柳斯基赫、波波夫，以及驻守在普罗维杰尼耶海湾地区的哨所全体人员。

今年8月4日14点，自北海道群岛方向、在1500米高空飞行的一架美国双马达的轰炸机，在千岛群岛的阿努钦群岛地区飞行时，出现在科耶马卡伊基奥海峡上方。在飞过阿努钦、尤里和泽列内伊群岛之后，消失在东北方向。

对飞机飞行情况进行观察的人员有：上尉古拉克，中尉斯莫连佐夫、博西亚科夫和驻守在阿努钦、尤里和泽列内伊群岛地区的边防哨所全体人员，以及边防舰队

官兵和当地的居民。

对今年8月27日9点45分在千岛群岛之列的伊图鲁普群岛飞行的美国“B-29”飞机的飞行情况，边防部队分队的勤务人员没有进行记录，也没有向苏联外交部进行通报。

也是在这一天里，自8点23分到8点45分，边防哨所的勤务人员在有限的能见度条件下，根据马达的喧嚣声记录了不明飞机在阿努钦、尤里、泽列内伊、波隆斯基和希科塘群岛的飞行情况，并以1950年8月29日第C-4437号信件方式向苏联外交部进行了通报。[①]

对于美国空军上述一系列挑衅性行为，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直到9月4日，一架从旅顺基地起飞进行训练飞行（未装载炸弹或鱼雷）的苏联轰炸机遇到11架美国战斗机的围攻，并被击落，苏联政府才提出抗议。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其理由是击落轰炸机的飞机受命于联合国，因此美国不能接受苏联的抗议。[②] 为了谨慎起见，在外交部准备进一步的抗议照会前，联共（布）中央要求边防军对于苏联国家安全部和海军总参谋部提供的通报“再次进行核实”，以说明侵入领空的事件“是否属实”以及上述通报的“准确程度”。[③] 于是就有了上述斯塔哈诺夫中将的报告。不过，得到10月4日这份证实报告后，苏联外交部并没有提出新的抗议。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时刻——美国军队即将越过三八线，而斯大林正在催促中国尽快派军队入朝作战。显然，莫斯科不愿在此时加剧美苏之间的冲突。

然而，尽管苏联一再忍让退缩，联合国大会还是于10月7日通过决议，批准了联合国军对整个朝鲜领土的占领，美国军队以此为据于当天开入北朝鲜。更有甚者，10月8日下午4时，两架美国F-80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苏哈亚河地区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对此，苏联的反应仍然极其平静：既没有派飞机升空迎敌，也没有使用地面机枪和高炮进行还击。[④]

---

① АВПРФ，ф.0129，оп.34，п.231，д.56，л.71-73，*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268-270.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с.214-216；F. 斯通：《朝鲜战争内幕》，第131页。

③ АВПРФ，ф.0129，оп.34，п.231，д.56，л.65，*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268.

④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277-279；斯通：《朝鲜战争内幕》，第129页。

直到10月9日22时45分，葛罗米柯才打电话给美国大使，要求两个小时后与他会面，向他递交照会。柯克声称自己患了感冒和正在卧床休息，葛罗米柯只得同意在23点30分接见公使衔参赞巴尔布尔。[①] 在与巴尔布尔会面时，葛罗米柯宣读了抗议照会，但巴尔布尔声明说，他不能接受这份照书，苏联必须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朝鲜地区只有联合国的武装力量在行动。尽管葛罗米柯强调，对苏联机场进行的挑唆性扫射的是美国空军的飞机，美国人仍然坚持拒绝接受照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苏联外交部只好把照会寄到美国大使馆。然而，10月10日美国使馆通过外交邮件退回了这份照书，没有任何附函或文字说明。在归档的照书封页上只有苏联人的标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于1950年10月10日11点30分通过外交邮件退回"。其实，被美国退回的这份照会用语既简单又温和，只是表明了苏联政府这样一个立场："要求严厉惩罚袭击苏联飞机场的罪魁和期待美国政府做出保证：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杜绝今后发生类似的挑唆行动"。[②]

美国空军采取的显然具有挑衅性的行动——做低空飞行的美国飞行员不可能看不到苏联机场的标志，很可能是在试探苏联的态度。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以后，如果莫斯科想采取强硬立场，本来可以利用这次飞机扫射事件警告美国，甚至以此作为苏联对朝鲜战争进行军事干预的有力借口。但莫斯科表现出如此软弱的立场和谨慎的态度，充分表明斯大林宁可忍辱负重，也不愿在这个危急关头与美国兵戎相见。即使在10月19日美国承认对苏联飞机场的射击，是美军"空中领航错误和计算不佳的结果"，又通报说，"这架飞机的领航员已经被撤职，同时采取了相应措施对两名过失飞行员进行了纪律处分"，美国政府还表示"准备提供资金用于补偿给苏联财产造成的任何损失"时，莫斯科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尽管空中射击给苏联造成了很大损失。[③]

由此可以推断，在美国军队尚未越过三八线时，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又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失去了信心。在这种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917.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 п.32, д.27, л.54-56,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c.277-279. 就连美国使馆都认为"苏联照会的口气相对温和"，并断定这是美国"威慑"政策的结果。*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4*, pp.1260-1261, 1264; Vol.7, pp.920-921.

③ АВПРФ, ф.0129, оп.34, п.56, д.231, л.82,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c.279-280; 詹姆斯·施纳贝尔：《美国兵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第二卷，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完全没有制胜把握的时候，至少应该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军事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下，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对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支援，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当13日毛泽东再次通报中国陆军可以先行出动，但要苏联保证两个月后提供空中支援时，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示，即使将来苏联空军出动，也不会进入朝鲜上空作战。这就是说，中国军队必须孤军奋斗。事实上，直到11月初中国志愿军向联合国军发起第一次进攻并取得初战胜利时，苏联空军才出现在鸭绿江上空。[①]

至此，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全过程应该说已经十分清楚了。当然，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还有一些未解之谜或不明之处，例如细菌战问题、战俘遣返问题等，但随着相关各国的档案文献不断披露，整个发展过程和大部分历史细节已经被研究者掌握，而且可以断定，最终“水落石出”的日子应该不远了。

发表于《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①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46–247、330–331页。

试论 1951 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介入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周边重大危机的第一次尝试。60 年过去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成为中国周边最棘手的问题。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很有必要对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进行检讨，尤其是面对危机，应该如何交替采取军事与外交的手段，如何及时实现战争与和谈的转换等，从而把握时机，减少代价，消除危机。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多，其中两年的时间是在停战谈判或边谈边打中度过的。所以，在朝鲜战争历史研究中，停战谈判同战争起源问题一样，也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不过，学者们以往讨论的重点集中在 1951 年 7 月开始的开城、板门店谈判及此后边谈边打的漫长过程，而对中美开战至 1951 年初联合国停战谈判议案的出笼以及中国的反应和立场，专门的研究不多，且有明显的意见分歧。① 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再次提出讨论，主要是由于过去相关的档案材料比较欠缺，以至对这短短 3

① 关于中国停战谈判决策的问题，1996 年 1 月在“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上，有 3 位学者提交了相关的论文，即 Chen Jian，“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此文修改后成为作者专著中的一节：*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83-99）；K. 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1950-53”；F. Orlandi，“The Alliance：Beijing，Moscow，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其后，还有一些研究涉及这个问题，如齐德学、刘颖伟：《朝鲜停战谈判时机问题辨析》，《军事历史》1998 年第 2 期，第 35–38 页；*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c.96-110；柴成文：《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第 10–21 页；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成败》，《二十一世纪》2000 年 10 月号，第 81–94 页，《1953 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 年第 2 期，第 2–18 页；牛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第 35–47 页。在关于 1951 年初中国停战决策问题的研究中，陈兼、沈志华和牛军的论文倾向于认为中国错失了停战谈判的最佳时机，虽然他们各自的论述重点和论据不尽相同，而齐德学和刘颖伟则完全否定这种看法。

个月的历史过程，都没有一个详细的、连贯的梳理。本文利用美国、俄国公布的档案，特别是中国不久前出版的军事文献和解密的外交部档案，全面讨论了 1950 年 11 月至 1951 年 1 月联合国有关议案的提出过程，以及中国对通过停战谈判化解危机这一途径的立场、观点和对策。① 本文的结论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确有一次决策性的失误，但不是在危急关头做出的派兵入朝作战这个决定，而是在应该停战谈判的时候没有及时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正是这一决策及其不明智地表达的结果，使中国彻底失去了在朝鲜战场及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陷于被动局面。

一、印度政府的调停尝试与美国的反应

1950 年 9 月 15 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而改变了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被动局面。但是，美国决策者被轻而易举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随后便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策：越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导致这一决策错误的基本原因是美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情报机构一再对中国是否会出兵的问题进行预测和估计，并始终认为中国不会有所行动。直到中国秘密出兵已成事实，甚至已经与美军发生战斗，第八集团军和远东司令部的情报人员乃至中央情报局仍然坚持认为："中共不可能对朝鲜进行直接的干涉"，与美军作战的只是少数士兵，中国的"主力部队依然驻扎在满洲"，其目标也是保卫满洲。② 由于这种错误的判断，美国人做出了继续向中朝边境前进的致命决定，从而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并开始全线撤退。其结果之一，便是国际舆论和联合国中呼吁停战的声音逐渐高涨起来。

调停朝鲜冲突的最早尝试是英国和印度做出的，英国主要是与美国磋商，而印度则重点与中国联系。1950 年 7 月 13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便致函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希望冲突地方化，并通过安理会促成和平解决，为此应接

① 讨论中朝方面的停战决策，离不开对美国立场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早有涉及，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223–235 页。较新的研究成果见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第 37–55 页；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34–45 页。

②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七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第 72–101 页。

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苏联也返回安理会，以便同美国一起寻求终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基础。这一建议得到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赞扬，却遭到美苏的冷眼：斯大林要求安理会听取北朝鲜的意见，美国则拒绝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尼赫鲁 8 月 3 日发表讲话，说他并不否认北朝鲜是侵略者，但当务之急是将冲突地方化，寻求停止战争的途径，并确保朝鲜人自己决定朝鲜的前途。他再次强调，不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一个大错误。美国仁川登陆成功之后，印度再次展开调停活动。9 月 30 日尼赫鲁发表声明说，在未寻求其他解决手段前，联合国军不应越过三八线，并再次呼吁联合国接纳中国以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10 月 16 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了印度反对联合国 10 月 7 日通过的决议的理由。该决议支持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决定成立朝鲜统一和复兴委员会，代表联合国处理朝鲜问题。尼赫鲁说，北京有正当理由反对不与它磋商而解决朝鲜前途问题的任何企图，并指责联合国的决议是在扩大战争（决议通过的第二天，美国部队越过了三八线）。① 此后不久，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已经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在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印度试图集合一批中立国再次展开调停工作。不过，现在呼吁的对象已经转向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了。

11 月 23 日，在北京的印度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了英国的建议：举行和谈解决朝鲜问题。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却提出要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在一起。② 周恩来则在内部报告中则把这个建议称之为美国通过英国发出的“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③ 实际上，英国的建议并非为美国所鼓动。杜鲁门总统因战场上的失利正在气急败坏地威胁要使用原子弹，英国政府则为此忧心忡忡，艾德礼首相不得不宣布要亲自赶到华盛顿安抚美国人。④ 在这种气氛下，联合国内外围绕停火问题的活动也骤然升温。12 月 1 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贝内加尔·劳在纽约找中国特别代表伍修权，提出立即停火和设立非军事区的建议。12 月 2 日，加拿大政府照会美国政府，指出美国政府要盟国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是不明智的，只要存在可能性，那么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的大门就必须敞开到最后一分钟。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年，第 112–114 页；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王希荣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第 659–660、665–669 页。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 31–33 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105–106 页。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Korea*，Washington D.C.: GPO，1976，pp.1261-1262；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 年，第 472–474 页。

12 月 3 日，尼赫鲁又要劳氏向联合国提议，在谈判设立非军事区和停火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参与商讨。印度驻美大使甚至向记者透露，尼赫鲁有意来华盛顿参加杜鲁门与艾德礼的会晤。①

美国人婉言谢绝了印度的要求，却认真为英美首脑会谈做了准备。由国务院起草而经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改和签署的美国政府立场备忘录提出：只要条件不是难以接受，在目前情况下设法停火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如果停火是在三八线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但这样的停火安排不得附有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如果联合国军出于军事考虑而不得不撤出朝鲜，则联合国必须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制裁中国。② 看来，美国虽因初败有些惊魂未定，但还不想认输，所以一方面同意停火谈判，一方面又把条件提得很高。不仅如此，美国也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将中国置于被动地位。12 月 5 日，联大指导委员会以 10 票对 2 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1 票（印度）弃权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考虑中国干涉朝鲜的问题。第二天，联合国大会通过决定，在议程中增加了关于中国干涉朝鲜这一新项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六国（古巴、厄瓜多尔、法国、挪威、英国和美国）提出一个经过修改的指责中国干涉朝鲜的决议案，寻求在联合国大会得到通过。苏联则有针对性地再次提出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的建议。③ 在联合国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印度等十三个中立国家开始策划新的议案，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通过调停结束战争。然而，毛泽东此时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二、毛泽东决定打过三八线再谈停火问题

对于中国出兵的条件和目标，斯大林和毛泽东最初的设想都是以三八线为界限。1950 年 7 月 5 日斯大林第一次谈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时，就限定了一个条件：在“敌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候。④ 7 月 9 日刘晓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时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1340，1359.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1348-1349，1371-1372. 参见《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 477–478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22–323、329 页；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 670–671 页。

④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31，л.79。

也说道，万一美军反攻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帮助朝鲜人民“把美帝国主义驱逐出去”。[①] 后来在洛东江一线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时，毛泽东几次暗示中国愿意出兵，换上朝鲜军服，协助人民军作战。但斯大林始终没有认可，至少其表面理由是时机未到。[②] 10 月 1 日联合国军兵临三八线，在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斯大林再次提出，中国军队“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③] 这就是说，中国的责任首先在于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电报后立即做出反应，他在 10 月 2 日起草的回电中确认，中国既然出兵，就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同时准备美国向中国宣战，而初期只是“在北朝鲜的适当地区”进行防御作战。[④] 10 月 3 日凌晨，周恩来通过印度大使警告美国政府，外国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不得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就要出兵。至于朝鲜战事，周恩来提出，“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⑤] 在这里，周恩来不仅突出了三八线的政治地位，而且明确指出了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冲突的途径。这一看法与斯大林不谋而合。

10 月 5 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劝其出兵，并对国际局势分析说，只要中国出兵与美国“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其军事基地”。[⑥] 其实，此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只是寄希望于同苏联空军一道阻击美军北上。得知苏联空军暂不出动的情况后，10 月 14 日，毛泽东略微调整了作战部署，即避开美军，只打南朝鲜军，并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坚守待援。[⑦] 最后，在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空军不会入朝作战的情况下，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中国陆军依然按计划出动，但作战目标就比较含糊了：“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

① 转引自刘统：《中共对朝鲜战争初期局势的预测与对策》，《党的文献》2001 年第 6 期，第 52–53 页。

② 关于中国出兵情况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 年第 1 期，第 51–65 页；《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31 期（2009 年 5 月），第 165–198 页。

③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39–540 页。

⑤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 13–16 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67–68 页。

⑥ 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 7 卷，第 909–912 页，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56、558–561 页。

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①] 不过，几天后当毛泽东发现敌情的变化在军事上对志愿军发动突袭有利时，便及时指出：当前“是争取战机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志愿军应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并发动进攻，争取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以转变朝鲜战局。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只要能够对敌军实现各个歼灭，就有“迫使美国与我外交谈判之可能”。[②] 战斗打响后，周恩来向国内干部解释说，中国出兵就是要使战争“局部化”，“争取美帝国主义知难而退”。[③] 总之，中国出兵的最初战略目标就是在朝鲜北部打击美韩军队，并迫使美国接受调停，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

然而，当战场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时，中国对停战和谈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 11 月 13 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特意加写了一句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11 月 18 日又电告彭德怀：“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④] 一种轻松、乐观的心态跃然纸上。斯大林的贺电也助长了这种情绪，他以苏军战胜德军为例断言，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军队必将成为“完全现代化、装备精良、威力强大的军队”。[⑤] 12 月 3 日，即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时，为解决中朝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金日成。[⑥] 在分析战场形势时，毛泽东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为有力量。美国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同意在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这个谈话第二天被电告志愿军前线指挥官。[⑦] 显然，毛泽东此时对结束战争方式的考虑仍然是以和平谈判为主，不过条件是美军主动撤回或被打回三八线。当然，首先是在战斗中大量消灭敌人，才能在有利的条件下促成停战谈判。

因为斯大林一直很重视三八线的存在，所以，接受停战谈判的时间和条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7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75–577、588–589 页。

③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92 页，另参见第 102–109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658、672 页。

⑤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5.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02–103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388 页。

中国还要征求苏联的意见。12 月 4 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胜利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答复：“由于朝鲜局势出现了对美国人不利的转折，现在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鉴于这种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① 12 月 5 日，伍修权在纽约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并告知，在与赖伊会见时，瑞典、英国和其他国家代表“企图弄清中国军队是否停留在三八线以及中国军队是否准备在其余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同时离开朝鲜”。② 接到伍修权等人的同样电报后，周恩来于 12 月 7 日凌晨回电，首先向他们明确指出“现时三八线的界限已不存在”，至于谈判内容，“正在考虑中，容后电告”。③ 与此同时，周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发出特急电，向莫斯科通报：联合国秘书长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近来不断探询中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其意图在于“保持以三八线为界”。为了掌握主动，并在和谈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通过伍修权向他们提出如下五个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如果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在采取行动之前，想知道苏联政府的意见，并希望当日得到答复。④

当晚 8 时 40 分（莫斯科时间），葛罗米柯发出了斯大林的答复电：“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斯大林建议，中国只需表明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态度，同时要求联合国和美国首先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⑤ 周恩来收电后即刻告诉毛泽东：这个电报表明，斯大林的意见“与主席考虑相合，拖而不摊为上策”。⑥

---

① АПРФ，ф.3，оп.65，д.515，л.35-37.

② 转引自编委会：《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 年 10 月 –1951 年 12 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第 264–26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599–600 页。

④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7-19.

⑤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20-21.

⑥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06 页。

于是，周恩来在 12 月 8 日电告伍修权和乔冠华，“关于谈判问题，你们仍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不给他们以侦察的机会，不向他们过早摊牌”。随后，周恩来告诉他们该如何答复进一步的询问，其要点和使用的言词与斯大林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①]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等十三国建议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三、十三国停火建议与中国的最初回应

12 月 7 日下午，潘尼迦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转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印度代表十三国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战的建议。潘尼迦说：印度政府的基本建议是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中国当然为全权参加者。大国会议的先决条件是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战，然后进行商谈，讨论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及建立独立统一朝鲜的问题，同时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问题。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郑重考虑，宣布愿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并保证不越过三八线。鉴于章汉夫提到朝鲜人民军解放平壤的消息，潘尼迦说：“我个人对朝鲜军与中国志愿部队的力量并不怀疑，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必须由政治协商来解决，军事行动只能延迟问题的解决，即使能把美军赶出朝鲜，但日本离朝鲜很近，仍可从日本继续来轰炸。”因此，你们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这正是使朝鲜问题能在照顾朝鲜和其他邻国利益的情况下，获得和平解决的机会。章汉夫仍坚持：和谈的前提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潘尼迦则指出：撤兵确是一个办法，因为把军队打出朝鲜不能解决问题而反会加深危机，但这一目的只能通过谈判来达到。潘尼迦最后说：这一建议是所有非欧洲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这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举动，如果中国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获得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②]

12 月 8 日，印度参赞考尔要求再次会谈，以补充昨天潘尼迦的谈话。考尔主要说明了印度建议的急迫性及提出这一建议的动机。考尔说，不能认为这个建议是支持美国或与英美有关的。这一建议在团结亚洲各国和动员世界舆论上有很大作用，甚至得到了法国的支持。这是亚洲国家的第一次联合建议，这些国家包括了除

①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125 页。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 34–37 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 103 页。

泰国等反动政权以外的所有亚洲国家。道义上的胜利比军事上的胜利更为重要，美国支持的六国提案就是想争取道义上的胜利，获得联合国的支持。考尔还坦率地指出：只要中国同意十三国建议，则美国支持的六国提案就不会通过。反之，除印度外，其他亚洲国家恐怕会因此而倒向美国。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印度参赞的话，接待考尔的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不客气地提出了几个质问：十三个提案国为什么不公开反对美帝侵略？为什么不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撤军？为什么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不发表宣言反对？考尔一一给予耐心解答，并坦诚地指出：在军事上占优势时进行谈判不但不表示中国的软弱，反而正是对中国有利的时机，希望周恩来早日接见潘尼迦大使，表明中国的态度，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①

直到 12 日与苏联商妥后周恩来才会见潘尼迦，周说：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急愿知道美国和联合国对停战条件的整个意见。至于三八线问题，早已为美国侵略军所破坏而不复存在了。第二天，周恩来将谈话情况电告伍、乔，并特意指出，关于三八线不复存在的说法，可以告诉劳氏。周还指示，如果问到对十三国提案的立场，答复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其对停战条件的意见。②

中美交战以后，美国决策层在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一直意见纷纭，犹豫不决。如前所述，12 月 4 日美国曾设想在体面的条件下进行和谈。但在 12 月 8 日举行英美首脑最后一次会谈时，情况有了变化。在听取了前方的最新情况汇报后，杜鲁门舒了一口气，“他不认为我们将被逐出朝鲜”，形势并不像“会谈开始时那样暗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也认为，靠目前兵力和正常轮换，完全可以在朝鲜守住，现在“至少不必被迫进行谈判”了。③ 同一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对印度代表说，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建议，也没有要任何人提出此项建议。不过，倘若有人提出，美国将予以考虑，只是不得附加任何政治条件。④

第二天，这个建议便出现了。12 月 9 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收到了由菲律宾递交的十三国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立即停火；中国和美国军队撤离朝鲜；美舰撤出台湾海峡；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监督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 6 个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 40–43 页。

②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35–636 页。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1472.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1482.

联合国成员国组成一支不超过 5 万人的部队留在朝鲜维持治安；海港、边境由联合国视察员进行视察，以保证上述条款的执行；实现停火后 6 个月由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主持选举；选举后 3 个月，联合国部队撤走。① 11 日，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十三国建议。国防部长马歇尔指出了美国接受停火的两难困境：一旦停火就会停止所有空中侦察，并且可能会迫使美国海军撤退。如此，共产党方面就可以大大增加地面援助。但如果美国反对停火，又会被认为是在反对和平解决冲突。最后，会议确定接受停火的原则是不得使美军处于军事上的不利地位，不得附有政治条件，应在停火前谈妥停火的细节，由联合国监督停火。为了应付国会的指责，会议还决定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②

面对意见纷纭的国际舞台和各种政治压力，提出和平建议的十三国发生了分歧。12 月 12 日，原来建议的内容被一分为二后正式提出，第一提案（十三国）是“切望立即采取步骤防止朝鲜的冲突扩及其他地区并终止在朝鲜境内的战事，然后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依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求得现存问题的和平解决”。委托大会主席组织一个三人小组，“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的基础，并尽速向大会提出建议”。第二提案（十二国，菲律宾退出）是要求由联合国大会建议，美、苏、英、中、法、印度和埃及七国政府代表尽早举行会议，拟定建议案以便根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远东现存的问题。14 日，联合国大会以 52 票赞同、5 票（苏联及东欧国家）反对、1 票（中华民国）弃权，通过了十三国提案，并建立起三人停火委员会（又译三人小组或停战委员会），由联大主席安迪让、印度代表劳和加拿大代表皮尔逊组成。十二国提案暂被搁置。随后，停火委员会开始工作，联大休会，直到停火委员会提出报告为止。③

12 月 14 日下午，考尔向中国通报了联合国决议的情况。这位参赞说，第一个提案已经通过，第二个提案的内容是召开国际会议商谈停战地点、设立非军事区及关于朝鲜、台湾和远东的一般问题。这两个提案不但完全考虑了中国的意见，更超过了中国的要求。提案中的台湾问题和一般远东问题是潘尼迦大使电告了中国的意见后，由印度政府特别加入的，希望能动员各国支持和同情中国。这对中国是完全有利的，希望中国能了解该提案的目的及印度政府用意所在，早日做出圆满答复，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1500-1503.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1520；《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 498–501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31 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89 页；《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 671 页。

而不使印度在支持中国意见时处于为难境地。如果中国方面能在最近表示同意的话，印度政府可进一步推动。否则，印度政府可能放弃。陈家康表示对印度提案没有意见，但反复要求美国应首先对提案表态，主要是对解决朝鲜和一般远东问题的意见，否则"问题就无从谈起"。考尔表示，印度将继续向美国施加压力，印度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求美国同意举行会议的原则"，"如会议上美国所提条件无法接受，则可由世界舆论制裁"。由于陈家康一再回避表态，考尔最后说："现在联合国大多数已通过十三国提案，中国如失去这一机会则美国可能利用舆论来指责中国不要停战。"[①] 同一天，周恩来致电伍、乔，对他们将在 16 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稿提出修改意见，其重点在于揭露美国赞成在朝鲜"先停火再和谈"的阴谋诡计，并告知招待会后他们即可回国。[②] 显然，此时中国已决心拒绝十三国提案。

12 月 15 日下午，潘尼迦再次求见章汉夫，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联合国通过的提案，并进一步解释印度等国的立场。章汉夫重申了中国的要求，潘尼迦表示，印度也希望先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然后解决朝鲜问题。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其具体办法似需双方先行停战，然后具体布置撤兵程序"。章汉夫坚持："美国不停止其侵略，不从朝鲜和台湾撤兵，则和平解决只是口上谈谈而已"。潘尼迦强调："要外国军队撤退朝鲜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打下海去，一种是以和平方式撤退，双方和平撤军应先停战，商定何时何地停战。"章汉夫指出：联大通过了十三国提案，而把十二国提案搁置起来，其结果就是便于美国利用所谓停战，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发动进攻。潘尼迦解释说，"国际政治是错综复杂的，不能以一般逻辑和几何学的原理来解决"，现在的困难在于双方都坚持不下，印度为了东方的和平，希望双方能坐下来商谈。[③] 印度的努力毫无结果，同一天，周恩来要中国驻朝鲜代办柴成文转告金日成，"同意对安理会来电置之不理"。[④] 16 日下午，周恩来电告伍、乔，要他们向劳氏和联大主席直接表明态度：先停战后商谈的做法，只能适合美英集团的要求，是虚伪的停战，中国绝不同意。[⑤]

12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专论，批评联合国 14 日通过的决议是为美帝国

---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 48–52 页。

②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42–643 页。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 55–58 页。

④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58 页。12 月 12 日赖伊向朝鲜政府转达了十三国的信函，并要求回电予以确认。金日成提出应与北京商量如何答复。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ф.5，оп.918795，д.124，л.667-668。

⑤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63–664 页。

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因为美国侵略军在惨败溃逃的情况下，正在争取喘息的机会，以便保存侵略的阵地，而联合国大会的建议正是符合美国侵略者的这个愿望的。[①] 19 日，三人委员会又给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说，委员会正在推动召开十二国议案所提出的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国际会议，但要使会议开成，首先需要实现某种停火的安排。[②] 20 日，伍修权回国前在伦敦机场发表讲话：中国的提议“是一个真正停止战争的方案”，但安理会不予考虑。美国“别有用心地支持在朝鲜‘首先停火’的主张，企图借以欺骗全世界人民”，其目的“只是为了束缚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的手足，让美国军队继续侵略和扩大战争”。[③] 22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全面批驳了联合国的议案，进一步阐明中国的立场，并号召亚非国家必须抛弃“三人委员会”及先停战后谈判的想法。[④] 毛泽东在修改这一声明时，在谈到中国关于和谈条件的地方特意加了两条：美军撤出台湾、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说“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⑤] 听到这一消息，三人委员会陷入一片混乱，劳氏垂头丧气，一声不吭，皮尔逊则溜之大吉，索性回国了。[⑥]

四、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与联合国停火议案的提出

既然中国的既定方针是越过三八线再考虑和谈问题，那么美国对停火议案的态度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在周恩来组织外交部官员和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应付停火议案的同时，毛泽东集中精力考虑的是如何指挥志愿军打过三八线。

尽管志愿军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小。特别是因为朝鲜战场的制空权仍然掌握在美军手中，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面临极大的威胁和困难。[⑦] 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减员已达 10 万多人（其中冻伤 5 万余人），部队体力削弱，病员增多，第 9 兵团因冻伤严重至少 2—3 个月无法参战。全军物资

① 《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17 日第 1 版。
②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90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53–354 页。
④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84–689 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417 页。
⑥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 190 页。
⑦ 苏军参战空军部队报告：直到 1951 年初，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95，л.138-147。

供应短缺（汽车仅剩 260 辆），战士缺衣少粮（还有人打赤脚）。[①] 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 12 月 8 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如第二次战役后期能歼灭美李军各 2 个师，志愿军即可越过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否则，“即使能越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彭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部队进行补充休整，来年春天再战。[②]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彭电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朝联军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③] 周恩来则请毛泽东“考虑战略意图与战役计划的结合”，并建议将进攻汉城的“决战攻势”推迟到 3 月初进行，否则兵员、铁路、炮兵、空军都来不及准备。与各方面进行商谈后，周恩来于 12 日致函毛泽东说，如不能在离汉城不远地区寻机歼灭几部分敌人，那么，不论敌固守或放弃汉城，我军均应休整一个时期。[④]

但是，毛泽东主意已定，他在 12 月 13 日给彭德怀的回电中认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超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故决定，此役需南进到开城南北地区，寻机歼敌。如敌固守汉城，则志愿军主力退至开城一线休整，同时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如敌放弃汉城，则在平壤汉城间休整。[⑤]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志愿军总部 15 日决定派 6 个军向三八线以北攻击前进，以求在汉城以北歼灭一部美伪军，得手后再看情况。18 日志愿军党委发出了关于完成第三次战役任务的指示，在解释立即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的必要性时指出，敌人现在的唯一办法是“依托三八线作为缓兵之计”，“表面求和”，“拖延时间”，实际上是“加紧重整残部，企图反攻”。[⑥]

尽管命令已下，彭德怀仍有担心。他在 19 日致电毛泽东，谈到战场形势说：两次大胜后，速胜论和盲目乐观情绪有所增长，苏联大使和朝鲜方面均要求速进。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军转入防御后，战线缩短，兵力集

---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63 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56 页；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 62 页。此时，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虽已经大部移交给中国，但尚未运到前线或装备部队，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88-189。

②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16 页。

③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 740 页。

④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15、625–628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722–723 页。开城在三八线以南，距汉城 55 公里。

⑥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55 页；《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175–176 页。

中，纵深加大，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估计敌人不会马上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方针，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现已遵示越过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①] 22 日，彭德怀又转去志愿军副司令邓华的信。邓华估计，如第三次战役能歼灭更多美军，则敌人可能被迫谈判求和或撤出朝鲜，但敌已有两次经验，且兵力集中，故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应作长期打算，甚至建议志愿军主力撤回东北休整，留两三个军配合人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②]

其实，毛泽东也意识到了志愿军的困难。在 21 日给彭德怀的回电中，他承认彭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因此“必须作长期打算”，也同意如进攻“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③] 在 24 日和 26 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肯定“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强调“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不过，此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既没有三八线的概念，也抛弃了和谈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困难只是暂时的，部队休整是“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从策略上讲，越过三八线后暂停进攻，“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是为了让敌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为此，毛泽东还强调，休整时要“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要树立“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的观念。至于三八线，如同毛 29 日电所说：“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④] 由此看来，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并非受到来自平壤或莫斯科的压力，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战略考虑。这种考虑，已经预示了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命运。

中朝联军发动新的攻势后，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 年 1 月 3 日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劳氏代表报告说，因中国政府认为所有未经其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决议均为非法的、无效的，三人委员会“现无法提出任何建议”。随后，政治委员会宣布休会两天。[⑤] 1 月 5 日三人委员会请求再给予一些时间，以便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新建议。政治委员会同意了这一请求，而美国代表则宣称，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56–457 页。
② 邓华给彭德怀的信，1950 年 12 月 20 日。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16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731–732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733、734–735、741 页。
⑤ 《人民日报》，1951 年 1 月 8 日第 1 版。

他的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①] 1 月 11 日政治委员会复会，皮尔逊代表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包括五项原则性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会议接着对这一报告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在会上一反常态，奥斯汀发言表示，美国政府将投赞成票。经过两天的讨论，13 日下午进行表决，结果是 50 票赞成（包括美国）、7 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及国民党）反对、1 票（菲律宾）弃权。苏联和波兰发表声明说，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未邀请中国和北朝鲜的代表参与讨论。随后，会议又表决通过了挪威的提议：立即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一提案，并要求其说明是否承认以报告中所列举的原则作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基础。[②]

作为新的停火建议，这五项原则在满足中国的要求方面超过了联合国以往所通过的任何方案，而且是在美国明确表态后交给中国的，特别是该提案建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包括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及台湾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与 12 月 22 日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几乎是完全符合的，而根本无视美国反对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一再要求。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接受这个“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

实际上，美国是迫不得已才接受这个停火建议的。从内心讲，美国政府是不愿意接受停火的，因为这将使民主党政府在国会和选举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共和党议员就不断批评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军事形势恶化后，共和党议员把外交政策作为主要攻击对象，使得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中连连失利，席位大幅下降。如果政府接受这个使美国蒙羞的建议，必将遭受更加猛烈的指责。[③] 事实证明，美国投票赞同三人委员会建议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报刊和两党议员纷纷责难艾奇逊，要他引咎辞职。共和党领袖塔夫脱

---

①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1 年）》，吕佩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第 461 页。

② 详见《人民日报》，1951 年 1 月 18 日第 4 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67–371 页；*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Korea and China, Part 1*，Washington D.C.: GPO，1983，pp.64、76。

③ 详见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钱宗起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62–167 页。

称这个决议是“美国曾经同意过的最彻底的投降”。[①] 但是，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又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甚至引起亲密盟国的强烈不满。因为三人委员会的这个补充报告，实质上就是十二国提案的翻版，特别是英国对此显得十分热情。1月4—12日，英国在伦敦召集了英联邦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出路。会议发表的联合宣言提到，“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理解那些看起来和我们存在意见分歧的人”，“我们欢迎旨在与斯大林或毛泽东进行坦诚的意见交换的任何可行的安排，并将不遗余力地去倾听彼此的心声”。会议公报则表示：英联邦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们殷切期望，政治委员会正在讨论的新的提议将会使远东地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②]

的确，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艾奇逊所说：“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同意这个议案将使朝鲜人失去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就在杜鲁门左右为难时，艾奇逊出了个主意，他建议美国对此投赞同票，因为根据此前中国政府对十三国议案的立场，很可能中国也会拒绝这个决议。果真如此，不仅美国将摆脱困境，还会让盟国的头脑清醒起来，并追随美国谴责中国。[③] 于是，杜鲁门决心进行一次赌博。

五、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及其策略考虑

果然不出艾奇逊所料，中国又一次拒绝了联合国提案。1月13日赖伊向周恩来转达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并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接受这些原则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基础”。[④] 其实在1月11日联合国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报告时，中国就得到了消息，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一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备忘录向苏联征求意见，13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⑤] 收到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后，毛泽东原计划召金日成和彭德怀到北京共同协商，后又委托周恩来把备忘录修改一下，发给金

---

① Robert Leckie，*Conflict:The History of the Korea War, 1950-53*，Cambridge: Da Capo Press，1996，p.254.

② H.J. Yasamee and K.A.Hamilton（eds.），*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I，Vol. IV，Korean，June 1950-April 1951，London：HMSO，1991，CAB21/1780：(Microfiche 10）No.108i，10/1-30.

③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伍协力等译，第381–382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3–00068–01，第1–2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71–373页。

⑤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日成征求意见。[①] 14 日周恩来发出的致朝鲜政府备忘录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停战问题的立场和策略。备忘录指出，目前美国由于在朝鲜的失败，急于谋求出路，最好是光荣停战，否则就是有限战争。只要先停战，美国就有可能保存潜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我们拟拒绝先停战后谈判，并主动提出下列主张：1、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后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2、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海峡撤退及远东有关问题。3、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予以确定。4、七国会议的地点提议选在中国。如果上述提议在联合国中引起变化，他们可能提出先实行有限期的停战，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暗示在七国会议举行后，可以先讨论限期（1—2 个月）停战问题。如此议被接受而举行谈判，则谈判不成我军可得到休整两三个月的机会，期满再战，同时又能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如此议不成，其咎在彼，更不影响作战。周恩来还说明，上述提议已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和支持。[②] 彭德怀 15 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备忘录提出的方针。同马歇尔一样，彭德怀也注意到暂时停火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好处，他特别指出："限期至 3 月底不会妨碍朝鲜作战，反而有益，减少敌机活动，便利进行各项准备"。[③]

目前没有看到反映北朝鲜态度的史料，但想来金日成对此是赞同的。1 月 17 日，周恩来致电政治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并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决议"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因为这"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不管谈判的议程和内容规定得如何，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则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同时，周恩来提出了备忘录中提到的四条反建议。[④] 当天，中国外交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递交了周恩来的电文，周恩来还接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第二天，章汉夫分别接见了英国谈判代表胡阶森和丹麦公使穆克，欧非司司长宦乡接见了瑞典大使阿马斯顿，向他们解释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的理由。仔细阅读这些解密不久的记录，有助于进一步

①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8 页。

② 周恩来致柴军武电，1951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17 页。

③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67 页。

④ 《人民日报》，1951 年 1 月 18 日第 1 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73–374 页。

理解双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和策略。[①]

首先是对“先停战后谈判”原则的理解，这是中国反对联合国决议的主要理由。潘尼迦解释说，印度及其他国家对这一建议的理解不是文字上给人的那种印象，这里的意思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在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以结束战事”。周恩来答复，“我看谈判的条件是存在的”，具体实现停战当然必须通过谈判。“谈判的目的在于停战”，“在谈判中必须谈到停战的条件，甚至在谈判过程中就停战”。（章汉夫的用语是：“可以在谈判里谈停战问题，停战也作为谈判的一部分”。）潘尼迦接过来说：按照中国的说法，“谈判也就是假定了停战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我一定报告政府并敦促全力支持”，但是其他人没有如此的机会与阁下面谈，可能因为中国的答复在这一点上说得不明确而产生误解。所以，他希望中国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立场。从这几个谈话记录的文字表达可以看出，中国对联合国议案中“停战谈判”的涵义已经有所理解，但仍然坚持“先谈判后停战”，其本意就是要先答应中国提出的政治条件，再谈停战问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国际舞台表达意见的方式，按照潘尼迦的建议，中国不应首先表示反对联合国的决议，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应该首先表示原则上接受联合国的决议，随后再提出修正方案，如此就有了回旋余地。

针对中国文件中“先停战是美国政府为了取得喘息时间”的说法，胡阶森说：这是中国一向的看法，但是英国政府并不如此认为。“英国政府认为停战并不会造成联合国军队再行战争的条件，英外交部曾有许多电报给我谈此事”。就是说，一旦这个提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美国再想发动进攻，绝非易事。但章汉夫仍然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就是要争取一个喘息的时间。在这里，中国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且不说美国是否需要“喘息”，根据英国代表的说法以及联合国的程序，可以想见，作为投赞成票的成员国，面对已经通过的联合国决议，美国出尔反尔所遭遇的困境想必远远大于它在投票时的尴尬局面。

中国反对联合国决议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决议的讨论（这也是苏联反对的理由）。潘尼迦解释说，这个建议是“提请中国考虑的谈判基础，如果中国同意则正式协商”。联合国作为交战的一方，不可能先征求中国的意见，然后再提出建议。周恩来有些退让说，“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我们没有把联合国看为作战一方”。问题是中国在联合国应有合法地位，而这种合法地位至今未得到承认，“因

① 这些谈话记录分别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3-00068-01，第26–34、35–37、41–45、38–40页。以下引文不再出注。

此我们随时要提醒这一点”。周恩来说的是实情，也是中国关注的重点，由此便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先召开七国会议，并指出会议召开本身就意味着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中国一再强调停火是美国人的阴谋的说法，潘尼迦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美国是同意这一建议的，但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建议，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一建议。”这个说法进一步证实了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谈到的美国面对联合国决议的为难境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人了解到，停火议案并非是美国人有意鼓动或主动提出的。从周恩来的回复——“事情并不常常合乎美国的设想”——可以感到，他对此似乎已有所领悟。

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地点，潘尼迦一再提出“必须选择一个有中立性的地点，使与会者自在而不感觉到为难”，其中提到了香港、开罗和印度等地。周恩来坚持认为，“这一会议是要解决东方问题，因此在中国最为适宜”。显然，这一点是不合情理的，以至瑞典大使在外交部看到中国文件时就自言自语地说：“嗨，在中国开会！这怕人家不能同意吧！”

从周恩来起草的备忘录以及上述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种种理由均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英、印等国代表作出解释后，其真正原因是毛泽东并不打算进行停战谈判，至少现在还不是时机。占领汉城后，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关于全军休整的意见，并支持彭德怀顶住了金日成和苏联顾问要求继续南进的压力。[①] 然而，如前所述，毛泽东（包括彭德怀）这样安排，并非是想就此罢手，而是考虑如何为下一次决定性战役做好充分准备，以彻底打败美军。第三次战役结束时，1 月 8 日志愿军党委下达了关于休整期间任务的指示：今后的中心问题在于全党全军努力克服困难，充分准备，总结经验，提高战术、技术，争取在下一战役开始后，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这就是下一战役的奋斗目标。[②] 1 月 14 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反复强调，为春季攻势做好充分准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最后性质”的作战，“保障最后胜利”，在 4-5 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对未来战局的基本估计是：一、敌军“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二、“敌人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

① 详见 Shen Zhihua，“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pp.9-24。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192 页。

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第二天，毛泽东向斯大林转发了这份电报。[①] 既然联合国军迟早要退出朝鲜半岛，既然在几个月后志愿军就会大获全胜，为什么现在要进行停战谈判？所以，中国反对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而坚持先谈判（实际是谈政治条件）再考虑停战的方针。

六、中国错失了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

中国政府的答复，当然令白宫喜出望外。[②] 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抓住这一机会死不撒手，从而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

1 月 17 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政治委员会就周恩来的复电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并驳斥中国所谓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是有意让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因为志愿军可以归入朝鲜军队的序列。奥斯汀还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应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③] 20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宣布共产党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众议院投票时，几乎是全体一致通过。四天以后，参议院表决同一决议案时，也是无一异议。[④]

周恩来的声明在很多国家产生了不良反应。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从文件看中国政府并非彻底拒绝联合国的决议，印度代表劳氏在政委会发言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答复不是对三人委员会原则的正面拒绝，而是“部分接受，部分拒绝，部分要求解释，部分则是一套反建议”。而中国的这些反建议，“显然有再加讨论与谈判的余地”。但中国的做法却引起了三人委员会另一个成员的不满，皮尔逊发表声明宣称，“北京拒绝联合国之建议，即关闭了解决远东诸问题之途径”。甚至一向支持接收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英国也公开表态，“同意谴责中国支持侵略者的干涉行为”，尽管它不主张在现阶段采取新的重要决定。[⑤]

显然周恩来也意识到中国处理这一事件的策略失当，为了争取世界舆论，中国

---

①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3.

② 1 月 17 日，正当艾奇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遭受抨击而一脸沮丧的时候，忽然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艾奇逊看后如释重负，立即显得神态自若——纸条上写着：中国拒绝了五点方案。《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 195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77–381 页。

④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 197、201 页。

⑤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6-00049-02，第 21–23 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82–384、384–388 页。

外交部以答复印度大使的方式，于 1 月 22 日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方案，主要内容是：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后，并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将负责劝说志愿部队回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可分两步进行，首先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其次，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必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① 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不会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解释的机会和空间，周恩来的努力淹没在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

1 月 22 日，格罗斯在纽约宣布，美国的对台政策要取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坚决主张，将来有关台湾的任何会议，都必须有国民政府参加；对于中共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从未作过任何承诺。② 显然，格罗斯的强硬声明反映了美国当局做出的最后决定，其目的就是阻扰和打消各方面继续进行调解的念头。1 月 24 日，十二个亚非国家联名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由美国、埃及、苏联、印度和中国举行一次会议，以便中国对联合国 1 月 13 日决议的答复做出一切必要的澄清和补充。③ 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政委会于 30 日否决了这一提案，决定不再听取中国的解释。相反，在美国的鼓动和策划下，联合国大会终于在 2 月 1 日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④ 不过，与美国的外交计谋相比，真正使中国陷入困境的，是美军在战场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志愿军接连击败联合国军的情况下，美国最初确实考虑过撤军的问题。还在第三次战役发起之前，12 月 29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向麦克阿瑟和负责朝鲜地面部队的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发出指令：只有在不会造成巨大伤亡的情况下才应该继续组织防御，否则就要做好从朝鲜全面撤退的准备。这种考虑主要是出于两点：第一，从目前的情况估计，中共的军队有能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第二，从美国的总体战略出发，朝鲜不是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⑤ 但李奇微接管美国地面部队的指挥权后发现，其实美军并没有重大损失，只是士气不振，惊慌失措。此外，他还总结出志愿军的致命弱点，即由于没有后勤保障和现代化装备，中国军队的连续进攻最多能维持一个星期。所以，他认为美军是有能力守卫现有阵地

---

① 《人民日报》，1951 年 1 月 24 日第 1 版。

②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 200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88–389 页；*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Part 1*，pp.130-131.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391 页。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pp.1625-1626.

的，并表示决不撤离朝鲜半岛，甚至打算立即组织反攻。①

第三次战役打响后，李奇微本来是准备坚守三八线和汉城防线的，但由于联合国军防御部署的失误是把韩国军队摆在第一线，美英军队置于第二线，结果，韩军的不战而退导致全线动摇和溃败，李奇微不得不下令全线撤至汉城以南组织防御。②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又开始考虑从朝鲜撤军的问题，并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去前线，与麦克阿瑟商议。然而，两位参谋长视察前线部队后认为，局势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实际上，经过整顿的第八集团军士气高昂，阵容齐整，而李奇微已经于 1 月 15 日开始了试探性反攻。相反，“中国人由于补给线太长，显然已落到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的地步”。17 日返回华盛顿后，他们向白宫报告了这一情况。③ 1 月 20 日，麦克阿瑟也宣告：“没有人能把我们赶下海去，本司令打算在朝鲜保持一个军事阵地，只要联合国的政治家们做出决定，我们一定要这样做。”④

经过试探和准备，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停火议案以后，1 月 25 日，李奇微集中地面部队及全部炮兵、坦克部队（总兵力约 25 万余人），在空军支援下，发动了全线进攻。⑤ 其结果，不仅彻底破坏了中朝联军休整和准备再战的计划，而且使印度等国试图继续呼吁停战谈判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在联合国发动进攻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正如志愿军党委 1 月 8 日报告所言：“战斗单位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⑥ 因此，彭德怀与金日成、高岗等协商后，于 27 日致电毛泽东：如敌继续北犯，我保持桥头阵地甚困难，可否放弃汉城、仁川，由北京播发中朝联军拥护限期停战，北撤 15—30 公里的消息。⑦ 28 日毛泽东回电，否定了彭德怀的建议，理由是“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所以，毛反而要求中朝联军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消灭 2—3 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地区。此后休整 2—3 个月，再发动“带有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毛泽东的决定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

---

① 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第 99–107 页；《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222 页。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173、179–182 页；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第 108–109 页。

③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 386 页；《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 520–521 页；李奇微：《朝鲜战争》，第 119–120 页。

④ Leckie，*Conflict:The History of the Korea War,* p.255.

⑤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222–223 页。

⑥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190 页。

⑦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69 页。

支持。[①]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对敌方战略意图、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战局发展趋势，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给敌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联军进军三七线以南的作战目标根本无法达到。相反，联合国军不仅攻占了仁川、金浦和汉城等战略要地，而且全线突破中朝联军的阵地，再次进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在随后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然打过三八线，消灭了敌人几个师，但没有达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役目标，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则于 5 月 20 日发起全线反击，中朝军队被迫撤退，并遭受极大损失。[②] 最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双方均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开始考虑停战谈判问题。

对于志愿军的致命缺陷和严重困难，彭德怀心里最清楚。1951 年 2 月 21 日彭专程回北京，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有所触动，因而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③] 3 月 1 日毛泽东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做了说明，并告知：“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④] 到 5 月下旬，彭德怀深感战争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他于 26 日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长期性感到厌倦，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对战争能否取胜产生怀疑，某些干部甚至违抗命令，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现象相当严重。[⑤] 据聂荣臻回忆，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战争的前景，多数人主张“应停止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其理由如聂荣臻所述：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好接受。[⑥] 这就是说，中国对战争目标的设定和结束战争方式的考虑，又开始转回到最初的立场。

但此时莫斯科和平壤还在幻想继续作战。5 月 29 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说：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金日成则在 30 日致函彭德怀提出：决不能预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亦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454–455 页；АПРФ，ф.45，оп.1，д.337，л.44。

②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228–238、254–268、305–358 页；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第 185–193 页。

③ 《彭德怀年谱》，第 480 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 151–153 页。

⑤ 《彭德怀年谱》，第 498 页。

⑥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 741–742 页。

战争，并建议6月底或7月初发动总攻。[①] 为此，毛泽东邀金日成于6月3日来到北京，并说服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②] 斯大林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主意的，他在接到了北京转来的毛泽东、彭德怀关于作战困难的几封电报后，于6月5日回电，坚持“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而要继续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③] 毛泽东只好在6月5日晚再次致电斯大林，讲述中国在战争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并表示希望让高岗和金日成向他当面汇报和请示。[④] 6月10日高、金抵达莫斯科。在会谈中，斯大林一再追问，中朝方面的意图和愿望究竟是什么？得到的明确答复是：我们的愿望是停战。于是，这次会谈确定了停战和谈的方针。[⑤] 接到斯大林6月13日关于同意停战的电报后，毛泽东要求高岗和金日成继续与斯大林会谈，解决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毛认为，由于战场形势不利，中国和朝鲜目前都不便提出这个问题，最好由苏联政府出面试探和调解。至于停战的条件，毛泽东主动要求不再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台湾问题也只是作为筹码而已。[⑥] 至此，毛泽东终于明白，中国已经失去了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实力地位。

结论：对几个争议问题的看法

通过对历史过程及其中一系列前因后果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关于1950年底和1951年初中国拒绝停战谈判决策的是非功过，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

一、既然十三国提案和联合国停火议案不是美国策划安排的，那么把这些提案说成是美国的阴谋就没有任何根据了。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原来的十三国建议被分为两个提案，但是正如印度大使所说，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如果中国同意了第一个提案，特别是施展一些外交技巧，则十二国提案是完全有可能通过的。至于三人委员会的停火议案，就更是违背美国意愿而提出的。美国之所以表示赞同，完

①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8-99；金日成给彭德怀的信，1951年5月30日，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00页。

②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1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355页；2000年9月12日笔者采访柴成文记录。

③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6，10-16，24-25.

④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3.

⑤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506-508页。

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31-32，57-60.

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阴谋，那么也不是议案本身，而是赌博性地对议案投了赞同票后等待中国的拒绝。应该承认，正是因为中国拒绝了该议案，才使美国的阴谋得逞，并把自己的被动地位转移到中国一边。其实，真正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国军队，而是中国军队。所以，退一步讲，即使中国不接受十三国提案，至少也应该接受三人委员会的停火议案。

二、如果中朝联军打到三八线时接受停火建议，或者打过三八线以后即接受停火议案（甚至主动退回三八线），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在政治上，中国挽救了北朝鲜，履行了所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从而大大提高了自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在外交上，中国敢于单独出兵与美国作战，完全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也为中苏同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适时地开始停战谈判，也一定会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军事上，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反帝信念已经得到充分展示。此外，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这确是停战谈判的最佳时间。①

三、那么，在苏联、朝鲜和美国都不愿停战谈判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能够坚持停战谈判的立场，即使接受了联合国的建议，是否存在真正实现停火谈判的机会。不可否认，战争中的同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选择，毛泽东被迫同意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和决心出兵朝鲜，与此都不无关系。但是，中国参战后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同盟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事实证明，1951 年 6 月转而采取停战谈判的立场，以及在此前后其他一系列重大决策中，都是毛泽东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并最终得到苏联和朝鲜的认可。② 所以，毛泽东如果想停战谈判并坚持己见，在同盟内部是可以取得一致看法的。美国也确实不甘心停战谈判，但美国指挥的是"联合国军"，在法理上，其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批准，而联合国批准再战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退一步讲，即使美国不顾一切再次挑起战端，中国也将在各方面处于上风，且不说在道义和舆论上已赢得国际支持，就是在军事方面，中

① 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彭德怀为什么冒犯毛泽东说：打过三八线"实际上政治意义不大"。《彭德怀年谱》，第 460 页。

② 参见 Shen Zhihua，"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pp.9-24.

朝联军也能够利用短暂的时间恢复元气，补充给养，整装再战。

四、最后，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真正原因何在？毛泽东最初设想的军事目标，即把联合国军赶过三八线，逼迫美国停战谈判，是比较客观的，也符合他所设想的政治目标。但战争初期取得的军事胜利不仅鼓舞了莫斯科和平壤，也令毛泽东改变了原有的战略方针，虽然在把握进攻的时间上谨慎一些，但还是确定了一个超越中国现实能力的军事目标。打过三八线已属冒险，还要继续作战把美国人赶下海就更是力所不及了。从军事角度讲，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志愿军处于强弩之末的时候，犯了一个超越“进攻顶点”的决策错误。[①] 这一决策，不仅在于超越了既定的政治目标，还在于超越了自身的现实条件。由此而言，中国所犯的错误及其原因同 4 个月前美国的致命决策如出一辙。此外，缺乏外交知识和国际斗争经验，无疑也是中国未能把握良机，利用军事以外的手段实现其原有战略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发表于《外交评论》2010 年第 4 期

① “进攻顶点”是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概念，他解释说：“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三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第 833 页。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对日和约问题与朝鲜战争一样，都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它不仅涉及美、苏、中等战胜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的关系，而且标志着东亚冷战格局的最后形成。各国学者历来都很重视对日和约问题，不过，研究的角度大多是从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同盟国政策变化及政治思考出发的。[①] 从铁幕的另一边——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原因主要在于缺乏相应的史料。冷战结束后，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公布，关于苏联、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渐渐露出全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涌现。[②]

---

① 就笔者所见，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Michael Yoshitsu，*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85；Howard Schonberger，"Peacemaking in Asia：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ist China，1951-1952"，*Diplomatic History*，10：1（Winter 1986）；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淑雅：《杜勒斯与对日媾和中的台湾问题（1950–1952）》，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1996年；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以及崔丕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新作《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② 这方面的研究自然是从俄国学者开始的：*Славинский Б.Н.*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 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1；*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Россия-Япония, Обречены н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а и заметки историка，Москва：ПИМ，1996；*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процесс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и КНР с Японией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提交"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1997年）论文。使用俄国档案材料参与讨论的还有：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张盛发：《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与此同时，冷战国际史学界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随着史料的发掘，在原有课题——如战争起源、国际背景、核威慑以及战役进程等继续深入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对另一个重要问题——停战谈判越来越感兴趣。[①]的确，朝鲜战争历时3年多，其中大约2/3的时间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这种现象在国际战争史上是罕见的。[②]于是，许多研究者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既然交战双方认识到战争已经无法继续，而寻求以和谈方式结束冲突的途径，那么为什么又都迟迟不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达成和解？

至于对日和约与朝鲜战争的关系，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最终下决心改变了对日和约的方针，[③]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和约与战争之间还有一层关系，即美国改变对日和约方针以及对日媾和实现后，朝鲜战争双方相应地修改了自己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立场和对策。也就是说，对日和约签订的方式和结果，成为朝鲜停战谈判一再拖延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不仅促使美国全面改变了其亚洲政策，而且扫除了美国决策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最后障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于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向杜鲁门总统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

---

① 关于停战的问题，1996年1月在"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上，有3位学者提交了相关的论文，即 Chen Jian，"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K. 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1950-53"；F. 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Moscow，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其后，还有一些研究涉及这个问题，如 Conrad C. 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 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3，No2，June 2000；*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柴成文：《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牛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关于越南战争停战的巴黎和谈进行了不足4年（1969–1973），而整个战争长达9年（1964–1973），相对而言，还是朝鲜停战的谈判过程显得特别漫长。

③ 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刘维开：《蒋中正与中日和约的签订》，提交"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上海，2004年）论文；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

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①] 于是，美国海空军和陆军在战争爆发3天后陆续参战；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借机侵入中国台湾海峡。

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现出来。战争使日本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授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他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计划，要求把警察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并装备美制武器。[②] 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从东京回国不久便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第二天又强调了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③] 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并签署了联合备忘录，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④]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日媾和问题立刻在华盛顿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一番秘密的串联和准备，10月26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⑤] 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将割让给苏联；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

---

① CCS 381，Formosa (11-8-48)，sec.3，JCS Records，RG 218，in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83-284.

② 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93页。

③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6, Far East and Pacific*，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1243，1247-1248.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6*，pp. 1278-1282，1293-1296，1297-1304.

⑤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Япония，c.43. 另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的报道。

位，更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强调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①]

此时的朝鲜局势极其微妙，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请求和催促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派兵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求胜心切的美国人只管埋头北进，直到10月底与中国军队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战争，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却是心中暗喜。对于美国提出的媾和建议，莫斯科没有急于答复，一方面是等待战局出现明显的转化，一方面也是为了听取北京的意见。

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危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中苏的同盟关系此时显得尤为紧密。开放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此期中苏双方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往来的大量文件，可以证实苏联驻华使馆一秘贾丕才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盟国，当时中苏就与对日媾和有关的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②] 例如，1950年3月麦克阿瑟宣布提前释放正在日本执刑的主要战犯，苏联在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前通知了中国。周恩来于5月12日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并于苏联声明发表的第二天见报。[③] 又如，同年9月1日中国人向莫斯科通报了关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在台湾谈判的可靠情报。据情报说，美蒋就台湾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应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岛上将长期驻扎美军，由第七舰队负责封锁台湾海峡。[④] 这次美国正式提出对日和约建议，苏联自然要与中国进行协商。

美苏代表会谈后，苏联即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中国通报了美国建议的内容，同时送来苏联的答复草案。在苏联备忘录中译本文件上有周恩来的批示：“下夜罗申送来此件，系美政府交与苏联的。苏联尚未置答。请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苏联的备忘录措辞委婉，口气缓和，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建议表示任何反对意见，而只是提出了6个问题“希望得到解释”。备忘录最后提出，“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将采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6*，pp.1332-1336；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p.108；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页。

② *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1996，с.123-124.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22-01，第1–8页。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④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с.49-50.

取何种方法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①] 对于苏联的答复，中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②]

11月20日，马立克就是本着上述态度去会见杜勒斯的。按照美国人的记述，马立克一开始就“谈笑风生，讲叙苏美两国间的友谊和理解”，与上次会谈公事公办的姿态不同，这次苏联人似乎是要营造一种友好气氛。例如当马立克问到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讨论持何立场时，杜勒斯回答说，“迄今的会谈是外交会谈，因此美国是与本国承认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举行讨论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很明确的，但马立克对此未作反应，而是转移了话题。以致杜勒斯在会晤后感到，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代表权问题上，不必过于顾忌苏联。[③] 按照贾丕才的说法，莫斯科这是有意对媾和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④] 究其原因，显然与当时朝鲜战局的变化有关。斯大林不想过早地与美国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在马立克微笑的背后，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鲜战场传来进一步令人振奋的报告。

此时，中国军队已经取得了初战胜利。毛泽东对战争进程显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⑤] 这与斯大林的主张不谋而合。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在的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⑥] 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声明指出，北京“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⑦] 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

---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1，第1–10页。

② 除了翻译的措辞，后来公开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当时得到的草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6*，pp.1352-1354.

④ *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c.124.

⑤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5页。

⑥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35–636页。

⑦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54–357页。

已。

中国当然也考虑到利用朝鲜战争促进台湾和对日和约问题的解决。就在国际社会要求停战的一片呼吁声中，12 月 7 日北京时间 3 时，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并告知：近来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等国不断问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于不利地位，并意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提出以下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苏联政府的看法。在当天的回电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停战条件，而且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又不让中国马上宣布这些条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汉城之后，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①]

看来，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鲜战场的主动权后，才肯认真与美国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因此，对于 12 月 27 日美国国务院的答复，莫斯科只是转抄了一份给北京，而没有做出任何公开反应。[②]1950 年 11—12 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次战役把美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五角大楼和白宫都沉浸在日益阴郁的气氛中，甚至讨论了全面撤退的问题。[③]随后志愿军便打过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此时，联合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且提出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得到苏联的同意后）接受 1951 年 1 月 13 日联合国提案，进行停战谈判，不仅能够稳定住朝鲜战场的有利局面，也将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在台前的中国和在幕后的苏联都没有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当 1 月 17 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已是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不得不败退三八线以北。[④]朝鲜战局再次出现逆转，对日媾和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朝着与中苏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

①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639、641 页。

② 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 13–20 页。

③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 333 页；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Korea*，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1324-1328.

④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342–368 页。

二、美国为实现对日媾和而拖延停战谈判

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态度强硬起来。3 月 12 日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根据雅尔塔协定，“日本应当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让给苏联”。华盛顿的回答是：“美国认为准确地界定千岛群岛的边界应当是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的议题或者应当由国际法庭来作出法律裁定”。[①]在 3 月 30 日美国再次递交给苏联大使馆的照书中，不仅重复了有关托管日本几个岛屿及承认日本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等条款，而且强调，不参加本条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特别是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只提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但未提其归属。尽管对于雅尔塔协议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表面上仍采取承认的立场，但条件是“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准条约的情况下才会生效”。[②]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美国曾努力促使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因为这符合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长远利益。[③]这种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还在递交照会之前，杜勒斯在 3 月 21 日国务院讨论和约时就指出：“如果苏联拒绝条约的规定，我们考虑从和约中完全删除有关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条款”。对此，4 月 24 日杜勒斯与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谈话时说得更加透彻：条约草案中关于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条款“套用了雅尔塔协定的字句”，是因为美国“知道苏联不会参加对日媾和条约，所以不想改变雅尔塔协定的原文，给苏联以拒绝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借口”。[④]由此看出，美国实际上知道苏联不愿就范，甚至希望如此。

苏联确实不愿意在这种状况下签署对日和约。朝鲜战局的再次变化使斯大林颇为失望，随即对美国的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明确立场。不过，此时莫斯科能够指望的只有日共和中共。

---

① *Кошкин А.* 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 в войну с Японией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2000，№12，c.58.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6,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908；*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c.84.

③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89.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6*，pp.942-94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 199 页。

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坚决抵制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和驻军政策，并接受暴力革命的路线。1951 年 4 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国的德田秋一和野板参三等日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在斯大林的帮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检讨了过去的看法，承认“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并制定了新的革命纲领。[①]6 月 13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为日共的新计划提供 1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并委托苏联情报委员会转交日本共产党。[②]

同时，苏联开始与中国磋商如何抵制美国的媾和方案。5 月 6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苏联对媾和问题的立场：指责美国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要求条约草案中应明确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反对把琉球群岛及日本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必须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苏联政府建议在 7—8 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起草对日和约，其内容应规定：日本不得结盟以反对曾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和约签订后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任何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等。毛泽东当天回电表示完全赞同。[③]5 月 7 日，苏联外交部将“苏联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交给美国驻苏大使。5 月 22 日，周恩来正式向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具体建议。[④]5 月 24 日苏联全文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文件。[⑤]6 月 10 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美国，指责美国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并重申必须于 1951 年 7 月或 8 月召开包括所有参加对日作战国家代表出席的和会。[⑥]6 月 25 日，朝鲜外务省也向苏联递交了照会，声称“无论是在准备条约的程序方面，还是在条约的目的和实质方面”，朝鲜“完全赞同和支持苏联政府对日和约的立

① 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1945–1953, 提交“冷战在亚洲”学术讨论会（香港，1996 年）论文。关于斯大林与日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还可参见有关的回忆录，*Дырхаев Н.А* Встреча Сталина с японски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0，№2，с.140-144。

② 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89，оп.50，д.3，л.1。

③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755–756、757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74 页。

④ 《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 358、360、361 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3，第 86–87 页。

⑤ 《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25 日。英文本见 MF2527245-0990，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⑥ 参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第 95、100、107 页；*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7。

场”。[①]

就在华盛顿急于实现媾和而苏联明确表示抵制美国方案的时候，朝鲜战场的形势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陷入了僵局，双方都表现出和谈的意愿。[②]6月5日，重返国务院担任顾问的凯南与马立克讨论了停战谈判的可能性，苏联表示了急切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图。引起凯南注意的是，马立克在会面时根本没有提到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远东国际事务问题。凯南判断，这也许表明苏联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决这些更为广泛的远东问题。[③]美国人猜测的不错，苏联确实希望先实现朝鲜停战，再解决对日和约问题，这样会对中苏一方更为有利。而美国的策略则是针锋相对——先实现对日媾和，再谈朝鲜停战问题。

军事上占有优势，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军事优势，美国不仅迫使日本政府承诺不与新中国缔约，而且逼迫英国政府接受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参加多边和会”的立场，从而结束了英美围绕中国签约权的纷争。[④]7月3日美英制定出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不过，在敦促尽快召开和会的同时，美国还必须采取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拖延停战谈判。显然，如果此时朝鲜停战达成协议，远东地区出现和平局面，而中国和苏联成为“和平功臣”，美国就很难拒绝北京参加对日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⑤]于是，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断为和谈制造难题。尽管中朝方面步步退让，在确定谈判程序和划分停火线等问题上都大体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国仍然不断制造事端，如8月18日联合国军发动夏季攻势，8月19日停战谈判中朝方军警遭到武装袭击，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来凤庄中朝代表团驻地等等。[⑥]结果，开城谈判不得不于23日中断，而这正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如此，当美国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给苏联代表时，莫斯科已经被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

① АВПР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0102，оп.7，п.25，д.2，л.26-31。

② 相关的俄国档案见《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77–786、804–811、835–840页。

③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29–630页。

④ 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78–81页；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第32–35页。

⑤ 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美国报刊都看得十分清楚。见斯通：《朝鲜战争内幕》，第286页。

⑥ 参见《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941–100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44–155页。

美国政府于7月6日递交给苏联的（共同草案）备忘录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指出，这个经过修改的草案已经“体现了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盟国基本上能够接受的条件”，并将于7月20日左右分发给所有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苏联政府的意见。更使莫斯科感到气愤的是新草案在领土条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还提到日本应该向苏联归还南库页岛及其毗邻岛屿，移交千岛群岛，而在7月3日的草案中只谈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和要求，却丝毫没有提到其归属问题。不等苏联答复，7月20日，美英两国大使同时拜访苏联外交部，递交了美英联合照会、关于参加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国际代表会议的邀请函、和约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关文件。照会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础上召开的，美英政府请求告知，苏联政府是否接受这个邀请。尽管在照会中建议对和约草案提出意见，但同时又声称，不管有何意见，最终文本都将在8月13日予以公布。美国大使柯克还在口头声明中强调，召开国际会议不是为了制定条约，而只是为了签署8月13日公布的草案。[①]

斯大林确实为难了：参加会议无疑意味着向美国低头，拒绝出席又将处于外交上的孤立境地。面对这个难题，苏联政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该出席旧金山会议，但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会中，又说明了苏联不能参加这次会议的理由。经过反复考虑，8月10日联共（布）中央做出了决定。与1947年出席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的方针如出一辙，苏联的立场是：出席旧金山国际代表会议，同时批评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别是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参加会议，争取通过这些修改意见，否则将拒绝签署条约。随后，苏联于8月12日向中国通报了这一立场，并解释说，苏联很难拒绝参加上述会议，但保证将在会议上提出必须邀请中国代表的问题。[②]不久，苏联又向中国政府通报了关于日本赔偿和限制其武器规模的建议。[③]对于苏联决定，中国显然是理解的。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印度政府是否出席旧金山会议，当然由印度自己决

①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89-91.

②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91-93, 95.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6–7页。

定。如果印度参加会议而能始终坚持原来主张，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①]

三、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旧金山会议的过程十分简单，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苏联代表葛罗米柯首先发表了关于对日和约建议的演说，提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就不能讨论对日和约。遭到拒绝后，苏联代表又提出了关于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美国同样不予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波兰、捷克等国代表表示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②] 中国人似乎早已预见到和会的结果，并事先准备了关于旧金山和约的声明。9 月 3 日旧金山会议尚未召开，周恩来就在一次报告中宣称，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会议。[③] 差不多与旧金山签约仪式同时，北京时间 9 月 7 日晚，中国外交部就把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声明文本交给了苏联使馆。[④]

就在旧金山和约缔结 5 个小时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署了已经准备就绪的日美安全条约。12 月 24 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压力下致函蒋介石，建议缔结和约。此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于 1952 年 4 月 28 日，即旧金山和约生效前 7 个半小时，签订了“日华和约”。[⑤] 至此，美国人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其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接下来便要着手解决朝鲜停战的问题了。然而，在远东外交舞台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苏联和中国，却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表现出异常强硬的立场。

由于拒绝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苏联的对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首先面临的就是撤消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还在和约生效前，苏联外交部已经估计到这方面可能出现麻烦，但没有可以采取的积极措施，只能等待。1952 年 2 月 21 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报告说：对日和约在各国相继获得批准后，美国将公开宣布撤消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为此，苏联驻东京的代表建议，“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撤销一切与占领有关的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71 页;《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 362–364、366–367 页。印度和缅甸最后因不赞成美英条约文本而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c.9。

② 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 368–386 页；*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98；*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c.9。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78 页。

④ *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c.130.

⑤ 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 393–394 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 105–110 页。

机构”，“同时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但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样一个正式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撤销1945年12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因此，苏联只能在美国采取行动后，发表一个谴责性声明。葛罗米柯还提出，由于“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应“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又建议，应事先向中国通报此事，说明这并不改变苏联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立场。[①] 但即使在建立贸易代表团的问题上，从策略考虑，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现得过于积极，而要等待日本方面采取主动。[②]

1952年4月23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停止活动。美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也致函秘书长，提出在和约生效后解散远东委员会。无可奈何的苏联代表除了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谴责美国外，没有任何举动。[③] 同日，日本政府代表发表声明声称，“由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解散，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驻日美军司令部则通告苏联代表处，自和约生效时起，苏联外交使团即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为此，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赶快停止使用无线电台，“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在此之前，为防止可能的意外苏联外交部和军事部已经指示代表处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④] 后来苏联人发现，“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实业界都希望“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方面，期待着苏方的倡议，一方面通过日本实业界进行了非正式探测。苏联外交部感到有机可乘，便提出苏联代表基斯连科不应急于回国，而必须保持与日方的接触。[⑤]5月2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⑥] 然而，苏联的意图再次受挫。或许是受到美国的压力，5月30日，日本

① 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2月21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2118–2127页。

② 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2月23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以下简称《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131–132页。

③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吴世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85页；《人民日报》，1952年4月30日。

④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4月26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37–139页。

⑤ 详见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5月17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43–145页。

⑥ 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5月20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46页。

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代表团已经丧失其合法地位。尽管提出了抗议，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连科及其大多数随员不得不离开东京。[①]

更令莫斯科头疼的是日本为美军生产武器的问题。随着对日和约生效，盟军总司令部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②]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但苏联对此却无能为力。3月20日苏联外交部报告，盟军司令部3月12日批准日本政府可以生产武器弹药及军舰和飞机。为此，基斯连科认为应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但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议。第一，苏联曾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的陆、海、空军部队，并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针对美国人提出的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被利用攻击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③]两天后，联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见批准了给基斯连科的指示。[④]

至此，除了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苏联对远东问题的影响力已经彻底丧失。在9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十票对一票支持日本要求成为会员国的申请后，马立克使用了否决权。[⑤]对于台湾问题，中苏所能做的也只是延长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⑥]在外交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苏联和中国决定奋起反击，而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只有朝鲜战场。在那里，中国和美国毕竟还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斯大林唯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谈，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立即转而推动朝鲜的和谈，1951年10月5日美国大使柯克约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递交的声明中华盛顿强调，“朝鲜问题是当前需要立刻解决的最尖锐和最危险的国际问题”，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而言，“朝鲜停战谈判具有重大的意义”。[⑦]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

① 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6–487页。

②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100页。

③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3月20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33–134页。

④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1952年3月22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35页。

⑤ 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7页。

⑥ 斯大林在1952年9月与周恩来会谈时明确指出，苏联延长租用旅顺口，是因为“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同时强调，只要日蒋和约存在，“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222、1227–1232页。

⑦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058–1061页。

开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①] 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12 月 28 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②]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不怕拖的思想。[③]1952 年 1 月 14 日和 15 日，毛泽东又指示李克农，一定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并"主动积极反击敌人"。[④] 当谈判双方在第三项议程中争执不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准备在是否允许中方修复机场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并提议与中朝方面进行高层会谈。[⑤] 而中方的态度却更加强硬。2 月 24 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⑥]

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前后不到两个月，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由于部队轮换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而得到加强，或许完全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强硬立场得到了莫斯科的鼓励和支持。当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时，[⑦] 斯大林颇为赞赏，他 2 月 3 日致电毛泽东说，"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⑧]

4 月 28 日，即对日和约生效的当天，停战谈判双方举行了"秘密"会议。美方在会上提出：以中朝方面在战俘问题上接受美方"自愿遣返"主张和不提名苏联

---

①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 181 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07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265–266 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49、54–55 页。

⑤ JCS 91600，From JCS to Ridgway，10 Jan.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沃尔特·赫姆斯：《美国兵在朝鲜（第一卷）：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81–182 页。

⑥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20 页。

⑦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8，*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 с.104.

⑧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151 页。

为中立国为条件，美方放弃对修建机场的限制。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中朝方面应同意撤回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要求。5 月 2 日，中朝方面对应地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以全部遣返战俘和在机场修建问题上美方放弃干涉朝鲜内政为条件，同意只提双方均能接受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为中立国。至此，使第三项议程谈判拖延不决的最后两点分歧实际上已得到解决。由于在此之前进行第五项议程谈判的小组已经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只要第四项议程，即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朝鲜和谈就可以结束了。[①] 然而，就在双方起初认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战俘问题上，停战谈判却进入了死胡同。

自 1951 年 12 月 11 日第四项议程的谈判开始后，中美双方的交锋逐渐展现出一幅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画面，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无限期休会。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既有出于心理战的考虑，也有影响国际舆论的意图。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扭转在远东由于对日媾和完成而出现的被动局面。

美国倚仗其军事优势，试图通过狂轰滥炸及核讹诈逼迫中朝方面让步。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金日成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条件，因为在朝鲜看来，通过谈判争回的战俘人数，远远不及美国空军轰炸造成的伤亡人数。为此，金日成在 1952 年春指示朝鲜谈判代表南日提出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了“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②] 毛泽东则竭力劝说金日成，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战争也将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使其不断蒙受损失，这保证了苏联的建设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③] 毛泽东的这番话自然表达了斯大林的心声，在对日和约问题失利以后，鼓动和支持中国人在朝鲜战场坚持下去，是苏联在远东唯一可以对抗美国的手段。

8 月 20 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满口答应给予中国全面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战俘问题上，斯大林也支持中国的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而且，他非常赞同毛泽东看法：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

---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27–230 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 203 页。

②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7-158，*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с.104；《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152–1153 页。

③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187–1189 页。

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还极力主张，"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①]在9月4日与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强调：不要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也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②]在此期间，美国参联会与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商讨试图解决战俘问题的种种方案。[③]但是，无论美国人想出什么花样，只要不放弃自愿遣返原则，全部释放战俘，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那么，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④]克拉克以及白宫和五角大楼再也无法忍受中国的僵硬立场，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以表现出"联合国和美国立场的坚定性和尊严"。[⑤]10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宣布，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⑥]

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尽管已经感到必须结束战争，而且中方也一再做出让步，但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这时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苏联和中国却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发表于《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

①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200–1204页。

②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216页。

③ C 51562，From Clark to JCS，8 July 1952；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页。

④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8–249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89–290页。

⑤ 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 1952；JCS 919368，From JCS to Clark，25 Sep.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页。

⑥ 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开始解冻。详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1953 年朝鲜停战

——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1953 年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共和党在阔别白宫 16 年后推出艾森豪威尔重登总统宝座，最著名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引起东西方严重冲突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结束了。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 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① 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谈判僵局中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但是人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结束这场战争的，还是苏联新领导人迎合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② 本文试图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阐释在 1953 年朝鲜实现停战的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罗斯玛丽·福特有详细的介绍，见 R. Foot，"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Diplomatic History*, Vol.15, No.4, 1991,（中译文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② 在笔者参加的"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1996 年 1 月）上，有 3 位学者提交的论文谈到这个问题，见 Chen Jian，"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K. 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 1950-53"；F. 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 Moscow, 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 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进一步搞清楚导致战争结束的原因问题，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出现。

一、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①] 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

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②] 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③] 但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者中断"，而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④]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

① 到1951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时仍然相信，有关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见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 д.342, л.16-19。

②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 оп.8, п.35, д.10, л.157-158。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с.104。

③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2月8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42, л.81-83。

④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 ф.0102, оп.8, п.35, д.10, л.157-158。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с.104。

1952 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①] 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②]

根据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金日成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对美国让步，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除了担心人员伤亡加重、经济建设受阻以外，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背景，即他也主张扣留南朝鲜的战俘。据后来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北朝鲜扣留了 13094 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 6430 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 42262 人。[③]

看来问题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决。1952 年 8 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

① 拉祖瓦耶夫 1952 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 ф.0102, оп.8, п.36, д.11, л.19。转引自 *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с.104。

②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 年 7 月 18 日；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1952 年 7 月 17 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43, л.65-68，72-75。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③ 朝鲜停战后，金日成在访问北京期间曾与毛泽东商量怎样处理留下来的战俘问题，毛泽东认为现在交出战俘已经晚了，恐怕会给美国人提供谴责中朝方面违反停战协定的证据，金日成对此表示赞同。金日成向苏兹达列夫表示，朝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将留下来的战俘分散安置在国家的北部地区，并防止他们逃跑或与监督执行停战协定的中立国委员会建立联系。АВПРФ, ф.0102, оп.9, п.46, д.14, л.2；п.50, д.67, л.59-60，转引自 *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с.106, 108。

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第一可以打退敌人进攻，第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第三还可以发动进攻。总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①]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反而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项草案，建议应

①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 91-101。日本学者和田春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1952年周恩来访苏时，朝鲜要求停战，苏联也想停战，但中国不愿停战，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见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 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提交“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但作者没有为这种说法提供档案依据。马斯特尼持有另一种笔者不能同意的看法，他认为周恩来去苏联是要表达中国和朝鲜企求停战的愿望，而斯大林坚决反对；他甚至认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去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也是为了劝说斯大林实现停战。见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7-148。

获准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暂时居住在其他国家，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对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保证。该议案遭到苏联拒绝。维辛斯基在发言中提议先实现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但必须依据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11 月 17 日印度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比较接近中国第二方案的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双方应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 90 天后，仍未遣返的全部战俘应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 月 28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对于联大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印度提案，12 月 15 日新任联大主席皮尔逊收到了周恩来的否定答复。中国断言这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并敦请联大撤销该决议，呼吁恢复板门店谈判，而谈判必须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①] 由于周恩来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国和印度有人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因为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②] 从目前中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的，至于没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泽东的态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谬"的，且已在联合国通过，故对于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议的要求"无答复必要"。[③]

此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不是解决战俘问题，而是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11 月 24 日，总参作战部在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中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原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时间估计在"明年 3 月下旬解冻以后"。12 月 4 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也分析说：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进一些，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杜勒斯任国务

①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2）》，吴世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第 440–442, 445–44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70、273 页。

②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2 年 12 月 1 日、16 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 230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547、624 页。

卿则会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请求增兵，并对侧后登陆很感兴趣。报告对志愿军的状况进行分析后断言，已经“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对此，毛泽东指示，“应肯定敌以 5 至 7 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 5 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 4 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此时，总参谋部又接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美军将在 1953 年 2 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通报中还列举了驻日美军总部索要北朝鲜东西海岸地图、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调动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国再增派 4—5 个师来朝的情况。这一情报更增强了中国备战的决心，毛泽东 12 月 9 日电令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日，彭德怀召集会议研究防敌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并将朝鲜铁路的修建与改善，国内新兵动员，以及辽东、山东两半岛的设防等具体部署报告毛泽东。12 月 11 日毛泽东批准了有关部署，指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总参谋部随即要求志愿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并应“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①] 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只要战胜“侧后冒险登陆”，美国“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又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彭德怀也向部队宣布：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③] 面对联合国军前线部队的大量增加，[④] 中国对和谈已失去兴趣，不仅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45–348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 638–639、632、640–641、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331–33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305 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72–273 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538 页。

④ 1953 年 1 月美国调整部署，在前线增加了 12 个韩国师和 8 个师的联合国部队，总兵力已达 76.8 万人。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第 228 页。

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①] 至 1953 年 1 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 25 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等措施。为此，毛泽东要求苏联满足 1953 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②]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③] 所以，苏联有义务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国有所不同，他在 12 月 27 日的复电中认为，1953 年春季美国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中军人的计划，而艾森豪威尔上台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尽管如此，但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应做最坏的准备。至于在 1953 年 1-4 月供应 624 门各式火炮和 235.5 万发各种炮弹的要求，斯大林说这超出了苏联的供应能力，因为按原计划苏联应在 1953 年向中国提供 20 个师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已有 1320 门火炮和 80 万发炮弹。不过，考虑到中国所说的情况，斯大林答应 1953 年再增加供应 332 门火炮和 60 万发炮弹。毛泽东在 1 月 4 日电报中同意按此数量供应，但要求必须在 1—4 月，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年内平均提供。1 月 15 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只是把 20 个师装备的供应推迟到 5 月开始。[④]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报告，中国将派出海军部队到朝鲜作战，并要求在 2 月份即提供 18 艘鱼雷快艇，60 门岸炮，103 架飞机。斯大林回电赞同中国出动海军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18 艘鱼雷快艇、34 门岸炮、83 架飞机），并答应补派 3 名海军航空兵顾问。[⑤] 考虑到苏联战后的经济实力，斯大林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满足中国的请求，也算是尽力而为了。当然，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的一致性。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79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 31 页。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 359 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 年 12 月 17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105-114。

③ 不仅毛泽东在前引电报中如是说，周恩来也曾谈到：作为和平民主阵营“头号国家”的苏联没有参战，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和平建设，使它更加强大起来，更加成为无敌的力量。《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296 页。

④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 年 12 月 27 日，华西列夫斯基和索科洛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3 年 1 月 12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3 年 1 月 15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115-116, 133-135, 137。

⑤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3 年 1 月 7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3 年 1 月 27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125-128, 139。

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

显然，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及时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① 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③

至于和谈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乔冠华等人2月19日对局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还估计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苏联出面。④ 对于2月22日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来函，志愿军谈判代表丁国钰请示是否给予答复。由于对美国的举动是有意表示让步，还是因即将召开联大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一时无法做出判断，况且战场形势对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上有所松动，毛泽东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⑤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⑥ 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随即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二、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⑦ 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

①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8–372页。

② 苏兹达列夫1953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 ф.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Корее, оп. 9, п. 46, д. 14, л. 40-69。转引自 *Вольхова 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1950-1953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4，с.129；《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8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41页。

④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256页。

⑤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80页。

⑥ 2月24日，彭德怀在军训部关于入朝部队实施三个月战斗训练计划的报告上批示：“入朝新兵训练以80%的军事、20%的政治训练为妥。”《彭德怀年谱》，第544页。

⑦ 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此时他得到的情报分析是："美国军事领导人并不相信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如果使用原子弹而又不能确保美国取得真正的绝对优势，那么轰炸将损害美国的声望。此外，这样做将会使美国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为威慑力量的重要性。"① 就在与美国记者谈话发表以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时明确表示，他对印度试探在朝鲜进行调停的努力不感兴趣，梅农还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看见斯大林在一张纸上胡乱涂画了一群狼，并喋喋不休地说农民应该杀死这些狼。② 2月28日，斯大林又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要"争到底"。③ 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④ 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苏联政策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⑤ 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

---

① 情报委员会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关于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1953年1月31日，АВПРФ, ф.0595, оп.6, п.13, д.769, л.223。转引自V.Zubok, and C.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76。

② 见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p.166。

③ 德·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张祖武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632页。

④ 1953年3月5日《人民日报》。

⑤ 俄国学者的论文中披露了许多这方面的档案材料，可参见*Безыменский Л.* Завещание Сталина?//Новое время，1998，№14；*Зубкова Е.*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1953）//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9，№3，№4，№6；*Медведев Ж. А.* Секрет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

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1953 年 3 月 1 日斯大林再次中风，当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确认他已经不会再康复[①]的时候，于 3 月 5 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②]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如同贝利亚在他管辖的内务部范围内实行改革一样，[③]在国内政策的农业问题、乌克兰民族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处理东欧和德国问题，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南斯拉夫、芬兰和奥地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针正在悄然兴起。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过去有著作认为，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④]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⑤]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⑥]这些说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没有人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鲜问题竟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

---

① 关于斯大林死亡之谜，近年俄国学者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论证。参见 *Медведев Ж. А.* 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0，№1。

②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1953 年 3 月 5 日，АПРФ, ф.2, оп.2, д.196, л.1-7。转引自 Источник，1994，№1，c.107-111。

③ 有关苏联内务部改革情况的档案文献，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④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49 页。毛泽东确曾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与苏联新领导人交换过意见以后的事情。

⑤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99–300 页。

⑥ 关于这种意见的最新表示，见 Conrad Crane, “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 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3, No2, June 2000, pp.84-85。

托夫。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此外，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①] 莫斯科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与斯大林的乐观态度不同，苏联新领导人在大量情报评估的基础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冷战措施“作了最坏的设想”。[②] 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并没有征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见。

周恩来在启程赴苏“专程吊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中，的确列入了要同苏共领导人讨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内容，[③] 不过，从后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情况看，此时中国尚未考虑提出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周恩来 3 月 8 日抵达莫斯科，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后，3 月 11 日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④] 但在这次一般性会谈中，双方没有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尽管当天马林科夫发表的讲话提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⑤] 但很可能当时苏联尚未确定采取新方针的具体步骤。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直到 3 月 14 日，拉祖瓦耶夫才将克拉克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信函发给莫斯科。[⑥] 显然，苏联领导人这时已经开始认真研究结束战争的具体途径了。第二天苏联便明确放出改变对外政策的信号，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⑦] 3 月 18 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⑧]

而这时中国方面对于是否答复、如何答复美国来函还没有拿定主意，毛泽东在 3 月 19 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克拉克于 2 月 22 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

---

① 菲·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王南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年，第 126 页；F.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 Moscow, 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

②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154.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88 页。

④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89 页。

⑤ Правда，12 марта 1953 г.. 转引自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154.

⑥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电，1953 年 3 月 14 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58-59。

⑦ 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 618 页。笔者核对原文后对译文略有改动。

⑧ 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3 年 3 月 18 日，转引自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155。

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1] 此时周恩来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同一天，在未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已经确定了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新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部长会议决定向中朝方面发出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

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苏联领导人开宗明义地说：“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在批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苏联政府强调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贯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接着，信中提出了苏联认为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步骤：“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在随后的说明中，苏联领导人再次明确：给克拉克的答复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而“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

---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3年3月19日，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7–118页。

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在具体做法上苏联显然是考虑到了联合国此前通过的印度提案，该信指示中朝方面：“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信件最后说：“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与此同时通过的发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更明确地表达了苏联主动做出让步的立场。指令责成维辛斯基坚定地支持中国和朝鲜将于最近发表的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建议和声明。并特别要求维辛斯基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在波兰提案中谈到朝鲜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删去原提案中关于全部遣返战俘的内容，而代之以“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面消除妨碍结束朝鲜战争的障碍”。决议规定，给毛泽东的信函交由周恩来带回北京。[①]可以看出，这封信多少还带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国主义遗风。不过，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交往中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压力。

在 3 月 21 日周恩来返回莫斯科的当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人与他进行了单独会谈，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并递交了给毛泽东的信。周恩来表达了中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即利用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为，在恢复谈判问题上再拖一段时间。周恩来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这样做，“可以锻炼我们，增强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和平运动”。周恩来还认为，拖延实现停战可以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尤其是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苏联领导人则明确指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苏联方面认为，朝鲜战争继续拖延，其结果是有利于美国扩军备战，推迟其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便于美国胁迫各国服从其侵略目的。当周恩来问到美国是否仍将推行拖的政策时，苏联领导人回答说：“不能说没有此可能，因这是美国的事，权操在他手。”

① 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1953 年 3 月 19 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60-71。

但是“如我方毫不让步，美国拖的可能性就大。如我方有此让步，美国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难，有迫使其达成妥协的可能”。“这种让步，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至于“停战时机，可利用克拉克这封信”。周恩来又问：苏联信件中所说“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一切一系列办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联合国开会的时机。苏联领导人回答：“是指联合国开会期间，时间很有限。回去两三天至四五天内予以解决为好。”周恩来最后表态说：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他坚持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讨论后才能做出答复。①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电报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②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毛泽东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③

以上关于中苏领导人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方文献描

① 周恩来与苏共领导人会谈记录，1953年3月21日，转引自熊华源：《关于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恢复的情况》，在“朝鲜半岛的分裂与统一”学术讨论会（2000年10月，丹东）上的发言提纲。

②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3年3月21日，转引自《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8–119页，及前引熊华源发言提纲。

③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3年3月22日，转引自《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9页。毛泽东所说9月上旬有误，中国的三种方案周恩来是在8月22日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的（见前文）。谢明诺夫是斯大林的化名，现译为谢苗诺夫。

述的，[①] 俄国有关档案提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 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 年 3 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②] 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③] 但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国已开始调整政策。正是依从了苏联新方针的精神，毛泽东在 3 月 23 日给丁国钰发出如下电报："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电报还通知说正在准备给克拉克的复函。[④] 3 月 26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⑤]

与此同时，苏联向西方做出了明显地表示和解的姿态。3 月 21 日，莫斯科电

---

① 这与此前中国官方编写的外交史中的说法是吻合的，不过更详细，更具体了。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32 页。但如果认为会谈的结果是"一致认为中国和北朝鲜方面目前正处于在与敌人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的地位"（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44 页，则未免言过其实，因从谈话过程看，当时周并未立即接受苏联的立场。

② 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 年 8 月 9 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 оп.58, д.266I, л.122-131，转引自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3, Fall 1993, p.17。

③ 参见 K. Weathersby 和 F. 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 Moscow and 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155。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 148–149 页。

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91 页。

台报道说，苏联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 9 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①] 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又致电金日成，劝说朝鲜当局释放被扣押的法国公民 14 人，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法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给予积极回答在政治上是恰当的”。[②] 莫斯科的新方针对于朝鲜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据说金日成得悉这一新情况后“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③] 苏联特使报告说，“在 3 月 29 日的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个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他还抱怨说，“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 300—400 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④] 这后一句话，显然带有责怪中国人的意思。

的确，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 月 28 日向克拉克递交了复函；3 月 30 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还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三、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和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在中苏双方都崇尚个人作用的政治体制中，斯大林去世对于中苏关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约 500 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

① 《漫长的战斗》，第 618 页。
② 莫洛托夫致拉祖瓦耶夫电，1953 年 3 月 25 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л.94—95。
③ Н.Базанова, Самая загадочая война XX столетмя, Новое Время, 1996, №6, л.31。
④ 库兹涅佐夫、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 年 3 月 29 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л.97—99。

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在4月1日的声明中，莫洛托夫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交换病伤战俘，而且双方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以缔结停战协定和结束朝鲜战争。[①]但中国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把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4月8日又电：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②]这样部署的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

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战斗飞行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③]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志司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在5月上旬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电报指出：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条件下，我一个军攻歼敌人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军一齐动手发动一次战役反击，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造成敌内部更大的恐慌。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于4月1日复电："建议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甚好"。4月3日，彭德怀代军委拟电复杨得志、王建安，认为此时发动小规模的歼击战，对于志愿军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由杨得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4

① 1953年4月2日《人民日报》。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2—294页。

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195页；《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72、369、393页。

月 20 日邓华来电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因此，“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反击时间预定 6 月初开始到 7 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 5 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4 月 23 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 5 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①]

4 月 26 日恢复的板门店谈判，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也在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4 月 30 日彭德怀指示：应“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至于战役性进攻，如谈判无结果，在 6 月按计划举行。5 月 11 日邓华等指示各部队：板门店谈判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决，6 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 5 月 30 日前完成，6 月 1 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但是，当 5 月 13 日美方提出了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志愿军便在当天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 月 16 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②] 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直到 6 月初谈判再次恢复并达成协议，中国曾就谈判方案和发动战役的计划与苏联进行过协商。

关于 6 月 4 日恢复谈判和 8 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 1953 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 月 20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 月 21—22 日杜勒斯访问印度时，要尼赫鲁警告中国，

①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 393 页；《彭德怀年谱》，第 547 页；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 144 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347–348 页。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 395、399–401 页。

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 月 25 日美国大使会见莫洛托夫，又向苏联施加了压力。[①] 然而，这种看法未必站得住脚。华盛顿的确在积极制定核计划，但问题首先在于美国是否有意明确传递这种信息以及中国是否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伦都没有明确表示出美国有动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鲁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至于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压力，至今尚未发现此期双方有过接触的材料。而美国的档案文献表明，在 4—6 月华盛顿的指示和板门店谈判代表的报告中，都没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国提出过任何警告，其中最强硬的说法也不过是：美国将不支持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谈判。[②]

实际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当时得到了美国的警告，也完全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志愿军在 5 月 25 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 5 月 27 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对进攻目标的部署。6 月 1 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于 6 月 16 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 58 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 41000 余人。[③] 至于说到 6 月 8 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其 5 月 25 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波伦在会见莫洛托夫时有如下表白：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 5 月 7 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 3 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 2 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 4 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

① C. Crane, “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 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 pp.82-83；《漫长的战斗》，第 626–627 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730–731 页；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1952–1969）》，徐问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92 页；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刘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436–437 页。

②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335 页。

③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 406、411 页。

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 5 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1] 中国的档案文献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 5 月 7 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2]

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 月 5 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3]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 6 月 17 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 月 19 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 月 20 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 15000 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4] 6 月 25 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 20 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 2—3 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 6 月 28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5] 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 6 月 29 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 月 6 日志愿军第 20 兵团确定了 7 月 13 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 5—10 天的作战方案。翌日 16 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6]

因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只等双方代表签字了，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苏方

① 莫洛托夫与波伦会谈备忘录，1953 年 5 月 28 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6-13。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04–305 页。
③ 《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第 322 页。
④ 《彭德怀年谱》，第 553 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350 页。
⑤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 431、425 页。
⑥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 451–452、432 页。

的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 月 3 日凌晨 3 点 30 分，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转交了对克拉克 6 月 29 日来信的复函和中国政府关于“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将撇开李承晚而签署停战协定，其次是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来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并摆脱“释放战俘”问题的困扰，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愿意结束战争的。因此，尽管美国与李承晚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将采取的对策和步骤：一、准备于 7 月 5 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其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如果对方不作让步，则仍按 1953 年 6 月 17 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三、准备在 7 月 5 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并提出停战协定实施的有关问题。四、在会谈工作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该进行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并为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场所。五、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 7 月 15 日左右进行。在转交这份文件时，显然是为了让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放心，伍修权又口头通报说，李承晚所说如果美国人不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只能有限地增加对李承晚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就会采取严重的冒险行动，并且把美国也卷入其中。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中国方面估计，李承晚有可能组织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①] 虽然伍修权最后表示中方要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但实际上中国并无意等待莫斯科的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便做出决定：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②] 但莫洛托夫在复电中并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看法。电报说：“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挑拨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苏联认为，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

---

① 苏联外交部第 17286 号密码电报，1953 年 7 月 3 日，АПРФ，ф.3, оп.65, д.830, л.136-147。该电报的不同部分分别转引自 *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Москова，2000，c.280-281；E.P. Bajanov and N. Bajanova，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s，Manuscript，pp.193-196.

②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 14 号记录摘录，1953 年 7 月 4 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135。

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尽管美国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但“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① 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没有明说罢了。② 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那么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主动，并进一步争得了有利于己的停战条件。

7 月 8 日深夜，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克拉克来信所做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为之。中国同意停战谈判复会，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使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③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 18 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的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 7 月 20 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 ④ 7 月 13 日，即再次恢复谈判 3 天后，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直至 7 月 27 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 7.8 万余人，收复土地 192.6 平方公里。⑤ 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 1 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 21 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 18 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

①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1953 年 7 月 5 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148-150。

② 停战协定签字后，苏联大使与毛泽东会晤时改变了说法：“苏联领导人完全同意中国的分析，目前结束朝鲜的敌对状况的形势已经成熟了。由于军事上的原因，对方不想也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了。” E.P. Bajanov and N. Bajanova，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p.197.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13 页。

④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 453 页。

⑤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 448 页。

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1] 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2]

中国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惊受怕。不过，毛泽东当时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学者披露的情况，也未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结果：由于中国军队在谈判进程中一再发动攻势，“7 月 23 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解除了对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么时候传递给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而他本人在 7 月 23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3] 这个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国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朝鲜实现停战而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

发表于《世界史》2001 年第 2 期，略有修改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354 页。

② 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 年 7 月 29 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187-189。

③ C. Crane, “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 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 pp.84-85.

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

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就在十几年前，由于缺乏资料，关于中国介入战争的研究还是一个令国际学术界感到头疼的问题。[①]然而，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②]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③]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一、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

---

① 有国外学者表达了一种最为悲观的看法：中国的记载或者已经遗失或者将永远封存，"要想把北京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准确地描述出来，也许永远都没有可能"。转引自 M. Hunt, "Beijing and the Korean Crisis, June 1950-June 1951",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107, No.3, 1992。

② 笔者几年来收集的有关档案即有500余件，并已陆续整理汇编，均收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以下简称《朝鲜战争俄档》），未刊。

③ 有关中国出兵问题的档案文献和研究论著的详细介绍参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一书的导言。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①] 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②]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混乱不清”，[③] 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④] 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却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 日毛泽东的讲话，28 日周恩来的声明，29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 7 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⑤]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⑥] 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 1 月 5 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

---

① 艾伦·怀廷早在 60 年代就依据当时公开的资料做出了这一判断，见 Allen Whiting, *China Cre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60. 现在很多学者根据新史料支持和补充了这种观点。参见 T. Christenson，“Threats, Assurances, and the Last Chance for Peace: The Lessons of Mao's Korean War Telegram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17, No.1, 1992.

②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1994, 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③ 见 M. Hunt, Beijing and the Korean Crisis.

④ 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见《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 年第 3 期；《50 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⑤ 参见 1950 年 6 月 26–30 日和 7 月 15 日《人民日报》。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423 页。

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而在毛泽东看来，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① 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② 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 7 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 ③ 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第二，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 月 11 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 1951 年以后，到 9 月底，毛泽东甚至

① 见 1950 年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

② R. Jervis,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24, No.4, 1980.

③ 1950 年 9 月 21 日刘少奇与罗申谈话纪要，转引自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79。

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①] 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

早在 1949 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②] 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 1950 年 5 月 14 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③] 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 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 200 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④] 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拉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 9 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⑤] 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 7 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 8 月 5 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

---

① 《当代中国的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41 页。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第 7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36 页。

② 中苏两党会谈的中文记录参见 1949 年 7 月 27 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412 页。苏方记录见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1-3, с.78-79。

③ 1949 年 5 月 18 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5 月 14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第 284–288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51、54 页。

⑤ E. 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6-7, 1995/96, pp.88-89；1950 年 7 月 1 日、7 月 4 日什特科夫致冯西（斯大林）电，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 д.346, л.105-107、136-139；1950 年 7 月 5 日、7 月 8 日菲利波夫（斯大林）致罗申电，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 д.331, л.79-82。

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① 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8 月 4 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②

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首先，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③ 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④ 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第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允许和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 7 月 2 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428、454、469、485 页。

②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3 页。

③ 毛泽东在 10 月 2 日与罗申谈话时就提到“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见 1950 年 10 月 3 日罗申致菲利波夫电，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05-106。

④ 周恩来提醒高岗“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军有出国的意图”（1950 年 9 月 20 日周恩来致高岗电）时，显然是考虑到了参与一场国际战争的复杂情况。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第 56–57 页。

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① 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② 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③ 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到9月28日，当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其危险的时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同时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④ 莫斯科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在10月1日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鲜迅速组织三八线防御，一方面提出，“组织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⑤ 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赶到了北京。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而且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时，10月2日，毛泽东电令邓华“随时待命出动”，并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中国同意出动12个师赴朝作战。⑥ 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毛泽东答应出兵的电报没有发出。⑦ 面对国内极其困难的局面，10月3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⑧ 一方面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朝鲜局势日益危急，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决定。彭德怀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

① 见 E. 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pp.88-89.

②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79页。

③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第一卷，第28页；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④ 1950年9月30日金日成、朴宪永致斯大林电，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1-45，46-49。

⑤ V. Petrov sel. & com.，“Soviet Role in the Korean War Confirmed: Secret Documents Declassified, Yu Song-chol Reminiscences”，*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13, No.3, 1994, pp.60-61。1950年10月1日冯西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菲利波夫致罗申电，《朝鲜战争俄档》第7卷，第896–897、900–90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38、539–540页。

⑦ 在国际学术界轰动一时的关于中俄分别公布的两封内容相反的10月2日电报的争论，笔者曾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见《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的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英文稿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7, Issue 8-9, 1997.

⑧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5页。

不如打烂了再建设的一番慷慨陈词，无疑反映的是当日上午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表示的决心。[①] 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坏打算。[②] 只是出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没有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大林，而是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商谈。[③]

就在 10 月 13 日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朝鲜实施全面撤退计划后几个小时，莫斯科收到了毛泽东决定出兵的通知。[④] 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而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空袭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⑤] 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⑥] 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 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⑦] 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

①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01–403 页。毛泽东在 10 月 13 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讲述了同样的理由，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56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93–94 页。

③ 关于黑海会谈和中国出兵决策的反复过程，可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五章。

④ A. Y. Mansourov，“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6-7, 1995/96, p.104；1950 年 10 月 13 日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0 月 14 日什特科夫致冯西电，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3。

⑤ 1986 年 9–10 月沃伦·科恩访问韩念龙、黄华等几位周恩来当年的助手时，他们都坚持认为，中国军队的介入是因为美国的飞机轰炸了满洲，以及美国的地面部队正在逼近鸭绿江。W. I. Cohen, “Conversation with Chinese Friends: 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lect 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40s and the Korean War”，*Diplomatic History*, V.11, No.3, 1987, p.288。

⑥ 实际上斯大林确实有此考虑，见 1950 年 10 月 8 日冯西致金日成电，АПРФ，ф.45，оп.1，д.347，л.65-67。只不过，毛泽东当时是否看到过斯大林的电报尚无法确定。

⑦ 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1950 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3 期。

时的心腹之患。[1] 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2] 即使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3] 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

① 无论高岗是否真的说过要把东北作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此传言本身以及高岗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就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参见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 №6, 1992, №1；李海文：《柯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 年第 1 期。

② 1950 年 10 月 8 日冯西致金日成电，АПРФ，ф.45，оп.1，д.347，л.65-67。

③ 尽管对美国政府这种缺乏远见的举动有不同的解释，但许多西方学者的一致看法是，如果美国在三八线前止住，北京的介入是可能避免的，战争就会在 1950 年秋天结束。见 W.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Chappel Hill, 1981，pp.254-255；B. I. Kaufman，*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Philadelphia, 1986，pp.83-85；R.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Ithaca, 1985，pp.67-74。

二、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① 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②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攸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③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是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 12 月 8 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39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56、559–560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88–589 页。

春天再战。[①] 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须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②]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③] 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④] 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⑤] 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对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提出了建议。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⑥]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⑦] 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⑧] 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⑨] 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

①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 141 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53–454 页。

②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 740 页。

③ 见 1950 年 12 月 10 日《人民日报》。

④ 1950 年 12 月 5 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日记摘录，АПРФ，ф.3，оп.65，д.515，л.35-37。

⑤ 1950 年 12 月 7 日罗申致莫斯科电，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7-19

⑥ 1950 年 12 月 7 日葛罗米柯致罗申电，АПРФ，ф.45，оп.1，д.336，л.20-2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125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722、741–742 页。

⑧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245–246、249–250 页。

⑨ 1951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3。

1951 年 1 月 13 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①]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②]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③] 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 月 17 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④] 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⑤] 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

① 联合国辩论和投票情况详见 1950 年 12 月 17 日、1951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

②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 381 页。

③ 关于停战谈判的时机选择问题，中国军方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见解，见齐德学、刘颖伟：《朝鲜停战谈判时机问题辨析》，《军事历史》1998 年第 2 期，第 35–38 页。

④ 参见 1951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

⑤ 聂荣臻当时曾向苏联顾问说，中国军队入朝以来已减少兵员达 10 万人，运往前线的物资因敌空军轰炸损失达 30%–40%，粮食仅能供应部队所需的 25%。仅第二战役中便冻伤 5 万余人。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第 11 页。

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投票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① 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 1 月 27 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 15 至 30 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 2—3 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一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②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③ 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④ 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⑤ 1951 年 6 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⑥

---

① 陈兼提交 1996 年 1 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

② 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 446 页；1951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 月 30 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

③ 1 月 31 日彭德怀就预言："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人被动的可能。"《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373 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151–153 页。1951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3 月 3 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

⑤ 详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81–505 页。

⑥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 741–742 页；1951 年 6 月 13 日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6 月 24 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д.339，л.57-60，78。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①]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三、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②]

至于说到得失，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 33 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③]由

① 斯大林为毛泽东的出兵决定所感动，于 1950 年 11 月 1 日命令驻守在沈阳基地的苏联第 64 航空集团军出动飞机加入了朝鲜的空战。详见拙文：《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②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③ 引号中学者的用语转引自 V. Petro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3, No.2, 1994。

此开始的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况且所谓胜利，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当然，就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战争的结局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 11.4 万人，负伤 25.2 万人，失踪 2.56 万（其中被俘 2.1 万）人，因伤病致死的 3.46 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 42.62 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 200 多人。[①] 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 3.39:1，负伤 2.47:1，失踪或被俘 5.02:1，伤病致死 1.68:1, 兵员总损失 2.62:1。[②] 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 0.7:1, 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 5.65 万人，加上冻伤 5 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 1/4。[③] 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这两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

决策方针的失误并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 1951 年将军费开支从 1950 年占预算总支出的 43% 减少到 30%，而用 70% 来进行经济建设。[④] 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 1951 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 45.64%。[⑤] 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 3 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 4000 万美元），[⑥] 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 1951 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 60%，而总预

①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 322 页。

② 美军的伤亡数字参见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 556 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 754 页。比例数为笔者计算所得。

③ 徐焰：《第一次较量》，第 47、59–60、67 页。

④ 《当代中国财政》（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69 页。

⑤ 《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891 页。

⑥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996 页；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3，pp.99-100.

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 32%。[①]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 年 9 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 5 年中再贷款 40 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 8 亿卢布。[②] 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 560 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 62 亿元，[③] 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④] 直到 1951 年 1 月 8 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⑤] 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拒绝了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 月 30 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 44 票对 7 票（7 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⑥] 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 月 18 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⑦] 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 43 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⑧]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

---

① 195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58 页；1952 年 9 月 3 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③ 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第 333 页。

④ 1950 年 1 月 6 日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 185 页。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Part 1, Korea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83, pp.37-38.

⑥ 投票过程参见 1951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可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50 年 6 月 27 日美国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在联合国只获得 7 张赞成票，其中一票还是“中华民国”代表投的。

⑦ 参见 1951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报》。

⑧ 1951 年 11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公报，转引自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姜中才等译，第 225 页。

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 1950 年为 32.4%，1952 年为 52.9%，1953 年为 72%，此后直到 50 年代末一直保持在 70% 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 50%。[①] 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 50 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 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 59 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 41.39 亿元。[②] 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③] 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 年 2 月杜鲁门专门拨出 5 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 520 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 1600 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 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 3 亿美元的援助。[④] 特别是 1952 年 3 月 22 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28 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⑤] 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

① 《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 年，第 499–500 页；《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第 19 页。

② 参见《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266、268、270 页。

③ 在 1950 年 12 月 12–13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作为十三国提案发起者的印度政府认为，“台湾问题应当根据确定台湾必须归还中国的开罗与波茨坦两个协定加以解决”。见 1950 年 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Part 1, Korea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83, pp. 1584-1585；爱德温 · 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第 226–267 页。

⑤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5 页。

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①] 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②]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是“铁板一块”。[③] 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算达到了就其动机而言的客观目的，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50 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 年 10 月号

① W. Stueck, “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10, No.4, 1986.

② P. West, “Confronting the West: China as David and Goliath in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2, No.1, 1993.

③ R. Jervis,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

附录

俄国档案馆关于朝鲜战争的解密文件

自从1994年夏天俄国总统叶利钦总统有关朝鲜战争的216件俄国解密档案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后，关于这场战争的神秘面纱终于一点点地被揭开了。此后一段时间，除俄国学者外，美国、韩国、中国的研究人员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那些能够进一步解开朝鲜战争之谜的重要历史文件。俄国档案之所以如此吸引各国学者，是因为在与这场战争紧密相关的几个国家中，美国的档案早已公布于众，朝鲜和韩国的档案大多毁于战火，而中国的档案在目前的制度下还不可能充分地为研究者所利用。于是，能够揭露当年铁幕背后秘密的史料，只有俄国一个来源了。笔者编辑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刊载了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700余件（含附件）。就其形式而言，这些档案大多是苏联、中国、朝鲜三方领导人及相应机构之间的往来电文、会谈记录，苏共和苏联政府从中央到各主管部门的会议记录、决议草案、请示报告及情况通报，苏联驻中国和朝鲜使馆与国内相关部门往来的电报、信函等等。这里发表的是其中部分文件。

文件 001

什特科夫关于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电

（1949 年 1 月 27 日）

发自平壤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近 10 天以来（1 月 15 日至 25 日），南朝鲜警察和军队擅自越过三八线的事件增多了。

1 月 15 日，在三巨里地区，南朝鲜警察一个排越过了三八线，袭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家。越境者企图抢夺文件。北朝鲜警察赶到后，驱逐了越境者。

1 月 18 日，在三巨里地区，南朝鲜警察一个排，共 30 人，携带轻机枪和步枪，越过三八线，向劳动党区委会大楼发射燃烧弹，大楼被烧毁。北朝鲜警察赶到后，将越境者逐回三八线。

1 月 20 日，在铁原方向的泉谷地区，南朝鲜军一个排的士兵，约 40 人，袭击了北朝鲜的一个警察哨所。交火中，北朝鲜警察 4 人被打死、2 人受重伤、2 人失踪。

同一天，在阳德地区，南朝鲜军一群士兵，约 60 人，越过三八线，向村庄开火，结果 1 名居民被打死，1 名居民被击伤。

1 月 23 日，南朝鲜军一群士兵约 80 人和警察约 90 人乘坐汽车，企图在铁原方向的泉谷地区越过三八线，北朝鲜警察采取措施将其击退。

据北朝鲜警察的情报，南朝鲜军队正调往三八线。军队正在高成、铁原、南川店、海州几个主要作战方向集结。据警察情报，在庆州地区好像已集结有第 1 旅，人数约 11000 人；在其他方向上各有 3000 至 5000 人。据来自南朝鲜的侦察员证实，那里到处传言南朝鲜军准备向北方发动进攻。据说，军官们都在谈论，他们，即南朝鲜方面，应先发制人，夺取主动权。

朝鲜各级政府已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三八线的防卫和提高戒备。

结论：我认为南方军队目前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不论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也可能，他们将军队推至三八线附近，将其集中在主要方向上（从保护汉城的角度看这些方向也是主要的），是为了保护汉城免遭北方军队进攻（他们一直预计

北方军队会进攻）。

最近以来，南朝鲜侦察部门还加强了向朝鲜北部派遣破坏组和恐怖组的活动。总共截获 80 余人。

在海州抓住的一个小组共 14 人，随身携带有 5 个纵火包、6 个燃烧瓶和 1 桶汽油。该组的任务是纵火烧毁仓库、学校，并对地方政权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

什特科夫

1949 年 1 月 27 日

АПРФ，ф.3，оп.65，д.3，л.3-5

文件 002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关于三八线形势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9 年 4 月 20 日）

致斯大林同志：

现将朝鲜三八线的局势报告如下：

我军撤出北朝鲜以后，“南方人”对三八线规定的破坏已经具有挑衅性和经常性。近一个月，这种破坏规定的事件频繁发生：

从今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在整个三八线上发生了 37 起破坏规定的事件，其中 24 起发生在 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期间。

就其性质看，破坏规定的事件多是警戒部队的小规模冲突，一般是连和营规模的冲突，动用了轻机枪和迫击炮，还有一些是“南方人”越过三八线的事件。

在所有这些破坏规定的事件中，均是“南方人”首先开火。

与此同时，随着三八线局势的复杂化，“南方人”在 3 月至 4 月间将部分野战部队调集到三八线附近。

例如，第 1 步兵旅已从汉城调到开城地区。

据需要证实的消息称，“南方人”还在继续向三八线调集部队。

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

考虑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

“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

华西列夫斯基（签名）[1]

什捷缅科（签名）

1949年4月20日

АПРФ，ф.3，оп.65，д.3，л.29-30

文件 003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

（1949年5月15日）

发自平壤

致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我5月14日与金日成会晤，他向我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Kim Il）（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到北平访问的结果。金一被派往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并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朝鲜师问题（朝鲜师系指由满洲朝鲜人组成的师）进行谈判。

金一在中国驻朝鲜商务代表陪同下，于4月28日离开平壤，4月30日到达沈阳，并会晤了高岗。后者为金一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在北平，金一会见朱德和周恩来4次，会见毛泽东1次。金一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个朝鲜师中，有2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参加进攻战役。毛泽东说，他们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2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他们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同时，毛泽东提醒金一，上述师同他们的整个军队一样，都不是正规军，军事训练较差。他建议朝方对这些师的军官进行军事训练。

金一问毛泽东，由于上述朝鲜师使用的是日本武器，中方今后对这3个师所需

① 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95–1977），苏军元帅，时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弹药能否给予支持。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

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

毛泽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对朝鲜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询问得很仔细。他告诉金一，中共中央收到了4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但他会将这次谈话报告金日成。

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但是，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仔细考虑一下。

毛泽东希望在中共中央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说有关这些问题朝方可找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他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

最后，金一告诉毛泽东，朝鲜劳动党中央想在中国解放并成立政府后，立即承认这个政府和向中国派出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回答说，他们不急于成立政府，他们打算拿下广东、整顿好秩序后再成立政府。

在金一同朱德和周恩来最后一次会晤时，朱德问金一，苏联同志是否知道关于朝方请求将几个师转属的事，他们是什么意见。金一回答说，他是受劳动党中央的委托，看来中央谈过这件事。

朱德询问了朝鲜的经济形势。他说，中国可以支持朝鲜粮食，同时也请朝方支持中国肥料。

在返国途中，金一会见了高岗。高岗说，他已接到毛泽东关于2个朝鲜师的指示。他表示希望同金日成建立联系。金一问高岗，他能否到朝鲜去。高岗回答说，他随时准备去。

金一拟于5月底在平壤与高岗会晤。

金一通报说，毛泽东、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朝鲜代表前来访问表示满意，并非常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

什特科夫

1949 年 5 月 15 日

АПРФ，ф.3，оп.65，д.9，л.51-55

文件 004

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

（1949 年 5 月 18 日）

1949 年 5 月 18 日 16 时 17 分收到

1949 年 5 月 18 日 17 时 55 分译出

致菲利波夫同志[①]：

昨天（5 月 17 日），毛泽东同志请我向您通报：

一、朝鲜军队政治部主任金一同志（他和金日成同志一起参加过中国东北的游击运动）从北朝鲜来到这里。他受全权委托同中共中央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东方形势。

（二）关于成立情报局。

（三）关于援助北朝鲜的军队干部和武器。

毛泽东同志说，他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问题还不成熟。在东方 12 个国家中，中国共产党目前只同 5 个国家有联系，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而同其他国家，甚至同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没有建立经常的联系，对这些国家的情况知道甚少。因此，他说，最好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尔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而现在则限于互相建立电讯联系，借以交换对所发生的具体问题的看法。

二、至于说到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可以提供这种援助。在中国东北有 150 万朝鲜人，已组成两个朝鲜师（每师 10000 名士兵）。其中一个师有作战经验，曾积极参加过同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军作战。这些师我们可以随

①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时根据他们的要求转交给北朝鲜。当朝鲜同志现在暂时不需要时，我们负责全面保障和训练这些师。此外，我们还训练了 200 名军官，他们正在接受补充训练，一个月后可以派往朝鲜。如果北南朝鲜发生战争，我们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

朝鲜同志认为，美军在最近期间可能撤出南朝鲜，但他们担心日本人来接替美军，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

我们劝他们反击这些军队，但这时要估计南朝鲜军队中有无日军。如果有日军参加，那么就要审慎，当敌人占优势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最好牺牲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

我们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思想准备，出现这种形势是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朝鲜的失败，这仅仅是战略转移。

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

我们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 1950 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

当然，毛泽东同志补充说，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三、关于同北朝鲜建立贸易联系以及解决利用鸭绿江水力发电站的电力问题，我们建议金一同志到沈阳去，就这些问题同高岗同志协商。

毛泽东同志通报时在座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和 ×××①。

科瓦廖夫②

1949 年 5 月 18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② 科瓦廖夫，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1901–1995），原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曾带领苏联专家帮助修复长春铁路，1949 年 2 月随同米高扬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时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

文件 005

缅希科夫和什捷缅科关于苏联同意提供武器致什特科夫和戈洛温电
（1949 年 6 月 4 日）

平壤

苏联大使：

现转去缅希科夫[①]和什捷缅科的电报：

"致什特科夫、戈洛温[②]

请转告金日成，根据他的请求，苏联政府同意 1949 年向朝鲜提供下列武器、弹药和军事技术器材：

空军器材		
伊尔 –10 飞机	架	30
伊尔 –10 教练机	架	4
雅克 –9 飞机	架	30
雅克 –11 飞机	架	6
雅克 –18 飞机	架	24
波 –2 飞机	架	4
AM–42 备份发动机	台	6
降落伞	个	250
备份部件（价值）	千卢布	350
装甲坦克器材		
T–34 坦克	辆	87
Cy–76 自行火炮	辆	102
БA–64 装甲车	辆	57
M–72 三轮摩托车	辆	122
备份部件（价值）	千卢布	200

① 缅希科夫，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1902– ？），1946–1951 年任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部长。

② 戈洛温，苏联驻朝鲜贸易副代表。

武器		
7.62 毫米步枪	支	10000
7.62 毫米特等射手步枪	支	1000
7.62 毫米骑枪	支	4000
45 毫米反坦克加农炮	门	48
76 毫米 ЗИС–3 火炮	门	73
120 毫米加农炮	门	18
仪器		
ПУАЗО–3 高炮射击指挥仪	套	3
4 米基阵测距仪	架	3
1 米基阵测距仪	套	12
炮队镜	个	22
方位仪	个	134
指北针	个	3251
望远镜	架	2000
БИ 高炮双筒指挥镜	套	9
望远镜检测仪	个	2
炮队镜检测仪	个	2
方位仪检测仪	个	2
周视瞄准镜检测仪	个	2
M炮用油	吨	5
弹药		
7.62 步枪子弹	千发	11000
7.62 重弹	千发	1750
45 毫米炮弹	千发	30
27 式加农炮用 76 毫米炮弹	千发	4
ЗИС–3 炮用 76 毫米炮弹	千发	23
82 毫米迫击炮弹	千发	78.5
T–34 坦克炮用 85 毫米炮弹	千发	16.5
12.7 毫米子弹	千发	150
23 毫米炮弹	千发	100

ФАБ–100 航空爆破炸弹	枚	720
АО–10 航空杀伤炸弹	枚	10800
ПТАБ 反坦克航空炸弹	枚	25200
牵引工具		
85 毫米高炮牵引车（ЗИС–151）	辆	12
76 毫米加农炮牵引车（ГАЗ–63）	辆	36
37 毫米高炮炮牵引车（ГАЗ–63）	辆	24
工程器材		
НЛП 轻型舟桥纵列	套	3
А–3 艇	艘	12
ДСЛ 折叠式登陆艇	艘	12
ЛМН 橡皮艇	艘	20
БМК 牵引汽艇	艘	5
Н2П 舟桥纵列	套	1
АЭС–1 发电汽车	辆	6
АЭС–3 发电汽车	辆	2
ПМ–1 爆破机	个	60
ПМ–2 爆破机	个	60
МУВ 通用地雷引信	千个	50
МВ–5 地雷引信	千个	50
ТАТ–8	千个	100
工兵电线	米	50000
68 号爆破具	个	60
68 号工程材料	个	25
爆破机控制台	个	20
探雷器	个	170
各种闭合器	个	150
ТМД–Б 木壳反坦克雷	个	30000
ПОМЗ–2 防步兵障碍地雷	个	30000
ТОЛ 梯恩梯	吨	20
导火索	米	3000

指挥所照明灯	个	10
金属压路机	台	3
金属打桩机	台	5
铁丝剪	把	200
斗链式扬水器	台	6
浅管井	口	6
78–89 米钻进设备	台	1
通信器材		
РАФ 电台（固定）	台	1
РСБ 电台（固定）	台	10
РБ М电台	台	179
А–7– А电台	台	46
13–Р 电台	台	15
北方牌电台	台	16
无线电接收机	台	25
1.5 型 ЭС–3 充电机	台	10
Л–6 充电机	台	4
Л–6 发动机	台	4
СТ–35 音响电报机	台	18
莫尔斯电报机	台	21
5 型 НКН–60 蓄电池	套	100
ТАИ–41 音响电报机	台	741
ПК–10 交换机	台	54
ПК–30 交换机	台	2
瑞士交换机	台	9
电话被复线单线	公里	800
电报被复线	公里	100
齿轮转动线圈	个	1600
电报接头	个	11
КВ–4 石英量波器	个	22
КТ–288 工具袋	个	10

KT–289 工具袋	个	25
电压电流表	个	50
波卡尔变压器	台	100
УНА–ФИ 电话机	台	60
海军器材		
Г–5 鱼雷快艇（使用过）带有两枚 45–36–H 鱼雷	艘	5
РД–200 猎潜艇（使用过），携带两枚舰用深水炸弹和火炮弹药	艘	3
122A 猎潜舰（使用过），携带两枚舰用深水炸弹和火炮弹药	艘	1
其他器材		
钢盔	个	60000

请转告金日成，苏联政府已委托苏联外贸部，就向朝鲜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器材以及换取朝鲜大米和其他商品问题，同朝鲜政府签署 1949 年 3 月 17 日关于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贸易和支付协议议定书。

苏联政府已批准上述议定书文本草案，您可以把它作为草案，转交朝方。议定书文本草案如下：

1949 年 3 月 17 日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换货和支付协议议定书

鉴于苏联政府同意满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向朝鲜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器材的要求，并根据 1949 年 3 月 17 日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换货和支付协议第 3 条，双方商定：

一、苏联政府将在 1949 年内，根据本议定书所附清单，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器材。

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在 1949 年内向苏联政府提供朝鲜商品，以抵偿武器和军事技术器材的价值，其中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提供 30000 吨大米。

朝鲜为抵偿苏联向朝鲜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器材的价值而应向苏联提供的其余商品清单，双方将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协商。

三、双方根据本议定书互相提供的商品的价格和其他条件，将由相应的苏联外

贸机构和朝鲜外贸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议定书签字仪式于1949年 月 日在莫斯科举行，议定书一式两份，俄文和朝文各一份，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请询问一下朝鲜政府将派谁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这份议定书的签字仪式。

请电告。

米·缅希科夫（签名）

谢·什捷缅科（签名）

葛罗米柯（签名）

АПРФ，ф.6，оп.9，д.14，л.57-62

文件 006

什特科夫关于南朝鲜军将进攻北方的情报等问题致维辛斯基电

（1949年7月13日）

发自平壤

致安·扬·维辛斯基同志并抄送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7月12日，在瓮津方向（海州以西40公里）俘虏了3名南朝鲜军士兵（属第18团第2营）。

据俘虏口供，他们所在的营已于6月进抵瓮津方向。

该团以前参加过镇压南朝鲜的起义。

俘虏还供认，他们的指挥官7月以来多次讲话，断言北朝鲜军队企图进攻南方，因此南朝鲜军队应先发制人，给北朝鲜军队以突然打击，并在8月15日（朝鲜解放日）前夺占北朝鲜。

俘虏接着供认，第12团的任务是攻占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

第18团的任务是从瓮津地区出发，在第13团（据现有情报该团配置在开城地区）的协同下，向北进攻，合围海州，歼灭该城的北朝鲜军队集群，在一周内占领海州。

据从南朝鲜劳动党得到的谍报材料，在李承晚处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李承晚

说，北方关于和平统一的呼吁书不是别的，而是最后通牒；北方军队一定会在 8 月或 9 月发动进攻。李承晚声称，南方军队应先发制人，在 7 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

据谍报，南朝鲜军队正在变更部署，三八线附近地区的居民已开始后撤。

北朝鲜方面已完成 416 号电报中所述的各项措施。已给三八线区域内的各师师长以及警卫三八线的各警备旅旅长下令，让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金日成已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

什特科夫

1949 年 7 月 13 日

文件 007

什特科夫关于美军撤离南朝鲜等情况致葛罗米柯电

（1949 年 7 月 27 日）

发自平壤

致安·安·葛罗米柯同志：

联合国委员会 7 月 2 日正式确认，最后一批美军已于 6 月 29 日从仁川撤走。

联合国委员会主席辛格在 7 月 2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第三分委员会将于四五天内到美军驻扎过的地方访问并向委员会提交报告，待报告批准后将公布证实撤军的声明。共同社汉城分社 7 月 14 日报道，联合国委员会关于撤军的声明将于一二天内发表。但是，这个声明至今仍未看到。

据谍报，一些美军还在汉城和其他一些地方。由于南朝鲜方面加紧三八线地区的军事化，侦察工作有困难，因此我们暂时不掌握关于留下的美军数量的准确情报。搜集必要情报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

关于在南朝鲜的美国军事使团的人数尚未查清。据汉城新闻界材料，军事使团有 500 人，而据谍报材料则有 800 至 1200 人。

经核实的材料将尽速报您。

什特科夫

1949 年 7 月 27 日

文件 008

顿金关于金日成准备夺取瓮津半岛致维辛斯基电

（1949年9月3日）

发自平壤

致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苏联籍朝鲜人）来到我处。他受金日成委托向我通报，他们得到可靠消息，南方最近企图夺占位于三八线以北的瓮津半岛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

文日说，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占瓮津半岛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

文日说，金日成认为，如果国际局势许可，他们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夺取南朝鲜。

我请他转告金日成，这是一个十分重大和严肃的问题，必须加以认真、周密的考虑，因此我郑重地建议金日成不要仓促行事，暂时不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任何决定。

大概金日成近日内还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现已查明，朝方确实截获了一份给瓮津半岛驻军司令的命令，其中要求该司令于9月2日8时开始炮击海州市水泥厂，并将其摧毁。从这份命令中可以看出，南朝鲜方面认为这个工厂是军工厂。

命令中所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了，但炮击暂时还没有发生。

北朝鲜方面采取了必要措施，以防对工厂的炮击。

关于南朝鲜方面企图夺占位于三八线以北的部分瓮津半岛一事，现在只有南方投诚者的口供。

从8月15日起，三八线上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只发生了一些零星对射和偶尔炮击瓮津半岛的北朝鲜地区，以及擅越三八线等事件。

南朝鲜方面正在三八线上加紧构筑防御工事。

请指示。

顿金

1949年9月3日

АПРФ，ф.3，оп.65，д.775，л.116-11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136-138

文件 009

斯大林关于速与金日成会晤弄清南北双方军事实力致顿金电

（1949 年 9 月 11 日）

平壤

致苏联大使馆顿金同志：

您务必尽快与金日成会晤，在他那里努力进一步弄清下列问题：

一、他们是怎样估计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

二、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以及他们指望从游击队那里得到何种实际的帮助。

三、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

四、朝鲜南方驻有美国军队吗？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

五、北方是怎样估计自己的能力的，如军队状况、保障程度和战斗力？

六、请告诉我们您自己对情况的判断，我们朋友的建议有何种程度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上述问题需要与 1949 年 8 月 12 日和 9 月 3 日两次谈话中他所提的问题联系起来弄清楚。

谈话结果速电告。

斯大林

1949 年 9 月 11 日

АПРФ，ф.3，оп.65，д.775，л.122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45

文件 010

顿金关于会晤金日成情况致斯大林电

（1949 年 9 月 14 日）

发自平壤[①]

9 月 12 日和 13 日我会晤了金日成和朴宪永。

对您来电中所提的主要问题他们的意见是：

一、南朝鲜军队。陆军编成内有 7 个师，以及首都警卫部队、军官学校和训练班（共 23 个团和 2 个独立营）。

陆军和航空兵有 80000–85000 人。

武器：步枪 70000 支；自动步枪 1818 支；轻机枪 388 挺；重机枪 780 挺；火焰喷射器 633 具；37 毫米火炮 47 门；105 毫米火炮 93 门；60 毫米迫击炮 384 门；82 毫米迫击炮 433 门。

装甲车 30 辆、超轻型坦克 20 辆（关于超轻型坦克的情报待证实）。

飞机：L–4 通信机 10 架；L–5 通信机 9 架；侦察机 10 架；攻击机 10 架；运输机 3 架。总共 42 架，其中堪用的只有 10 架 L–4 通信机和 3 架运输机。

附记：以上材料基本上与我驻朝鲜内务省顾问掌握的材料一致，但根据我们顾问的材料，南朝鲜军队：

（一）除上述火炮外，还有 113 门 57 毫米反坦克炮、2653 门无坐力炮。

（二）没有关于坦克数量的材料，但有消息说，8 月 15 日在汉城的阅兵式上曾有 6 辆坦克参加。

（三）飞机总数为 36 架。

海军编成内有 40 个单位，其中美式近距离作战舰艇 14 艘，日式近距离作战舰艇 10 艘。舰队人员 6200 人，其中 5000 人为海军陆战队（据我驻内务省顾问的材料，南朝鲜海军共有 57 个单位）。

陆空海三军人员有 85000–90000 人，其中军官约 4700 人。

警察约 50000 人（据我们顾问的材料为 60000 人）。

所谓的“卫国军”（类似民兵）共有 40000–50000 人（其中多少人有武器不

---

① 档案原件未注明收报人。根据电报内容判断该电是发给斯大林的。

详）。

军官训练较差。军队训练大纲没有系统执行。总的说来，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战斗力不强，并说北方军队根据自己在三八线上小规模战斗的经验深信这一点。

他们在南方军队的所有部队中都有自己的谍报人员，但这些人能否在内战发生时瓦解南方军队，则很难说。

二、据他们的材料，他们在南朝鲜有约总数为1500–2000人的游击支队。近来游击运动有所加强。但金日成认为，不能指望从游击队方面得到很大帮助。

朴宪永是南方人，他持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帮助会很大。不管怎样，他们都期望游击队能以自己在敌人交通线上的行动来帮助军队。游击队最好能占领南朝鲜的主要港口，但在军事行动开始时未必能做得到。或许游击队在稍后一些时候能做到这一点。

三、在如果北方发动国内战争，舆论和人民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问题上，金日成拿不定主意。9月12日谈话时，他明确说，如果北方首先开始军事行动，那么这将在人民中产生不良印象，而且由他们先动手在政治上不利。当时他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发动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金日成的想法是，等到中国主要战役结束后再说。

在9月13日谈话中，显然是在许哥怡（He Ka Yi）（苏联籍朝鲜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第二次谈话时当翻译）的影响下，金日成先是说人民将欢迎北方的武装发动，即使他们首先开始军事行动，他们在政治上也不会输掉。在后来的谈话过程中，金日成又说，如果内战拖延下去，那时他们会在政治上陷于不利地位。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而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到大约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

他们认为，发生内战时，南朝鲜人民将同情北方军队，并在北方军队进入南朝鲜时给予支持。他们希望在军事行动顺利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

四、根据官方材料，南朝鲜有500名美国军事顾问和教官。据谍报（需进一步核查），南朝鲜有900名军事顾问和教官，以及1500名担任警卫的士兵和军官。

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将派日本人和中国人来援助南朝鲜人；用自己的兵器从海上和空中进行支持；让美国教官直接参加组织作战行动。

五、北朝鲜军队（包括航空兵和岸防部队）的人数为97500人。

装备部队的有64辆坦克，59辆装甲车，75架飞机。

北方警察人数为23200人。

金日成认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

北方军队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如航空兵飞行人员数量不足和训练较差，军用舰艇缺乏，对于实战来说，大口径火炮准备不充分、弹药不足。

简单地说，金日成的建议是：先突击瓮津半岛上的南朝鲜军队，消灭那里的两个团，占领半岛以及半岛以东大约至开城地区，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南朝鲜军队遭此突击后，可能陷于士气沮丧，这时就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如果南朝鲜军队在瓮津战役之后并没有士气沮丧，则巩固所占地区，从而可以缩短防线约三分之一。

可以不急于发动瓮津半岛战役，等苏联的补充武器运到再说。这时可以加固三八线其他地段的防御。

金日成认为瓮津半岛战役有可能发展成为内战，但他希望这将不会发生。他认为，南朝鲜人不敢在三八线其他地段上发动进攻。

我们的意见：

金日成预计的局部性战役，能够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北方和南方的内战。在北朝鲜和南朝鲜领导人的圈子内，都有不少主张打内战的人。因此，在发动这个局部性战役时，必须考虑到，它必将是内战的开始。

现在发动内战，对北朝鲜自己是适宜的吗？

我们以为，这是不适宜的。

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甚至把南朝鲜游击队和人民将给予北方军队的援助考虑在内，也不能指望速胜。同时，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首先，拖延战争将使美国能够给李承晚以相应的援助。美国在中国遭到失败后，大概会比在中国时更坚决地干涉朝鲜事务，自然会尽一切努力挽救李承晚。其次，当内战拖长时，战争带来的牺牲和苦难，会使人民对战争发动者产生不满情绪。

此外，朝鲜持久的内战，会被美国利用来进行反苏宣传和进一步掀起对战争的狂热叫嚣。

因此，现在发动内战，对北朝鲜是不适宜的。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如果北

方能够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地迅速结束战争，那么，只有在这个时候，进攻南方的决定才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上面所说的局部性战役胜利了，而且也没有导致内战，那么即使在这个时候，北朝鲜也只是军事上赢了，而政治上却在许多方面输了。这种战役将被利用来指控北朝鲜力图挑起骨肉相残的战争。它还将被美国和国际社会利用来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事务进行有利于南方的干预。

我们认为，在上述条件下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

顿金

1949年9月14日

АПРФ，ф.3，оп.65，д.837，л.94-9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46-53

文件 011

斯大林关于朝鲜军队不应进攻致毛泽东电

（1949年10月26日）

莫洛托夫 1949年10月26日

绝密

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送上为答复毛泽东同志就朝鲜问题发给菲利波夫同志（斯大林）的电报（见科瓦廖夫同志的第234号电报）而起草的复电。

维·莫洛托夫

1949年10月26日

致科瓦廖夫、罗申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菲利波夫对毛泽东10月21日来电的答复：

“毛泽东同志：

我们同意您的意见，目前朝鲜军队（还）不应实施进攻。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因为，目前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

我们认为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集中力量开展游击运动、在

南朝鲜建立解放区并千方百计地巩固朝鲜人民军。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АПРФ，ф.45，оп.1，д.332，л.47-48

文件 012

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苏中两国关系和东南亚形势的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16日）

在双方互致问候和进行了关于一般性问题的交谈之后，会谈转入如下内容：

毛泽东：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确保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以休养生息，恢复战前经济水平和稳定国家社会秩序。中国最重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未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大环境。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保证国际和平和多大程度上能确保世界和平。

斯大林：中国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苏联更关心和平问题，虽然它已有了四年的和平期。对于中国而言，目前并不存在能够对它产生直接威胁的力量：日本尚未恢复元气，因而不会准备战争；美国虽然不断发出战争的叫嚣，但它更害怕战争；欧洲已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因此，中国根本就没有战争的对手，难道金日成会与中国开战？

世界和平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齐心协力。如果我们两国之间能保持友好，不仅会确保5—10年的和平，而且20—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都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刘少奇返回中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关于中苏友好、结盟和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协商解决。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对外宣布关于维持现有的1945年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不变，或发表一个关于将对之进行修改的声明，或者现在就对之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这个条约是苏联和中国在载有最重要条款（关于库页群岛（Курильск）、南萨哈林、旅顺港（Порт-Артур）等问题）的对日协约的基础上签订的。这意味着，美国和英国人对这一条约的签订是很了解的。这一情况表明，我

们私下里可以这样决定，即暂不变更该条约中任何条款，因为条约中任何条款的变更都会让美国和英国人抓到法律上的依据，从而提出关于变更条约中涉及库页群岛、南萨哈林等内容的其他条款。我们可以形式上保留原条约内容，而实际上改变之，即形式上苏联仍拥有在旅顺港驻军的权利，但实际上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意见将部分苏联军队从那里撤出。只要中方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便会实施这一行动。

至于中长铁路问题，我们也可以形式上保留现有条约中的相关规定，而实际上则根据中方的意愿变更相关条款。

当然，如果我们的这一设想不能使中国同志满意，那么，他们也可以继续提出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目前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成功地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另外，中长铁路也是一所学校，它可以为中国培养铁路和工业方面的骨干人才。

斯大林：撤出军队并不表明，苏联将不帮助中国。如果中方提出要求，苏联依然会帮。问题在于，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便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别国，尤其是友好国家的土地上的。因为这样，有人就会说，如果苏联军队可以留在中国，那么，难道英国人的军队就不能驻扎在香港，美国人——东京?

苏联军队根据两国间协议撤离旅顺港，有助于我们在国际上取得优势。另外，苏联从中国领土撤军也极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处理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共产党人可以做到蒋介石所无法做到的事。中国共产党应当重视民族资产阶级。

现有的苏中条约保证苏联有权在旅顺港驻军。但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一权利，并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撤出军队。如果这不能让中国同志满意，那么，苏联军队也可以遵照中国的意愿，在旅顺港驻留两年半或10年。如果这还不行，那么我们就要逃离中国了。我们可不想让自己的军队在中国驻上20年。

毛泽东：在讨论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时，我们并未考虑与雅尔塔协定相关的美国和英国的立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当有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我们应当认真想一想。但目前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既不宜变更现有条约，也不宜让苏联军队迅速从旅顺港撤军。

是否有必要让周恩来来莫斯科解决中苏条约相关事宜?

斯大林：这个问题你们应自己决定。可能，周恩来到莫斯科有其他方面的事务需要办理。

毛泽东：（周恩来到莫斯科）想解决关于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即签署苏中政府间贷款 3 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这可以。如果你们想现在就签署这一协议，我们没有意见。

毛泽东：是的，我们现在就想签。因为这会在中国引起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解决贸易问题，尤其是苏联与新疆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目前还拿不出具体的关于这一地区贸易活动的计划。

斯大林：我们现在就想了解，中国需要什么设备，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设备储备，必须向工业部门提前预订。

毛泽东：我们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对中国工业的整体情况并不摸底。

斯大林：希望（你们）能迅速编制出订单，因为在苏联工业部门订购的设备，至少需提前一年时间发出订单，才能如期交货。

毛泽东：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的帮助，以建立中苏间的空中交通航线。

斯大林：我们准备给予这方面的帮助。空中航线可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我们有这方面的专家，保证向你们提供帮助。

毛泽东：很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建立海军。

斯大林：中国海军的干部可以在旅顺港培养。你们出人，我们给舰艇。经过培训的中国海军骨干可返回中国，并在这些舰艇上工作。

毛泽东：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海军和空军基地。没有海、空军为人民解放军占领该岛增加了难度。有鉴于此，我们一些将领建议请苏联帮助。苏联可以派遣自己的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帮助中国，以便迅速夺取台湾。

斯大林：不排除我们提供帮助的可能，但帮助的方式需要考虑。关键在于——不要给美国人的干涉提供口实。参谋和教练人员，我们可以随时提供。至于其他问题，我们还要考虑一下。

你们有没有空降部队？

毛泽东：有一个前国民党的空降团，是投诚过来的。

斯大林：可以从该团的连级干部中选拔一些人，经过宣传教育后，空投到台湾，以便通过这些人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我们的军队已进军到了中缅和中印边境地区。英国和美国对此表示担忧。我们是越过边境，还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斯大林：可以放出风声，即我们准备越过边境。以此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们。

毛泽东：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上表现得特别积极。不过，我们认为，对此不应操之过急。我们应当先处理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再与国外的帝国主义者对话。

斯大林：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绝不应自己制造与英、美之间的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完全可以利用广东省与香港的纠纷。而毛泽东则可以充当调解这场纠纷的中间人。关键在于——既不要匆忙行事，还要避免冲突。

上海的外国银行还在运营吗？

毛泽东：是的。

斯大林：他们都为那些人提供服务？

毛泽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我们暂且没有触动的外国企业。关于外国人的影响范围，英国资本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占优，而在文化－教育领域美国人居主导。

斯大林：日本企业的状况如何？

毛泽东：这些企业都已收归国有。

斯大林：海关由谁控制？

毛泽东：现掌握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必须高度重视海关的管理，一般而言，这是国家收人的主要源泉。

毛泽东：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在文化和经济方面，我们仍未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你们在外国企业和银行等中是否有监察员或情报人员？

毛泽东：有的。我们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以便对外国企业（如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研究和监督。

斯大林：应当配备政府的监察员，以便其合法的开展工作。应当让外国人承担比中国人更多的税务。

钨、钼和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政府。

斯大林：应当发展矿产，尤其是石油的采掘。可以在兰州以西至成都之间地区铺设输油管道，然后再经水路来运送燃料。

毛泽东：我们尚未决定，中国应首先发展那些地区——沿海还是内地，因为我

们对世界的未来还不太了解。

斯大林：不管有战争与否，石油、煤炭、金属等总是需要的。

斯大林：中国南部能否种植橡胶树？

毛泽东：截至目前还未成功种植。

斯大林：中国是否有气象站？

毛泽东：没有，尚未建立。

斯大林：应当建立这样的部门。

斯大林：我想从您这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并把它们译成俄语。

毛泽东：我正在审阅自己的著作。它们当年都是在各地方刊物上发表的，其中存在大量的错误和曲解之处。我计划于1950年春之前结束审阅工作。我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其一，与俄语翻译一起对文章进行修改；其二，帮助我对中文著作原文进行审校。

斯大林：这可以办到。不过，您的著作还有必要审校吗？

毛泽东：需要的，我请求为此专门派给我相关同志，比如，俄共（布）中央的某位委员。

斯大林：如果需要，这当然可以办到。

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费德林和师哲（卡尔斯基）等同志。

记录员：费德林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文件 013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提出向南方发动进攻问题致维辛斯基电

（1950年1月19日）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现把金日成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举行的午宴上所谈的想法报上。1月1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有少数人参加的午宴。

朝鲜方面出席午宴的有：金枓奉、金日成、朴宪永、副外务相朴东朝、李周渊，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文士祯出席了午宴。我方出席的有我和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午宴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金日成、朴宪永以及中国贸易代表在祝酒时对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本人为朝鲜和中国提供的无私的援助表示了友爱和感谢之情。……[①] 如果将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拖延下去，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对我的信任。”接着，金日成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曾告诉他，不要向南方进攻，当李承晚军队向北方进攻时，可以对朝鲜南方进行反攻。但是，李承晚至今未发动进攻，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便拖延下来，所以他（金日成）想，必须再到斯大林那里去一趟，接受指示并获准让人民军发起进攻，解放南朝鲜人民。金日成继续说，他不能自行发动进攻，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是个守纪律的人，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对他就是法律。随后，他声称，如果现在不能会见斯大林同志，那么，他在毛泽东从莫斯科返回后将设法会见毛泽东。金日成强调说，毛泽东曾答应他在中国战争结束后将给予援助。（看来，金日成指的是朝鲜代表金一 1949 年 6 月 [②] 同毛泽东的谈话，我曾用密码电报汇报过此事。）金日成说，他还有别的问题要同毛泽东谈，例如，可否建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

接着，他又说，就这些问题他将设法同什特科夫同志会谈，并通过他争取同斯大林同志会面。

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为了回避讨论这些问题，便尽量把谈话引向一般话题。这时，金日成便走近我，把我叫到一边，又说了下面的一些话：他能否同斯大林同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对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他说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队强大得多。谈到这里，他又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同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以后将会得到对各项问题的指示。

随后，金日成又向我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拿下这个半岛，如果发动一次总攻，人民军几天之内就能进入汉城。

我回答金日成说，他没有提出过会见斯大林同志的问题，如果他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斯大林同志将接见他，对于进攻瓮津半岛的问题，我回答他不能那样干。然后，我尽力想结束关于这些问题的谈话，便借口时间已晚，建议该回去了。谈话

① 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

② 原文如此，根据俄国的档案文件，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是在 1949 年 5 月。

到此便结束了。

饭后，金日成有些醉意，整个谈话是在兴奋状态下进行的。看来，他说起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倾诉情怀，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金日成一再强调，他希望听取斯大林同志对朝鲜南方形势的看法，因为他（金日成）一直都想发动进攻。

什特科夫

1950 年 1 月 19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62-65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87-91

文件 014

刘少奇关于朝鲜族部队回国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0 年 1 月 22 日电）

秘密

刘少奇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电报

中共中央的电报

毛主席：

在第四野战军服役的朝鲜官兵有 14000 人。金日成派出以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为首的三名代表来接收这批朝鲜官兵。他们请求把这些朝鲜士兵组成一个师和直属该师的支队，还要带走所有装备：步枪 12000 支、轻机枪 440 挺、重机枪 180 挺、左轮手枪 120 支、掷弹炮 132 门、坦克炮 72 门、105 毫米火箭炮 36 门，还有弹药。林彪同志让我们满足这一要求。请您就这一问题给予指示。

刘少奇

1950 年 1 月 22 日

完全同意满足这一要求。

毛泽东

1950 年 1 月 25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2

文件 015

斯大林关于同意会晤金日成讨论统一问题致什特科夫电

（1950年1月30日）

平壤

苏联大使馆

致什特科夫：

一、您的报告已接到。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大的举措，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此举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二、我对金日成同志有个请求。苏联十分缺铅。我们希望每年至少能得到25000吨铅。如果朝鲜每年能向苏联提供上述吨数的铅，那么，朝鲜将给我们很大帮助。我希望，金日成不会拒绝我们这一请求。也许金日成需要我们的技术援助和某些苏联专家，我们准备向他提供这种援助。请把我的此项请求转告金日成同志，并替我请求他把他对此事的意见告诉我。

约·斯大林

1949年1月3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70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92

文件 016

伊格纳季耶夫关于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的情况致维辛斯基电

（1950年4月10日）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①]通知我以下事项：

① 即金策。

一、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李周渊给金日成的报告，其中谈到，1950年3月底，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李周渊。

在毛泽东与李周渊会谈时，根据后者的提议讨论了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对会见金日成一事持肯定态度，并将会晤时间定在今年4月底或5月初。毛泽东把预期的会晤同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

对于会晤的时间和方式问题，李周渊借口金日成现在正在治病，未作具体答复。在与李周渊交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

二、金策通知说，朝鲜南方游击队领导人金达三（Kim Dal Sam）4月3日从南朝鲜来平壤。南方报界和电台曾多次正式宣布，他在与南朝鲜军讨伐队作战时被击毙。金达三来北朝鲜汇报南朝鲜游击队运动的形势并接受对此问题的指示。

金策请我把上述各事通过什特科夫同志转告金日成。[①]

伊格纳季耶夫

1950年4月10日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98-99

文件 017

罗申关于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情况的电报

（1950年5月13日）

发自北京

立即报告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5月13日23时30分，周恩来来我处，并根据毛泽东委托转告以下事项：

一、金日成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今年5月13日来北京。

二、今晚毛泽东同志会见了他们一行。在与毛泽东同志交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

① 此时，什特科夫陪同金日成在莫斯科访问。

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

三、朝鲜同志将在北京停留两天。

鉴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想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根据罗申同志转来的菲利波夫同志的上一封电报，本应在近几天内就接到说明”。

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

罗申

1950年5月13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2-53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00-103

文件 018

斯大林关于同意朝鲜同志建议致毛泽东电

（1950年5月14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第十处，复件存档

1950年5月14日4时10分收到

1950年5月14日5时30分发出

北京

苏联大使：

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菲利波夫”

请将执行情况电告

维辛斯基（签名）

1950年5月1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5

文件 019

罗申关于毛泽东同朝鲜签约问题的意见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5 月 14 日）

绝密

编号示例，1 号送斯大林，2 号送斯大林，3 号送莫洛托夫，4 号送马林科夫，5 号送布尔加宁，6 号送维辛斯基

罗申发自北京

1950 年 5 月 14 日

优先拍发　特件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于 5 月 14 日 14 时 40 分拜见了毛泽东同志并向他转交了您的电报。毛泽东同志感谢您的回复，之后又谈到朝鲜同志在 5 月 13 日晚与他会谈时详细通报了国内情况和与您谈话的内容。他同意朝鲜同志对北朝鲜和南朝鲜局势的评价，也同意他们对南北力量对比的看法。接下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他向朝鲜同志表示，中国和朝鲜（朝鲜统一之后）可以按照《中苏条约》的模式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中国政府只能在同菲利波夫同志商量后才最终决定能否签订这样的条约。

罗申

1950 年 5 月 14 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56

文件 020

斯大林关于同意中朝在朝鲜统一后再签约致毛泽东电

（1950 年 5 月 16 日）

绝密

密码电报

北京

苏联大使

1950年5月16日优先拍发

特件

"请转告毛泽东，菲利波夫同志和朋友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朝鲜统一后与其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维辛斯基

1950年5月16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57

文件 021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进攻日期致维辛斯基转斯大林电

（1950年5月30日）

密码电报

绝密

禁止复印

特档

优先拍发

致维辛斯基（转呈上级）：

5月29日根据金日成的请求，我与他进行了会晤。在会晤开始时金日成通报说，他在莫斯科期间要求的那些武器和弹药已经基本上运达了。武器已经被分运给重新组建的那些师，在6月1日前将全部发到士兵手中。接着金日成继续通报说，他已经到这些重新组建的师里去过，考察了他们的军事训练进程，并认为，到6月底这些师将具备战斗能力。

金日成说，根据他的委托，总参谋长已经结束了关于进攻的原则性决定的研究工作。总参谋长已经将这个决定的提纲报告给他和顾问瓦西里耶夫将军。他赞成采取的决定和选定的在进攻时主要打击的方向。他请求我与他、总参谋长和顾问瓦西

里耶夫将军一起会面，共同审阅这个决定。我回避了这样共同的会晤，并借口说，我要到瓦西里耶夫将军那里了解一下这个决定。

接着金日成通报说，陆军中的组织筹备工作在6月1日前能够全部结束。海军中的工作要落后一些，因为他们还没有收到一艘苏联的扫雷舰和猎潜舰。这些战舰的全体船员已经选出，但是还没有接受培训，因为还没有这些舰只。他请求我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快运来这些舰只。我回答他说，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这些舰只将在6月初运抵朝鲜。接着金日成还指出，他们的步兵已经准备参加战斗行动。10个步兵师中有7个师已经准备好参加进攻行动。一个坦克旅和一个摩托化团也都准备就绪。3个新射击师的训练工作将在6月份结束。这对他们来说完全合适，因为他们被指定作为第二梯队。

接着他指出，南方人完全没有掌握关于人民军状况及其战斗准备情况的资料。但是，他们目前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自己的部队，虽然南朝鲜的部队中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考虑到人民军已经做好了参加战斗行动的准备工作，他希望在6月底开始针对南方的军事行动。继续拖延开始军事行动对北方人是没有好处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南方人将会发现他们的计划并采取措施加强自己的军队。第二，7月份将有暴风雨天气，到那时就不得不将进攻行动推迟到9月份，而这是非常不理想的。接着金日成指出，根据总参谋长的报告，他需要16天的时间集结部队。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在6月8-10日开始调集部队。金日成说，在党的政治委员会讨论会上他还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他打算在最近几天提出这个问题，这取决于进攻行动开始的时间。我回避了直接回答他提出的关于战斗行动开始的时间这个问题，并借口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他应该与军事领导人商量，他们需要多少时间准备好自己的部队，还要同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们商量，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附注：

在就这些问题与金日成进行会谈之后，我召见了顾问瓦西里耶夫将军和波斯特尼科夫将军，了解他们对朝鲜军队准备工作的程度和6月底开始战斗行动的可行性的看法。瓦西里耶夫将军和波斯特尼科夫将军认为，集结部队和与师、团指挥员详细研究作战行动需要很多时间，因此，7月份开始进攻行动是合适的。但是，考虑到7月份将有暴风雨天气，以及南方人将会发现北方人的战斗准备计划，并开始加强自己的队伍，他们更倾向于，人民军能够结束部队的准备工作并于6月底开始军事行动。

我的意见。

由于金日成打算在6月底开始军事行动，并且在此之前部队的准备工作也可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同意这个期限。

接着，金日成通报说，他与朴宪永对政治措施计划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向南方人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建议。最初他们考虑代表祖国阵线发表声明，而后来改为代表政府。他请求我接见朴宪永，并帮助他起草这些文件。我对此表示同意。

谈话结束时，金日成请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快贸易代表处定购的、时至今日仍未收到的药品的运输工作，以及应该在6—7月份运达的10000~15000吨石油。金日成强调指出，目前他们非常缺乏汽油。我答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我支持金日成的请求，他们确实非常需要药品和汽油。

我请求就所触及的问题尽快下达指示。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30日

12份

打印：5月30日20时20分

分送：

发放：列古诺夫

第1份：作修改用

第2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3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4份送：莫洛托夫同志

第5份送：马林科夫同志

第6份送：贝利亚同志

第7份送：米高扬同志

第8份送：卡冈诺维奇同志

第9份送：布尔加宁同志

第10份送：维辛斯基同志

第11份送：葛罗米柯同志

第12份送：副本

发自平壤

1950年5月30日13时40分第16030号

16033 16044

专号：第 408–410

文件 022

葛罗米柯关于斯大林同意进攻日期致什特科夫电

（1950 年 6 月 1 日）

专号：第 333 号

密码电报

平壤 苏联大使 第 1 份

特档

优先拍发

1950 年 5 月 31 日

答复您的第 408–410 号电报。

上级赞成您的建议。药品和石油将提前收到。

葛罗米柯

1950 年 6 月 1 日

分送：

1. 斯大林同志
2. 莫洛托夫同志
3. 马林科夫同志
4. 维辛斯基同志
5. 做副本用

文件 023

葛罗米柯关于朝鲜军事情报呈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6月20日）

绝密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莫斯科时间22时，什特科夫同志（从平壤）打电话报告，两小时以前（莫斯科时间20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截获南朝鲜军司令部的一项命令，该命令指示南朝鲜军在一小时内（即23时）向北方发起进攻。什特科夫同志报告，该命令以如此公开的方式传送，在他看来，整个事情是值得怀疑的。什特科夫还报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已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葛罗米柯

抄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

文件 024

什特科夫关于转呈朝鲜外务省通报致葛罗米柯电

（1950年6月26日）

发自平壤

致安·安·葛罗米柯同志：

在此向您转呈朝鲜外交部于1950年6月25日通过无线电广播所做的通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通报

今年的6月25日清晨，南朝鲜傀儡政府所谓的民族国防军部队，沿整个三八线向北朝鲜发起了突然进攻。开始突然进攻的敌人，攻入了北朝鲜境内，纵深达三八线以北1—2公里的海州以西地区，以及金川、铁原地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给保安部队下达了命令：打退攻入北朝鲜境内的敌人的进攻。目前，共和国的保安部队正在顽强地抗击着敌人。共和国的保安部队在杨阳（Янян）地区已经打退了攻入北朝鲜境内的敌人的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责成外务省，警告南朝鲜傀儡政府当局，如果不立即停止自己在三

八线以北地区的冒险的军事行动的话，他们将采取坚决的措施消灭敌人，而对于所有这一切因冒险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南朝鲜傀儡政府当局将承担全部责任。”

什特科夫

文件 025

赖伊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第 473 次会议决议致苏联外交部电

（1950 年 6 月 26 日）

致外交部

莫斯科

荣幸地通报安全理事会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第 473 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内容。

“安全理事会，

在此提醒联合国大会在其 1949 年 10 月 21 日决议案中所做出的结论，即大韩民国政府是合法建立的政府，该政府对一部分朝鲜领土实行着有效的监督和管辖，在这部分领土上，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可以进行考察和咨询，绝大部分朝鲜人民居住在此地；该政府是在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次选举是真实有效的，是朝鲜那一部分地区选民意志的自由表示，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对选举进行了监督，这个政府是朝鲜唯一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在其 1948 年 12 月 12 日和 1949 年 10 月 21 日决议中表示出的担心，如果联合国成员国不停止行动的话——这些行动将会给联合国组织在确保朝鲜完全独立和统一方面取得的成果造成损失，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描述的状况，是对大韩民国和韩国人民的安宁和幸福的严重威胁，可能会导致公开的武装冲突，联合国大会对此也十分担忧。

怀着极其担忧的心情注意到北朝鲜军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行动，安理会决定，这样的行动是对和平的破坏，……[1]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缺行。

一、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呼吁北朝鲜政权立即将自己的武装力量撤回到三八线附近地区；

二、请求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

（一）尽快通报对于业已形成的局势自己的经充分考虑的建议；

（二）监督北朝鲜部队撤回到三八线附近地区；

（三）确保安全理事会了解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三、呼吁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在执行本决议过程中给予联合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并拒绝帮助北朝鲜政权。”

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

1950年6月26日

分送：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米高扬同志

卡冈诺维奇同志

布尔加宁同志

文件 026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战况致扎哈罗夫电

（1950年6月26日）

致扎哈罗夫[①]同志：

谨此报告关于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的准备与进程。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

敌军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以严

① 扎哈罗夫，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1898–1972），时任苏联军事部副总参谋长。

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①]的命令。

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4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袭。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

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

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为：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出版）。

在顺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

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

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

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

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

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

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半岛；第

---

① Д和Ч是苏联军事条令中发动进攻和军事行动开始时间的代号。

六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

在汉城方向，第一、四师攻占了云山、东豆川等城市，第二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

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

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十二步兵师、与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三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对北方的总结。

在人民军的作战行动中，最重要的不足之处必须指出以下几点：

一、从作战行动一开始，随着各部队和各军团的向前推进，就失去了自上而下各参谋部的联系。人民军总参谋部在第一天就已由于无法与任何一个师取得稳定的联系，因而不能指挥战斗。

军团下属各部队的指挥员并不寻求与上级参谋部取得联系，营长以上的指挥所未经上级参谋部同意即自行变更，总参谋部至今未与沿东海岸行动的那个旅和第十二步兵师取得联系。

二、朝鲜人民军的指挥人员没有战斗经验，在苏联军事顾问撤离后，他们不善于组织指挥战斗，不善于在战斗中利用大炮和坦克，并且不能保持联系。

三、但是，我们的军事顾问注意到朝鲜人民军各作战部队的高昂情绪和完成当前任务的坚强意志。

四、朝鲜北方人民对于开始的战斗行动在政治情绪上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朝鲜人民军必胜的信心。

6月26日，金日成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告朝鲜人民书，阐述目前国内形势并提出了击溃敌人、统一朝鲜的任务。

五、朝鲜人民军司令部采取措施整顿与各部队、各战斗指挥机构的联系。为此目的，人民军指挥所已迁移至铁原地区。民族保卫相、总参谋长和首席军事顾问及一批军官即将前往朝鲜人民军指挥所。

对南方的总结。

军事行动开始后头两天的情况表明了以下几点：

一、敌人进行抵抗并在战斗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退却，未发现南朝鲜军队大批投降和被俘的情况。

二、南朝鲜傀儡政权开始从纵深地区调出部队，企图阻止人民军推进。

三、人民军发起进攻的第一天引起南方仓皇失措。南朝鲜政权与美国大使亲自

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南朝鲜人民保持平静。南朝鲜军参谋部发布关于南朝鲜军取得胜利的虚假新闻。

什特科夫

1950 年 6 月 26 日

文件 027

什特科夫转呈朝鲜人民军通报致葛罗米柯电
（1950 年 7 月 1 日）

非密码专信

电报

发自平壤

1950 年 6 月 30 日

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

葛罗米柯同志：

在此转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 6 月 30 日通报。

为把我们的祖国变成殖民地，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怂恿其代理人——李承晚卖国贼集团，悍然发动了国内战争，趁机开始武装干涉朝鲜的内部事务。自 6 月 26 日起，美国的空军开始轰炸城市和乡村。6 月 26 日 11 时，美国的 9 架飞机袭击了开城（Кэсан）的人民军部队。我们的空军击溃了美军，并跟踪美军飞机，在汉城附近击落了两架 B–29 敌机。6 月 28 日 17 时 30 分，6 架美国飞机出现在三八线以北的金川地区，其目标是对平壤市进行袭击。我们的空军在金川和载宁（Кеден）地区立即与敌人展开了战斗。战斗结果是一架美机被击落。也是这一天，美国飞机大规模集结，对已被人民军解放的汉城进行了轰炸。人民军空军中队参加了与美军的空战，并迫使美机返回。同时还击退了在水原机场上空巡逻的一架 4 引擎的美机。接着又对位于该机场内的 4 架相同型号的美机进行了轰炸。在空战中人民军空军中队损失了 4 架飞机。6 月 29 日 17 时 30 分，27 架美国歼击机对平壤市进行了轰炸，向和平居民投下了重量为 50–500 公斤的炸弹 300 多枚。由于野蛮的轰炸，有许多和平居民丧生。

关于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委员会的通报

平壤，6月29日。由于英勇的人民军的顺利反攻，解放区的居民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6月27日，黄海道的玉坪（Енбяк）郡重建了人民委员会，而6月28日瓮津郡建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临时人民委员会是在有居民各阶层代表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建立的。参加临时人民委员会的有工人和农民代表、文艺工作者、专家，还有保卫人民利益与李承晚反动集团进行斗争的游击队员代表。

关于南方游击斗争的通报

平壤，6月29日。英勇的人民军为拯救祖国和人民而斗争，对敌人的进攻进行了还击，朝鲜南方的游击队员和居民支持人民军的反攻行动，他们为粉碎溃退的李承晚傀儡军队展开了残酷的斗争。根据收到的情报，庆尚南道山清郡的居民，与活动在镇山市的游击队联合起来，对溃逃的李承晚的所谓“国防军”部队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消灭反动的地主分子和警察，并扩大了自己的活动区域。朴清（Босенф）地区、全罗南道和忠清南道、庆尚南道的游击队，在居民的支持下扩大了解放区，在进行激战的同时不断向前推进。釜山和马山地区，在开展游击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人民运动，这使傀儡政府的军队和警察陷入混乱状态。

什特科夫

1950年7月1日

文件 028

斯大林关于朝鲜战局的指示致什特科夫电

（1950年7月1日）

平壤

苏联大使：

一、你对朝鲜司令部的任何计划都没有报告。司令部是否打算向前推进？还是决定暂停推进。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外国干涉的机会就越少。

二、还要报告：朝鲜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地区的袭击，他们是被吓坏了，还是在继续顽强坚守。

三、朝鲜政府是否打算对袭击和武装干涉提出公开抗议？我们认为必须这么做。

四、我们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将这点通知金日成。

第362号电

冯西[1]

1950年7月1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04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07

文件 029

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朝鲜人民军损失情况的报告

（1950年7月3日）

一、空军——飞机36架

其中：

——在机场被摧毁26架；

——空战中被击毁10架。

二、海军舰艇——海战中被击毁：

——鱼雷快艇3艘（两艘沉没，一艘在岸边抛锚）

——小型猎潜艇2艘（在岸边抛锚并被击毁）

帕夫洛夫斯基　中将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37

① 冯西是斯大林的化名。

文件 030

斯大林关于中国在中朝边境集结部队问题致罗申电

（1950年7月5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1950年7月5日23时45分收到

1950年7月6日0时55分发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

一、我们同意中国同志在接纳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让印度居间调停的意见。

二、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三、您关于苏联飞机在中国东北领空飞行的消息未得到证实。已下令禁止此类飞行。

菲利波夫

1950年7月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15

文件 031

斯大林关于向朝鲜提供武器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

（1950年7月6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同志：

复第439号密码电报。

一、武器将通过满洲里、安东、新义州运送。

二、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三、我们全部供给 2 个师、2 个坦克旅和 12 个营使用的武器、坦克以及其他军需品，然而我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要补充现有的师并使其兵员达到 12000 人。必须在各师建立征兵机构，负责补充兵员并对其加以审查和训练，然后补充到各师。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 374 号密码电报

冯西

1950 年 7 月 6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0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16

文件 032

什特科夫关于同金日成会面情况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7 月 8 日）

第 477 号

1950 年 7 月 7 日，根据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会了面。

会谈一开始金日成便问道：嘿，苏联顾问的事情进展如何？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汉城。我答道，近两天我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至今仍未接到上级关于苏联顾问可以到三八线以南的指示。

金日成说，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姜健向他询问苏联顾问是否与自己一同前往南部。金日成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于是姜健声称，如果苏联顾问不到汉城来，自己便什么也干不来。因为没有苏联顾问自己便无法指挥部队。

我再次答道，关于这一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金日成说，如果苏联顾问不去汉城，那就意味着失败，再说一次，就是崩溃。金日成接着说，姜健请他立刻正式致函苏联政府，请求其允许苏联顾问前往汉城，到各集团军领导小组中去，自己将保证苏联顾问的安全，不会让他们当敌人的俘虏。

随后，金日成又让我向他解释成立预备役兵团、对其中人员进行培训和组建步兵营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的意义。

我向他作了详细的说明。

会谈期间我通知金日成，朝鲜最近预订的空军设备、武器和弹药已装运，将于7月8日运抵边境口岸。他问他，关于这些货物经中国铁路转运至朝鲜境内之事是否已与中国人达成协议。

他答，正式的协议还没有。不过，他已给高岗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与此同时，金日成带着明显的不满说道，他没有人可以签订协议，因为在平壤没有中国代表。最后，金日成再次请我加快关于苏联顾问问题的答复。

金日成接着说，各地区均给他打电话，都是关于美国空军的空袭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今天美国人炸毁了一个铁路枢纽，咸兴（Канко）地区被敌机摧毁的多座铁路桥仍未恢复。

在我与金日成的多数会面中，这是我首次看到他的心绪如此的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193-194

文件 033

什特科夫转呈金日成关于派遣苏联顾问的请求致斯大林电

（1950年7月8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1950年7月8日9时26分发自平壤

1950年7月8日11时15分收到

1950年7月8日11时35分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

致冯西同志：

我收到金日成给您的信，内容如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大元帅约·维·斯大林同志：

请接受我们对您的深深敬意和对于您在我们争取独立斗争中给我国人民的宝贵援助的感谢。

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

前线司令部和两个军团司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国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

忠实于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

1950年7月8日于平壤”

第481号密码电报

什特科夫

1950年7月8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3-144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151

文件 034

斯大林关于派遣苏联顾问事宜致什特科夫电

（1950年7月8日）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8局

密码电报 第36275号

只用电报线拍发

平壤

苏联大使：

看来你们的表现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们事先没有询问我们，就答应朝鲜人给他们派苏联顾问。

你们应该明白，你们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

按所要求的数量派出我们的顾问，让他们穿上便装，作为《真理报》的记者到前线参谋部和军团部队中。

你们本人将对苏联政府负责，保证我们的顾问不落入敌人手中。

第380号密电

冯西

打印出3份

第1份分送：斯大林同志

第 2 份分送：斯大林同志

第 3 份分送：布尔加宁同志

由布达诺娃打印，1950 年 7 月 8 日 19 时 35 分

核校：苏军总参谋部第 8 局第 4 处拍报室主任冈察尔上校

文件 035

斯大林关于英国的建议和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致罗申电

（1950 年 7 月 13 日）

1950 年 7 月 13 日 5 时 50 分

第 5426 号

请将下列意见转达给周恩来或毛泽东：

“一、英国人通过其驻莫斯科使节向我发出正式声明，鉴于安理会相关决议，他们暂且无法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当然，如果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将自己的军队撤回三八线，那么这可能会有助于加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

英国人请苏联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

苏联政府认为英国人的这一要求是无礼和不可接受的。

我们认为应这样答复，即在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朝鲜问题已严重复杂化了。如此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有苏联、中国和朝鲜代表参加的安理会，并认真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才可能得以解决。

请通报你们的看法。

至于印度大使的声明，我们决定不予以答复，因为我们已经获悉，这个声明只是该大使的个人观点，与印度政府没有关系。

二、我们还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境地区部署 9 个师的兵力。如果你们已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派遣携有 124 架喷气式飞机的歼击航空师去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我们认为，在苏联飞行员的帮助下，中国飞行员经过 2—3 个月的培训，我们再将所有空军方面的物资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这样，你们便可完成在上海组建空军师的工作。

请通报你们的意见”。

请通过电报联系。

菲里波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5

文件 036

金日成致关于同意苏联方案给什特科夫的信

（1950 年 7 月 14 日）

1950 年 7 月 14 日

朝文译文

苏联驻朝鲜特别全权大使

Т.Ф. 什特科夫

请向苏联政府转达下列内容：

关于英国致函苏联政府，要求朝鲜人民军部队撤回三八线一事，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一样，均认为英国人的这一要求是无礼的和无法接受的。

我们完全同意苏联政府的意见，即朝鲜问题应在有苏联、中国和朝鲜代表参加的安理会进行讨论。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将采取一切手段，以便尽快将美国侵略者彻底赶出朝鲜。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

АПРФ，ф.3，оп.65，д.826，л.108-109

文件 037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政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援助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7 月 15 日）

1950 年 7 月 15 日

第 586 号

根据金日成 7 月 13 日的邀请，我与他会了面。会谈一开始金日成便通报说，他已会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司童明（Си Тунмя）。

受周恩来的委托，中国代办向金日成转达道，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为了能及时满足朝鲜方面的需要，请金日成在提出帮助要求时不要客气。

该代办接着说，周恩来在与他谈话中声称，中国人认为，不能容忍美国人对朝鲜发生的战争的干预。

中国代办请金日成向他提供比例尺分别为 1 比 10 万，1 比 20 万，1 比 50 万的朝鲜地图各 500 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为此，他将从使馆派两个人（都是上校），专门负责与国防部保持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代办要求金日成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

接下来，金日成又说，汉城有 150 万居民，很多人都失了业，工厂暂时又无法开工。有鉴于此，他打算让政府通过关于征招汉城工人到北朝鲜工厂工作的决议，而将另一部分（汉城）人迁移到农村。金日成指出，在北京的中国人也采取过类似的举措，并就此征询我的意见。

我答，这是一项有益和合理的举措，如果他们能组织得力的话。

接着，金日成又将话题转向前线战况。他说，由于美国地面部队，尤其是美国空军的活动，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他心情很沉重。因而他想派朴宪永或金枓奉去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量关于朝鲜今后该怎么办的问题。金日成认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我有意回避了他的这一问题，只是对他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

金日成没有重复上述问题，只是说，为了加强对南方的领导，他准备派以朴宪永为首的领导小组去汉城。

由于您的电报，我与金日成再次会面时，他也没再重提那个问题。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03-305

文件 038

什特科夫关于前线状况和中朝讨论中国参战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7 月 20 日）

1950 年 7 月 20 日 2 时 30 分（电报发出时间）

第 649 号

7 月 19 日，应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见了面。

会谈伊始金日成谈了前线战况。他生气地说，战局变得让人难以理解，而这对我们而言可能意味着灾难。一切变故都是由于美国空军。没有人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金日成说，他今天已经两次责骂了前线指挥官金策和前线司令部负责人姜健，可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无法理解整个形势的政治意义。

全世界都在关注：看我们将占领大田，还是将因此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淖。

目前已有三个美军师进入这一地区。这些美军的到来使整个战局变得复杂化了，可他们（指人民军前线指挥员们）仍不能明白这一点。

接着，金日成又指出，根据我方无线电台所截获的情报显示，美国人已命令：无论如何要阻止北方人的进攻，不让其突入安东和尚州（Сйосю）地区。

我已再次向前线指挥员下达了命令，可他们没有有效地组织和执行我的命令。其借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空军，白天无法展开行动，而晚上又不便于采取行动。

接下来，金日成问我，应当采取哪些必要措施才能扭转目前前线的战局。

我指出，他应当比我更了解前线的情况。我说，根据苏联顾问的通报，人民军部队借口空军问题，近期实际上已停止了作战行动。要知道，美国空军的空袭活动是有时间间隔的，如早上 6—7 点钟，人民军部队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时间差来进行作战行动。我方部队的进攻完全可以从早上 4 点就开始，但人民军各军和前线指挥部对部队的管理不善，没有要求部队坚决执行战斗命令。

金日成说，自己想亲自去汉城，就地与各军和前线指挥部的高级将领交谈——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并警告他们，促使其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承担起对民族应负的责任。

我答，这是您的事。

接着，金日成又对我说，他想向我报告关于他的代表去中国的结果。

在与中国代办会谈后，金日成决定派贸易副部长李去中国，请求其给予武器和马匹方面的援助，因为北朝鲜目前急需这方面的物资。

中国人答应给朝鲜 30000 支步枪，2000 挺手提机枪，200 挺重机枪，300 门 81 毫米迫击炮和 1000 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 7 月 25 日起运。

金日成又说，他的代表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对朝鲜战事很感兴趣。但他的代表什么也说不出，因为他对战争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太了解。

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朝鲜同志怎么看——美国人是否将在朝鲜长期参战。在此，毛还加了这么一句话：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他们是不会完全撤离朝鲜的，为了赢得胜利，他们会向朝鲜投入很多自己的军队。

金日成是否想过这样一问题，如何撤退，从那里开始后撤，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

毛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是否想过去向其他国家求助，以便后者派自己的部队来援助朝鲜。如果有过这样的请求，那么中国人也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四个军——共 32 万人。

如果我们以外籍军团的方式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朝鲜，那么，就不会因此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请金日成仔细考虑一下，并于 8 月 10 日以前向我们通报他的意见。

金日成接着说，毛泽东请我们派一个了解目前朝鲜战争状况的军事代表去中国，并要求该代表必须在 8 月 1 日以前抵达中国。

金日成问我，派谁去中国合适呢，姜健是不能去的，他想派崔庸健（国防部长）。

我回避答复这个问题，并声称，这是您的事。

金日成将话题转到关于外籍军团的问题上，他问，斯大林同志对此有何意见。

我答，关于斯大林同志对这一问题有何见解，我目前一无所知。

于是，金日成说，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只是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与斯大林同志协商过。

我再次答复道，我对此一点都不知道。

会谈最后金日成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并说，这是周恩来的来信，其中罗列了中国人将援助朝鲜的武器清单。

金日成又补充道，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来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前来很困难。于是，他们请我们派军事代表去中国。

这样，此次会谈便结束了。

请通知我，中央是否将就上述所涉及问题给我指示，如果下次见面时，金日成再提出这些问题，我将何以应对。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52-355

文件 039

罗申转发毛泽东关于对中国提供空军掩护等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0年7月22日）

发自北京，1950年7月22日20时50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致菲利波夫：

我于7月22日14时30分从周恩来那里收到毛泽东给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

关于为中朝边境线地区我军部队提供空军掩护、我航空兵改装喷气式飞机并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的全部武器装备的问题，我们已进行了研究，对于您的这一提议特表欢迎，并对您和苏联政府所给予的援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

关于我歼击机改装喷气式飞机问题，拟按以下方法加以解决。在巴季茨基[1]喷气机团的基地上于近两个月内建立一个改装训练中心。

为培养160名机组人员，以便使用你方交给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我方拟首先对混成航空兵旅现有65名歼击机机组人员进行改装训练。待其改装训练即将结束时，即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将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各联合飞行技术航校1月份的毕业生中挑选人员进行第二批改装训练（100名机组人员）。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于1951年3-4月内完成接收新式喷气式飞机的工作。由此可见，我们完全能够在这一时限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

为及时实现预定的改装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对60人同时进行训练的训练中心，并要为其提供训练器材、直观教具及最必需数量的教练人员。为实际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派我空军代表及首席空军顾问普鲁特科夫空军少将前往莫斯科就此相商，是适当的。

请将您的决定告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备注：在即将给您发出该电时，收到了苏联军事部[2]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给军事总顾问[3]和巴季茨基同志关于进行改装训练并将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朋友的指示。有鉴于此，总参谋部已同我军事顾问共同准备了一个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将中国的一个混成航空兵旅集中到上海、南京、苏州地区进行改装训练。所缺飞行员由哈尔滨－锦州联合航校抽调。有关飞机的转场和人员的集中工作将于1950年11月完成。

今天，该计划将由中国政府审定并做出最后决定。毛泽东同志看来会将这一情况补充电告您。

第1503号电

罗申

1950年7月2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

---

① 巴季茨基，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1910-？），1948年毕业于苏联总参军事学院，1950年率苏联一个航空团进驻中国东北。

② 即原苏联武装力量部，1950年2月改称苏联军事部。

③ 指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1897-？），苏联空军元帅，曾任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空军集团军司令等职。时任苏联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

文件 040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政府通报战况及请求空军援助致苏联外长电

（1950 年 8 月 19 日）

1950 年 8 月 19 日 21 时（电报接收时间）

第 902 号

8 月 19 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苏联朝鲜族人）来找我，并说，他受金日成的委托向我通报一件秘密问题。

我问是什么问题。文日说，正卧病在床的金日成把他找去，并以忧心如焚的心情告诉他，自己收到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姜健一份问题非常严重的报告。

在报告中文日说，敌人开始重型飞机对我军实施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我们在前线的所有部队都遭到了这样的轰炸。

敌机以 30—40 架为一编队向我部队上空投掷了许多箱子，这些箱子在空中打开，从中散落下许多小型炸弹。

由于这样的轰炸我方部队，不论是有生力量，还是武器装备均遭受了重大损失。

1950 年 8 月 18 日，由于受到这样的空袭，我第 4 师几乎无一人生还，该师师部被摧毁，师长牺牲。

第 3 师和第 12 师也遇到同样情况，由于受到敌机轰炸，他们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阵地。

接着，文日补充道，他从来未见过金日成的心情如此沮丧。

文日又说，金日成派他来除向我通报此事之外，还想询问一个问题，即朝鲜人民军是否能得到帮助。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

我问，在前线指挥部负责人的报告中是否有因敌机轰炸而造成的部队损失情况相关资料。

文日答，报告中没有写这方面的情况，但前线指挥员许诺将派专人送来。

我答，关于这一问题我无话可说。我以半玩笑式的口吻指出，前线指挥官夸大了美国空军炸弹的威力。关于美国空军的炸弹，一位英国记者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他认为，其威力不大。

我接着指出，离灭亡越近，敌人的抵抗也就愈加疯狂，美国陆军表现不佳，美国人只好让空军参加地面作战。

美国人有可能对前沿阵地实施轰炸，因为近期人民军部队向前推进不多，前线阵地比较固定。

应当要求金日成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快向前推进，从而减少因敌机轰炸给部队造成的损失。

我又指出，我们苏联军队在 1941 年时没少挨过德国人的轰炸，但我们的士兵依然在战斗中表现优秀。人民军部队也是好样的，只是需要好的指挥和领导。如果指挥得好，他们也将会表现神勇，美国空军是不可能对他们的前进形成阻碍的。

文日答应将向金日成转达我的意见。

近期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

他对美国飞机轰炸（北朝鲜的）工业设施和铁路交通非常担忧，声称，美国人将摧毁北朝鲜的所有工业，我们很长时间也是无法重建这些工厂的。

而如今美国人对人民军部队空袭的加强，更增加了他的忧虑，因为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看来，他是对人民军部队的思想心理状况，对他们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

在与我和军队的同志进行会谈时，金日成曾对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摧毁朝鲜的交通和工业颇有微词。

兹按情报程序报告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621-623

文件 041

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朝鲜人民军空军情况的报告

（1950 年 8 月 26 日）

1950 年 8 月 26 日

编号	名称	参战初期总数	截至 7 月 20 日状况		截至 8 月 24 日状况	
			损失	现存	损失	现存
1	强击机	93	36	57	109*	34
2	歼击机	84	49	35		2
3	强击机飞行员	25	10	15	8	17
4	歼击机飞行员	26	15	11	16	6

*1—2 两个机型总共损失数量。

远东方面军副司令　高尔拉切夫上校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 126

文件 042

斯大林关于同意向中国派遣防空专家问题致科托夫电

（1950 年 8 月 27 日）

发自莫斯科。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北京

致科托夫同志[①]：

复第 1726 号电。

请拜访周恩来，并将对他关于派军事顾问的电报的复电面交他。

“周恩来同志：您关于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请求，已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同意。即将向中国派出 38 名顾问，其中 10 名为防空专家，28 名为空军专家。

① 科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

至于派遣其余 26 名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尚无派遣这些顾问的特殊需要，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已给防空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除完成其主要工作外，还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已给空军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

上述 38 名顾问将于最近动身前往中国。

菲利波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4

文件 043

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命令第 151 歼击航空师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给布尔加宁的报告

（1950 年 8 月 28 日）

H.A. 布尔加宁在该文件上作了如下批示："退还 A.M. 华西列夫斯基。8 月 29 日。布尔加宁"

1950 年 8 月 28 日

第 283608 号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 7 月 21 日决议第 3201-1334 号，截至今年 8 月 10 日第 151 歼击航空师已彻底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区的集结任务。

鉴于今年 8 月 27 日美国飞机曾对（满洲）中国居民点和火车站实施过空袭和扫射，我们请求允许让第 151 歼击航空师承担为人民解放军第 13 朝鲜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的战斗任务。该师目前已完成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集结，并继续肩负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再培训的任务。

综上所述，我们将下达给第 151 歼击航空师师长的命令草案，并请求上级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马兰金

沈阳 第 151 歼击航空师师长别洛夫（收）

复印件：北京 科托夫同志（收）

莫斯科 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负责人日加列夫同志（收）

地图（比例尺）1 比 1000000——1942 年

一、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再培训任务的同时，自今年 9 月 1 日起第 151 歼击航空师在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将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 13 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二、在执行掩护任务过程中，第 151 歼击航空师的飞机不得飞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境线。

三、与第 13 兵团司令部（位于安东）一起制定同人民解放军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协作计划。

该师空中掩护行动计划必须通过（苏联）沈阳总领事馆以最便捷的外交邮件渠道呈交苏军总参（审阅）。

四、涉及空战方面的活动报告必须在每天 20 时以前立即通过热线电话用密码暗语向苏军总参谋长汇报。

五、接到（上级）指示时必须（回电）确认，在完成战斗准备时亦必须（向上级）报告。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

文件 044

斯大林关于关于美国参战致金日成电

（1950 年 8 月 28 日）

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第 8 局

第 75021 号密码电报

致苏联驻平壤大使

向金日成口头转述下述电文。如果他索要该电文的书面文件——那就把书面文件给他，但是上面没有我的签名。

1.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金日成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表示祝贺，因为金日成同志正领导朝鲜人民在伟大的解放斗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苏共中央坚信，干涉者们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不光彩地逐出朝鲜。

2. 金日成同志不应当因下面的事实而感到局促不安，即他在反对干涉者们的

战争中没有彻底获胜，并且胜利有时因前进受阻甚或一些局部挫折而被中断。在这种战争中，持续获胜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俄国人在内战期间，甚至更多的是在和德国的战争期间，也没有取得持续不断的胜利。朝鲜人民获得的最伟大胜利就是，朝鲜目前在世界上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国家，而且已成为亚洲打碎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所有遭奴役人民的军队现在从朝鲜人民军那里学会了给美国人以及任何帝国主义者决定性打击的技艺。此外，金日成同志不应忘记，朝鲜目前不是孤立的，它有盟友。这些盟友正在为它提供援助和将要为它提供援助。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联合干涉期间面临的形势要比朝鲜同志当前面临的形势糟糕好几倍。

3. 建议金日成同志不要使其空军过于分散，而是要把它集中到前线。人民军每次在对前线的任何一部分发动进攻之前，都需要由攻击机对敌军部队实施几次决定性的打击，同时需要由战斗机尽可能地保护人民军部队免受敌军飞机的轰炸。如必要的话，我们可以为朝鲜空军增添额外的攻击机和战斗机。

冯西（斯大林）

1950年8月28日

No. 483/sh

第一号副本送交斯大林

文件 045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致苏联外长电

（1950年8月28日）

1950年8月29日3时（文件打印时间）

第981号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政府电话向我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济物浦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

最后在电话中金日成要求我晚上与他和朴宪永见个面，谈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表示同意。

我们没有预定见面的时间。

当地时间20点整，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打来电话，请求来见我。

我表示同意。

文日来了以后便说，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决定任命共和国副检察长为反间谍部队负责人，劳动党平安书记为内务副相（此两人均为苏联朝鲜族人）。文日问我，苏联方面是否对此持异议。

我答，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因为这两个人工作都很踏实，有工作能力。

然后，文日在准备离开之时，又对我说了下面一些话：今天白天，金日成叫他去。金一边审视地图研究着前线的形势，一边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前线的局势很艰难。

金日成问文日，是否知道捷连季·福米奇（即什特科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文日答，他对我的观点一无所知。

金日成接着说，他想与捷连季·福米奇（即与我）见个面，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和关于自己想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信中谈谈朝鲜的局势和请其对朝鲜今后的行动提些建议。

文日似乎如此作答，即斯大林同志也正在研究朝鲜的局势。

金日成又谈了关于自己仍然想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事先了解捷连季·福米奇（即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文日几次强调了关于金日成打算给斯大林同志写信的事。

随后，文日说，金日成想把这一问题提交政治委员会，并与各位委员交流意见。

我安静地听完文日的话，说道，金日成工作太重，近期过于劳累。文日和其他助手们应当给他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以便他能得到休息。

看来，文日已明白，我不想与他讨论他刚提到的那个问题。于是，他便说道，关于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给我听的。似乎，金日成已请他不要对我讲这些。

谈话到此结束。

我的观点：金日成原打算与我见面时提出这些问题，但不能决定是否由自己亲自把这些问题向我当面提出。于是便决定派文日来刺探我的口风。

原定我与金日成和朴宪永的会面最终并未成行，因为金日成后来再未就这一问题给我电话。

近期，由于前线迟滞不前和美国空军不断对人民军部队、北朝鲜交通线实施攻击，大量工业企业遭到严重破坏，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

信心。因而他多次试图征得我的同意，以便其去请求中国人派兵来帮助朝鲜。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7，л.666-669

文件 046

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向旅顺港地区增派歼击航空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9月13日）

1950年9月13日

第283781号

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今年9日13日命令，兹报告向旅顺地区增派歼击航空兵的新计划。

为了加速米格–15歼击机航空团在旅顺地区的集结，建议将原部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303航空师第177歼击航空团和一个航空机械营调往该地。

该团在旅顺地区集结的最后日期为今年10月6日，并于10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截至1951年3月1日前，该团将扩编为一个米格–15歼击航空师，其中其他两个团及其指挥机关全部均来自第151歼击航空师。后者将于1951年2月1日前结束在沈阳地区对中国飞行员的再培训工作。

建议任命第303歼击航空师副师长Халутин上校为第177歼击航空团团长。此人一贯表示良好，经验丰富，而且跟该团所有指战员都很熟悉。

当该团扩编为师级编制后，Халутин将被任命为该师师长。

请研究和确认我们就这一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决议草案。

华西列夫斯基

马兰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0-171

文件 047

马兰金关于截至 9 月 14 日 8 时朝鲜战局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 年 9 月 14 日）

1950 年 9 月 14 日

第 283784 号

一、朝鲜人民军部队继续巩固已占领阵地，实施侦察，并对各方向敌人的反攻进行了反击。

二、9 月 13 日第 6 步兵师击退了敌人一个携有 30 辆坦克的加强营的反扑。该师侦察小分队，在敌后活动的同时，还对新马山（Ню-Масан）以东高地上的美军炮兵阵地发动了进攻，共消灭 105 毫米火炮七门和 60 名以上敌兵。

9 月 13 日第 4 步兵师在元山以西两次击退了敌人一个带有坦克的步兵加强营的进攻。

第 15 步兵师在永川（Эйсен）东北地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在正面，敌人纠集了 6 个步兵团，并有美国空军的集群式轰炸，在侧翼，还有坦克的强大包抄。战斗结果：我方第 15 步兵师毫无组织地向东北方向退却。截至 9 月 13 日我们对第 15 步兵师的具体位置还不清楚，对该师的情况仍需进一步了解。

人民军其他部队均已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并在实施侦察。9 月 13 日第 8 步兵师几次击退了敌人组织的整排和整连兵力的反攻。

三、经过 8 个小时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准备后，敌人于 9 月 13 日 15 时开始在济物浦地区实施海军登陆作战，此次登陆行动共有军舰五艘和六艘登陆驳船。我方岸防火炮对登陆的敌人实施了攻击。

17 时敌人重新开始炮击，并对济物浦港实施空袭。

为了加强反登陆兵力，人民军第 18 边防旅被从汉城调往济物浦地区。

四、9 月 13 日美国空军飞机以 25—30 架为一编队为自己部队的进攻提供空中支援，对人民军作战部队实施轰炸和突袭，其攻击目标主要集中在第 15 步兵师防守区域。

敌人的轰炸机还对人民军的交通线和后方进行了空袭。

整个 9 月 13 日一天，敌人共出动飞机达 1000 架次以上。

9 月 11 日我方步兵用火炮击落了敌人一架侦察机，9 月 12 日击落两架强击

机。

苏军代总参谋长　马兰金大将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56-157

文件 048

马兰金关于联合国部队试图在仁川登陆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 年 9 月 15 日）

第 283796 号，1950 年 9 月 15 日 13 时 30 分

1. 由于与前线指挥部失去联系，关于 9 月 14 日朝鲜人民军部队的行动和状况仍没有消息。

9 月 14 日敌人用舰载大炮和飞机对济物浦地区的海岸实施了炮击，并不断试图实施登陆。但敌人的登陆行动（关于敌人登陆部队的兵力构成和武器配置情况仍未得到上报）均被人民军岸防部队击退。

在群山（Гунзан）和木浦（Моппо）等地区敌人用少量部队进行了登陆侦察，并对我岸防部队进行了炮击。在群山地区登陆的敌侦察小分队被我歼灭。

2. 根据无线电侦察资料显示，朝鲜前线战局并未发生重大变化。敌我双方都在巩固现有阵地，并相互实施侦察。在庆州（Кейсю）地区南朝鲜军队的首都师和第 3 步兵师，以及美军第 24 步兵师为占据有利阵地而与人民军部队进行了战斗。

美军第 25 步兵师第 27 团从马山（Масан）地区调往大丘（Тайкю），配合第 1 骑兵师作战。

3. 敌空军炸毁了分布在人民军主要交通线上的桥梁和渡口。9 月 14 日汉城遭到敌机轰炸。

苏军代总参谋长

大将马兰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58

文件 049

葛罗米柯关于对周恩来的答复致罗申电

（1950 年 9 月 20 日）

北京

苏联大使：

鉴于您与周恩来 9 月 18 日就朝鲜军事形势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您应该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根据莫斯科的委托向周恩来转达如下内容：

“第一，从周恩来与罗申同志、科托夫同志和孔诺夫同志的会谈内容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朝鲜朋友没有向中国同志认真地通报朝鲜的军事形势，以及朝鲜军队指挥部和朝鲜政府就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如果金日成没有定期向你们提供情报，那么这应该解释为与前线的联系薄弱，而并非是朝鲜同志不想这样做。

很遗憾，莫斯科通过自己驻平壤的大使所收到的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情报，也是不全面的和过时的。显然，这是由于朝鲜人民军目前还很年轻、缺乏经验，以及朝鲜领导人与自己的军队联系薄弱，还由于朝鲜同志没有及时认真地分析前线的形势。应该记住，朝鲜人民军和朝鲜共产党都过于年轻，他们总共才只有 3 个月的战争经验。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就会对朝鲜人民军在与外国标准化武装军队的战斗中取得的重大成绩感到惊奇。

第二，自然，失掉仁川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这个缺陷说明朝鲜人民军不仅要与李承晚军队作战，而且还要与英美军队以及他们的空军和海军作战，这就造成了许多新的额外的困难。毫无疑问，如果朝鲜人民军只是与国内的李承晚军队打交道，如果不失掉仁川的话，朝鲜早就肃清反动分子了。

第三，涉及到中国同志们的意见，即周恩来就消灭登陆的敌人和建立强大的集团军队以便将主力部队从前线撤回到北方的措施方面所阐述的那些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打算是正确的。

在我们看来：

（一）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在汉城地区采取的措施，说明他们对敌人采取的行动的整个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应该认为，敌人开始的这次行动，仅限于第一批登陆人员的这些数量。大批的船只可使敌人不断地加强自己在汉城地区部队的实力，其目

的是摧毁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并以此来切断主要战线与供应基地的联系；

（二）在业已形成的严重局势下，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所采取的调集一些独立营和团并利用这些力量的战略计划是错误和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这些营和团被分批地消灭，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

（三）消除目前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可通过立即将主要战线的部队大批调到汉城地区，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形成主要战场的方法来实现；

（四）东南地区的部队应该转入积极的防御状态，其任务是阻止向汉城战场突击的敌人；

我们已经将自己的这些意图通过我们在平壤的苏联大使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第四，涉及到可能通过和平的途径解决朝鲜的问题，我们觉得，最近由于空降兵在仁川地区登陆，朝鲜的军事形势复杂化，使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也接到了指示，坚决捍卫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第五，我们同中国同志一样，都认为，美国人将继续坚持不让人民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政策。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的代表团已经得到指示：坚决将国民党帮派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

请电告您与周恩来的会谈结果。

受上级的委托

葛罗米柯

注：以下是该文件的初稿

草稿

北京

苏联大使：

鉴于您与周恩来9月18日就朝鲜军事形势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您应该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根据莫斯科的委托向周恩来转达如下内容：

“第一，从周恩来与罗申同志、科托夫同志和孔诺夫同志的会谈内容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朝鲜朋友没有向中国同志认真地通报朝鲜的军事形势，以及朝鲜军队指挥部和朝鲜政府就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在我们看来，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并认为金日成必须改正这一点。

很遗憾，莫斯科通过自己驻平壤的大使所收到的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情报也是不全面的和过时的。显然，这是朝鲜领导人与自己的军队联系薄弱的结果，还由于

朝鲜同志没有及时认真地分析前线的形势。

第二，涉及到中国同志们的意见，即：周恩来就消灭登陆的敌人和建立强大的集团军队以便将主力部队从前线撤回到北方的措施方面所阐述的那些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打算是正确的。

在我们看来：

（一）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在汉城地区采取的措施，说明他们对敌人采取的行动的整个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应该认为，敌人开始的这次行动，仅限于第一批登陆人员的这些数量。大批的船只可使敌人不断地加强自己在汉城地区部队的实力，其目的是摧毁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并以此来切断主要战线与食品基地的联系；

（二）在业已形成的严重局势下，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所采取的调集一些独立营和团并利用这些力量的战略计划是错误和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这些营和团被分批地消灭，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

（三）消除目前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可通过立即将主要战线的部队大批调到汉城地区，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形成主要战场的方法来实现；

（四）东南地区的部队应该转入积极的防御状态，其任务是阻止向汉城战场突击的敌人；

我们已经将自己的这些意图通过我们在平壤的苏联大使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第三，涉及到可能通过和平的途径解决朝鲜的问题，我们觉得，最近由于空降兵在仁川地区登陆，朝鲜的军事形势复杂化，使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也接到了指示，坚决捍卫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第四，我们同中国同志一样，都认为，美国人将继续坚持不让人民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政策。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的代表团已经得到指示：坚决将国民党帮派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

请电告您与周恩来的会谈结果。

葛罗米柯

文件 050

罗申关于同周恩来谈话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9 月 21 日）

1950 年 9 月 21 日罗申拜见了周恩来并向他讲述了苏联政府收到 9 月 20 日电报后的指示。此后罗申向莫斯科报告：

周恩来对收到电报表示感谢，并且对关于朝鲜形势的评估符合实际而表示满意。他表示，9 月 19 日他们已经向平壤发去了建议，其内容已经于 9 月 18 日同苏联代表谈过了。19 日当天中国驻平壤大使电告了金日成的原话，“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战斗”。此外就没有任何来自朝鲜的消息。

周恩来进而又指出，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对接纳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会。中国政府现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南方边境，因为美国向那里投放国民党分子的行动开始活跃了起来。

关于中国国内社会对朝鲜事件态度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总体上是正面的”。民主党派领袖们认为，美英没有准备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一些民主人士表示，美军在济物浦登陆后，战争将延长，这必然让中国蒙受一定的损失。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1

文件 051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询问中国军队参战问题致葛罗米柯电

（1950 年 9 月 21 日）

第 1238 号，1950 年 9 月 21 日 3 时 45 分（接收电报时的打印时间）

1950 年 9 月 20 日，根据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见了面，当时在场的还有朴宪永。

会谈伊始，金日成便指着汉城战争形势图说，敌人正在强渡汉江。

据悉，汉城西南战线局势稳定，但在金浦地区，由于敌人强渡汉江，形势严重。

这时，金日成问我，是否还可以预先采取一些措施来消灭渡河的敌人。

我答道，目前应当做的是：迅速将上述各师从主阵地上调往汉城地区。

此举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汉城地区前线的局势。我问金日成，目前这些部队都在什么位置。

金日成答，他已经向这些部队下达调往汉城地区的命令，但关于他们的具体位置，自己也不清楚。

这时，朴宪永向我们读了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发来的一封电报。后者在电报中通报说，周恩来召见了他，并询问了他其他一些问题。其中，关于美军在济物浦地区登陆，周恩来问李周渊，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朴宪永接着报告说，中国大使去了他那里，并告诉他：根据中国政府所获情报，在济物浦登陆的是由两个师组成的美军第10军和李承晚军队的一个旅。

关于周恩来就朝鲜政府给中国的建议而对李周渊所提问题，金日成解释道：周恩来指的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济物浦或镇南浦或元山登陆，他们——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问我，您认为应如何答复中国人。

我答，关于这一问题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金日成接着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战争经验。但到了我们这里，在如此众多的美国飞机不间断地对部队进行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呢，（真的很难说）。

此时，金科奉（最高人民大会主席团主席）走上前来，并说道：他们（指中国）有军队，部队战斗的也很勇敢。但美国空军的不断轰炸会给他们（中国军队）造成大量伤亡。自己曾与很多从前线回来的朝鲜军官和士兵交谈过。据他们说，美国空军的活动给朝鲜人民军部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

这里，大家都说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进行的相当艰难。

显而易见的是，朴宪永很想了解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即使至今他们（朝鲜人）仍坚持认为，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但如果有中国军队的参与，那么目前朝鲜战场上这种困难的局面就会有所改观。

朴宪永又指出，希望能让中国到朝鲜来参战，况且中国已与苏联有约在先。

我对这一问题避而不答。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文件 052

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向朝鲜派遣空军问题呈斯大林的报告

（1950 年 9 月 21 日）

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致斯大林同志：

关于调遣空军雅克 –9 歼击机航空团去保卫平壤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为加快调动，我认为派遣第 147 航空师第 34 歼击机团最合适。该团配备 40 架雅克 –9 飞机，现部署在滨海边疆区的伏罗希洛夫地区。该团可飞经中国境内，沿延吉 – 安东 – 平壤航线前往。该团的飞行需要两天。组织飞行时需要考虑在安东 – 平壤区发生不可避免的空战。

二、我们非常仔细地向什特科夫同志询问了以下问题：

由于敌方飞机的猛烈袭击，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内，平壤地区的机场是否适宜飞机降落。

在这些机场是否有航空服务人员、汽油和弹药。

三、如果朝鲜人没有地勤人员，就需要在该团出发以前，把这个团的航空技术营 223 人及机场技术设备用铁路经安东运往平壤。考虑到要经过安东地区渡过鸭绿江，该营的调动需要 5-6 天。

如果朝鲜人没有弹药和燃料，还要随技术营向平壤运去这些物资。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团在平壤进入最后的准备状态，考虑到人员的调派，需要 8—10 天。

四、考虑到朝鲜人在平壤地区没有对空观测和报警系统，为了给我们的歼击机团创造正常的作战条件，我们认为有必要随团运去几部雷达和一个通讯小分队，以便发现敌机并组织雷达站与机场之间的通讯联系。否则，我们的飞机在机场上将受敌机的突然袭击。

五、请允许我们在弄清朝鲜方面与派遣空军歼击机团有关的问题后，立即报告向平壤派出该团的全部计划。那时也将向您报告我们关于在该团驻扎的机场组织防空火力的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1]

1950年9月21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7，л.79-80

文件 053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讨论中国军队参战问题致葛罗米柯电

（1950年9月22日）

第1258号，1950年9月22日　20时30分（电报接收时的打印时间）

1950年9月21日，劳动党中央书记许哥而（苏联朝鲜族人）来找我。

会谈伊始，许哥而便说，他想向我通报一下关于1950年9月21日举行的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此次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议题：如何答复周恩来关于中国政府鉴于朝鲜局势复杂化而给朝鲜政府的建议。

金日成在会上读了朝鲜大使李周渊关于自己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的报告，并询问了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

朴宪永、金科奉和朴一禹在发言中均认为，（朝鲜）局势很严重，北朝鲜明显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

随后发言的金日成说，怎么会这样呢，要知道，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作好所有事的。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

金日成接着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加入朝鲜一方参战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难道这样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这里，金日成似乎引用了毛泽东曾说过的话：中国与任何国际条约都无关，也未参加联合国，因而可以帮（朝鲜）这个忙。

金日成声称，虽然苏联和中国都不愿意由于朝鲜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由于朝鲜——正如美帝国主义者们所言——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点，因而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

① 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95–1977），苏军元帅，时任苏联军事部部长。

金日成建议暂且不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我们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自己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

金日成接着说，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加速组建新部队，那么，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不过，北朝鲜人担心时间来不及了。

此次会议讨论的最终结果——未通过任何决议。

许哥而在谈话结束时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对此避而不答。

我的观点：许哥而来向我通报上述内容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受了金日成的委托来刺探我的想法。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文件 054

罗申关于尤金于毛泽东谈话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9 月 22 日）

1950 年 9 月 22 日尤金院士向斯大林汇报了同毛泽东在其寓所进行的谈话。

……毛泽东强调说，杜鲁门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 6 月底宣布美军入侵朝鲜和台湾，这样杜鲁门就扩大了美国侵略的范围。

这一举措将英国置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因为一方面英国应该支持美国在朝鲜的方针，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支持美国反对中国。考虑再三，英国不断督促美国寻求应对亚洲复杂局势的途径。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表明，美国并不打算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他们所作的，只是一种实力测试，看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中国将如何反应，国际舆论将如何。

为此毛泽东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美国将努力寻找某种途径安排朝鲜的妥协谈判，从而不是很丢面子地解决当前问题。为此，美英有可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寻找机会恢复中国的席位。这只是假设，不过，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针对台湾的侵略对印度、菲律宾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家产生了影响，这对于它来说是有（不）

利的。

接下来毛泽东认为，美国明白，暂时不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暂时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中国的手脚就是自由的，可以有更多作为，不拘泥于形式，在亚洲采用各种措施反对美帝国主义。如果中国加入联合国，如果中国以某种形式与美英有所联系，那么这将束缚它的行动，就会给中国带上了项圈。此外建立外交关系后，特务和间谍活动就会借助大使馆和外交使团活跃起来。

在中国加入到联合国后，就会在安理会以及其他联合国组织中出现一些变化，因为那里将出现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个大国。这无疑是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好处。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6-138

文件 055

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向朝鲜派遣歼击机团问题呈斯大林的报告

（1950 年 9 月 23 日）

致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我们关于从滨海边疆区派遣空军拉 –9 歼击机团去保卫平壤的措施。

一、为此，我们已决定派出空军第 32 歼击机航空师第 304 团，该团配备 40 架拉 –9 飞机，现部署在滨海边疆区斯帕斯克机场。

该团将于 10 月 1 日和 2 日飞经中国境内，沿斯帕斯克 – 东宁 – 延吉 – 通化 – 安东 – 平壤航线前往。

我们将认真制定，并由该团飞行员认真研究飞行计划，特别是在安东 – 平壤地段的飞行计划。

二、我们从获得的朝鲜资料得知，平壤地区的机场适于工作。

这些机场现在没有地勤人员，他们已被派往汉城以南的机场，在平壤地区也没有航空燃料和弹药储备。

因此，我们将在 9 月 25 日至 30 日期间用铁路经安东从滨海边疆区运送：

该团的技术服务小分队和最必要的机场设备；

一支配有 4 部雷达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小分队，以便搜索敌机并为我方飞机导航；

一个高射炮师，由 3 个 85 毫米高炮营和一个 37 毫米高炮营组成，共有 16 门高炮，任务是保卫机场；

15 个燃料基数的燃料和 15 个弹药基数的弹药。

三、为了接收该团和组织其战斗，我们将于 9 月 24 日派滨海边疆区空军部队指挥员诺加上校乘汽车前往平壤，他将在安东同该团会合，向它下达战斗任务，并将指挥该团飞往平壤。

四、10 月 3 日该团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

五、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第一次空战后，我国飞行员保卫平壤的战斗就会被美国人发现，因为空战的一切指挥将用俄语通过无线电话进行。

华西列夫斯基

1950 年 9 月 23 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文件 056

马特维耶夫关于朝鲜战争局势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9 月 27 日）

发自平壤

第 1298 号，1950 年 9 月 27 日 12 时 35 分（电报发出时间）

在了解了朝鲜人民军情况之后，兹作出如下报告：

人民军部队在西线（汉城）和东南战线（釜山）的情况很严重。

在济物浦登陆的美军部队试图围歼人民军主力，现已开始从大丘以北和西北地区转入对忠州（Цюсю）的全面进攻。

美国空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地面部队得到了空军的强大支持。这对前线和后方的人民军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部队中普遍存在美国空军恐惧症。借此，美国人得以顺利地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 25–30 公里，在大丘以北和西北地区美军一部已占领了尚州和安东。

据有关视察报告显示，敌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攻克了忠州，从而使人民军第一军团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人民军部队损失惨重，其中大部分人员损失都是由于美国空军的轰炸所致。人民军丧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战斗进行的相当艰苦。部队的弹药和燃料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运输近乎中断，另一方面也与人民军部队在武器

和弹药的合理使用上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以及部队自上而下的指挥和组织管理相当混乱有关。敌人飞机炸断了人民军部队的电话线，而无线电联络——由于缺乏技术熟练的发报员，无线电台的燃料得不到保证，工作时断时续，因而这种原本相当灵活的通讯方式也几乎未被人民军采用。

朝鲜人民军部队的情况，尤其是东南战线的情况，仍需进一步落实。

根据我们的建议，1950 年 9 月 26 日夜已向前线指挥部和汉城集团军派出了一些朝鲜联络官，以了解各部队的目前状况。

1950 年 9 月 25 日当地时间 19 时金日成向人民军各部队发布命令。根据这一命令，部署在东南战线北部地区的汉城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住敌人的进攻，并转入防御。部署在东南战线南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集团军各部队则开始向西北方面全面撤退，进天安、大田和报恩（Хоон）各地区，以构筑与汉城 – 骊州（Рейсю）– 忠州 – 荣州（Найдзио）– 蔚珍战线平行的第二道防线。

1950 年 9 月 26 日我们一行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

当时在场的还有朝鲜外交部长朴宪永和什特科夫同志。

会谈结果：金日成决定由自己兼任人民军总司令和军事部队职务。在总司令下设参谋部以对部队实施管理，并注重在后方开展工作。

截至目前朝鲜北部已组建的部队只有六个步兵师。由于形势突变，人民军原定由南朝鲜人组建 9 个师的计划没有能实现。

于是，金日成指示，立即采取措施，将南朝鲜人口带往北方，用这些人力资源来组建北朝鲜军队，以免被南朝鲜所利用。

与此相关，中国铁路也正在接连不断地为朝鲜运输所需物资，其中主要包括：给这新组建的六个步兵师准备的武器，以及弹药。

在与金日成会谈后，我们便开始工作，准备给予的帮助具体如下：

——更好地组织和管理部队；

——整顿部队的物质 – 技术保障，运输和道路后勤服务等问题；

——预设防御阵地。

人民军急需司机。我们向其提供的 3400 辆汽车，只是由于没有驾驶员而无法使用。是否能建议金日成请中国朋友向朝鲜派遣至少 1500 名汽车司机。

马特维耶夫

АПРФ，ф.3，оп.65，д.827，л.103-106

文件 057

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问题致罗申电

（1950 年 10 月 1 日）

交布尔加宁同志

1950 年 10 月 1 日 3 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 9 月 16 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 1 和第二军团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 4 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 1 和第二军团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 年 10 月 1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文件 058

斯大林关于对朝鲜局势的处理意见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

（1950 年 10 月 1 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马特维耶夫同志：

你们 9 月 30 日和 10 月 1 日的电报收到了。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金日成同志和其他朝鲜领导同志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你们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我认为你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朝鲜同志自然要征询建议和寻求帮助，而什特科夫同志却故不作答，从而使朝鲜领导人更加动摇不定。派马特维耶夫同志去朝鲜，不是要他汇报那些我们不派他去也能知道的关于朝鲜事件的情况，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向莫斯科提出他对于朝鲜军事形势的详尽的分析，而且他也未能根据形势提出任何建议，从而使我们难以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决断。马特维耶夫同志对朝鲜领导人的帮助不大，因为朝鲜领导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的共和国进行防御计划，没有从南朝鲜撤出军队的计划。

请你们今后在朝鲜的活动中考虑这些指示。

请立即拜访金日成和朴宪永并转告他们：

第一，敌人是否会越过三八线北进。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最坏处着想，即敌人将力图占领北朝鲜，因此必须毫不迟延地动员一切力量，不让敌人越过三八线，同时也要做好同敌人在三八线以北战斗的准备。

不能对朝鲜共和国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力量和潜力估计不足。在朝鲜北方，有巨大的动员潜力和资源。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靠加强现有的部队，二靠新编部队，完成组建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的任务。所有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全部由我们提供。

我认为，所谓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进行抵抗的说法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力量，只是需要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并利用一切潜力进行防御。应全力加快新编部队和兵团的组建，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在运往朝鲜的路上。同时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把部队从南方撤出，这样做的考虑是，在南方没有连成一片的战线，因而部队完全有可能撤到北方。这件事要抓紧去做，因为美国人肯定会在近期想方设法阻止这些部队北撤。

第二，在南方，在敌人后方，必须转而进行游击活动。为此目的除了可以利用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游击队，还可以利用留在南方、没有可能撤到北方的部队。游击队员的任务是——破坏交通线，破坏通讯机构和线路，袭击敌人官兵，并采取其他积极的行动，从而搞乱和惊扰敌人的后方。

第三，目前的形势要求有坚强的领导，并根据组织顽强防御的新任务对领导班子进行改组。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领导人中间的动摇情绪，严格和明确地确定领导同志的职责，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并对某些国防问题承担责任。应当立即采取无情的措施消灭反动势力和维护自己后方的秩序。为了对付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应当成立由可靠的人组成的地方歼敌自卫队。政府在其驻地必须拥有一支由可靠的和忠于政府的人组成的强大的突击队。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在主要港口和敌人登陆部队有可能登陆的地方布雷；在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四，至于金日成同志给冯西同志的信中提出的关于派武装力量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最能接受的援助形式是派志愿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同中国同志们进行协商。你们将于近日收到对金日成同志来信的答复。

冯西

1950 年 10 月 1 日

文件 059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0 月 3 日）

发自北京 1950 年 10 月 3 日 12 时 15 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2 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致菲利波夫：

呈上毛泽东对您第 4581 号电报的答复如下：

“1950 年 10 月 1 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

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

盼复。

毛泽东

1950 年 10 月 2 日”

一、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Yudin）[①]、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

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自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我们暂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以设想，目前对此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②]呼吁中国人采取

① 尤金，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1899–1968），苏联哲学家，其时正在中国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1954 年出任驻华大使。

② 尼赫鲁，贾瓦哈尔·潘迪特（1889–1964），时任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

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

罗申

1950 年 10 月 3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05-106

文件 060

马特维耶夫关于朴一禹通报中国出兵情况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0 月 7 日）

第 1425 号，1950 年 10 月 7 日 1 点 50 分（电报发出时间）

兹报告如下：根据我们现掌握资料显示，内务部长朴一禹 已于 1950 年 10 月 5 日从北京返回朝鲜。1950 年 10 月 6 日劳动党政治局开了一个会。

在这次会议上朴一禹通报说，他在北京期间再次受到了毛泽东和 5 位政治局委员的接见。第一次谈话持续了 4 小时，第二次——6 小时。

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提供帮助，但就是不能派军队。原因在于，如果中国（用军队）帮助朝鲜，那么此举实际上就会将苏联也拖入这场战争。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这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另外，中国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却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军和海军。

（毛泽东）建议朝鲜人继续在前线和后方坚持斗争，并着重强调了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说，金日成可以把满洲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在讨论了目前朝鲜的战争形势后，劳动党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使在得不到外部武力援助的情况下，也将在山区继续坚持战斗，还可以在中国组织突击集团军，从而为以后的进攻做好准备。

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由李承英（Ли Сын Ен）具体负责。在北朝鲜，在发生撤退的情况下，也将展开游击斗争，领导人为朴一禹。

朝鲜方面目前仍未向我们通报关于朴一禹从北京回国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马特维耶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05-706

文件 061

罗申关于毛泽东对出兵的态度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0 月 7 日）

第 1 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 2 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 3 份送：莫洛托夫同志

第 4 份送：马林科夫同志

第 5 份送：贝利亚同志

第 6 份送：米高扬同志

第 7 份送：卡冈诺维奇同志

第 8 份送：布尔加宁同志

发自北京

1950 年 10 月 7 日 11 时 55 分收到

第 1 份

优先拍发

致菲利波夫：

答复您的第 4676 号电报。

10 月 6 日北京时间 22 时 30 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答复。

毛泽东在听完我的话之后，说：

一、他完全同意您对国际形势及其今后可能发展的前景所做的评价。

二、他对于您在答复中谈到中国和苏联共同进行反对美国人的斗争，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指出，如果谈到打仗，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就应该打。同时他还说，类似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了。

三、涉及到派中国军队到朝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最适宜的不是派出 5—6 个师，而是最起码要派出 9 个。但是，这些师的技术装备非常差，他们只有 108 门大炮，一辆坦克也没有。

与此同时，毛泽东援引了从朝鲜朋友处得到的资料说，美国的 1 个军（3 个师）就有大约 1500 门各种口径的大炮，还有坦克。

毛泽东认为，要摧毁美国 1 个军的部队，中国人应该拥有比其多 4 倍的兵力和

2倍的技术装备。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由于拥有后备力量，关于步兵的问题他们很容易解决，而这些部队的技术装备，他们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还说，目前他们还不具备培训好的炮兵、坦克兵和其他技术兵的专业人员。

关于中国军队到达朝鲜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指出，他们准备在最近几天出动自己的部队，但是，他认为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应该给美国人机会，使其将自己的部队向北方集结，分散驻扎，这样中国人便能顺利地将他们分批歼灭。

四、毛泽东极其关注有关空军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1000架飞机，中国人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队，这是因为：

（一）为了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

（二）为了前线地区的作战行动；

（三）为了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首先将利用空中打击来摧毁中国的工业中心、破坏经济生活、毁坏交通干线。毛泽东说，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引起国内，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并将人民政府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声明说，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

五、毛泽东还提请注意，朝鲜境内的交通线路已经被破坏，这使得部队的物资供给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苏联方面提供的运输工具。

六、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空军所必需的武器和弹药。1951年度的整个财政预算是22亿美元，其中只有2亿美元可用于为部队购买武器。

七、鉴于上述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向您汇报有关情况以及中国朋友的全部打算。周恩来和林彪10月8日即可动身。他们可以乘飞机从北京出发抵达伊尔库茨克。我们必须派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他们。

毛泽东希望，师哲和费德林与周恩来一同前往。会谈时在场的有：周恩来、伍修权和费德林。谈话持续了1小时45分钟。

请您下达指示。

罗申

第 2318 号

1950 年 10 月 7 日

译电：阿拉乌什金　第 9–10 号，第 8 处
1950 年 10 月 7 日，13 时 00 分
打印：切列金奇娜
1950 年 10 月 7 日 13 时 50 分
第 8609 号

文件 062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得到中国出兵通报致电斯大林

（1950 年 10 月 8 日）

第 1436 号，1950 年 10 月 8 日

1950 年 10 月 8 日金日成请我到他那里去，并通报说，他已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后者在电报中说，中国政府已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援助朝鲜人民。

中国方面已确定了前线指挥员的人选，并要求朝方派一个代表来，以便通报朝鲜战争形势和协商中国军队入朝的相关事宜。

今天晚上内务部长朴一禹便将启程前往沈阳与中方前线指挥员会面。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1

文件 063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

（1950 年 10 月 8 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

金日成同志！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 月 1 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了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原，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

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对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 月 7 日我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的不是 6 个而是 9 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而且同他们详细商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您应牢牢守住自己的每一块土地，加强对侵朝美军的抵抗，并使用朝鲜人民军突围出来的军事干部来组建预备队。由此同样可以看出，您建议把全部在苏联接受训练的朝鲜同志改学飞行，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同中国同志谈判的进一步情况，下次再通报。

冯西

1950 年 10 月 8 日

什特科夫同志，请您将此信念给金日成听。他可以当着您的面转抄，但鉴于此信属绝密件，故不要将它交给金日成。

冯西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65-67

文件 064

毛泽东关于中国决定出兵朝鲜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0 月 8 日）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

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发自北京

1950 年 10 月 9 日

优先拍发

菲利波夫：

现在向您报告我在北京时间 22 点 30 分收到的毛泽东给您的电报的内容，以此作为对我 2318 号电报的补充：

“菲利波夫同志：

我很高兴收到了您的回电。我党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您的意见。我已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

高岗同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们已于今天早晨（10 月 8 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沈阳。

部队大约能在 10 月 15 日前开始入朝。

我已将派中国志愿军入朝的决定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已于今晨 8 点乘飞机前往您的所在地。他们的使命请予保密。

毛泽东”

1950 年 10 月 8 日

根据我从民航获得的消息，周恩来一行已于 17 时 43 分顺利抵达伊尔库茨克。

罗申

第 2332 号电 10 月 8 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2

文件 065

斯大林、周恩来关于中国暂不出兵朝鲜致毛泽东电

（1950 年 10 月 11 日）

绝密

第 4784 号密码电报

优先拍发

驻北京的苏联使馆立即转告毛泽东同志

贵国代表已于今日到达，我们联共（布）的领导同志与贵国代表一起讨论了贵国已知的那些问题。

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以下情况：

1、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装备差，缺少大炮，没有坦克，执行掩护任务的航空兵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用于装备和培训上述军队的时间至少需要六个月。

2、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

3、因此，为朝鲜人提供的像样的援军只能在半年后，即朝鲜被美国人占领，朝鲜已不再需要援军的时候才能到位。

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到周恩来同志报告的因中国参战而给国内带来的不利因素，我们一一致决定：

1、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

2、如果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也只能在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的山区而不应深入；

3、一部分朝鲜军队应在平壤和元山以北的山区组织防御，另一部分军队要转入敌后打游击；

4、把战时应征入伍的朝鲜人中的优秀分子及指挥员分批悄悄调入满洲，在那里把他们整编成朝鲜师团；

5、要尽快对平壤和北朝鲜山区以南的其他重要据点进行疏散。

至于中国同志所需的用于重新装备中国军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苏联将充分予以满足。

等待您的决定。

签名：菲利波夫

周恩来

1950 年 10 月 11 日

报告执行情况

打印 1 份送斯大林同志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

文件 066

毛泽东关于已下令停止出兵朝鲜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0 月 12 日）

绝密

1950 年 10 月 12 日

发自北京

菲利波夫同志：

此件是对我 2390 号电报的补充。

22 时 12 分我收到毛泽东发给您的如下电报：

“致菲利波夫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我同意 10 月 11 日电报的意见。

我方军队还没有出发，我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

关于朝鲜同志应根据形势重新部署兵力并招待新的工作计划一事，我已委托高岗向朝鲜同志进行解释。

毛泽东”

罗申

第 2395 号电

1950 年 12 月 12 日

打印两份 2 号件——备案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1

文件 067

罗申关于中国决定出兵朝鲜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0 月 13 日）

绝密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发自北京

1950 年 10 月 13 日

优先拍发

菲利波夫：

10 月 13 日 21 时毛泽东把我叫去宣布了下列事项：

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菲利波夫同志的最近一封电报和我的决定。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

鉴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同志马上把周恩来拦在了莫斯科，给他下达了同您讨论朝鲜问题的新指示。

现将谈话的详细内容随本电报一起发出。

罗申

1950 年 10 月 13 日

第 2406 号电

打印 9 份

第 9 号件 1 份送 8 处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5

文件 068

斯大林关于中国决定援助朝鲜致金日成电

（1950 年 10 月 13 日）

绝密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八局

密码电报第 75525 号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

我刚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中共中央再次对时局进行了讨论并决定，尽管中国军队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对朝鲜同志予以军事援助。

我正在等待毛泽东有关此事的详细通报。

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

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

冯西

第 4/6759 号电

1950 年 10 月 13 日

打印 3 份

1 号件 1 份——送斯大林同志

2 号件 1 份——

1 号件 1 份——[31]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5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50

文件 069

罗申关于毛泽东决定出兵等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0 月 13 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发自北京

1950 年 10 月 14 日 1 时 38 分收到

1950 年 10 月 14 日 2 时译出

1950 年 10 月 14 日 3 时 30 分送出

致菲利波夫同志：

作为对我的第 2406 号电（包括在第 25612 号电内）[①] 的补充，毛泽东还谈到：

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

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

暂时先派出由 9 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

① 见文件 067。

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抓紧准备第二梯队。

毛泽东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这样，就不会动用1951年的预算，他们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解释此事。

最后，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人应该在朝鲜同志进行艰苦斗争时帮助他们，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新的指示已送周恩来。

第2408号电

罗申

10月13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

文件 070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援助朝鲜问题致金日成电

（1950年10月14日）

平壤

苏联大使：

向金日成转达：

经历犹豫和若干暂时决定后，中国同志终于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定。

我为终于做出的这个有利于朝鲜的最后决定感到高兴。

有鉴于此，您要注意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共同决定。

中国军队所需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

祝您成功！

冯西

1950年10月1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7

文件 071

华西列夫斯基关于苏军在中国东北集结情况的报告

1950 年 10 月 19 日前

兹报告关于我派往中国沈阳地区的空军和坦克团的整编和集结期限等事宜。

关于歼击航空兵

截至今年 11 月 3 日，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我米格 –15 歼击机第 151 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每师共两个团，每团有飞机 30 架。

其中一个米格 –15 空军师将有可能在短期内全部配备中国飞行员和后勤技术人员。这些飞行员中既有在沈阳地区培训的，还有从上海专门调拨过来的。

在我防空（ПВО）米格 -9 歼击航空兵第 328 师和 144 师的基础上组建了四个歼击航空师，每师共两个团，每团飞机 30 架。截至今年 10 月 24 日前，这四个师中的两个将在其现驻防地完成整编，其余两个——根据指示，将在抵达中国境内之后再完成扩编。为这两个师提供后勤保障和服务的部队和一个歼击航空团也将整装随之一同从苏联发往中国。

要经铁路将上述所有部队运往中国需用 40 个专列。

专列首发日期确定在今年 10 月 24 日，平均每昼夜 5 个专列。发运截至日期为 11 月 3 日。列车换装将在满洲站进行，期限为今年 11 月 11 日 –20 日之间。因为满洲车站每昼夜只能换装五个专列。

这样，上述部队在沈阳地区集结的日期将为今年 11 月 28 日。两个在苏联已完成整编的空军师将于 12 月 5 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而尚需在中国境内完成扩编的两个师——则需延迟至今年 12 月 15 日前。

关于强击航空兵

在后贝加尔军区空军第 45 军第 186 强击航空师的基础上，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前组建了如下部队：

一个由两个团组成的强击航空师，每团有伊尔 –10 型飞机 30 架；

一个强击航空团，拥有伊尔 –10 型飞机 30 架。

这些新组建的强击航空师和强击航空团的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将于今年 11 月

12-17 日间经铁路用 10 个专列发往中国，11 月 14—20 日间在满洲车站换装，今年 11 月 25 日前在沈阳地区集结。

所有飞行人员将于今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间，即所属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在沈阳集结完毕后，空运至沈阳。

关于坦克团

由后贝加尔军区第六近卫机械化军的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机械化师组建 10 个坦克团，平均每团配备携：带 85 毫米炮的 T–34 中型坦克 30 辆、ИС–2 重型坦克 6 辆和 ИСУ–122 自行火炮发射装置 4 台。

ИС–2 重型坦克将于今年 10 月 21 日从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 Буй（布伊）等地区的坦克后备基地启程发往满洲车站。

鉴于这些新组建的坦克团距满洲车站只有 120–160 公里，因此它们可自行前往该车站，抵达目的地的日期应是今年 11 月 1 日，并于 11 月 3 日直接在这里换装，经铁路运往沈阳。

运输这些坦克共需 56 个专列。该车站每昼夜可装载坦克 5 个专列。坦克的运送将分两个阶段进行：11 月 3–9 日——发送 35 个专列；11 月 20–24 日——其余 21 个专列。之所以如此安排，原因在于：11 月 10–20 日间运输歼击机和强击机航空师的专列要在满洲车站换装。

截至今年 11 月 30 日，10 个坦克团将最终完成在沈阳地区的集结。

综上所述，我们将在中国境内集结的部队如下：

截至 11 月 28 日——若干歼击航空师；

截至 12 月 1 日——1 个强击 – 歼击航空师和 1 个强击航空团；

截至 11 月 30 日——10 个坦克团。

现驻防在中国境内的第 151 歼击航空师将于今年 11 月 3 日前改编成两个师。

上述空军师和坦克团在中国境内的组建和集结活动由苏军总参负责监督，并向各站点派遣有专人负责的工作组。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5-18

文件 072

华西列夫斯基关于新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开往中国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 年 10 月 30 日

1950 年 10 月 30 日

根据政府决议，最先发运的 8 个歼击航空团必须于 11 月 28 日前在中国境内集结，3 个强击航空团和 10 个坦克团将于今年 11 月 30 日前集结。

根据既定计划，针对拥有两个团（每团有飞机 30 架）编制的空军师中的歼击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的改组工作已于 10 月 24 日结束，并于当天经铁路开始发运。

截至今年 10 月 30 日，运送这些部队的总共 55 个专列中已有 35 列装载完毕且已发出。整个运输工作均按计划正常进行。

坦克团也已完成组建工作，并将按既定计划发往满洲车站，直接在该站换装。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4

文件 073

什捷缅科关于向中国派遣苏军的进展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 年 11 月 5 日）

第 284283 号，1950 年 11 月 5 日

兹报告关于发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团的进程情况：

截至今年 11 月 5 日所有首批发送的歼击航空兵各团及其军用保障物资已装车，目前正在苏联境内经铁路运往中国。

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当这些歼击航空团在中国境内集中后，当作如下部署：两个航空团在上海，一个航空团——在汤山（徐州地区），两个航空团——在北京，两个航空团——在鞍山（沈阳地区）。

计划发运的 10 个坦克团中已有 6 个目前正在中国境内经铁路运往目的地，其余 4 个——将于明天，即 11 月 6 日抵达中国。

这些坦克团在中国境内的部署情况如下：三个团——北京，两个团——四平，一个团——吉林，一个团——哈尔滨，一个团——长春，两个团——徐州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5-126

文件 074

毛泽东关于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1 月 7 日）

发自北京，1950 年 11 月 8 日 0 时 2 分收到

送：斯大林（2 份）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什捷缅科同志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

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

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为 12 个军，计 36 个师，仅有 6 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装工作可能要到 1951 年下半年方能开始。

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 1951 年 1 月和 2 月这一时期给 36 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其具体品种名称和数量如下：

一、苏式步枪 14 万支。

二、步枪子弹 5800 万发。

三、苏式自动枪 26000 支。

四、自动枪子弹 8000 万发。

五、苏式轻机枪 7000 挺。

六、轻机枪子弹 3700 万发。

七、苏式重机枪 2000 挺。

八、重机枪子弹 2000 万发。

九、飞行员用手枪 1000 支。

十、飞行员用手枪子弹 10 万发。

十一、梯恩梯炸药 1000 吨。

请您将你们对我的这一请求的研究结果告我。[①]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50 年 11 月 7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80-81

文件 075

毛泽东关于同意加强空军的建议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1 月 15 日）

送：斯大林（2 份）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通过给中国补充两批共 120 架米格 –15 飞机来加强别洛夫空军师的力量，并建立航空兵指挥部。

至于东北各机场全面加强防空措施的问题，我们将与扎哈罗夫同志一起解决。

苏联飞行员在空中表现出了英勇气概和强大威力，他们在最近 12 天内，击落了 23 架入侵的美国飞机，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谢意，我认为，此事值得向您报告。

祝您一切顺利！

毛泽东

1950 年 11 月 15 日

又及：

致菲利波夫同志

---

① 是月 9 日，周恩来会见扎哈罗夫，得知斯大林复电同意供给中国所需的步兵武器，并将于翌年一二月内交货。

兹报告，您的电报已于 11 月 15 日当地时间 20 点 30 分送出。[①]

第 2910 号电

扎哈罗夫

1950 年 11 月 16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16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189

文件 076

周恩来关于请求苏联提供汽油等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0 年 11 月 16 日）

特急

送：斯大林（2 份）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致菲利波夫同志：

现在，我国在朝鲜作战的部队，已由 6 个军 18 个师增至 9 个军 30 个师。此外，我们还有 3 个军 9 个师作为预备队。因此，运输任务非常繁重。关于汽车问题，苏联政府已同意在 12 月 15 日以前为我们提供 3000 辆。

我们必须及时解决汽油和润滑油的问题。我请求您批准按以下数量提供汽油和润滑油：

一、新的订货：汽油 10000 吨，机油 2720 桶（容量 53 加仑，下同），后轴箱润滑油 220 桶，刹车油 110 桶，黄油（润滑脂）144 桶。

二、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向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的订单规定，提供下列油料：汽油 7000 吨，机油 2380 桶，后轴箱润滑油 190 桶，刹车油 95 桶，黄油（润滑脂）126 桶。

三、必须从苏联购买的各类油料（第 1、2 两项相加）总数为：汽油 17000 吨，

① 11 月 15 日晚扎哈罗夫向周恩来转告斯大林的建议：为增强苏联空军在中国后方对美空军的作战，拟增派 120 米格 -15 飞机，分两批来华，增加到别洛夫空军师中，并成立空军军一级指挥部。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商定：苏联空军除使用安东、鞍山、辽阳、沈阳的机场外，在安东附近再修建一个机场供其使用。

机油 5100 桶，后轴箱润滑油 410 桶，刹车油 205 桶，黄油（润滑脂）270 桶。

请您在 12 月底以前首先提供上述汽油和润滑油的 50%，另外 50%请在 1951 年 1 月 20 日以前提供。

上述内容是否需要另行提出详细报告?

盼复。

顺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第 2917 号电

周恩来

1950 年 11 月 16 日 14 时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17-118

文件 077

斯大林关于同意提供汽车问题致周恩来电

（1950 年 11 月 17 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同志：

转周恩来同志：

关于请求紧急提供 500 辆汽车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将满足您的要求。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汽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的旧车辆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站交付新汽车，11 月 20 日移交中方代表 140 辆汽车，11 月 25–26 日移交 355 辆汽车。

其余的车辆将于今年 12 月 5 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 1000 辆汽车。

菲利波夫

1950 年 11 月 17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4

文件 078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航空师的决议

（1950 年 11 月 20 日）

第 4680–2019 号，1950 年 11 月 20 日

苏联军事部的问题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 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负责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运部队的工作，具体任务如下：

1）发运两个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每师由两个歼击航空团组成，每团有飞机 30 架。上述诸师是在巴库地区防空军歼击航空师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接替第 309 歼击航空师移驻巴库地区的部队将是来自撒马尔罕地区的土耳其斯坦军区空军第 73 军第 216 歼击航空师，该师新配备的飞机为米格 –15。

2)发运两个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其所使用的飞机为米格 –15。每师由两个歼击航空团组成，每团有飞机 30 架。上述新组建诸师的原单位为：莫斯科军区空军第 324 歼击航空师和部署在旅顺地区的滨海军区空军第 54 军第 50 歼击航空师。

3）不带飞机，发运一个由两个团组成的使用拉 –9 机型的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 – 服务部队。该师组建前的原单位为：后贝加尔军区空防军第 297 歼击航空师和滨海军区空军第 54 军第 32 师第 304 歼击航空团。

4）一个驾驶图 –2 飞机的轰炸机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 – 服务部队。该师由两个轰炸机航空团组成，每团有飞机 30 架。在外贝加尔已准备了 30 架图 –2 型飞机，以便与该师一同发往中国。该师组建前原单位为：喀尔巴阡山军区空军第 57 军第 162 轰炸机航空师。

5）发运 62 架飞机，以及两个歼击航空团和一个师机关的全套装备。

6）10 个弹药基数，10 部航空加油车和相应数量的航空油料均以空运方式运输。

2. 空军各师的发送均须遵照如下期限实施：

第 50 和第 297 歼击航空师——最迟须在今年 11 月 20 日以前；

其余各师和军事装备——今年 11 月 16–21 日之间，并须在 1951 年 1 月 10 日

前完成在中国境内的集结。

3. 为确保发运这些部队的机密不致泄露，整个行动必须严格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3月22日颁布的第1146420号保密教导手册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4. 苏联军事部允许这些部队在运输过程中着苏联军服，可一旦进入中国，必须立即改着中国军装。

苏联飞机上的标志必须在其发运前便彻底清除。

5. 必须让前往中国的全体官兵非常清楚地了解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1425号和1949年10月3日第4200–1743号诸决议的内容。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室主任

М. 波马兹涅夫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67-169

文件 079

拉祖瓦耶夫关于中朝联合指挥谈判结果致葛罗米柯电

（1950年12月1日）

第1775号，1950年12月5日

1950年12月5日21时金日成从北京返回朝鲜。

在私人交谈中他对我说：

1. 谈了关于联合司令部的问题，但毛泽东建议此事不要急。关于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双方已达成协议。

2. 还谈了关于军队活动的问题。朝鲜人的主要任务：在三八线以南开展游击运动，并促使其不断发展壮大。

3. 中国人不同意让部队打到三八线便停下来。

4. 毛泽东建议（朝鲜劳动党）召集中央全会，以批评所犯的错误。金日成对此表示同意。

5. 1950年12月6日清晨金日成将要到中国军队司令员彭德怀那里去。金日成邀我一同前往。

请求指示。

拉祖瓦耶夫

证明材料：就这一问题，拉祖瓦耶夫同志曾于12月5日咨询了（苏联）军事部，并得到上级批准（即可以去彭德怀那里）。类似上述密码电报中所述问题已由军事部向政府各委员散发。

ЦАМО РФ，ф.5，оп. 918795，д.124，л.553

文件 080

斯大林关于朝鲜战局致毛泽东的祝贺电

（1950年12月1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的第3153号电报。

感谢您告知中国国内情况，并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地展开攻势。

你们的胜利不仅使我和我们的领导同志感到高兴，而且也使全体苏联人民为之振奋。请允许我向您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他们在抗击美国的斗争中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

正如苏军在与第一流武装的德军作战取得了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并变成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一样，在反击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美军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无疑也将取得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其本身也将变成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威力强大的军队。

祝你们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菲利波夫

1950年12月1日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5

文件 081

罗申关于中国政府停止在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的电报

（1950 年 12 月 7 日）

发自北京[①]

1950 年 12 月 7 日 6 时 55 分收到

特急

12 月 7 日北京时间 3 时，周恩来召见我并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传达了下述事项：

近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②]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

他们的意图在于保持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在不利的地位，并意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将下述说明交伍修权，以答复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和特里格夫·赖伊：

“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果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

周恩来以书面方式转交了上述条件。

周恩来接着说，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恳切地要求苏联政府：中国政府希望今天就得到答复。

我告诉周恩来，对于他转达的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和有关答复的请

---

①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

② 1950 年 11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求，将尽快呈报苏联政府。

罗申

1950年12月7日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7-1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93-195

文件 082

葛罗米柯关于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致罗申电

（1950年12月7日）

特急

1950年12月7日19时10分收到

1950年12月7日20时40分发出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十处，副本存档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拜会周恩来并转告下述事项：

“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

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一旦被美国利用，就如同打了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机会。

因此，我们考虑，在此可以仅限于提出下述说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你们，英国、瑞典、印度的代表先生们一样，欢迎尽快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将竭尽全力，以便尽快结束强加给朝鲜和中国的军事行为。

二、因此我们想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停战条件的看法。我们十分清楚，你们既不是联合国，也不是美国授权同任何人谈停战条件的全权代表。况且，英国代表

团已同美国、法国、挪威、厄瓜多尔、古巴代表团一起，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谴责中国并以此阻挠朝鲜问题调解事宜的决议案。

三、因此，我们将耐心地等待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所提出的意见。①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6，л.20-21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96-197

文件 083

戈尔拉乔夫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情况的报告

（1950年12月15日）

一、1950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第13兵团在云山、熙川地区歼灭南朝鲜第2军的进攻战役。

根据第13兵团司令员开始时的决心，为歼灭南朝鲜第2军，集中了4个军（第39、第40、第38和第42军，共12个师）。诸军实施了穿插合围。兵力平均部署在整个战线上。没有组织第二战役梯队。

经过4天激战，向正东和东北方向进攻的第39军和40军向前推进了25公里，在进攻过程中为追剿后退之敌，两军转角90°折而向南进攻。向西南方向进攻的第38军，击退了南朝鲜第8步兵师，向前推进了50公里。第42军改变了先前的决定，以主力攻咸兴，仅以步125师一个师的兵力向西南方向进攻。

在战斗过程中，敌使南第2军摆脱第13兵团的攻击并向南撤退，同时又把美第一骑兵师（КПД）调往这一方向以对第39、第40军右翼实施攻击，这也是第

① 是月12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13日，周恩来电示伍修权、乔冠华向提出十三国提案的国家表明中国的立场：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

39 和第 40 两军折而向南的原因之一。

在进攻过程中，第 13 兵团司令作出了消灭清川江以北美军主力的决定。为此又使用了 4 个军（第 66、39、40 和 38 军，共 12 个步兵师）。这次兵力平均摆在整个战线上，没组织突击集团。3 个军对飞虎山（博川）实施围攻。在迂回左翼进攻的只有第 38 军（3 个师）。这次战役没有组织第二梯队。

在 7 天的进攻战斗中，集群迂回部队向前推进 20 公里，几次把敌人压向清川江以南。敌猜透第 13 兵团指挥部的意图，把部队撤出战斗，退到南东方向调整部署，并于 11 月 7 日转入进攻。

二、1950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第 13 兵团歼灭安州地区美军部队的进攻战役。

依据敌之行动特点，第 13 兵团司令员制定了两个行动方案。他决定歼灭安州地区的美军进攻部队。但部队部署仍和 11 月 24 日战斗过程中的部署一样。4 个军（66、39、40 和 38 军）向不同的方向进攻（似乎是穿插分割），目的是在清川江以北粉碎这些军的南面之敌，只以左翼第 42 军一个军（3 个师）对敌之右翼实施迂回突击，前出到安州地区敌之后方。

按照中国最高指挥部的命令，4 个军（66、39、40 和 38 军）折而向东，因此实施进攻推迟了一昼夜。但在实施转向之后，兵力仍平均分布在整个战线上。

根据新的决定，右翼 3 个军（50、66、39 军）推迟了一昼夜转入进攻，实施正面突击，目的是牵制敌人，不让它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左翼 3 个军实施迂回突击，任务是前出到美军主力部队之后。

部队布阵纵深不大，没有第二战役梯队。

在 6 天的进攻战斗中，第 13 兵团的部队歼灭了美第 2 步兵师、南朝鲜第 2 军（第 7、第 8 步兵师）主力；几乎全歼土耳其旅；重创美第 24、第 25 步兵师和第 1 骑兵师、南朝鲜第 1 步兵师和英国第 27 步兵旅。但没有达到战役的主要目的——聚歼美主要集团。敌摆脱了第 13 兵团的进攻部队，后撤到平壤方向，然后又撤回三八线以后。

三、1950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0 日，第 9 兵团歼灭美第 1 海军陆战师和第 7 步兵师的战役。

第 9 兵团司令员作出决定，以两个军之兵力（第 20 军和第 27 军，共 8 个师）对下碣隅里、古土里（Гудинни）地区之敌实施包围突击，然后歼灭之。为对敌实施直接突击（敌第一海军陆战师和第 7 步兵师）只使用了 5 个师；3 个师从南面和

东北面保障战役的实施。第 26 军（4 个步兵师）留作预备队，但在战斗过程中被用来歼灭被围之敌。

在这一持续 13 昼夜的战役中，中国部队行动不坚决，在敌可能外来打击方向兵力部署稀薄。第 26 军在战役之初未被用来向咸兴突击以控制此地并前出到在东海岸活动的敌之集团之后。敌遭到重创，尽管如此，还是于 12 月 10 日冲破包围退到咸兴。

总的结论：

一、在上述 3 次战役中，兵力和装备沿全线平均部署，没组织突击集团，各军都是在独立的方向上实施突击，在敌之薄弱环节没实施强大突击。

二、第 13 兵团在两次战役中没组织第二战役梯队，结果第一梯队取得的战果没得到发展，战役没达到目的。

三、部队行动不坚决，尤其是正面进攻部队。这使敌人有机可乘，毫无阻力地后撤并重新部署。

四、第 13 兵团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在敌最危急时刻——其主要兵力在横渡清川江之时，停止了进攻，当时以 40、38 和 42 军之兵力很容易包抄敌人。

五、第 9 兵团之第 20 和第 27 军，在合围敌人后，行动迟缓而不坚决。留作预备队的第 26 军未被用来对咸兴方向实施突击以建立外合围圈。

上校戈尔拉乔夫[①]

1950 年 12 月 15 日

文件 084

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问题呈斯大林的报告

（1951 年 1 月 19 日）

致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同志今年 1 月 14 日致电菲利波夫同志，要求准确说明军事贷款协定草案第 3 条，详细解释中国人 2 月和 5 月的申请单中所列物资的供应数字，并要求尽快得到其余 12000 辆汽车和询问能否将提供的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列入军事贷款项下。

---

① 此人任职不详。

因此，我们将给毛泽东的复电草稿和给扎哈罗夫与米库诺夫[①]同志电文草案呈上，请您审阅。

按毛泽东所提问题，报告如下：

一、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议，由外贸部负责与中国政府结算军事部所提供的物资，外贸部工程技术局已于1950年11月将总数为2.375亿卢布的两份军用物资清单交给驻莫斯科中国大使王稼祥，这里指的是贸易结算，并已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中。

在明确规定1950年实际供货数额后，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贷款的决定，纳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总数定为2.65亿卢布（1.4亿卢布属1950年贷款，1.25亿属商品流通）。这些数目的说明书已于今年1月9日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库诺夫同志。

二、在1950年2–5月中国人申请的军用物资项下，军事部和海军部按照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已移交给中国属于1950年供货的军用物资不包括26艘海军舰艇（2艘扫雷艇，6艘大型猎潜舰，18艘鱼雷艇）。

按5月的决议未提供的204架飞机、118台飞机发动机、专用运输车辆零件和飞机备用零件，已按比1950年末我国空军师编制大得多的数量提供给中国人了。

由于毛泽东告知，中国人打算按1951年提供的军事贷款，编制新的军用物资申请单，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地要告知他，按中国人以前的申请单，我们已规定1951年除3500万卢布的铁路装备外，以军事贷款提供的军用物资总数近1亿卢布。

三、在答复毛泽东的电稿中指明1951年1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所规定的提供汽车的期限。

四、按1950年10月19日以后苏联部长会议所作的决议，总数为1140万卢布的车用汽油、航空汽油和其他燃料－润滑用油，已运往中国以外，按1950年10月以前的商品流通协议和各个决议所规定的石油产品，已于1950年运往中国。

在答复毛泽东的电稿中，建议告知，石油产品的供货列在商品流通项下。

五、军事贷款协议第3条第2款的措词已取得周恩来同意，而第1款的措词在给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库诺夫同志的电稿中做了说明。我方这一款的文本与中国人提供的措词不同之处在于，其中规定，所提供的1950年10月19日以后生产的军用物资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商品流通项下，目的在于不与中国赴朝作

① 米库诺夫，苏联外贸部驻华代表。

战发生直接的联系。

华西列夫斯基

缅希科夫[①]

1951年1月19日

附件：

华西列夫斯基给扎哈罗夫和米库诺夫的电报

北京

致扎哈罗夫和米库诺夫同志：

据你们的第15453号来电及今年1月14日转你们的菲利波夫同志致毛泽东的复电，请遵循下述方针：

一、考虑到周恩来的意见，第3条第1款可用下列措词：

“按现在的协议，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

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有关的目的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

你们提出的第3条第2款已经周恩来同意。

二、可以告知周恩来，1951年1月9日缅希科夫在给米库诺夫同志电报中所报告的军用物资清单：1950年运去的列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议项下的军用物资，总价值1.4亿卢布，列入商品流通项下的是1.25亿卢布。

已拟定于1951年提供的，列入军事贷款的总数为1亿卢布的军用物资清单，将由外贸部另电告你们。这份清单请交周恩来。

三、关于2月和5月的申请，请按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的复电执行。

华西列夫斯基

缅希科夫

1951年1月1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26-28，34-35

① 缅希科夫，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1902–？），1946–1951年任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部长。

文件 085

毛泽东关于准备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3 月 1 日）

发自北京，1951 年 3 月 2 日 2 时 45 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2 份）

致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来京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所确定的一些意见告您。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的状况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消灭这些敌军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

目前敌人的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月当中，敌人当占住阵地之后，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进攻。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军舰艇对朝鲜沿海地区实施积极的攻击，敌军航空兵不断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我运往前线的物资补充，部队仅得到了其中的 60%–70%，而其余 30%–40% 则因敌机袭击而被炸毁。

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在今后一个半月中，敌人有重新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三番部队轮流作战。目前正在朝鲜作战的 10 个军（计 30 个师）为第一番志愿部队。现正由中国国内调去的 6 个军和目前位于朝鲜的 3 个军（将于最近得到补充，其中 2 个军正在元山、咸兴地区进行休整），共计 9 个军（27 个师），将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第二番志愿部队约于今年 4 月上旬全部进抵三八线地区，用以替换现阶段在汉江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的 6 个军。

此外，我们还拟使用将从中国调去的 6 个军及从志愿军编成中抽调 4 个军，共计 10 个军（30 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拟于 6 月左右用于前线。

鉴于第三番志愿部队 10 个军中有 4 个军在 5 个月过程中已参加作战，需作休整，因此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抵达前线之后，这 4 个军将调到平壤和元山地区休整，并在此地负责完成沿海地带的防御任务。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其余 2 个军将撤回中国休整。

中国志愿军在前 4 次战役中的战斗和非战斗损失（阵亡、负伤和其他原因丧失战斗力）为 10 万多人。为了弥补此一损失，需要用 12 万老兵和新兵。预计在今明两年还会损失 30 万人。因此，还需要有 30 万人用于补充，才能保障实行战争中轮番使用兵力的战术。

至于朝鲜人民军，彭德怀同志已根据您的建议，提请金日成同志将现有的 8 个军团缩编为 6 个军团。每个军团宜编 3 个满员师，每师为 10000 人，此外，还要组建 5 个警备旅，用以防守沿海地带和主要城市。

金日成同志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因此，朝鲜人民军的 6 个军团也可采用轮番作战的方针，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三、1—2 月份的作战经验表明，当我 3 个军在汉江以北地区因损失较大而不得不进行休整时，在前线作战的只有 6 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此，我由于没有后备力量而不能发动胜利的进攻，而当敌人派来援兵时，我又无法同其进行对抗。与此同时，随着我军向南推进，交通线也就日益延长，供给上的困难也就不断增大，我被迫留下部队以警卫后方。因此，如不大量歼敌，如无空军掩护，那么，当敌过早地被压向南方时，我们将难以各个歼敌。目前的形势是：在第二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 9 个军于 4 月上旬抵达前线之前，陆军方面的优势将在敌人那边，因此我们必须避免进行战役进攻。我们必须使用从第一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 6 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 4 个军团，在南汉江以北地区实施防御，以迟滞进攻之敌。

但必须考虑到，在今后一个半月中，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 9 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利的新战役。我们计划：在第二番志愿部队前出至指定地区以后，用两个半月的时间（4 月 15 日到 6 月底）在三八线地区歼灭美军和伪军部队数支正规部队，约数万人，尔后再向南汉江以南地区实施进攻。这样做将有利于我。彭德怀同志已就这一问题同金日成同志进行了会谈。如果敌人得以重新占领汉城和再次越过三八线，那么这在政治上必然会引起一定的风波，对此我们必须预作准备。

四、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 30%–40%；敌人则将定期获得补充（例如，到 6 月底将又有 6–7 万美军开抵朝鲜）。我们预计，在 4、5 月份，我们将可以使 10 个航空团参战，但至今我们在朝鲜领土上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土地尚未解冻，因此我们尚未对机场进行大修。此外，一个最为严重的因素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航空兵

掩护，我们在今后也无法进行修理工程。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苏联航空兵最好是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位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

根据彭德怀同志的看法，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至于汽车问题，我们要求于今年下半年内通过商贸这一渠道向我们再提供6000辆汽车。

有无这种可能，盼复。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以上意见，请您研究，并给以指示。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3月1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78-82

文件 086

斯大林关于苏联空军入朝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年3月3日）

1951年3月4日1时10分收到

1951年3月4日2时38分转交

北京

扎哈罗夫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3月1日的来电已收到。

我们同意您关于朝鲜未来战役的看法。

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 151 和第 324 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 1 条钢板飞机跑道，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 2 条钢板跑道。同时必须建立不少于 4 个混凝土跑道的机场，因为钢板跑道不够。我们希望建设工程在劳动力和物资上将得到保障。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向您供应高射炮弹。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可以供应 6000 辆卡车。

菲利波夫

1951 年 3 月 3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89

文件 087

斯大林关于中国空军作战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3 月 15 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转毛泽东或周恩来：

在朝鲜，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在最近将面临几个大的战役。显然，无论前线还是后方，你们将需要大量的飞机。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即 2 个中国歼击机师配置在安东地区，以掩护这一地区。但是，现在我们看出，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的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 1 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用于那里的战役。

我们希望您不会反对。

菲利波夫

1951 年 3 月 15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24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202

文件 088

毛泽东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3 月 18 日）

送：斯大林同志（2 份）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 1951 年 3 月 3 日第 1462 号电报及第 1749 号电报，均已收到。对您关于将 2 个苏联歼击机航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转场到朝鲜境内的决定以及关于再派 1 个大型歼击机航空师到安东以掩护中朝部队的决定，深表感谢。您在 1951 年 3 月 3 日第 1462 号电报中建议，我们在朝鲜再建 4 个混凝土跑道机场。我们现已会同扎哈罗夫同志和朝鲜同志们研究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完成这一工程。朝鲜同志现有 1 个钢板跑道机场。感谢您关于再提供 2 条钢板跑道的决定。

我们现正在计算需用多少数量的高射炮兵部队来掩护朝鲜机场和最重要的铁路桥。最后计算结果将由周恩来同志补充告您。

关于您已同意于今年下半年再向我们提供的 6000 辆汽车，其具体品种、名称将由周恩来同志拟定，并通过扎哈罗夫同志告您。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第 1368 号电

毛泽东

1951 年 3 月 18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26-127

文件 089

周恩来关于后方掩护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3 月 23 日）

发自北京，1951 年 3 月 23 日 17 时 40 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2 份）

致菲利波夫同志：

经过对用以掩护朝鲜机场和最重要铁路桥所需高炮部队问题的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告您：

目前中国仅有 4 个实力相当于高炮团的小型野战高炮师和 2 个机动混编高炮团，共计有 6 个团的兵力。

自从我们根据 1951 年 3 月 15 日申请单得到高炮以后，我高炮数量将增加 5 个混编高炮团。这些高炮将不足以掩护所有重要铁路桥及在朝鲜境内为苏联和中国航空兵修建的 6 个机场。

为了确保掩护，我们建议：由位于中国境内的安东到定州至安州铁路沿线的铁路桥以及 4 个供苏联航空兵使用的机场，由苏联高炮部队加以掩护。

对朝鲜境内其余铁路桥和机场的掩护任务，将由中国高炮部队承担。

请您研究我们的意见，并将您的意见告我。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第 1437 号电

周恩来

1951 年 3 月 23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38-139

文件 090

斯大林关于朝鲜铁路运输交中国管理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3 月 25 日）

我们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最近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如下意见，即为正确组织军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指挥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支持这个意见，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会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即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顺利进行解放战争起见，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我们一般地认为，为朝鲜本身利益着想，最好能建立起中国和朝鲜间的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斯大林

1951 年 3 月 25 日

文件 091

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关于苏联航空兵部署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4 月 12 日）

致斯大林同志：

现将我们关于保障别洛夫歼击航空军部署的意见报告如下。

鉴于决定派遣别洛夫军的 2 个歼击机航空师进驻朝鲜的平壤地区和 1 个航空师进驻中国的安东地区，必须采取下列最起码的措施，以保证上述各师完成战斗任务：

一、用我们的高炮部队对我歼击机航空师的驻地机场实行空中掩护，为此需派遣 2 个高炮师，其中 1 个师为 3 个团编制（总共有 96 门 85 毫米大炮和 72 门 37 毫米大炮），用于掩护平壤地区的机场；另 1 个师为 2 个团编制（有 64 门 85 毫米大炮和 49 门 37 毫米大炮），用于掩护安东地区的机场和安东地区的鸭绿江铁路大桥。

此外，再派一个 2 团编制的高炮师用于掩护安东、平壤地区最重要的铁路大桥。

二、为我歼击机夜间同敌空军作战提供保障，以及夜间对我歼击机基地进行空中掩护，需派遣 1 个装备拉 –11 战斗机的歼击机航空团进驻中国并部署在鞍山地区。该航空团可从驻扎在旅顺地区的第 153 歼击机航空师抽调。

为了在我驻朝鲜歼机机航空兵基地建立探照灯照射区，需从莫斯科防空区派遣 1 个探照灯团前往朝鲜。

三、鉴于喷气式歼击机飞行员的高度紧张和疲劳，为保证他们在执行任务时的战斗力，需要保证休息，做好战斗准备。

为此，每 1 个歼击机飞行员要有 10 个后备飞行员，他们可以留在战区以外，根据需要派他们替换到后方休息的飞行员。

四、为了保障别洛夫军的物资技术供应和对其后勤工作的领导，需向该军派遣：

——带有供应部门的航空技术部队；

——给各高炮师运送弹药和军用物资的独立汽车运输营；

——20 辆航空油料加油车和 20 个航空弹药基数，其中一半放在航空师基地，另一半放在沈阳地区的基地；

——1 个月的炮兵弹药储备，即 9 个 85 毫米高炮弹药基数和 15 个 37 毫米高炮弹药基数。

五、为了更可靠地用雷达搜索敌机，给别洛夫军增加 2 个雷达站。

六、鉴于高射炮兵主要用于掩护我歼击机航空兵，对各高炮师的指挥应全部交给别洛夫。为了直接组织高炮掩护，给别洛夫委派 1 位高射炮兵副手和 1 个小型作战机构。

以上报告请予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①]

1951 年 4 月 12 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140-142

文件 092

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无偿提供米格 –15 飞机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5 月 22 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②]转毛泽东同志：

满洲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 –15 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至于米格 –9 喷气式歼击机，虽不如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却完全适用于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机航空师目前已有 10 个，其中 6 个为米格 –9 歼击机师，4 个为米格 –15 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机航空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机航空兵，应用米格 –15 歼击机取代米格 –9 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 372 架米格 –15 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

① 什捷缅科，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1907–1976），时任任苏联武装力量部（1950 年 2 月改名为军事部）副部长、总参谋长。

② 克拉索夫斯基，苏联空军上将。扎哈罗夫于 1951 年 4 月中旬奉命回国，克拉索夫斯基继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

一点，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仅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飞机，可以留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不足10天的时间。

我们已拟定了将372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72架，6月20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飞机。

对此您如无意见，我们即认为此计划是可行的。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87

文件 093

毛泽东关于苏联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致斯大林电

（1951年5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26日0时15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2份）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22日电报，已经收到。我对您关于无偿提供给我们372架米格–15飞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对您关于将这些飞机运送到中国的计划及支付其运费一事，亦表同意。

我十分感谢您对中国空军建设工作的关怀。

此致

敬礼！

第2586号电

毛泽东

1951年5月2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89

文件 094

斯大林关于无偿向中国提供米格 –15 飞机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5 月 26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对您的谢意十分感谢。

但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所珍视的谢意，而是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 –9 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问题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 –15 歼击机来取代米格 –9 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

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 –9 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那就把米格 –9 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

敬礼！

第 279 号密码电报

菲利波夫

1951 年 5 月 26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1

文件 095

毛泽东关于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1年5月27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27日20时收到

送：斯大林（2份）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致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给您寄去，请您了解其内容：

"彭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掉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1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1个整营，至多2个整营，也就够了。

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1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也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2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1个整营为适宜。

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1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整师的计划了。

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

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

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以上请你考虑并电告。"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第 2627 号电

毛泽东

1951 年 5 月 27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5-97

文件 096

斯大林关于打英美军战术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5 月 29 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我看过了您给彭德怀关于打英美军战术的电报。

该电报中所述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样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

英美军很容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

如果你们在前线后方有构筑很好的防御工事，能迅速将敌主力吸引到这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倒不妨再冒险试一试采用这一计划。然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在朝鲜尚无这样的工事。因此，这里的危险性就在于，英美军一旦识破了你们的计划，就不会给你们以实施机动的可能性。而由于你们是第四次重复这一计划，那也就很容易被英美军识破。

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难以不付出巨大损失就能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 1 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还应注意到，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

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

第 284 号密码电报

菲利波夫

1951 年 5 月 29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8-99

文件 097

克拉索夫斯基转发志司关于防御问题指示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6 月 4 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彭德怀同志的电报。

“志愿军司令部关于进行战斗阻止敌军前进给各兵团司令员的指示和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本。

由于三八线以南有许多河流（现在雨季正在来临），而这些河流上的桥梁极不牢固和经常毁坏，同时也因为战线拉得太长，运输工具不足，食品和弹药补给困难，部队十分疲惫，所以，我们继续向南方进攻变得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决定比拟定期限提早结束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并把我军主力撤至我们开始进行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地区，以便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中，休整部队，补充和训练部队，以进行新的战斗行动。

为进行积极的、机动灵活的防御，每个军必须留一部分主力部队，以便用消灭、分散和消耗敌军力量的办法，来保证主力部队有休息和改编所必要的一定时间。

在此期间，志愿军司令部拟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削减不必要的机构，裁减非战斗人员，加强后勤机关工作，改进组织工作。

二、消除部队中现存的非常严重的右倾情绪。

三、将在朝鲜作战的战术经验加以总结和系统化。

四、力求做到使部分空军、反坦克预备队和高射炮兵参加在朝鲜的战斗。

五、组织和训练敌后游击队的斗争，迫使敌人拉长战线，消耗和分散它的力量，为我军主力在以后的战役过程中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现在，在目前主力部队撤回北方的条件下，由于某些部队的指挥员对指挥意图理解不够深刻和错误地运用现有力量，所以，这些缺点虽然已经暴露，但未得到及时纠正，各部队之间还出现了已被敌军加以利用的缺口。

自从我军在6—7天内发动进攻以来，开始感到食品、弹药不足和疲惫，敌军则提前准备了大量机械化部队，并利用我军停止进攻和后撤，开始尾随追击。我们对此还不适应。

再者，新入朝的部队在防御敌机械化部队方面尚无足够的经验。此外，某些指挥员自己在最主要的战线上未能跟上部队，不能及时地发布命令，并与主力部队距离很远。

有些根据情报制定的作战计划看起来很好，也没有什么漏洞，但它们不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所以，从5月21日至5月28日的几天内，我若干部队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为了牢固地守住阵地和保证我军进行休整，从而为以后的作战取得胜利和在积极、灵活机动的防御战中给敌军以打击提供必要的保障，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在公路上阻滞敌运动和消灭机械化部队。如敌军步兵从小路推进和通过山地进攻，则更有利于我给予打击。为此必须集中各种反坦克火器以及重榴弹炮部队，按其火力远近配置于公路两侧的隐蔽处，进行必要的工兵作业；利用有利地形，建立火力系统，做好向公路和敌坦克最可能出现的地方进行射击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必须破坏最狭窄地区的山区公路；在我反坦克火力区域和被破坏的道路之间，必须埋设反坦克地雷。这样，如果敌坦克遇到障碍而绕行，他们将触雷。我部队此时应利用炮兵部队射击敌军集结地区。与此同时，装备有反坦克手榴弹的小分队向前方运动。埋伏在道路两边，准备反冲锋的部队利用敌军混乱时机，部分地或全部地击溃敌人。如果敌步兵沿两翼运动企图沿小路迂回攻击我军，那么这将更好。这时，山区没有重武器支援，敌人不得不以步兵队形进攻，容易予以击溃。因此我们必须预先准备好部队和轻型火炮武器（可移动炮、迫击炮），坚决、勇敢、迅速地消灭敌军。

在打击沿公路运动的机械化部队的同时，打击越过山地沿两翼进攻的敌步兵，我部队必须不分散行动，各部队执行一定的任务。这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我们才能阻止敌人推进并取得战斗胜利。

二、我们部队靠步行无法摆脱敌机械化部队。因此为进行积极战术防御，不仅要有第一线防御，还要有第二线、第三线防御，以便在第一线发生不利于我的情况变化时，我们能够在第二线和第三线阻挡敌人。但是我们的力量不能平均分配在所有防线上，而要依据防御地区，尤其是铁路和公路地区的重要性而集中部署。在我部队从第一防线撤到第二防线后，第二防线部队必须派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兵小分队迅速而彻底地破坏桥梁、隘路并沿防线埋设地雷，以便阻挡敌人进攻。如果自己的或友邻的部队没有来得及完成撤退，那么为了不使敌机械化部队有机可乘，深入我防线并破坏我作战计划，每一兵团、每一师、每一团都必须使用一定数量的兵力，不惜任何代价阻击并击溃敌部队，从而保障自己的部队和友邻的部队平稳而有组织地后撤到预定地区。虽然执行阻挡敌军、掩护我军任务的部队将蒙受某些损失，但这些损失是值得的，给整个战役将带来巨大好处。

三、必须使每一个指挥员都正确理解在前沿防线部署较少兵力而在后方防线部署较多兵力的原则，以及在前沿防线组织强大火力而在后方防线火力组织稍弱火力，并使第一和第二防线结合起来的原则。必须懂得在前沿防线部署较小兵力而在后部防线部署重兵，在防御时是必须的，是为了避免过分集中兵力并减少有生力量的损失。因此我军的主要力量必须隐蔽地集中在侧翼和后方，以便在有利时机反击进攻的敌人，予以消灭、驱散，而不是消极地后撤和抵抗。为了用不大的兵力牵制敌人，不仅需要良好的工事，还要有足够的火力支援。因此在前沿防线需要组织强大火力，而在后方防线火力较弱；应该根据火炮性能，纵深配置火力，有间隔地对敌进行突然的、猛烈的射击，以杀伤敌有生力量，支援我步兵反冲锋。各部队都要征询炮兵的意见，帮助炮兵开辟道路，构筑阵地，保障他们准备战斗的必要时间。炮兵方面要克服一切困难，在战斗中积极帮助步兵。

在防御过程中进攻时机的正确选择取决于每一个指挥员独立决策的能力。每一指挥员必须设立观察点随时掌握战场情况，根据敌部队情况的变化，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反冲锋，使敌人受到有生力量的巨大伤亡。

各兵种部队必须找到时间把志愿军司令部今年3月8日和今年3月15日的命令，以及今年4月6日关于进行防御战斗经验的文件，传达到全体指挥员，对这些文件加以研究学习。每级指挥员学习上述文件后，要向司令部报告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些文件的。

四、要坚决反对指挥员处事的不严肃态度，对上级指挥员命令不重视的态度，以及不认真研究情况的态度。

鉴于新到朝鲜的部队没有抗击技术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战争经验，尤其是进行防御战的经验以及下级指挥员指挥能力较弱，更鉴于参加战斗的兵种数目较以前增加，因此高级指挥员不应把不同兵种部队看作为自己以前的下属部队，而不去想一想他们是否能使用这些部队，是否能指挥这些部队。

全体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应该深入研究高级首长的计划，详细了解具体情况，研究地形并细致地制订作战计划。在制订第一阶段作战计划之后，必须制订第二阶段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准备好进行作战，而决不允许仓促上阵。

与此同时，在目前情况下，上级指挥员必须深入基层，实际进行领导，帮助下级指挥员摆脱困境。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弄清楚下级指挥员对自己首长的意图和计划的态度，纠正下级指挥员的错误和缺点，同时也要依据实际情况改正自己计划中不正确之处，避免汇报和实际情况之间的不符之处。这无疑可以提高下属对胜利的信心。

现时在抗击技术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斗争中只凭勇敢是不够的，必须有勇敢而明智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深入基层，即亲临前线，不仅防御时必要，进攻时也必要。

必须设立良好的指挥点，在主攻方向上随部队移动，及时观察情况，选择有利时机行动。随后必须使计划和汇报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相信，上述指示将在各部队由指挥员贯彻执行，志愿军司令部的行动意图也将以口头形式传达到所有师、团指挥员，务必使所有部队依据总体意图，很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现时要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击溃敌人，削弱敌人，挫败敌人锐气，以便逐步过渡到大批消灭敌人。

我们要求各级指挥员仔细研究情况，妥善部署兵力，组织火力系统，使得每个兵团能够同时击溃一至两个连或一个营的敌正规军部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这也是现时在敌人冒险进攻阶段消灭敌人的最有效的指导方针。

我们希望各级指挥员深入研究这些指示，克服一切困难，动员全体部队，竭尽全力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

志愿军司令部

1951 年 5 月 31 日 15 时”

第 2759 号电

克拉索夫斯基

1951 年 6 月 4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10-16

文件 098

斯大林关于防御作战等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6 月 5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 6 月 4 日的电报以及彭德怀同志的两个指示。

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战场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降低英美军队的军事威信。

我在自己的电报中主要谈的是，如果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没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匆忙地进行机动作战是危险的，要能够迅速地把主力调到那里去。彭德怀同志写道，他在后方建立了三条防线。如果这样做，防线就将是真正巩固的，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好，军队就不会陷入包围。

您抱怨说，你们那里大炮、反坦克炮和其他武器很少。两个月前我已通知您，波兰人放弃了他们的订货，因此我们能在今年给您额外的供应，并相应地增加 1951 年度的军事贷款额。周恩来同志欢迎我的这个通知并告诉我们，您很快就会寄来新的订单。但是，没有收到您的订单，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我再次通知您，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新的大炮、武器。

彭德怀同志认为应加强敌人后方游击队的行动，这是对的，是绝对必要的。彭德怀同志谈到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采取的先是稍稍向前推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机动作战，给你们的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我担心，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中朝军队的士气。我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 3—4 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这种打击将导致中朝军队和英美军队士气的重大转变。当然，这不是广泛的和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对敌人进行短暂而重大的打击，但这将是使敌人清醒和提高中朝军队的士气的一次打击。此外，这样还可以使您能够在以后进行更广泛和更有效的

局部战役，这是消耗敌人所必需的。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4-25

文件 099

毛泽东关于高岗、金日成访苏等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1年6月9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9日19时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6月5日和6月7日两封电报，均已收到。

您1951年6月9日派出的专机已抵北京。

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定于1951年6月10日乘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希望现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同志能参加会谈。

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补充申请单，由高岗同志随身带去。

请您对此做出决定。

周恩来同志因病目前正在大连治疗，申请工作因而延误了一些时间。现在编制申请单的工作才刚刚结束，因此延误的过错应由我们来承担。

由高岗同志带去的申请单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编制的。这次申请单所列总价值相当大。

请苏联政府按这些申请单供货，并按半价计入军事贷款，还请延期支付此一款项。请您和高岗同志讨论这一问题之后，将您的决定通过高岗同志告我。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志愿军聘请苏联顾问的问题，由高岗同志当面向您报告，因此我在这里就不谈了。

祝您身体健康！

第2893号电

毛泽东

1951年6月9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8-29

文件 100

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6 月 13 日）

北京

致罗申：

请尽快交给收电人。

“毛泽东同志：

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第二、关于军事顾问。如果您很需要他们，我们愿意满足您的要求。

第三、关于供应 60 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

我在这里不谈细则，您的代表们将告诉您这些情况。

我们认为，16 个中国空军师中至少 8 个歼击机师现在就投入使用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考虑，除了两个或三个米格 –15 战斗机师以外，你们可以从中国中部和南部把 5 个或 6 个米格 –9 战斗机师调到前线，这些师将有效地反击轰炸机。你们前线的 8 个歼击机师可以完全满足前线的需要。根据我们的资料，你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飞行。应当使他们尽快投入战斗，以便他们成为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战斗中的飞行员。我们培训前线作战的飞行员用了 5—6 个月时间。培训中国飞行员有 7—8 个月足够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你们前线最重要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收到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最近打算代表 16 个反对朝鲜的参战国向你们和朝鲜人提出停战建议。但是，在提出这个建议以前，他们想对你们的军队进行一次打击。可能这是传闻，但也完全是可能的，很可能这不简单是传闻，而且会有相应的行动。因此，建议加强防卫并不让敌人前进。

菲利波夫”

罗申：

请把这封电报内容告诉克拉索夫斯基，我们将给他专门指示。

第 302 号密码电报

菲利波夫

1951 年 6 月 13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31-32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1-32

文件 101

斯大林关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等问题致克拉索夫斯基电

（1951 年 6 月 13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根据我们的资料，我们的飞行员培训朝鲜人非常慢，马马虎虎。你和别洛夫将军看来想把中国飞行员变成教授而不是战斗飞行员。我们认为，我们的航空专家过分谨小慎微了。如果说战争时期俄国飞行员 5—6 个月就培训出来了，为什么中国飞行员的培训不能在 7—8 个月内结束？是该抛弃这种有害的谨小慎微的时候了。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 8 个中国航空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它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您最重要的任务。

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报告执行情况。

第 303 号密码电报

菲利波夫

1951 年 6 月 13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7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3

文件 102

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高岗、金日成电

（1951年6月13日）

致高岗和金日成同志：

我已收到你们6月13日的电报。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应采取防御态势。

最好这样做：

一、等待敌方提出。

二、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①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三、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

四、我们已命令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等立即返回前线并坚决守住现有防线。6月和7月份将加强准备。8月份我们将进行较大的战役。如果敌人不在我们的后方

---

① 凯南，乔治·福斯特（1904–？），1949年出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翌年辞职。1951年5月31日受美国政府委托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会见，提出和平谈判的试探。6月5日马立克再次与他会见，表示苏联希望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派遣大规模空降部队，我们的上述目标就可以达到。如果敌人不向朝鲜派遣新的增援部队和不派遣空降兵，8 月份我们就会比现在强大得多。

五、我们现在正计划向前线调动空军部队。

毛泽东

1951 年 6 月 13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57-60

文件 103

克拉索夫斯基关于中国空军状况等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6 月 15 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现在报告：

一、1951 年 6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做好战斗准备的有：6 个歼击机师，其中 3 个米格 –9 战斗机师，2 个米格 –15 战斗机师，1 个由 1 个米格 –15 战斗机团和 1 个拉 –11 战斗机团组成的师，共有歼击机飞行员 307 名。

2 个伊尔 –10 强击机师，共有强击机机组人员 107 名。

2 个图 –2 轰炸机师，其中 1 个师只有 1 个团有物质保证。

共有轰炸机机组人员 109 名，其中 14 名能夜间飞行。

二、处于重新训练阶段的有：5 个中国航空歼击机师，177 名飞行员。各师短缺的 133 名飞行员，要到 7 月 1 日才能从空军学校分配来。

正在重新训练的航空歼击机师中，1 个米格 –15 战斗机师将于 7 月 15 日准备好参加战斗，1 个拉 –9 战斗机师将于 8 月 1 日准备好参加战斗。

其余 3 个空军歼机师由于获得了米格 –15 战斗机，将进行重新训练，并将于 10 月 1 日前结束训练计划。

1 个朝鲜航空歼击机师共有 65 名飞行员。8 月 15 日将准备好参加战斗。

三、我正在采取坚决措施执行您关于训练由 8 个航空歼击机师组成的空军集团军参加战斗的指示。为此：

按以小时计算的进度表进行夏季空军师重新训练工作。

为了监督和按期完成重新训练计划以及就地给予实际帮助，我亲自负责朝鲜

师。

我向将于7月15日结束米格–15战斗机训练的师派出了空军集团军参谋长，并向将于8月1日结束的拉–9战斗机师训练的师派出了负责指挥的军官组。

我正在修改并将于1951年6月20日批准战斗部队和学校训练计划，根据卫国战争的经验，缩短训练期。

向中国司令部提出解决以下问题：

一、加速供其空军驻扎的朝鲜机场的建设。机场建设速度因美国空军对已建好跑道的破坏而受阻。

二、根据机场和敌人部队的情况而使用轰炸机师和强击机师。

三、改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工作，因为从1951年4月1日改由中国供应以后，空军技术物资和油料的供应急剧恶化了。

四、请您给予帮助，供应部队：米格–15飞机12架；РД10发动机40台，РД20发动机200台，AM21发动机30台；米格–9和米格–15飞机内外胎660X160型1200套，雅克飞机内外胎570X140型400套。

根据中国政府的订单加快空军技术物资的发货。

第3004号电报

克拉索夫斯基

1951年6月1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1-63

文件 104

科切尔金关于中国军队情况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

（1951年6月16日）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①]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

① 原文如此，即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同。

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

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直到不久以前，为部队运输粮食和弹药直接负责的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不亲自过问后勤问题。直到5月底才决定成立军团、军、师、团的后勤环节，直到鸭绿江边的广大后方地区都属于彭德怀管辖。

此外还做出决定吸收一定数量的汽车和马车。尤其是广泛号召制造轻型手推铁车以供师、团后勤使用。

改造后勤系统，吸收交通工具，交通线实施防空，这些措施最近将对作战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技术装备差，中国人民军被迫采取以下措施。

（一）战斗，更不用说部队调动，只在夜间进行，因此部队很容易感到疲惫；

（二）与敌接触的并非主力，主力部署在敌炮火够不到的地方和敌坦克不能接

近的地区；

（三）防守时不组织密集战线。部队不把守敌之坦克可以攻击的道路，而是在道路两旁的高地设防；

（四）通常进攻不是与敌人直接接手时发起，而是从距敌 5–15 公里的地方开始；

（五）实施阵地战不合适，因为这将导致损失，迅速消耗弹药。

认为实施运动战最合适（对进攻之敌实施迎面突击）。

由于部队物质保障不力，进攻战役带有以下特点：

（一）持续时间不长（5–6 天），这是因为战士只能带 5–6 天的给养和弹药；

（二）纵深不大（30–50 公里）；

（三）目的有限——主要是战术目的；

（四）不能把取得的战术成果发展成战役成果。在实施 5–6 天战斗之后，部队需返回基地休整、补充。

在部队战斗行动中以下消极因素值得注意：

（一）组织战斗——进攻的和防守的，完全带有原始的特点，没有进行预先侦察，勘测地形和组织协同动作；

（二）对战斗没进行集中指挥，结果导致战斗自行发展，在战场上部队甚至相互干扰；

（三）在转入进攻前，部队没先进入出发阵地，没对敌实施火力侦察；

（四）没注意保障两翼和接合部；

（五）对经常碰到的部队撤退没有组织给予保障；

（六）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有充分使用炮兵。主要的炮兵预备队（炮兵师），由于缺少炮弹和不会密集使用，根本没有动用；

（七）位于朝鲜的 3 个坦克团，由于害怕损失装备，至今在战斗中没有使用过。（现驻在元山和平壤地区）；

（八）没有充分使用障碍物进行防御和在退却时迟滞敌人进攻；

（九）指挥部队是中国人民军里最薄弱的环节。早在过去（同蒋介石斗争时期）司令部就不是真正的指挥机关，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在部队中没有威信，直到现在事情也没有好转。

指挥战斗通常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司令部处在后方，在指挥部队上一点儿作用也不起。如在最近一次战役（春季）中，第 3 兵团司令员从第 12 军指挥员指挥所

指挥了战斗。兵团司令部留在后方（距前线约100公里），一点儿也不知道情况，结果在整个战役期间这个兵团一点儿情况也未上报。

电台是唯一的通信手段。没有使用其他通信，其中包括移动通信。同部队失去联系，都泰然处之，没有一个人着急。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可以认为，如果没接到什么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部队指挥，实际上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

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粉碎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粉碎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

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1]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在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科切尔金少将[2]

1951 年 6 月 16 日

文件 105

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军队装备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6 月 24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您 6 月 21 日的电报收悉。

一、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3]可能停战问题会有进展。

二、关于装备 60 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 10 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 1951、1952、1953 年和 1954 年上半年内，也就是 3 年内有可能完成 60 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

① 此处档案原件字迹不清。

② 此人任职不详。

③ 指 1951 年 6 月 23 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的声明，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广播节目中提出，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规定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我将以专门的电报更详细地告知这一切以及关于目前中国师的编制问题。

第 635177 号电

菲利波夫

1951 年 6 月 24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78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8

文件 106

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6 月 30 日）

发自北京，1951 年 6 月 30 日 11 时 20 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一、您的两份电报（发自 1951 年 6 月 24 日和 1951 年 6 月 28 日）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一）至于提供 60 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 3 年内完成 60 个师装备供应，而在 1951 年完成 10 个师的供应。

（二）您建议的现代化的中国陆军师的编制结构很好。我们采纳。在有了根据这种编制装备起来的 60 个师之后，中国军队将比现在强大得多。

二、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

1951 年 6 月 28 日我通过罗申同志收到了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谈话内容的主要精神。谈话的最后说："每一方应该只能有两个代表参加。此外，这些代表应该是有关军队的指挥员，而不是政府代表。因此中国志愿军的代表应该参加谈判，但不是作为交战方中国的代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金日成同志发来的电报收到了。他在电报中问：如果李奇微[①]要求开始谈判，应该如何答复。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我们应该一边认真观察战斗形势，以便不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这个对其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

① 李奇微，马修·邦克（1895-？），美国上将，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任美国第 8 集团军司令，1951 年继麦克阿瑟出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

同志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并做好准备，在敌人要求开始谈判的情况下，派合适的代表进行谈判。

至于如何答复李奇微，在收到李奇微的要求后，应该讨论答复的内容和措辞。您对此问题是什么意见？

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

我把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发给您看。

第 3260 号电

毛泽东

1951 年 6 月 30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90-91

文件 107

斯大林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6 月 30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认为，应立即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这个协议应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如果没有中国志愿军司令员签署，那么，美国人会认为朝鲜单方面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意义。应坚决拒绝把元山地区的丹麦医疗船作为会晤地点。应要求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正如您指出的，现在您掌握着停战的主动权，所以美国人将不得不在会晤地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您今天要给李奇微发出大致如下的答复：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您 28 日[①] 关于谈判停战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命向您声明，同意与您的代表会晤，以进行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停战的谈判。我们建议以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作为会晤地点。如果您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 7 月

① 这里指的是北京时间，按美国东部时间，该声明是 29 日发表的。

10–15 日同您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在电报中，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

第 335 号密码电报

菲利波夫

1951 年 6 月 30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95-96

文件 108

斯大林关于同意中朝方面谈判立场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8 月 29 日）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您 8 月 27 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同意您对目前开城谈判情况的评价和你们的立场，对美国人为压制中朝方面的挑衅事件需要得到一个满意答复。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根据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

你们建议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在目前谈判阶段的监督员和观察员参加谈判，我们认为这没有益处。此建议的不利方面是，美国人将认为中朝方面比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对此问题如果您坚持这个观点，那么应向金日成通报此情况。

菲利波夫

1951 年 8 月 29 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9，л.4-5

文件 109

毛泽东关于接受斯大林的建议致斯大林电

（1951年8月30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8月29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同意关于我们在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现阶段谈判的监督员和观察员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是不适宜的。

此情况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

第4358号电

毛泽东

1951年8月3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97

文件 110

毛泽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情况等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1年11月14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4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朝鲜停战谈判以后，由于近两个月来前线损失惨重，以及美国国内外的停战要求增强，美国方面接受停战条件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仍然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因此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积极打探消息并玩弄花招，力图拖延谈判。

确定分界线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敌方要把分界线划在我军深远后方，而不是建议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确定分界线，对之做出某些改变，并将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

目前，在签署停战协议时，敌方已提出要求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没有把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我们则坚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确定以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在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时如有变化则对双方部队接触线做出改变。目前敌方正就这一问题同我们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争论不会持续很久。

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之所以同意推迟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和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问题，不仅因为目前进行的谈判是停战谈判，以及敌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立即以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山区来交换三八线以南的西部低地，而是因为在敌方拒绝放弃东部山区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也有有利于防御的山区；至于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地区，则它对我们有利，是因为那里居住着比东部地区多得多的居民，还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开城地区是夺取汉城的前哨阵地。

金日成同志今年 6 月在北京讨论停战条件时曾就此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停战条件也是征得他的同意的。

关于对谈判监督问题的讨论，我们早就打算建议建立停战机构，双方代表均参加这一机构，由该机构承担对停战条件的执行进行监督和在缓冲地带进行监督的任务。

但是，敌方一定会要求在双方后方建立监督，以便限制双方援军和军用物资的调遣。

我们打算同意在双方 1–2 个边境居民点建立监督，并同意您的指示，建议给中立国，即未参战的国家赋予监督职能，我们打算邀请苏联、波兰和印度这 3 个国家承担此项任务。

可能美国人一开始会反对。若是这样，我们就建议由瑞典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派出代表。

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

我认为，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由有关国家政府召开高级会议问题可能有 3 种方案：

一、召开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双方政治代表会议（可能美国提出这一方案）。

二、召开 4 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三、召开7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请您指示，从国际局势来看这3种方案中哪种是最佳方案，或者请您提出新方案。

目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力求在今年达成停战。与此同时，我们应进行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敌方拖延谈判和破坏谈判。从朝鲜战争还要拖延半年甚至一年着想，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正在节约兵力、物力和人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国内，我们正在准备整编军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持朝鲜战争，并保证国内财政状况及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和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加紧进行。

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1950年预算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的32%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

因此，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的方针，则明年的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请您就上述问题给予指示。

第5631号电

毛泽东

1951年11月1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6-19

文件 111

斯大林关于苏军撤出旅顺等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2年4月2日）

密码电报，1952年4月2日11时12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 1950 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 1952 年撤出旅顺港。

您 3 月 28 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 1952 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给人留下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

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 – 张家口铁路问题，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还因为 1950 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因为：(1) 它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她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2) 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3) 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于是乌兰巴托 – 张家口或乌兰巴托 – 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线是适宜的，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 – 中国的铁路线问题。

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答复。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2-3

文件 112

斯大林关于苏军撤出旅顺等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2 年 4 月 9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续上电[①]：

“第四，关于按计划给 60 个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到 1952 年底，如果没有困难，我们力求满足您的要求，力求给您提供 16 个师的武器。

第五，我们研究了您关于在 1952 年给 20 个航空团提供飞机的电报。根据我们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在今年继续给中国提供飞机，但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们西方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缔结的协定提供飞机，在 1952 年底以前剩下的 9 个月中，我们只能给您提供 15 个团的飞机，即 450 架。

我们的军方认为，在一年之内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难的，因为除飞行员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人员和技术员，以及不少于 10–15 个机场及其飞行服务和保障器材。迄今为止，在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还有 4 个团的米格 –9 喷气歼击机被搁置在仓库中未加利用。

至于您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教练机和其他各种飞机，只有在收到您的具体申请单之后才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第六，我们同意您订购岸炮、护卫舰以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

关于这些武器和物资的交货期限，将与贵国海军代表另行商定。显然，1955 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必须延长 2–3 年。

第七，我们同意您关于就支付 60 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与贵国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建议在谈判中还根据我们商定的提供计划确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

第八，我们准备于 5 月份接待贵国代表团商讨上述问题，并同意中国海军代表于 4 月份来莫斯科。第 167 号密码电报。

---

① 从内容上看，在此电与 4 月 9 日电（文件 0111）之间应该还有一封电报，但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电。

结束。

菲利波夫”

1952 年 4 月 9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8-9

文件 113

华西列夫斯基关于第 64 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计划的命令

（1952 年 4 月 14 日）

第 45077 号，1952 年 4 月 14 日

你们提出的关于替换洛博夫同志所率领军团各部队的建议，我们认为应作如下修改：

1. 应在今年 6 月 1 日前替换第 64 军所属机关，而非你们所建议的在 5 月 1 日前。

2. 根据今年的时间安排，每隔 4–6 个月对该师各航空师进行替换较为合理。

3. 对洛博夫同志所率军团中的高炮师和探照灯团的替换可能不会早于今年 10 月 1 日。

关于与国家防空部队司令协商和共同制定的洛博夫同志所率各部队的替换计划，你们必须最迟在今年 4 月 25 日前向总参提交如下给政府的报告。

据阿加利佐夫和萨维茨基等同志报告，近期美国空军在我空军驻防机场附近的活动较以往更加频繁，其目的就是企图用自己的 F–86 歼击机来缠住我米格 –15 比斯机群和对我机场实施封锁，以确保其强击机在战区的活动。敌人所实施的这一战术之所以经常得逞，是因为我军所在的安东和庙沟机场距朝鲜湾有 8–14 公里距离，敌机能够从空中很清楚看到我空军的活动。

虽然我歼击机的起飞和降落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掩护，但从朝鲜湾方向高速俯冲而来的美国飞机仍能对我正在起飞，尤其是已完成战斗任务而燃料即将耗尽的正在降落的米格 –15 比斯发动攻击。如果这些发动攻击的敌机遭到我军反击，美国人又会立即向朝鲜湾方向撤退，而其飞回那里总共也只需 30–60 秒，而我们的飞机根据规定是不得飞入朝鲜湾的。因为如果我们的追击飞机被击毁或击伤，飞机和机组人员将落入敌人之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敌人掌握了海上的制空权，而朝鲜湾很多

地区都很狭窄，敌机一天内便可轻松抵达。

还应报告的内容包括：在这一地区中国人共有 5 个空军师。他们作战非常小心谨慎，主要只与敌 F–80 和 F–84 等机型作战，而一般不参加针对敌 F–86 的战斗。朝鲜人的米格 –15 歼击航空师则根据本国政府的禁令，不参加作战活动。

总体而言，我们在沈阳和安东地区部署的 10 个歼击航空师中实际与美国空军作战的只有 2 个师。正因为此，一般情况下美国人在战斗中均能在兵力上优于我方，而我们的飞行员则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作战。

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

ЦАМО РФ，ф.16，оп.3139，д.125，л.13

文件 114

毛泽东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致斯大林电

（1952 年 4 月 22 日）

发自北京，1952 年 4 月 22 日 19 时 10 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一、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关于 1952 年向中国航空兵提供够装备 15 个航空团的各型飞机的决定。

今年年底前，现有 8 个航校将有足够组建 26 个团的飞行和技术人员毕业。此外，现在还有一个轰炸机团没有飞机。

因此，除了已向苏联订购的装备 15 个团的飞机、以及库存的装备 4 个团的米格 –9 飞机外，还有 8 个团有飞行技术人员而没有飞机。这些团可能被分配到各相应部队中去接受飞行训练（按每两架飞机 3 个飞行员分配）。

二、在我军航空兵现有 19 个米格 –15 歼击机团中，有 15 个团（配置在安东及其附近各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由于作战和训练中的损失，19 个歼击机团共缺少 154 架米格 –15 飞机（按每团 31 架飞机的编制计算）。

为了提高战斗力、保障继续作战，以及保障飞行人员有相应数量的飞机来继续提高飞行技术，我们请苏联政府除了您今年 4 月 9 日来电中所指的用于装备 15 个团的飞机外，再允许中国政府在 1952 年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 100 架米格 –15 飞机。

我们希望您能尽快地把这些飞机派往中国。

请把您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告诉我们。

三、1952 年各型教练机所需数量详细申请单，已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

为了保障各航校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我们希望您同意申请单中的飞机数量。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 年 4 月 22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22-23

文件 115

斯大林关于 1953 年军需品订购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2 年 12 月 27 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收到您 12 月 17 日电报。

您关于美国人 1953 年春季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领导下的目前美国在朝鲜的司令部的计划。为了缓和朝鲜战场的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您根据美国人进攻的可能性考虑到事情的最坏方面，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详细研究了您那份 1953 年军需品申请单和那份紧急军需品申请单。

您所申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数额超过了我们 1953 年的供应能力。根据可能，我们 1953 年将向您提供 20 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也就是说按 20 个师我们将提供炮弹约 80 万发，各式大炮 1320 门和其他军需品。

考虑到您在电报中说到的情况，我们 1953 年将尽最大努力向您提供超出 20 个师的所预定的武器和弹药，到年底平均运出的数量约为您 12 月 17 日电报申请数的 1/4，计：炮弹 60 万发、各式火炮 332 门、炮牵引车、信管和其他军需品，运送数额我们军事部有详细清单。

这样，将1953年提供2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弹约计算在内，将向您提供：炮弹140万发（1952年为112.5万发）、各式火炮1652门（1952年为1056门）。

您电报中提及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交来的军火生产材料申请单，目前我国外贸部正在研究这份申请单。

谢苗诺夫[①]

1952年12月2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15-116

文件 116

斯大林关于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3年1月15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月4日的电报已收到。

根据电报我们再次研究了能否满足您关于请求加速起运60万枚炮弹和332门大炮的问题。按您电报中要求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保证全部如数运出是不可能的。我们已命令军事部加速运货并保证予以供应60万发炮弹（1–4月，每月15万发）和332门大炮（1–2月，每月166门）。

炮弹和大炮的规格均按您的申请单提供。

因此，提供20个师的大炮、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则从5月份开始至年底。

谢苗诺夫

1953年1月1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37

① 斯大林的化名。

文件 117

斯大林关于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3 年 1 月 15 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 1 月 4 日的电报已收到。

根据电报我们再次研究了能否满足您关于请求加速起运 60 万枚炮弹和 332 门大炮的问题。按您电报中要求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保证全部如数运出是不可能的。我们已命令军事部加速运货并保证予以供应 60 万发炮弹（1–4 月，每月 15 万发）和 332 门大炮（1–2 月，每月 166 门）。

炮弹和大炮的规格均按您的申请单提供。

因此，提供 20 个师的大炮、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则从 5 月份开始至年底。

谢苗诺夫

1953 年 1 月 15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37

文件 118

华西列夫斯基等关于朝鲜形势呈布尔加宁的报告

（1953 年 1 月 21 日）

布尔加宁同志：

兹报告现在朝鲜的形势。

在艾森豪威尔 1952 年 12 月 2–5 日访朝之后，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关于克拉克有进攻计划的侦察情报，许多美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的言论以及美国在远东准备进攻朝鲜的实际措施都表明了这一点。

这些措施反映在以下方面：

——加紧兵力部署，进一步展开南朝鲜军队。1952 年 12 月，组建了两个步兵

师，3 个独立步兵团。考虑到这些新组建部队，南朝鲜军的战斗编成最近时间可达到 15 个步兵师（原有 10 个师）；

——加强武器和技术装备。南朝鲜每个步兵师都成立：由 4 个炮兵营编成的炮兵集团（72 门火炮），校射航空兵分队（8 架飞机）和一个坦克连；

——美国要求每一个朝鲜参战国都增加自己的部队，对此，比如土耳其政府表示同意并准备再往朝鲜增派一个旅；

——美国人在台湾训练和准备了国民党 3 个师，它们可能被用于朝鲜；

——驻在日本和朝鲜的 9 个师有 7 个师完成了登陆训练。在日本和朝鲜东海岸实施了总结性的登陆演习，美国人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登陆能力的检验；

——开始在朝鲜准备海军基地和港口：镇海（釜山以西 40 公里）、釜山和仁川；在北朝鲜西海岸仁川 – 海州地段诸岛修建基地。在这些岛上发现美军支持登陆的第 2 旅的分队。

——美国在北朝鲜大大加强了侦察和破坏活动。侦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西海岸安州 - 海州，东海岸城津（Сэнгдзин）至元山段，交通枢纽和装备基地；

——美航空兵加紧轰炸北朝鲜西部的道路、渡口和人民军基地；

——在前线南朝鲜师逐渐替代美军师。1952 年 12 月，3 个美军师由第一梯队调为预备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指挥部是这样评述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的：

朝鲜持久战对美国不利。因此为赢得战争他们得采取坚决的行动。在朝鲜顺利进行战争的方法可能是实施大规模海上登陆。

美国人将以近 7 个步兵师的兵力，通过在朝鲜西海岸格松岛（Гецуундо）– 海州段登陆实施主要突击。

同时，美国人还将以 1–2 个师的兵力，通过在元山地区登陆，实施辅助突击。与此同时，加紧正面进攻。

此外，中国指挥部估计到以一个师的兵力在安州、云山（Юнсен）和开城地区空降的可能性。

认为在黄海（Кокай）半岛登陆不大可能，因为这只能拉长战线。

为实施登陆，敌人可能运用 11–12 个师的兵力，其中 6 个师从主要前线抽调，5–6 个师从外地调（从日本调一个师，从蒋介石那里调 2 个师，从美国调 2 个师）。

认为登陆时间很可能是在 1953 年 7 月。

中国指挥部认为，美国人在实施登陆战役时将使用原子武器。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指挥部决定：

一、加强自己在北朝鲜的兵力部署，把3个军（第1、16和54军，共9个师）连带重武器和一个坦克师调往北朝鲜。

此外，在鸭绿江以北中国东北辑安和临江地区，于1953年3月集中一个军。

二、调整在朝的兵力部署，重点加强西海岸防御。

从前线抽调优秀部队以加强海岸防御：把第40和第38军调往西海岸地区，把第15军调往东海岸地区，第47军留作前线预备队。

它们的阵地由缺少战斗经验的第23、第24、第46和第1军驻守。

由于兵力重新部署，西海岸地区防守兵力将加强到6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和数个炮兵部队。

在东段战线，为加大战斗队形密度，规定把朝鲜第7军团配置在第一线，并由驻在西海岸的朝鲜第4军团取代朝鲜第3军团。

部署调整，其中包括中国境内出兵，计划在很短时间里，至1953年1月20日完成。

但是，计划的人民军兵力部署调整，由于中国军队入朝推迟，至今尚未全部结束。

三、为指挥部队成立了西海岸地区防御司令部和东海岸地区防御司令部。

西岸防御司令部指挥中国人的第38、第39、第16、第40和第50军，以及朝鲜人的3个军团；东岸防御司令部指挥中国人的第12、第15军和第33步兵师，以及朝鲜人的第2、第5兵团和第24旅。

四、立即着手加固海岸防御工事。

五、在最短的期限里（200天）建成开城－海滨（宁远）－休济岛（Сюдзиодо）的铁路，并拓宽主要的公路干线。

六、在1953年实施3次战役，每次一个月，目的是牵制敌人，杀伤敌人，不让其加强登陆部队。

七、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补充伤亡，1953年成立了25万人的预备队。师和军成立了预备营，兵团成立了预备团。

八、为预防敌人在黄海半岛地区登陆，着手组建这一地区的朝鲜游击队。

九、制定的所有反登陆措施，包括构筑钢筋水泥工事和坑道，计划在1953年3月15日前完成。

我们认为中国指挥部对朝鲜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它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

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对在西海岸格松岛－镇南浦一线登陆不利，美国人可能采取其他行动，即：

——以登陆部队从镇南浦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从汉城以北地区实施突击，任务是消灭海州东北人民军部队，然后向平壤、安州进攻；

——以登陆部队从元山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从铁原、金化地区实施突击，任务是消灭人民军左翼集团，然后向平壤进攻。

在美国人按照这一方案实施行动的情况下，人民军部队的部署可以保障坚固的防御。

不排除美国人通过登陆部队在黄海半岛登陆实施部分战役的可能性，其任务是前出到开城地区（海州以东 75 公里），夺取人民军右翼部队的主要交通线。在 1952 年下半年，美国的谍报－破坏小组不断在这个半岛实施登陆。

为了加强抗登陆防御，防止敌人在可能地段登陆，我们已建议斯特列利比茨基[①]同志同中国指挥部一起讨论下述问题：

——以驻扎在该方向的第 64 军之兵力加强镇南浦的防御，以及以第二梯队兵力实施机动；

——建立军团和兵团反坦克炮兵预备队；

——加强东岸防御部队的炮兵部队。

此外，我们还建议格拉祖诺夫[②]同志在近期内向朝鲜派出我们的通信专家和工程专家，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有这方面的要求。

同时我们还准备通过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向中国指挥部提供组织抗登陆防御的基本原则。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 年 1 月 21 日

① 斯特列利比茨基，苏联驻志愿军总部的军事顾问。

② 此人任职不详。

文件 119

斯大林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3 年 1 月 27 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在朝鲜使用中国海军部队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向您提供鱼雷艇、飞机和装备的电报已收到。

您请求告知我们对派中国海军志愿军赴朝是否适宜的看法。我们认为您大概指的是使用海军陆战队。当然，海军陆战队可以成功地用在沿岸抗登陆防御总体战中以消灭敌人靠岸和登陆时的运输工具和登陆部队。我们认为您的上述设想是正确的。

关于向你们提供海军军需品问题我们已下达了指示：拨给你们 10 艘鱼雷艇、83 架飞机（其中图 –2 型轰炸机 32 架，拉 –11 型歼击机 35 架）、26 门 37 毫米火炮和 8 门 130 毫米火炮以及适用于这些火炮的弹药。鱼雷、水雷、空投炸弹及其他军需品均按您的电报拨给。

已向海军部下达指示，于第一季度向你们发出上述装备。

关于顾问，我们打算再补派 3 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您邀请的其他方面的专家将从目前正在中国的我方海军顾问中派出。

谢苗诺夫

1953 年 1 月 27 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39

文件 120

瓦斯科夫关于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致斯大林电
（1953 年 7 月 3 日）

1953 年 7 月 3 日 23 时 40 分

第 1211–1220 号

7 月 3 日凌晨 3 时 30 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受周恩来的委托驱车来到使馆交给我一些文件，具体包括：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 6 月 29 日来信的答复草案（给克拉克的答复草案准备于 7 月 5 日发出）；一份报告——中国政府对和谈现状的评估和就克拉克的来信拟准备采取的相应举措。

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如下：

和谈现状和针对克拉克的来信拟准备采取的举措。

谈判情况。最近 12 天来，已释放了战俘的李承晚开展了反对和谈的运动。而深陷朝鲜战争泥淖的美国则主要是劝导李承晚，以便其弱化自己的反和谈运动，并与之妥协。

为了安抚李承晚，美国人打算与其签订一个临时协定。该协定将可能使和谈协议得以签署，并使美国人从目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不过，李承晚的本意是想让美国人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他对与美国人签订一个临时协定并不满意。因而他继续提出要求：在 3 个月之内举行政治会议，如果过了这一期限，将重新恢复战争行动；在该会议上他将拥有否决权。李承晚的这一要求与美国人关于停战的决定发生了矛盾。因此两天来美国和李承晚关于这一问题上所举行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人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李承晚施加压力。

鉴于上述情况，克拉克出人意料地于 6 月 29 日地回复了金日成和彭德怀去信。其目的在于：其一，让李承晚明白，美国人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已不可能再作让步。他打算不顾及李承晚的反对而签署和约。其二，让我们知道，他（克拉克）能在多大限度内履行自己的承诺；他希望以和平协议的签署来增加自己与李承晚谈判的筹码（和平协议签署后将有利于限制对李承晚的武器供给）和取消关于 27000 名战俘的问题。其三，让全世界知道，美国希望结束战争。

可以预知的是，深刻了解美国人弱点的李承晚是不会让步的。不过，我们也知道，美国是朝鲜战争的主角。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李承晚会受到来自各

方面的压力。因此，尽管美国和李承晚之间仍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最终他们依然可能在朝鲜和谈问题达成妥协。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实现妥协之后李承晚仍将会继续发动一些小规模的挑衅活动。

我们的对策。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美国的政策会由于国、内外在南朝鲜问题上观点的分歧而发生波动（摇摆），我们打算坚持如下方针：

在实现停战方面掌握主动权，在停战问题上与美国取得一致，以便达到打击、孤立李承晚，促使美国对李承晚施压和加剧美方内、外部分歧的目的。与这一方针密切相关，我们打算预先采取如下步骤：

1. 起草金日成和彭德怀给克拉克的答复信，并于7月5日发出。在复信中表示：同意恢复和谈，驳斥美方的指责，并指出美国推行纵容（李承晚）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

该复信的具体内容见附件。

2. 准备在和平协定签署前对李承晚傀儡军队实施打击，将前线向南方推移。在和谈会议恢复后，向对方指出，只是由于李承晚的原因才拖延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和导致了前线形势的变化。而根据双方以前所达成的约定，即根据战场实际状况也划定边界。建议再次修正（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可以预测的是，由于目前谈判对手与李承晚的关系陷于恶化，其将同意我们的这一建议。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对方不同意让步，并以此作为其对外宣传的口实。一旦出现这种情形，我们将选择适当的时机，最终作出妥协，拟以1953年6月17日双方的约定来划分（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

3. 准备于7月5日以后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在会议上我们拟向对方提出如下与实现停战协议相关的问题：

1）关于修正分界线；

2）李承晚是否参加停战，以及与此相关，他是否会根据停战协议而将自己的军队及时撤出所占地区？

3）李承晚集团是否是停战委员会联合检查小组的成员？

4）关于要求美方负责27000名战俘的遣返工作；如果美方拒绝承担这方面责任，那么我们将有权将这一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讨论；

5）关于保障红十字会联合小组在对战俘及其代表进行讯问和解释工作时的人身安全；

6）关于确保所有坚决要求被遣送回国的外国战俘不遭受强制性扣留；

7）关于如何保证在运用“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法”解决非直接遣返战俘问题时该法律能得到真正落实和如何动用该委员会军队来保证战俘的人身安全；

8）关于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何时开始工作；

9）关于停战协定的效力。

4. 在代表团会议重新开始的同时，所属军官 - 参谋和翻译人员亦应开始进行与停战协定的签署有关的预备工作。其中包括重新修复准备用于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房屋。

5. 我们认为，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应在 7 月 15 日左右举行。必须说明的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及其在中立国观察小组中的副手——20 个检查小组中的成员，以及他们在最初阶段至少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均将在 7 月 10 日左右去北京。鉴此，在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便应在代表团会议上将上述情况向对方说明。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收）

在 1953 年 6 月 29 日的复信中您已经承认，李承晚集团强制解放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战俘和强力扣留这些战俘是严重和悲惨的事件。这是对的。但您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以及所采取的措施却不能令人满意。

所有事实均明显的证实，联合国军不能完全排除自己对这一事件应担负的责任。人们很早就已看到，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对这一事件是事先作了准备的。而你们对此也是知道的，却未采取任何预防性的举措。即使在事件发生以后，你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来阻止在联合国军监督下的南朝鲜警卫部队的行动。南朝鲜军队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之间）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结果是导致战俘们被迫离开了战俘营。我们在 6 月 12 日的去信中已指出，我们将高度关注这一事件。但您依然允许南朝鲜警卫队继续使用强制手段从战俘营中释放战俘。结果导致被李承晚集团强制扣留的战俘总量达到了 27000 人以上，其中包括 50 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在 6 月 18 日你方代表团团长哈里逊将军的信中和您在 6 月 29 日的复信中均提到，目前应采取措施以遣返战俘中的“逃跑者”。但与此同时，你们在信中又说不可能全部遣返这些战俘。实际中，你们的宪兵队得到的指令是：不采取任何针对“逃跑”战俘的措施。甚至于，在宪兵队的纵容下，这些战俘还被强制性地送进了专门培训李承晚军队的军事基地（中心）。联合国军所采取的上述立场，在军事方面至少可得出如下结论：纵容李承晚集团旨在粗暴破坏双方关于战俘问题的

协议和为实现停战设置障碍的行动。

我们在停战谈判开始前便已解放了自己战场上俘获的你方士兵。而您却试图将我广播人道主义做法与南朝鲜警卫队的破坏活动相类比，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须知，后者即使在我们签署了关于战俘的协议之后仍强迫战俘离开战俘营。关于“逃跑”战俘的遣返问题，你们无论如何都应承担全部负责。我们不得不向你们提出警告，李承晚集团仍将会继续叫嚣，即要求解放和强制扣留 8500 多名未被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李承晚集团与蒋介石的代理人密谋要强迫中国志愿军战俘脱离战俘营，并以此来彻底撕毁我们双方已达成的关于战俘的协议。我们认为，你们应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负责，并保证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您在来信中保证，联合国军将在一些必要的站点采取，甚至可能动用预防性的军事手段来确保停战协定的落实。我们认为这是应该的。但你们又声明说，自己并不能有效保证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也遵守双方代表团所达成的停战协议。与此同时，李承晚集团仍在继续叫喊要“通过武力方式统一朝鲜”。仅从这一声明便已经证明，三年前究竟是谁发动了侵略。如果现在联合国军继续纵容李承晚集团和允许其采取各种破坏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的罪恶活动，则将导致：虽然朝鲜停战协定业已签署，但却依然可能随时爆发针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武力侵略。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使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能停战协定及其相关其他协议。只有这时，朝鲜的停战才会得到保障和不致遭到违反。

综上所述，虽然您的答复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鉴于你们已表达了致力于迅速达成停战的意愿，我们在关注你们所作出的保证的同时，同意由双方代表团确定会谈的时间和商定如何真正落实停战协定相关问题和提前为签署这一协定作准备。双方会谈的日期应通过联络官由两个代表团团长来决定。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元帅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3 年 7 月 5 日

在当面交付了这些文件之后，伍修权又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向我口头通报了如下内容：

中国政府认为，近期李承晚的挑衅活动有二：一方面，极力想向美国讨价还

价，以得到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向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和中国实施恐吓。也正因为此，李承晚坚决要求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公约。

李承晚还说了一些空话，如他声称，如果美国不满足他的要求，那么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

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将只会给予李承晚有限的援助。因为美国也担心，如果给李承晚的援助过大，那么后者就可能真的进行军事冒险，并将美国也拖入其中。不论是未来可能被强行拖入战争，还是目前就在远东地区进行相当规模的军事冒险，都是违背美国人意愿的。在这方面，美国人的观点与李承晚存在一定的分歧。

关于在未来政治会议上应如何行动的问题上，李承晚和美国也是不尽同的。李承晚认为，如果会议不接受他（李承晚）的要求，那么，就应当离开大会，重新恢复针对北朝鲜的大规模进攻，一直打到鸭绿江畔，即朝中边界。美国人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为，在政治会议上谈判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终止，即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朝中代表将获得他们凭借武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时。鉴于以上所述，中国政府认为，为了和平我们必须签署停战协定。伍修权玩笑式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场面，好像是我们与美国在共同反对李承晚”。

伍修权接着说，中国政府认为，李承晚只可能会干一些小规模的挑衅和破坏活动，而要采取某种真正颇具规模的行动他还没有这个实力。

最后，伍修权说，中国政府正在等苏联政府对给克拉克的这一答复草案、报告和他受委托口头传达的中国政府的上述观点提出意见和建议。

瓦斯科夫

1953年7月3日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6-147

文件 121

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

（1966年8月9日）

抄送：勃列日涅夫（2份）、柯西金（2份）、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科瓦廖夫、柯涅克、苏达里科、外交部外交历史档案管理局、外交部国际问题司、外交部

东南亚处、存档（2份）。

绝密

关于1950—1953年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①]

一、战争准备及战争第一阶段

自1948年南北朝鲜分别进行选举，南方成立李承晚傀儡政府，北方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来，南北方之间的关系即急剧恶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汉城政权都宣称对整个朝鲜享有主权。苏军和美军于1948年从朝鲜撤出后，三八线地区的形势变得愈加紧张起来。

此时，金日成和其他朝鲜领导人已下定决心，以武力方式统一朝鲜，而未对当时存在着的和平统一的可能性——通过南朝鲜广泛发展的民主运动来达到统一的目的——给予必要的注意和考虑。

当时朝鲜人民军在人员和装备上都大大超过南朝鲜的武装力量。至1950年1月，朝鲜人民军总数已达11万人，一批新的战斗师正在迅速组建。

由于估计美国不会介入在南朝鲜爆发的战争，金日成一再坚持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意他用武力统一国家的计划。（第4–51、233号电报，1950年）

开始时，斯大林对金日成的反复要求持保留态度，认为“这样一个与南朝鲜有关的重大问题……需要做非常周密的准备”，但他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个计划。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随后，金日成于5月访问了北京，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朝鲜政府预计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

（一）把部队集结在三八线附近；

（二）向南方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

（三）在南方拒绝和平统一建议之后开始军事行动。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北朝鲜人有关提供武器装备以组建人民军新的战斗部队的一切要求，都以最快速度给予了满足。中国领导人也向北朝鲜移交了一个由朝鲜籍士兵组成的师，这些朝鲜籍士兵曾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中国还许诺提供食品援助，并调一个军驻扎在靠近朝鲜边界的地方，“以防日本人站在南朝鲜一边介入战争”。

① 该文件是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时手抄的，后以英文发表在《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Vol.2, No.4, 1993），其中部分内容威瑟斯比在抄写时省略了，但做了简要说明，并用方括号加以标示。该文件译自英文。

(第 62 号电报，1950 年)

至 1950 年 5 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共同报告，在三八线的军事集结已经完毕。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的发起时间定为 1950 年 6 月 25 日。(第 408 号电报，1950 年)

在进攻即将开始时，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与南朝鲜相比占有很大优势。南北朝鲜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如下：军队人数 1:2；步枪 1:2；机关枪 1:7；冲锋枪 1:13；坦克 1:6.5；作战飞机 1:6。朝鲜人民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预计，每天向南推进 15–20 公里，整个军事行动在 22–27 天内基本完成。(第 468 号电报，1950 年)

〔此处有一段对 1950 年 10 月之前战争进程的简短叙述，从朝鲜人民军在 6 月、7 月和 8 月的最初胜利直到 9 月美国人在仁川两栖登陆后他们几乎被彻底击败。〕

在朝鲜人民的这个最严峻关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竭尽全力组建新的部队，并利用中国边界地区来完成这一任务。被包围于南部的人民军各部队，则在山区坚持分散作战。

二、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

在金日成于 1950 年 5 月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强调指出，他确信美国不会“为像朝鲜这样的区区之地”而卷入战争。毛还提到，中国政府将在沈阳地区部署一支部队，以便在南朝鲜拉日本军人参与军事行动时，向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美军不会介入战争，因此没有打算以派遣大量兵员的方式帮助北朝鲜。

1950 年 8 月，美军飞机开始对靠近鸭绿江的中国领土进行轰炸。1950 年 10 月，也就是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不久，战线很快移至接近中朝边界的地区，敌方的大炮开始轰击中国一侧。美国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

此时，朝鲜人民军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逃出包围圈的残余部队正在夺路向中国退却，以便重新整编。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只是在中国的安全确实受到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才决定派遣志愿军进入朝鲜。1950 年 10 月的下半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作战。随后不久，中国入朝部队的总数达 100 万人，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人员被派往朝鲜做运输工作。至 1951 年底，朝鲜人民军总数约 33.7 万人。在敌人一方，约有 70 万官兵加入地面战斗，其中包括 38 万南朝鲜军和 28 万美军，而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未计算在内。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和苏联军事顾问的积极介入——他们参加了所有重要战

役的组织和筹划——在军事方面造成了决定性的突破。美军和南朝鲜军被迫退回三八线，在有些地段向南后撤更远。在西线作战的中国部队于 1951 年 1 月初占领了汉城。

然而，中国军队按照中共领导人守住三八线的战略方针，放弃汉城实施北撤。他们未对人民军试图将东线美军赶过三八线的作战提供支援。

在战争的这段时间，金日成同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朝鲜人不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弃汉城的做法，并指责他们未对东线人民军部队提供支援。

在中国的志愿军驻扎朝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共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中国人企图拉拢朝鲜人民军的指挥官，说明这种看法的例证之一是朴一禹事件。朴是朝鲜人民军驻中国志愿军司令部首席代表。金日成不只一次宣称朴一禹的言行俨然是毛泽东的私人代表，他试图诋毁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权威，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中国人煽动各种阴谋，利用朴一禹来反对金日成。彭德怀大言不惭地发表对金日成军事指挥能力低下的看法。中国指挥官明显地蔑视朝鲜人，表现出一种大国主义态度。有一次金日成到彭德怀的司令部时，曾遭到中国警卫的阻拦，并被他们扣押了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地方当局抱怨说，中国志愿军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等。

很多朝鲜人为朝鲜人民军的败退和重大损失而责备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援助早一个月到来，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朝鲜领导人当时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主张，很可能在 1950 年冬天中国志愿军取得进攻胜利的时候，就已经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并实现全国统一了。

尽管如此，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扭转战局和使战线保持在三八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志愿军在参战的第一年伤亡超过 30 万人。

中国领导人利用志愿军长期驻守在朝鲜这一情况，试图加强对北朝鲜的长期影响。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在朝鲜驻扎了 5 年多。直到 1958 年 10 月底，在朝鲜人的压力之下，志愿军才最终撤回国内。

中国领导人甚至现在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利用志愿军在朝鲜参战这个历史来迫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支持他们的冒险主义立场。

三、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的干涉

〔此节为一段简短的概述。〕

四、停战谈判

至1951年中，朝鲜的局势已清楚表明，以武力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朝领导人都被迫承认了这一点。在同中朝方面进行初步磋商之后，苏联政府于1951年7月23日提出解决朝鲜军事冲突的建议。苏联代表指出："第一步，应进行停火谈判，为此双方军队应撤离三八线。"这一建议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1951年6月27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拜访葛罗米柯（当时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就有关这些建议的大量问题向他提出要求。葛罗米柯向柯克阐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指出停战谈判必须是在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司令部为一方代表，而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为另一方代表的情况下，才可以举行。葛罗米柯同志特别提出，谈判必须限制在军事问题方面，并且首先是停火问题。

6月29日，当时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向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呼吁，建议开始停战谈判。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在电台发表联合声明，对李奇微的呼吁做出答复。答复表示他们同意与美军司令部的代表举行会议，"就停止军事行动和实现和平进行谈判"。

战争各方司令部的代表于1951年7月10日举行谈判，以后时续时断达两年以上，直到1953年7月底。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讨论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双方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详细制定实行停火和停战的实际措施，包括监督实现停火和停战条件的一个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责。

到1952年5月初，除了如何对待战俘的问题外，对所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后来，战俘问题也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停战协定的缔结。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期间，同苏联领导人就朝鲜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

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停战协定划定了军事分界线并规定双方的军队从这条线后撤两公里，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还规定停战协定生效后 72 小时之内，双方军队都撤出非军事区。

〔此处列举了协定的条款。〕

五、停战后的朝鲜问题

朝鲜停战为这个国家实现和平的重新统一建立了前提条件。为达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必须召开停战协定中设想的政治会议。

由于美国的破坏，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直到 1954 年 4 月 26 日才在日内瓦召开。美国代表竭尽全力阻止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在朝鲜半岛建立单一的、真正民主的政府为目标的各项建议。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对朝鲜有建设性的决议。

朝鲜问题直到现在仍然在联合国机构中被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联合国大会每一次例行会议“讨论”的一个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明确反对在联合国讨论所谓朝鲜问题，主张撤销“朝鲜统一和复兴委员会”，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政府的这一主张得到苏联政府的全力支持。

ЦХСД，ф.5，оп.58，д.266，л.122-131

节选自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的解密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最后阶段的俄国档案文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对外政策立即发生了变化，提出了所谓“新方针”的问题。[①]在这些变化中，最突出的就是改变了苏联以往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尽快结束战争的设想和措施。随后，苏联领导人与前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了会谈，说明了苏联的新方针，并希望中方予以接受。经周恩来与毛泽东初步商议后，中国接受了尽快结束战争的意见，并按照苏联的安排，从答复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交换伤病战俘的电报开始，提出了全面停战的问题。对于立即停战，朝鲜领导人盼望已久，但中国领导人多少有些不甘心。于是，利用各种机会发动军事攻势，又取得了一些使谈判结果有利于己的胜利。但是，中方最终还是放弃了两年来一直坚持的“全面遣返战俘”原则，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②]

过去有著作认为，1953年春，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③]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④]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

① 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印的《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二辑）刊登了一组关于斯大林去世问题的俄国学者的论文，可以参阅。笔者在这组译文的编者按中，综合论述了此期苏联政策变化的历史背景。

② 关于这一过程的详细讨论见拙文《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③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9页。毛泽东确曾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与苏联新领导人交换过意见以后的事情。

④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9–300页。

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1] 这些说法都因近年来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不过，同样是俄国的有关档案，也有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 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 年 3 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2] 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3] 按照这种说法，似乎立即结束朝鲜战争的“新方针”首先是由中国提出的，或者是按照中国的要求而提出的。

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笔者在这里挑选了 14 件俄国档案文献，都是关于 1953 年 3 月至 7 月朝鲜停战问题的。

3 月 14 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关于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备要报告，显然是苏共领导人决定改变方针后要求外交部提供的。报告简要地陈述了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历史过程和结果，并说明了苏联以往的立场，以备领导人参考。

3 月 19 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和 3 月 31 日莫洛托夫起草的苏联声明，充分表明的苏共领导人的“新方针”的意图和为实现这一意图而计划采取的一步一步的措施，后来的事情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安排发展的。

3 月 29 日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的电报反映了朝鲜政府对苏联新方针的积极赞成和热情支持的立场。

---

① 最近的研究说明，这种观点仍为一些学者所坚持，见 Conrad Crane, “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 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3, No2, June 2000, pp.84-85。

② 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 年 8 月 9 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 оп.58, д.266I, л.122-131，转引自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3, Fall 1993, p.17.

③ 参见“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6 年 1 月，香港）论文：K. Weathersby, “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 1950-53”; F. Orlandi, “The Alliance: Beijing, Moscow, 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 V.Zubok and C.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 Harvard Uni. Press 1996, p.155.

5月28日和6月3日莫洛托夫与美国驻苏大使波伦的谈话备忘录，说明苏联为促进和谈成功所表示的积极态度。

7月4日和5日的文件，以及7月29日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说明，到这个时候，停战谈判的具体进程实际上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毛泽东和彭德怀认定李承晚与其美国主子之间有分歧，决定继续进行军事打击以扩大战果，而苏联领导人则担心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到停战进程。

7月20、23、24日的几封电报，是关于停战协定签字的具体安排的，主要讨论的内容是金日成是否出席签字仪式。这是以往研究中很少注意的事情。

7月27日和30日的文件是贺电和答谢电，没有实质性内容。不过，从苏共中央分别给中、朝发出贺电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朝鲜停战确实使莫斯科松了一口气。

当然，仅仅依靠这几件档案是无法对朝鲜停战的最后阶段进行研究的，相对而言，中方的有关史料似乎要详实得多。不过，这些文件对于全面了解情况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发展带给人们的启示：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利用双边乃至多边档案文献的趋势，要求研究者在讲述一个历史事件时，尽可能地同时使用各当事国的文献资料。

这里挑选的档案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现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在笔者收集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的过程中，原俄国驻华使馆首席参赞（现任俄外交部远东司第一副司长）冈察洛夫（Сергей Гончаров）先生和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教授无私地提供了大量帮助，谨在此致以谢意。

文件末标有俄国档案的馆藏号，个别文件的馆藏号在收集时缺失，无法标出。左上角的编号为笔者收藏的档案原文复印件的标号。目前，这些文件都已经复制，并收藏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研究中心，有意核对原文者可以前往索取，或与笔者联系。

（本专题文件由周绍珩、吴安迪、陈云卿、吕允连翻译，沈志华、方琼校对，沈志华注释和编辑。）

文件 01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关于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备要报告

（1953 年 3 月 14 日）

（№1）秘密，第 22 号

一、美国侵略朝鲜开始前的朝鲜问题

1943 年 12 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签署了开罗宣言，其中指出，三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朝鲜应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这一宣言 1945 年 7 月 26 日被上述三国波茨坦公告所肯定。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加入波茨坦公告。

摧毁日本之后，根据盟军总司令[①]的一号命令，苏联统帅部在朝鲜北纬 38 度以北领土上接受了日军的投降，美国统帅部在其北纬 38 度以南领土上接受了日军的投降。这样在朝鲜形成了两个军事责任区：北朝鲜——占全国 57% 的领土面积，人口约 1100 万人；南朝鲜——占全国 43% 的领土面积，人口 1700 万。

1945 年 12 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通过了成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决定，而为了促使这一政府的成立，决定由苏美驻朝部队指挥部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被授权在有临时政府参加和吸收朝鲜各民主组织的情况下制定四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对朝鲜的 5 年托管条件。

由于驻朝美军指挥部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同朝鲜民主组织协商，朝鲜临时民主政府未能成立。同时莫斯科会议关于制定四国托管条件的决定也未能实施。

在破坏了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之后，美国政府企图将整个朝鲜隶属于自己，于是于 1947 年 9 月把朝鲜问题提交第二届联大会议讨论。根据美国的提案，联大上英美多数国家建议朝鲜在 1948 年 3 月 31 日之前举行“国民会议”选举，以便由“国民会议”成立“朝鲜国民政府”。为了实施这一建议，联大成立了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包括乌克兰在内共 9 个成员，该委员会被赋予在整个朝鲜领土上通行的权利。该建议的目的是在朝鲜成立隶属于美国的傀儡政府。

---

① 即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在上述联大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反对联大讨论朝鲜问题，因为该问题是战后调节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7条不属于联大组织讨论的范围。在联大终于通过讨论朝鲜问题的决定后，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美国和苏联部队于1948年初同时撤出朝鲜”和“给朝鲜人民提供自己成立朝鲜民族政府的可能性”的提案。苏联的这一提案遭到了拒绝。苏联关于邀请北朝鲜和南朝鲜代表参加朝鲜问题讨论的提案也遭到拒绝。因此，苏联代表团没有参加美国关于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表决。乌克兰拒绝参加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

1948年5月10日，南朝鲜在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的“观察下”举行了所谓的“国民会议”选举。无论是北朝鲜还是南朝鲜的民主人士都拒绝同委员会合作，没有参加选举。在汉城召开的“国民会议”于1948年12月宣布成立“大韩民国”。

1948年8月，拥有各阶层代表的朝鲜民主统一战线在北、南朝鲜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选举。在北朝鲜，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占99.98%，在南朝鲜占77.52%。1948年9月成立了最高人民会议，它宣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高人民会议呼吁美苏政府从朝鲜撤出它们的军队。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满足这一请求并下令在1949年1月1日前从朝鲜撤出苏联军队。1948年10月，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美军于1949年6月底撤出了朝鲜。

在1948年和1949年召开的第三届和第四届联大会议上，由于在讨论朝鲜问题时英美占多数，朝鲜委员会的行动得到“赞许”，并被授权为了“朝鲜的统一”而“加紧”活动，对朝鲜整个事态进程进行监督。

在上述两次联大会议上，苏联提议取消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因为它的活动违反联合国原则，妨碍南北朝鲜的统一事业。

1950年6月19日，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应朝鲜统一民主国家阵线中央全会请求，决定呼吁南朝鲜“国民会议”，建议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国民会议”合并为统一的全朝立法机关以使朝鲜统一。该立法机关应通过宪法，建立统一的朝鲜共和国政府。然后在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全朝鲜立法机关选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声明，它准备派代表团去汉城或接待南朝鲜“国民会议”代表团来平壤。

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和在其领导下准备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进攻的南朝鲜政府拒绝了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建议。

二、安理会对朝鲜问题的讨论（1950 年下半年）

1950 年 6 月 25 日，即南朝鲜军队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天，应美国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破坏和平并呼吁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把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北。因为拒绝了苏联关于驱逐国民党代表出联合国和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提议，苏联当时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1950 年 6 月 27 日早晨，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进入朝鲜，参与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当天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联合国成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击退武装进攻所必要的援助”。

为此，苏联政府于 1950 年 6 月 29 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安理会 6 月 27 日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因为该决议是在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苏联和中国缺席情况下通过的。

1950 年 6 月 27 日美国呼吁苏联政府，请它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从南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6 月 29 日苏联政府给予答复，指出朝鲜发生的事件伴随着南朝鲜军队对北朝鲜边境地区的侵犯，所以这些事件的责任应由南朝鲜政权和支持它的人来负。苏联政府在答复中还指出，它奉行不允许外国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

1950 年 7 月 4 日，美国政府借口安理会 6 月 27 日决议，通知苏联政府说要对朝鲜海岸实施海上封锁。苏联政府在对这一通知的答复中向美国政府声明，上述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对朝鲜采取任何措施，其中包括实施海上封锁的合法依据”。苏联政府还认为封锁朝鲜是新的侵略行为。

1950 年 7 月 7 日，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提议，安理会通过了给联合国成员国的建议书——建议它们出兵朝鲜以反对朝鲜人民，这些军队交由美国任命的“联合司令部”指挥。建议美国政府任命这些军队的总司令。授予联合司令部在进行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的行动时有使用联合国旗帜的权利。苏联政府在答复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这一决议的通知时声明，这一决议作为预谋的产物，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践踏，它的目的是“利用联合国旗帜掩盖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朝鲜人民的直接侵略”。

1950 年 7 月 13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请求斯大林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以便

在安理会范围内或其以外，“通过非正式接触，由苏联、美国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帮助或合作下找到停止冲突和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1950 年 7 月 15 日斯大林复信尼赫鲁，欢迎他的和平倡议，完全赞成他“通过安理会——必须有 5 国代表、其中有中国人民政府代表参加——调解朝鲜问题的观点”。

美国政府拒绝了尼赫鲁和平调解朝鲜冲突的建议。

1950 年 7 月底，苏联政府通过决定：从 8 月 1 日起苏联政府重新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因为这时轮到苏联担任安理会主席。

已指示苏联代表把“和平调解朝鲜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苏联代表于 1950 年 8 月 4 日提出了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同时提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苏联代表还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和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后来，8 月 8 日，苏联代表还把下述提案提交安理会讨论：希望安理会建议美国政府停止和以后不再派飞机和用其他方法轰炸城市和居民点，以及从空中扫射朝鲜和平居民。

苏联关于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提案和关于停止野蛮轰炸朝鲜城市和居民点的提案被安理会否定。

1950 年 9 月联大会议开始工作。会议议事日程中列入了“朝鲜独立问题”。第一委员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提议邀请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讨论。这一建议遭到美英集团的否定。委员会接受了国民党分子提出的只邀请李承晚政府代表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还提议解散非法机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还呼吁大会建议美国政府停止用飞机和其他手段轰炸城市和居民点以及从空中轰炸朝鲜和平居民。此外，苏联还把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恢复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在这一决议草案中建议交战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建议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从朝鲜撤走自己的军队，建议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全朝鲜选举，联合国监督委员会里应有朝鲜邻国的代表（未列举这些国家的名称）。

苏联的提案被联合国大会否定。

与此同时，大会于 1950 年 10 月 7 日通过决议，其中建议采取“相应步骤以保障整个朝鲜的稳定形势”。大会以此批准了“联合国军”对整个朝鲜领土的占领。在这一决议的掩护下，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挺进，直抵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

1950 年 10 月 7 日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还规定成立联合国朝鲜统一和复兴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荷兰、巴基斯坦、泰国、土耳其、芬兰和智利，想以此取

代在这以前存在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

美国部队前进到中国边境引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950 年 11 月 5 日，麦克阿瑟将军作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向安理会呈递报告，其中称，“联合国军遇到了新的敌人”，“已同中共部队交火……”。按照美国的要求，安理会议程上加上了“对侵略韩国的控诉问题”。苏联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讨论朝鲜问题，但未被通过。安理会决定只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中国政府拒绝参加这一报告的讨论。

1950 年 11 月 10 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把决议草案提交安理会讨论，其中指出，“中共部队已展开行动反对驻朝鲜的联合国军”，建议“所有国家和当局，尤其是对上述行动负责的国家和当局，应拒绝援助或鼓励北朝鲜当局，不给自己的公民、某些人士或军队提供援助北朝鲜军队的机会……”。1950 年 11 月 30 日，安理会否定了这一决议草案，因为苏联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三、在五届联大会议上的朝鲜问题

在苏联代表恢复参加安理会工作之后，美国已不能利用安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它把朝鲜问题提到了联合国大会。

1950 年 12 月 6 日，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代表团的坚持下，联大议程上列人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美国、英国、法国、古巴、挪威和厄瓜多尔的代表在第一委员会提出了 1950 年 11 月 10 日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决议草案。该草案陈述部分的一句话“中共部队已展开行动反对驻朝鲜的联合国军”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军队正实施军事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苏联代表团反对这一决议草案，并于 1950 年 12 月 9 日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呼吁注意美军和参与侵略战争的其他国家的军队继续武装干涉朝鲜给和平和人民安全所带来的严重威胁，为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苏联建议:“1、立即从朝鲜撤走 一切外国军队；2、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

第一委员会没有讨论苏联的提案。

1950 年 12 月 12 日，印度代表劳以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名义提出了两个决议草案。在第一个草案里建议成立以大会主席安特扎（伊朗）为首的三人小组，并责成该小组准备提案，以便为“能达成朝鲜停战协定确立基本原则”。第二个草案建议由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代表组成一个委员

会，并授权该委员会起草“和平解决所发生问题的建议”。1950 年 12 月 14 日大会通过了成立“三人小组”的提案。苏联代表团投票反对。除安特扎外，“三人小组”里还有劳和皮尔逊[①]。

“三人小组”请麦克阿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朝鲜停战的条件。1951 年 1 月 11 日“三人小组”向第一委员会提出了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是：1、“立即保证停火”；2、“利用停火之机，继续讨论下一步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步骤”；所有非朝鲜军队逐步撤离朝鲜，并按照联合国的原则采取措施，“让朝鲜人民可以在自己未来政府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志”；4、在完成这些措施之前，采取必要的保障朝鲜“行政管理的措施以维护那里的和平和安全”；5、在签订停火协定之后，联合国大会应立即成立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组成的机构，其目的是使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代表席位问题获得调解。这些原则于 1951 年 1 月 13 日得到了第一委员会的赞许。同时，该委员会根据挪威提议通过了决议，其中委托第一委员会主席把上述原则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知，它是否讨论这些原则中所包括的作为远东问题调解基础的提议。

1951 年 1 月 17 日周恩来作了答复，指出为了真正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其他涉及亚洲的重要问题，必须：

“（一）为尽快停止朝鲜战争，有关国家的谈判应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内部事务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之协定的基础上进行。

（二）谈判日程应包括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问题以及其他涉及远东的问题。

（三）参加谈判的应是 7 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应在这次 7 国会议上确定之。”

苏联代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提案。

1951 年 1 月 20 日，在第一委员会上美国代表提出了决议草案，其中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同时呼吁所有国家和当局给予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以可能的援助，拒绝“给朝鲜侵略者以任何援助”；还建议责成该委员会采取集体措施，“紧急讨论击退侵略的补充措施并向大会报告这些情况”。

1951 年 1 月 22 日，在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印度代表劳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皮尔逊，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后任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

政府对自己 1 月 17 日的通报做了如下说明：

"一、假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原则得以通过并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则承诺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

二、至于朝鲜战争结束和和平调解朝鲜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分两步走：首先，为了使谈判能够进行下去，可在第一次 7 国会议上先就暂时停火达成协议。

第二步，为了保证朝鲜战争彻底停止和东亚和平，所有停战条件讨论应考虑政治问题，应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必要措施；关于由朝鲜人民自己调解朝鲜内部问题的必要步骤和措施给朝鲜人民的提议；按照开罗和波茨坦宣言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自己的军队；涉及远东的其他问题。

三、应保证彻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2 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于 1951 年 1 月 24 日提出了新的决议草案，其中建议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和埃及的代表尽快会晤，以便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它对第一委员会 1951 年 1 月 13 日关于朝鲜问题 5 项调解原则决议答复的解释。

"12 国提案"于 1951 年 1 月 30 日被第一委员会否定。当天，委员会通过了美国 1951 年 1 月 20 日提出的关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1951 年 2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未经讨论批准了这个决议草案。

在大会 1951 年 2 月 1 日通过的决议中，除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措施外，还规定成立由美、英、法、澳、比利时，缅甸、巴西、委内瑞拉、埃及、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菲律宾和南斯拉夫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受命紧急讨论下一步措施问题。缅甸和南斯拉夫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在 1951 年 3 月 8 日的会议上，以前未冠名称的委员会决定自称"补充措施委员会"。

1951 年 5 月 3 日，"补充措施委员会"决定把经济制裁问题"作为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可能措施的第一条。"

1951 年 5 月 9 日，美国代表向"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武器、弹药、石油等禁运的决议草案。1951 年 5 月 14 日，委员会赞同美国提出的草案并把它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在第一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7 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的问题属于安理会的特别职能，按照宪章第二条第二款，大会无权对这一问题做出决定。因此，苏联代表说，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

第一委员会通过了“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1951年5月18日，该决议草案得到大会全会的赞同，苏联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

1951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在非法通过这一可耻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大会这一新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破坏，是对安理会职权的侵犯，是蓄意扩大侵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还指出，这一决议的通过充分证明，“联合国已完全变成了侵略战争的工具，正在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服务”。

四、朝鲜停战谈判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秘书处组织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发表讲话时，在指出联合国通过了非法决定、事后批准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之后，声明如下：

“苏联人民相信，即使在现在朝鲜军事冲突的时刻，也可以调解最尖锐的问题。对此需要各方做好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准备。苏联人民相信，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停火谈判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的谈判”。

1951年7月27日，美驻苏大使柯克拜见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请他对马立克发言中的上述引文做出解释。葛罗米柯同志回答说，谈判应在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司令部代表为一方和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统帅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为另一方之间进行。葛罗米柯同志说，谈判应只涉及军事问题，其中包括停火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苏联政府，葛罗米柯同志说，强调的只是签订停战协定，在苏联代表马立克同志的声明中没有规定任何和平调解的其他步骤。但是，葛罗米柯同志补充说，朝鲜交战双方的事情决定着必须采取哪些措施以调解政治和领土问题（1951年6月29日给联合国秘书处的信）。

1951年6月29日，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发表广播讲话，建议在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火谈判。1951年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将军，表示同意与其会晤并进行“和平停战谈判”，建议谈判在开城地区三八线上举行。1951年7月4日美国人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会议直到1951年7月10日才开始进行。

前10次会议讨论谈判议事日程。1951年7月26日，通过了以下谈判日程：

“一、通过谈判议程。

二、为建立非军事区确立双方军事分界线，以此作为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制定实现朝鲜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确定停战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编成、权力和职能。

四、关于战俘问题。

五、给双方有关政府的建议。”

从1951年8月10日开始，按照上述议程举行了谈判，除战俘遣返问题外，达成了停战协定的所有条件。

所达成的停战条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一）军事分界线沿停战协定生效之日双方部队对峙线，即沿“为了建立非军事区双方部队各后撤两公里”的正面前沿划分（停战协定草案第1条）。

（二）军事行动应在停战协定签字12小时后停止（草案第12条）。

（三）应成立停战军事委员会，由10名资深军官组成，其中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另外5名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第19条）。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谈判调解可能出现的对协定的违反问题（第24、25条）。

（四）应成立停战协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和瑞士的代表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任命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第36、37条）。

该委员会可成立由这些国家代表构成的监察小组（第40条）。

中立国家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履行监督职能（第41条）。

中立国家监察小组分别驻在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光州、群山。

（五）双方司令员应“建议双方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3个月期间里召开双方最高政治会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和平解决朝鲜问题（60条）。

1951年12月18日，美军司令部向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

部递交了美军俘获的 132474 名俘虏名单。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向美方递交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 11559 名战俘名单，其中包括 3198 名美军俘虏。美方指出，截至 1951 年 12 月 18 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美军士兵至少有 11000 人。

正如艾奇逊在 1952 年 10 月 24 日联大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声明的，美军司令部手里有 17 万名俘虏。这些俘虏中，似乎愿意被遣返的只有 8.3 万人。其余的或是当地居民（37000），或似乎反对遣返。

在和平谈判中美国代表声明，只能遣返那些同意遣返的战俘。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坚决反对关于滞留一部分战俘的说法，坚决要求遣返所有战俘。

1952 年 6 月 9 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信美军司令克拉克将军，要求“双方所俘获的所有外国武装人员——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都应遣返；双方所俘获的朝鲜军人——南朝鲜军人和北朝鲜军人，其出生地在敌对一方的应该遣返，其出生地在擒获其一方的，应允许直接返回故里，无需遣返”。

美国人反对这一建议。同时，他们加强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平居民点和和平企业的空袭，想以此恫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居民，迫使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同意美军扣留大部分被美军俘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以便将来利用他们反对北朝鲜和中国。

1952 年 9 月 28 日在板门店会议上美国代表提出了以下 3 点选择性提议：

（一）每一方手中的战俘，在非军事区商定地点验明身份之后都将被认为是“已遣返人员”。任何一名战俘，只要在验明身份时表示愿回到抓获他的一方的领土上去，都应该允许这样做，应该给他保证必要的交通工具。

所有战俘都应恢复公民生活，再不允许他们参加朝鲜的战斗行动。

验明身份，或由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或由有关国家红十字会组织的代表，或由联合军事小组的代表，或由这些组织组成某种联合组织实施。

（二）所有表示愿意遣返的战俘应尽快遣返。那些反对遣返的，应小量分批把他们送到非军事区，解除各方的军事监督。

然后由双方同意选择的国家的代表或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的代表同他们进行谈话，之后允许这些战俘去他们选择的一方的领土。

如果同意，该程序可由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或有关国家红十字会组织的代

表，或联合军事小组的代表，或由这些组织组成的联合组织实施。

（三）愿意遣返的战俘应尽快遣返。那些愿意留在抓获他们一方的战俘应分批把他们送到非军事区，并解除任何军事管制。然后允许他们去他们所选择的一方的领土，无需任何谈话、调查和审核。

这件事可在红十字会或联合军事小组监督下实施。

在 1952 年 10 月 8 日的会议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南日将军声明，美国 1952 年 9 月 28 日的提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它是美国人以前强行扣留战俘要求的翻版，它完全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和双方所有战俘遣返的原则。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哈里逊将军以最后通牒方式声明中止停战谈判，直到通过美国提案时为止，说完就离开了会场。

当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声明，说停战谈判不应认为已经终止，它只是拖延一段时间，并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

五、在第六、第七届联大上的朝鲜问题

在第六届联大会议上，朝鲜问题被列入议事日程，但实际并未讨论。美英多数借口联大讨论朝鲜问题会妨碍平壤谈判和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故通过了第六次会议不讨论朝鲜问题的决定，呼吁在安理会收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消息之后立即召开联大特别会议。

苏联代表团坚持在六届联大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以便促使朝鲜停战。

在 1952 年 10 月 14 日开幕的第七届联大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苏联代表团建议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会议参与朝鲜问题讨论。这一建议未被通过。

1952 年 10 月 24 日艾奇逊在会议上发言，他以美国的观点回顾了朝鲜问题，坚持战俘“自愿遣返”的原则。在这次会议上，以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 18 个国家的名义提出了联大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指出，“赞同联合国‘代表’，即美国代表为签署公正的体面的朝鲜停战协定所作的努力”。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美国关于“自愿遣返”战俘的提案。

在 1952 年 10 月 29 日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同志发言，陈述了朝鲜问题的历史，

揭露了美国在朝鲜的侵略。他指出，美国坚持所谓的战俘自愿遣返，粗暴地违反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尤其是公约的第118和第119条。维辛斯基把一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其中建议成立“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吸收当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没有参与朝鲜战争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应“采取调解朝鲜问题的措施，指导思想是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实现朝鲜统一”。

1952年11月3日，墨西哥代表团把一项战俘问题决议草案提交第一委员会讨论。该草案建议根据以下原则遣返战俘：

（一）对于“自愿表示要回自己出生地国家”的战俘，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应立即遣返。

（二）其余的战俘遣往愿在自己领土上接收这些战俘的国家。如果战俘愿意，也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就给他们提供这种遣返的机会。

在1952年11月3日委员会会议上，秘鲁代表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提议“成立五成员委员会，其中每一方都有1名代表。联合国大会任命2名代表，并呼吁一个未加入联合国的中立国家（指瑞士）给予合作，参加并主持该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立即投入遣返战俘的工作，同时要考虑战俘自己的意愿。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中立区受委员会保护”。委员会应尽快向联合国提出“彻底解决它保护之下的战俘命运的妥善措施，注意在愿意接收这些战俘的国家安置他们或在主管国家同意后在托管领土安置他们”。

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团对它1952年10月29日提出的决议草案提出了补充。补充里规定，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应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

在第一委员会辩论朝鲜问题时，美国和美英集团其他国家的报纸上围绕印度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议论纷纷。这似乎表明，英美之间出现了分歧，因为英国赞成印度的提案，而美国反对。1952年11月17日，印度提出了只涉及部分朝鲜问题即战俘问题的决议草案。

印度的提案建议成立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代表组成的朝鲜战俘遣返委员会，将所有战俘交这一委员会管辖。在按照民族和居住地对他们进行分类后给他们提供回国的权利。在90天期限里还未归国的战俘问题，交政治会议讨

论——该会议按照和平协议草案第 60 条[①] 召开。印度的决议草案还规定，遣返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要根据相互协商的原则进行任命调停人的谈判。如果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后 3 个星期时间里还未达成任命调停人的协议，这个问题则提交联合国大会”。在遣返委员会里，一切问题都根据简单多数决定。“如果形不成多数，调停人则有决定权……”

这样，印度建议交换的仅是那些“自愿”表示想回故里的战俘，实际上这是在重复美国的立场。遣返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归结为调停，就像作为朝鲜交战一方的联合国本身那种调停一样。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印度草案中只字未提。

美国代表急忙声明他们支持印度的方案。英国代表艾登在 1952 年 11 月 20 日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欢迎印度的提案，把它看成是走出朝鲜僵局的“建设性一步”。

1952 年 11 月 23 日，苏联代表团提出给讨论过的苏联代表团决议草案（作为第 1 条）补充以下内容：“建议朝鲜交战双方立即全面停火，即根据交战双方已经达成的停战协定草案停止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全部遣返战俘问题交苏联决议草案中规定的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解决，在那里，问题将由 2/3 以上的委员会成员决定”。

维辛斯基同志在 1952 年 11 月 24 日发言时指出，印度的决议草案同 1949 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相矛盾，没有提及必须立即停止朝鲜的流血冲突。维辛斯基同志呼吁通过苏联的决议草案，其中呼吁在朝鲜立即停火。

1952 年 11 月 26 日，根据伊朗代表的提议，第一委员会决定首先讨论印度的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对印度的草案提出了修改，这些修改包含了苏联关于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原则。

1952 年 11 月 28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在第七届联大会议上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完全符合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利益，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1952 年 11 月 29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也发表声明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苏联的提案“最公正，它旨在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因此完全支持这一提案……”

---

① 草案第 60 条规定：双方司令部应“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和生效后 3 个月内，召开双方更高级别的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外国部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

1952年12月1日，第一委员会通过了丹麦代表团提出的对印度决议草案的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如果在30天时间里战俘问题在政治会议上得不到解决（印度草案规定的期限为60天[①]），该问题转交联合国解决。当天，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按照丹麦修正案修改过的印度决议草案。

1952年12月2日第一委员会否决了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

委员会至此结束了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决定：在大会主席向委员会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印度提案的决议的答复之后，委员会再讨论这一问题。

1952年12月3日，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印度决议草案以54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被通过。

苏联的决议草案以41票反对，5票赞成，12票弃权被否决。

1952年12月5日，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皮尔逊（加拿大人）把大会通过的决议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12月14日，周恩来致电皮尔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这一决议不能保证“协定的公正和合理的基本原则”，“接受这一决议——这将意味着在美国粗暴的武力面前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议联大废除这一非法提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板门店谈判，在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的基础上，作为第一步先完全停火，然后把所有战俘的遣返问题交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调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也致电皮尔逊，要求废除联大1952年12月3日通过的决议，“应根据苏联的提案讨论和通过朝鲜立即停火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需的措施……”

1952年12月20日，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皮尔逊向大会提交报告，其中包括简短序言、皮尔逊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长的电报和附件——大会1952年12月3日通过的朝鲜问题决议以及上述中国和北朝鲜外长的答复。

这一报告，以及联合国朝鲜统一和复兴委员会对六届和七届联大会议的报告和所谓的联合国朝鲜复兴总代表的报告，在1953年2月24日开幕的七届联大第二次会议上得到了讨论。

苏联代表团提议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但

① 原文如此，前引文为90天。

遭到美英集团的拒绝。

美国代表洛奇于2月25日在第一委员会上讲话诬蔑苏联，“苏联为扩大朝鲜战争走得很远了……”，“苏联政府是可以停止战争的，但那是它想停止的时候”。

1953年3月2日，维辛斯基在第一委员会发言回击洛奇，指出，苏联任何时候也不隐瞒，它根据1945年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给自己的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过、现在也在提供武器。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于苏联同它没有友好和互助条约，苏联没有义务向它出售武器，也没有出售，如果不考虑1948年苏联从朝鲜撤军时给其留下了苏军多余的武器。维辛斯基指出，苏联主张立即全面停止朝鲜战争，坚持自己在七届联大第一次会议上所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他驳斥了美国代表洛奇的谎言，似乎苏联对朝鲜战争的延续感兴趣。

1953年3月5日，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菲律宾、丹麦和泰国的代表团提出决议草案，其中大会满意地指出联合国朝鲜复兴总代表的活动，“请求承诺对联合国朝鲜统一和复兴委员会承担费用的政府尽快履行这一义务”。

草案里没谈停止朝鲜战争的愿望，也没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大主席的信和1952年12月3日的联大决议复件的答复。

1953年3月9日，第一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苏联关于取缔联合国朝鲜统一和复兴委员会的提案被否决。1953年3月11日，第一委员会赞同的决议草案由联大全体会议通过。苏联代表团投了反对票。七届联大二次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表明，美国不打算立即让联合国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议案。

在讨论波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和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合作的决议草案时，七届联大会议将回到朝鲜问题上来。第一部分涉及朝鲜问题的该决议草案规定迅速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按照国际规则使所有战俘回到祖国，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按照由朝鲜人民实现朝鲜统一的精神对朝鲜问题进行和平调解。

B. 巴甫洛夫

B. 特鲁哈诺夫斯基

A. 罗申

文件 02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给各方发出指示的决议

（1953 年 3 月 19 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一、批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同志和金日成同志的信函（附件一）。

此信通过周恩来同志①和库兹涅佐夫同志②转交毛泽东同志，通过马立克③同志寄给金日成同志，立即发往平壤。

二、批准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附件二）。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室主任波马兹涅夫

附件一：

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

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

无需详细谈论侵略者在朝鲜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在全世界诚实人们的心目中，英美侵略集团在朝鲜的作为，越来越暴露出这个集团特别是美国侵略势力，是一种推行准备新的战争并企图扩大战争的政策的国际因素，其目的只是强迫人民服从他们的帝国主义侵略意志，即妄图建立起对全球的统治，并迫使人民屈服于这些帝国主义者。

---

① 周恩来已于 3 月 8 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追悼会和葬礼，同时准备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一五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

② 库兹涅佐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1901–？），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潘友新）。

③ 马立克，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1906–1980），1946–1953 年任苏联外交副部长，期间 1948–1952 年任苏联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

苏联政府认为，对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情况应该如以往那样予以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

鉴于以上所述，并考虑到最近时期有关朝鲜战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急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即：

一、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①]将军 2 月 22 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②]给予肯定的回答。

二、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三、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四、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五、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我们认为对以上所述需要作下面几点说明：

第一、对克拉克将军的答复。我们认为，在金日成和彭德怀致克拉克将军的复函中，应表明完全同意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指出这里考虑的是按照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

在给克拉克的答复中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

建议由双方联络官确定上述谈判的日期。

---

① 马克·克拉克，美国陆军上将，1952 年接替李奇微出任驻韩国联合国军总司令。

② 克拉克在 1953 年 2 月 22 日致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中声称："依据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联合国军始终准备遣返那些尚可移动的重伤重病战俘。我想知道，贵方是否准备遣返您们战俘营中那些属联合国军编制的重伤重病战俘。联合国军代表团的联络官准备就依据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检查重伤重病者状况问题，并为交换这些战俘采取必要的措施，与贵方联络官举行会谈。"

在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09条规定："对任何一个伤病战俘的遣返，都不能违背他在战争期间的意愿"进行的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过程中，应力求获得美军司令部的如下保证，即对上述战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强制手段阻拦他们返回祖国。

还应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的代表们组成委员会，促使伤病战俘返回祖国。

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为此应运用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特别是这一条的第二段，其中规定缔结"有关遣返或在中立国扣留已长期被俘的健康战俘的协议"。

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对这些战俘应像金日成和彭德怀1952年10月16日给克拉克将军的信中建议的那样，按民族和居住地分类。

战俘分类后，立即获得返回自己祖国的权利，这样使有关各方便于协助。

第二、关于北京声明。此声明应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讨论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问题，两国政府同样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命令自己的代表，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开始与克拉克将军谈判，考虑按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考虑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声明应指出，在开城和板门店的双边谈判过程中，已经就战俘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例如，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了协议：双方武装力量司令员发出命令，命令其属下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所有部队和人员，停止在朝鲜的各种军事行动，命令将于停战协议签字12小时后生效，并保证该命令得到执行。

还对停战的下述重要条件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建立军事分界线：该分界线应沿停战生效时作战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即前线）划分。"为组成非军事区，双方部队从分界线向后撤退两公里"（停战协议草案第1条）。

（二）关于成立由10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停战军事委员会，其中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5名由朝鲜人民军指挥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任命（第19条）。

该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议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和通过谈

判解决破坏停战协议的问题（第 24 条和 25 条）。

（三）关于建立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经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与瑞士代表，和经朝鲜人民军司令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任命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第 36 和 37 条）。

该委员会可建立由上述四国代表组成的观察小组。

中立国观察小组将分驻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和新安州（以上属北朝鲜）；仁川、大邱、釜山、光州和群山（以上属南朝鲜）。

此外还达成了如下协议：双方司令部应“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和生效后 3 个月内，召开双方更高级别的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外国部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第 60 条）。

还在协议草稿有关战俘（除遣返战俘问题外）的许多条款上取得了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自己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政策，力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全力以赴争取立即停止战争，主张全面解决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消除这个问题中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目前是缔结停火和停战协议的唯一障碍。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立刻遣返全部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将其余的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公正地解决他们的遣送问题。

在北京的声明中还应谈到以下内容：

我们迈向结束朝鲜战争的新的一步，也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积极解决，首先应有助于恢复中国和朝鲜在联合国中的权利。

第三，关于平壤声明。我们以为，在金日成同志的这一声明中应该指出，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声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商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对北京声明中关于政治形势的评价，还是对其中的具体结论和建议都完全赞同。这里不仅要强调完全支持，还要着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的合理性。

第四，关于莫斯科声明。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是恰当的，它应紧随北京和平壤的表态之后。我们认为莫斯科声明含义在于，在全世界面前强调苏、中、朝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第五，关于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苏联代表团。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应按上述对待朝鲜战争的政策计划行事。因此，只要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波兰的“防止

新世界大战威胁”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就必须对此草案涉及朝鲜部分提出相应的意见，并在必要情况下表明苏联代表团和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态度。

第六、补充意见。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满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

附件二：

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

一、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同志）在即将进行的讨论波兰代表团有关朝鲜问题的提议时，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的建议和声明。

苏联代表应陈明苏联对待交换战俘问题的立场，这种立场完全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然后应指出以下一点：苏联曾不止一次建议而且仍然主张在朝交战双方立即和全面停止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

按照苏联的倡议，1951年7月开始了交战双方关于在朝停火和停战的开城谈判。这些谈判使双方就遣返战俘以外的所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苏联仍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公正的，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行为的准则，也符合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

关于交换战俘的问题是在朝作战双方谈判中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以便消除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道路上最后一个障碍。

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光明磊落的倡议。苏联热情支持恢复朝鲜谈判的建议，以求达成有关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以及有关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解决停止朝鲜战争和签订和约的协议。

责成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6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下文字：“6、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

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60-71

文件 03

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关于停战问题朝方立场致莫洛托夫电

（1953年3月29日）

发自平壤

优先拍发

特档

答复您的第359号来电。

在3月29日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

金日成进一步强调，在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实现和平的问题上，从我们一方来说时机是主动的。金说，主动进行军事行动，或者结束战争，两者都是必要的。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对整个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有关这一点，金指出，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并且，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十分明智。在现在的条件下，金说，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

金日成将采取措施为预期的谈判做准备：确定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战俘里的伤病员数字，准备在板门店谈判的材料，准备一份来自平壤的声明，等等。

按照您的指示（您的第242号电报），我们与金日成商定，谈判代表（如果他们重新开始的话）仍旧是南日。与此相关，任命南日为外务相的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命令将推迟公布。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外务相的职务暂时由李东根担任。金日成将向中国朋友通知这件事。

库兹涅佐夫

费德林[①]

---

① 费德林，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1912–1996），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长期在苏联外交部担任中文高级翻译。

1953 年 3 月 29 日

报告：第 359 号

1953 年 3 月 29 日

库兹涅佐夫、拉祖瓦耶夫[①]和费德林报告说，3 月 29 日他们受到金日成的接见，南日将军也参加了，金日成收到了从莫斯科送达的文件，并且他们约定在金日成详细熟悉文件之后，再一次接触。

在 1953 年 3 月 24 日的第 242 号电报中，莫洛托夫指示向金日成转达，莫斯科建议任命南日为外务相的决定暂缓执行，直到马立克到达，而目前仅限于任命他为代理外务相，以后再任命为外务相。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97-99

文件 04

莫洛托夫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呈文

（1953 年 3 月 31 日）

送：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

马林科夫同志：

呈上我对朝鲜问题的声明文本。

莫洛托夫（签名）

1953 年 3 月 31 日

---

① 拉祖瓦耶夫，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接替什特科夫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附件：

莫洛托夫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的文稿

3 月 28 日发表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给驻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的回信。

信中对双方交换伤病战俘表示同意，并指出实际上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只是板门店谈判的中止，妨碍了这种交换的及早进行。信中表示同意按照有关战时的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交换伤病战俘。与此同时着重强调，这样的交换伤病战俘理应导致毫无障碍地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导致朝鲜停战协议的达成。为此，建议立即恢复板门店谈判。

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表态，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在平壤表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声明赞同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并一如既往地表明愿意达成有关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的协议，从而达成朝鲜停战协议。

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达成停战协议和停止朝鲜战争一事上，再次表现出主动。

我受权声明，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的这一高尚举动完全一致，而且毫不怀疑这一举动将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情支持。苏联政府还确信，这一建议将得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正确理解。

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支持旨在公正地休战和停止朝鲜战争的一切措施。

苏联政府领导人斯大林早在 1951 年 6 月答复尼赫鲁先生时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众所周知，1951 年 6 月安全理事会苏联代表的无线电广播讲话是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的基础。

先在开城后在板门店进行的这些停战谈判，除遣返战俘问题外，在所有停战条件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在去年 10 月，克拉克将军中断了停战谈判，这就阻碍了停战协议的签订。

在上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您的信中，不仅表示同意 2 月 22 日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而且提出恢复停战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

中朝一方接受克拉克将军的建议：按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对待战俘的109条交换伤病战俘。

该条规定

“除本条第3段规定的情况外，冲突双方必须按照下一条第1段，对重伤重病战俘无论其军衔高低和人数多少，一俟其身体恢复至可以转运的状况就将他们送回祖国。

在战争进行期间，冲突双方在有关中立国促进下，竭力组织下一条第2段指明的伤病战俘接受在中立国的住院治疗。此外，双方可以缔结有关遣返已长期被俘的健康战俘或将他们扣留在中立国的协议。

按照本条第1段，对任何一位指定被遣送的伤病战俘的遣返，都不能违背他战争期间的意愿。”

日内瓦公约的这一条属于和约签订前战争尚未停止时期，由于有关采用这一条的协议现已达成，而且可能于近日内由双方签字，故毫不拖延地开始交换伤病战俘已没有任何障碍。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外交部长周恩来在3月30日中朝两国政府共同商定的声明中，建议不仅要实现伤病战俘的交换，还要解决整个遣返战俘的问题，这将导致停战协议的缔结和朝鲜战争的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从自己方面通情达理地解决伤病战俘问题，然后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以求双方坦诚相见，互相妥协，实现朝鲜停火。

不言而喻，整个关于遣返战俘的问题也应按照日内瓦公约的条文解决，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苏联政府还是中国和朝鲜政府，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坚持。然而，尽人皆知，板门店的冗长谈判和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个问题多次讨论，都不曾得出积极的结果。

由于这个问题仍是缔结停战协议道路上的在朝作战双方之间的唯一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出于争取和平和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望，朝着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迈出了新的一步。他们建议双方恢复停战谈判，保证停止军事行动后立即遣返那些仍被他们扣押并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公正地解决他们的遣送问题。这样的建议使得公正解决遣返战俘问题和消除实现朝鲜停战的余留障碍有了可能。

毫无疑问，全世界人民，一切满怀结束朝鲜战争和巩固远东与世界和平及人民安全的真诚愿望的人们，都将以热情赞许之心欢迎这一建议并给予充分支持。

苏联政府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建议，并准备全力促其实现。

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失去了自己在联合国中的合法代表权这一事实，第一，破坏了这个组织的权威性，第二，失去了以应有方式加强国际安全和全面和平的可能性。

苏联政府认为自己有义务再次提醒人们注意：恢复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在联合国中的权利问题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恢复中国和朝鲜在联合国中的权利，将有助于全世界和平的巩固。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06-112

文件 05

莫洛托夫关于接见美国大使波伦的备忘录

（1953 年 5 月 28 日）

摘自莫洛托夫日记

1953 年 5 月 28 日 16 时接见了美国大使波伦。

波伦说，他今天拜访的目的在于受美国政府委托，提请注意在平壤进行谈判的联合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几点最新建议。为了清楚地说明他的话的涵义，他想递交一份非正式的文件，说明 5 月 25 日联合国代表团提出的六项基本建议的实质。

（波伦递交文件，文件译本附在谈话记录后边。应波伦请求，译员口头翻译了这份文件。）

波伦指出，按照联合国的几点新建议，朝中方面将用 90 天时间在战俘中进行解释工作。关于在此之后仍继续反对遣返的战俘问题，将移交政治委员会[①]研究。政治委员会将用 30 天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政治委员会无法顺利解决，那么，将依照朝中方面的选择，战俘将被释放，或者将战俘今后的命运问题移交联合国大会研究。

① 波伦在这里和后面所谈到“政治委员会”，其实是指“政治会议”，参见附件第 6 点。

莫洛托夫问，政治委员会组成的情况如何。

波伦答，关于这个问题他尚未得到通知，他认为，政治委员会将按印度提出的决议案中的规定组成，或者，这个委员会将按照谈判双方已达成一致的停战协定的条款的规定组成。①

波伦说，他对此事进一步研究以后，可以比较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波伦声称，联合国代表团在板门店提出的几点新提案，是非常认真的和重要的，这些提案试图消除战俘问题上的分歧。将这几点提案与朝中方面 5 月 7 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

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

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 3 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 2 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 4 个月。波伦说，我们认为 3 个月的期限用于尝试说服战俘遣返是完全足够的。

此外，波伦接着说，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就这一问题所作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与此同时，波伦说必须提出，由五个中立国组成委员会同样也是对方提出的，对此，联合国代表现在已表示同意。

波伦接着说，正如莫洛托夫所知道的，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一个普通的和明确的原则：

他们反对直接地或间接地使用压力迫使战俘遣返。波伦说，我们丝毫也不愿意在违背战俘意志的情况下截留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下述提案，即规定甚至可以采用间接的压力，以迫使战俘改变自己的决定。我们要求的仅仅是让战俘能够就其自己的命运自由地做出决定。在我方的最新提案中，我们为达成协议做出了最大的让步。我们无法再做出让步，无法违反自愿遣返这条基本原则。

波伦说，他认为，主要问题之一就在于朝鲜和中国代表在允许进行解释工作的期限结束以后，以及问题提交政治委员会研究以后，仍反对在遣返的战俘问题上预

① 在朝鲜停战协议第 60 号方案的条款中，只是建议“由有关双方国家的政府”召集“双方高层政治会议”，但这项条款引用了 1952 年 12 月 3 日通过的印度决议案。

先规定出最终解决的办法。如果不预先规定最终解决办法，那么战俘将面临被永远囚禁或者遣返的选择。波伦说，我们认为，没有这个最终解决办法，就等于向战俘施加压力。据此，联合国也提出，在政治委员会不能做出决定的情况下，战俘将予以释放或将战俘的命运问题移交联合国大会采取最终的解决办法。

当联合国代表在板门店提出自己的最后提案时，曾答应研究这些提案的对立方立即提出的反对规定将问题移交联合国解决或释放战俘的条款。波伦说，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认为，对不愿遣返的战俘问题，必须规定某种最终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在战俘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就在于此。

波伦声称，拒绝联合国这几项最新提案，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取得停战的希望破灭。停战谈判的失败，意味着将回到美国政府真诚希望避免的状态。

波伦说，鉴于莫洛托夫在4月2日发表的声明中，谈到苏联政府在朝鲜谈判中的促进作用，他提请莫洛托夫注意联合国的新提案。波伦指出，我们认为，这几项建议是非常宽容的，它们为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了全部基础。

莫洛托夫说，总的来说，他是理解这些建议的，但当然还必须更仔细地了解和研究它们。关于大使的通知，将报告苏联政府。

波伦指出，他递交的文件当然是非正式的，它说明的仅仅是在板门店提出的几点建议的基本原则。

莫洛托夫将话题拉回到政治委员会的组成上。

波伦答，据他所知，关于建立委员会，联合国已做出决定，他认为，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已经确定了。

波伦接着说，我们不打算公布任何有关今天会见的消息，因为这样做未必有利。如果会见的事实仍然被外界得悉（例如，在有人看见波伦和他的汽车驶到外交部的情况下），那我们打算宣称，会见时谈到了他（波伦）上次会见莫洛托夫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莫洛托夫问，在板门店是否已经讨论了波伦所说的建议。

波伦答，板门店谈判将在6月1日恢复。

波伦说，如果他与莫洛托夫的会见为外界所得悉，他想知道，如何应付他在上次会谈时所提出的那些问题。

莫洛托夫答，他将尽快研究这些问题。

波伦宣称，他个人想说，他希望板门店谈判将顺利地取得进展，因为谈判的顺利完成将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影响。波伦回忆了他在递交国书时同伏罗希洛夫的谈

话，关于这次谈话伏罗希洛夫或Г.М. 普希金[1]大概已通报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当时谈到了改善国际局势和苏美关系的可能性。他（波伦）回答他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朝鲜问题的分析，因为这个问题对美国人有重大意义。

莫洛托夫说，他在4月2日发表的声明，表达了苏联政府对朝鲜问题的观点。苏联政府希望巩固远东的和平，并希望和平将得以确立。

谈话持续了35分钟，到此结束。

（奥·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录，1953年5月28日）

附件：

美国大使波伦递交莫洛托夫的说明

一、同意建立由五国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条件是只由印度提供全部武装力量和作战人员。

二、同意在与中国人同样的条件下，未被遣返的朝鲜人将移交给委员会。

三、同意委员会在所有问题上的决议，将以多数票通过。

四、在关于委员会的条款中，保留保证不对不愿遣返的战俘采取强制手段和暴力的主要部分。

五、允许朝鲜人和中国人接触战俘的时间定为90天。

六、同意把未被遣返的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并预先警告：规定如果有关战俘命运的问题在120天内未获解决（90天用于朝中代表接触战俘和30天用于政治会议的讨论），战俘将被释放，或者是作为一种选择：在政治委员会没能做出最后决定的情况下，关于战俘的命运将移交联合国大会解决。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朝中方面选择的方案。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6-13，124-130

① 普希金，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文件 06

莫洛托夫关于接见美国大使波伦的备忘录

（1953 年 6 月 3 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日记

1953 年 6 月 3 日 13 时接见了美国大使波伦。

莫洛托夫说，他想将下述情况通知波伦。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知道了您在 5 月 28 日就板门店谈判向我所作的通报。

正如您所知道的，大使先生，这件事的解决不取决于我们。然而，可以满意地断定，顺利地完成板门店谈判的途径已初步确定。

波伦感谢莫洛托夫的通报，他说，他将向他的政府通报这一消息。

波伦希望板门店谈判将顺利结束，因为这次谈判所提出的这种解决办法，会使大家都感到满意。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波伦问，他在上次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提出的关于 6 位苏联女公民——美国人的妻子的问题，何时可望得到答复。

莫洛托夫答，他希望在最近几天给他相应的答复。

波伦说，在进行上述谈话时，他曾提到 6 位苏联女公民，他们的丈夫仍在苏联。现已弄清，还有两位苏联女公民——赫尔什菲利德夫人和丹克维奇夫人——她们的丈夫现居住在苏联境外。苏联外交部是否知道这两位苏联女公民。

莫洛托夫说，他不知道这两个人。

谈话持续 3 分钟，到此结束。

（奥·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录）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2-133

文件 07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同意中方停战措施的决定

（1953 年 7 月 4 日）

关于金日成和彭德怀给克拉克 1953 年 6 月 29 日来信的复函方案。

鉴于克拉克 1953 年 6 月 29 日的来信，委托马林科夫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答复中国同志，苏联同意他们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

中央书记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5

文件 08

莫洛托夫关于答复克拉克函等致库兹涅佐夫电

（1953 年 7 月 5 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拜会伍修权并告知他下述情况：

一、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拟订的措施是正确的。苏联政府同样同意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名义复函克拉克的方案。

二、苏联政府认为，停战谈判的全部过程证明，中朝方面在这次谈判中的战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中朝方面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了自己要和平的愿望和在保障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为进行谈判和寻求达成协议的基础，已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孤立了，现在国际社会舆论认为，美国应对拖延停战谈判和延长朝鲜战争负责。

三、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作的挑拨行径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美国垄断资本家中最富侵略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

由于中朝方面的成功战术，消除了缔结停战协定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从而不仅

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且也使它的国内政策陷于困境，因为这使美国无法为国际局势的尖锐化和朝鲜战争等等找到借口。在现有的局势下，美国统治集团在维持战争的歇斯底里和高额军事订货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政治难题。所以，美国统治集团利用李承晚和他周围人的叫嚣，以便在美国（不仅在美国）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

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舆论压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美国统治集团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

四、苏联政府认为，再谈一下金日成去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的问题是必要的。不可忽视李承晚集团的挑衅行为，该集团可能会对金日成采取某些危险的越轨行动。因此，应当劝告金日成不要前往板门店，而指派另一位负责的朝鲜同志签署协议。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同意这样做。

请电告执行情况。

莫洛托夫

1953 年 7 月 5 日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48-150

文件 09

苏共中央主席团第十七次会议关于答复朝鲜的记录摘录

（1953 年 7 月 20 日）

关于苏兹达列夫[①]同志的电报（1953 年 7 月 19 日，第 758-765 号）

委托莫洛托夫同志答复朝鲜朋友，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将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53

① 苏兹达列夫，新任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文件 10

莫洛托夫关于签署停战协定问题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呈文

（1953 年 7 月 2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致马林科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上就北京来电而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电的第 1356 号电文稿。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电如经批准，将同时向平壤发去相同的电报。

莫洛托夫

1953 年 7 月 23 日

附件：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的电报稿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将下列事项通知他：

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板门店交换停战协议文本时，金日成和彭德怀不出席的意见。要向美国人指出，每一方要由自己决定在交换协议文本时，由谁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务必要坚持这一点。

但是，必须估计到，鉴于中朝方面坚持这一立场，美国人可能借口谁在板门店作为代表的问题不合常规，而拖延签署协议。在此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可以同意由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代表中朝方面。当然，在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前往板门店时，一定要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关于这项答复，苏联政府将同时照会金日成同志。

请将同周恩来会谈的结果电告。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67-168

文件 11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批准停战协议签字问题给朝鲜电报的决定
（1953 年 7 月 24 日）

关于金日成同志参加停战协议签字问题给北朝鲜的电报草案。

批准苏联外交部（莫洛托夫同志）送来的就该问题所拟的电报稿。

中央书记

附件：

莫洛托夫给苏兹达列夫的电报稿

北朝鲜

苏联大使：

请转告金日成和朝鲜朋友们下述事项：

苏共中央赞同板门店停战协议朝中方面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副首相和彭德怀签字。作为首相，金日成本人不必亲自签署停战协定。由谁代表朝中方面签署停战协议，完全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丝毫不应受美国人的压力等所左右。

在当前条件下，由于李承晚分子可能采取某种针对金日成同志的挑衅行为，金日成赴板门店带有一定的危险性。问题的重要性要求排除李承晚分子进行这类挑衅的任何一点可能性，而金日成不亲自参加板门店停战协议签字，这一点就可得到保证。在这个问题上，苏共中央建议不要对其他任何意见让步，因为在此情况下，这些意见是次要的。但是，金日成拒绝前往板门店当然不应有示威性质。此外，正因为金日成将不去板门店，故彭德怀同志在板门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亲自签署停战协定就十分重要。

苏共中央不认为，金日成不去板门店有可能被美国人用来拖延签署停战协定。由于这个理由而拖延停战协定的签署是不会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的。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如果金日成不亲自签署停战协定，将会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造成不良的印象。我们毫不怀疑，朝鲜朋友和中国朋友会以应有的方式解释这一点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

苏共中央希望朝鲜朋友和中国朋友注意到这些意见。我们希望这些意见将被重视。

请通报金日成和朝鲜朋友们，我们同时还将上述意见发给北京的苏联大使，以便使其通报毛泽东和中国朋友们。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69-171

文件 12

马林科夫关于签订朝鲜停战谈判协定事宜致金日成电

（1953年7月27日）

关于第20号会议记录的第8条

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金日成同志：

全体苏联人民对于签署停战协定的公报非常满意，他们将停战谈判的顺利结束看作是英雄的朝鲜人民和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伟大胜利。

朝鲜停战协定同时也是整个和平和民主阵营的巨大胜利。

随着战争的结束，摆在朝鲜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恢复朝鲜国家的民族统一，同时还要恢复由于战争强加于朝鲜人民身上的已经被摧毁的国民经济。

苏联政府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完成这些巨大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过程中取得成绩。苏联政府准备给予饱受了苦难的朝鲜人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使其恢复和平生活，医治他们为争取自己祖国的和平和独立而进行的血战所造成的巨大伤痛。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马林科夫

1953年7月27日，于莫斯科

文件 13

库兹涅佐夫关于毛泽东谈停战问题给外交部的电报

（1953 年 7 月 29 日）

发自北京

紧急密码电报

抄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波采罗布

（关于 7 月 28 日会谈的报告）

在接受了苏共中央的问候之后，毛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我向苏共中央转达深切的感谢。毛注意到，敌人被迫提出停战不仅迫于军事上的原因，而且迫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在军事问题上，最近一年的情况已经表明敌人在陆地上不仅不能前进，也不能稳固地保持和守卫前线。中国军队不仅已经开始实施阵地战，也能够打破（敌人的）防线。

在迫使敌人停战的政治原因中，毛提到帝国主义阵营在军事上的矛盾和世界反对朝鲜战争的社会舆论的重大作用。

关于经济上的原因，毛阐述了在战争的头两年，美国的垄断集团在军火定货和交付中积累了庞大的利润，但是随着停战谈判的结束，也随着朝鲜战争停战运动加强的结果，他们的利润开始急剧地下降。

回到军事问题上，毛指出，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但再向南方深入，就会冒过分暴露朝鲜东西海岸侧翼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中朝军队的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将会大大增加。

谈到停战签字后更进一步的打算，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许多相关问题想和苏联政府商量。大约到 8 月 10 日，我们将准备一个有关必须要与苏联政府商量的措施计划的建议。

周恩来出席了会谈。

库兹涅佐夫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87-189

文件 14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答谢电

（1953 年 7 月 30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实现朝鲜停战的贺电，深为感谢。

在整个朝鲜反侵略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都给了中国和朝鲜人民以重大的支持。苏联、中国和朝鲜的充分的团结一致，保证了朝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将继续与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和平及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3 年 7 月 30 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30

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4 期，编号重排

人名译名对照表

阿马斯顿，T. Hammarstrom

艾德礼，C. Attlee

艾利森，John M. Allison

艾奇逊，Dean Acheson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

安特扎，Entezam

奥斯汀，Warren R. Austin

巴伯，Walworth Barbour

巴季茨基，П. Ф. Батицкий

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

别尔乌辛，М. Г. Первухин

波采罗夫，В. Поцеров

波尔特尼科夫，Georgi Kuzmich Poltnikov

波伦，查尔斯，Charles E. Bolen

波马兹涅夫，М. М. Помазнев

勃列日涅夫，А. А. Брежнев

博尼斯蒂尔，Charles H.Bonesteel

布尔加宁，Н. А. Булганин

布莱德雷，Omar N. Bradley

崔光，Choi Kwang

崔庸健，Choi Yong-kon

丹吉，S. A. Dange

德田秋一，Tokuda Kyuichi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
杜威，Thomas E. Dewey
范登堡，Hoyt S. Vandemberg
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芬勒特，Thomas K. Finletter
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高士，Ajoy Kumar Ghosh
戈尔拉乔夫，Горлачёв
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К. Готвальд
格罗斯，Ernest A. Gross
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A. A. Gromyko
宫本显治，Kenji Miyamoto
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Гарриман
赫尔，Cordell Hull
胡志明，Ho Chi Minh
华西列夫斯基，А. М. Василевский
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
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霍奇，John R. Hodge
基思连科，Кисленко
吉田茂，Иосида，Yosida
贾丕才，М. С. Капица
杰列维扬科，К.Деревянко
杰塞普，Phlip C. Jessup
金灿德，Kim Chan-dek
金策，Kim Chaek
金达三，Kim Dal-sam
金枓奉，Kim Tu-bong
金光侠，Kim Kwang-hyob
金日成，Kim Il-sung
卡冈诺维奇，Л. М. Каганович

凯南，George Kennan
柯克，Alan G. Kirk
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
柯涅克，Конек
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
柯西金，А. Н. Косыгин
克拉克，Mark W. Clark
克拉索夫斯基，С. А. Красовский
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库兹涅佐夫，В. В. Кузнецов
拉祖瓦耶夫，В. Н. Разуваев
腊斯克，Dean Rusk
赖伊，Trygve Lie
兰纳迪夫，B. T. Ranadive
劳，贝内加尔，Benegal N. Rau
李承晚，Lee Syngman
李光武，Ли Гвон Му
李海，William D. Leahy
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
李相朝，Lee Sang-cho
李钟植，Lee Chong silk
李周渊，Lee Ju-yeon
列多夫斯基，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路易·赛扬，Louis Seilhan
罗慕洛，Carlos P. Romnulo
罗申，Н. В. Рощин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洛博夫，Г. А. Лобов
洛奇，Henry Cabot Lodge
马兰金，Маландин
马立克，Я. А. Малик

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cв
马特雷，James I. Matray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马修斯，H. Freeman Matthews
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
梅津美治郎，Yoshijiro Umezu
梅农，Krishna Menon
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A. I. Mikoyan
米库诺夫，Мугунов
缅希科夫，М. А. Меньшиков
莫尔斯，Morse
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
穆克，A. Morch
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ьёв
穆乔，John J. Muccio
南日，Nam Il
尼采，Paul H. Nitze
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
潘尼迦，K. M. Panikkar
培根，Ruth E. Bacon
佩利申科，В.И.Пелишенко
佩斯，Frank Pace
皮尔逊，Warren L. Pierson
朴宪永，Pak Hon-yong
朴一禹，Pak Il-u
普希金，Г. М. Пушкин
切乔特金娜，Olga Chechetkina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日丹诺夫，В. М. Жданов

萨布罗夫，M. З. Сабуров
萨莫欣，A. B. Самохин，A.V. Samokhin
施纳贝尔，Schmbel
什捷缅科，C. M. Штеменко
什特科夫，Т. Ф. Штыков
斯大林，Й. В. Сталин
斯塔哈诺夫，Стаханов
斯特拉特迈耶，George E. Stratemeyer
索科洛夫，M. И. Соколов
索洛维约夫，K. C. Соловьев
索普，Willard L. Thorp
塔夫脱，Robert A.Taft
特卡琴科，В.П. Ткачинко
特罗亚诺夫斯基，О. Трояновский
托尔库诺夫，A. B. Торкунов
瓦西里耶夫，H.A.Васильев
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
韦伯，James E. Webb
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
文日，Mun Il
沃尔科格诺夫，Д. Волкогонов
沃尔特，Walter
乌菲姆采夫，Е. Уфимцев
武亭，Mu Jong
希克森，John Hickerson
希特勒，Adolf Hitler
谢尔曼，Forrestal P. Sherman
野坂参三，Sanzo Nozaka
伊格纳季耶夫，A. M. Игнатьев
尤金，П. Ф. Юдин
约翰逊，Alexis Johnson

约希，Puran Chandra Joshi

扎哈罗夫，M. B. Захаров

志贺义雄，Shiga Yoshio

佐林，B. A. Зорин